

红色中国网文集
(2014年)

目录

当前形势与社会主义革命（2009年）	3
分清敌我友，坚守独立性	19
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25
谁是我们的“同志”？谁是我们的“朋友”？	37
致天津市部分网友代表的复信	40
红色中国网《国内周刊》创刊了	42
与清水同志商榷——兼谈社会主义革命的策略	44
许志永在当代中国有进步意义吗	50
东亚各国各地区资产阶级之间没有根本不可调和的矛盾	54
谈谈乌有之乡	57
马列毛主义者把握农村问题的几个方面	63
薄熙来与辽阳铁合金厂的工人运动	66
21世纪与共产主义	69
从两件事看中国资本主义的依附性	78
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普遍实行生态农业	81
社会运动中的精英主义	85
精英主义与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机会主义	88
所谓社会主义核心政治组织	95
区分脑力无产者的意义是什么	97
裕元四万工人大罢工预示革命潜力	106
中国的“廉价劳动力”时代即将终结	113
《怎么办》的启示——也谈社会主义者当前的问题和任务	120
高居矛和袁庚华在政治上有区别吗？	126
少年中国评论批判大纲	131
新生代的胜利——裕元工人的团结斗争	137

薄熙来在法庭上的最后陈述	140
中国的阶级力量对比正在起变化	147
当前左翼内部两条路线的争论概述	151
希望红色中国网成为未来的新《火星报》	156
传统社会主义失败了，还是黎亚彬失败了.....	159
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异化问题的一些思考	173
如果红中网变成了“最革命者”的舞台，该说告别的是我	176
马列毛积极分子怎样对待小资产阶级进步派别	177
社会主义、修正主义及其同路人	184
《金融时报》、《华尔街日报》与中国经济	188
香港问题正在起变化	191
关于香港问题要抓主要矛盾	193
致红色中国网友，欠很多朋友一声同志	195
复新愚公 —— 关于几个经济问题	199
只要资产阶级无办法，最后无产阶级总归有办法	201
中国的马列毛左派要敢于走前人和外国人没有走过的道路	203

当前形势与社会主义革命

作者: 程广胜 04/03/2009- 华岳论坛 - <http://www.washeng.net/>

(一) 资本主义危机

当前正在深化的全球资本主义危机，我们乐观其变。我们认为，这次危机更加不可克服的局面还没有出现，危机正处于第一个阶段，即经济衰退正在发生，其后是一个相继持续数年的停滞阶段；第二个阶段美元面临崩溃，美国首先出现经济的滞胀，即经济停滞并伴随通货膨胀的阶段；第三个阶段，由美国一国的经济滞胀发展到全球资本主义经济滞胀。这是我们对未来十年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状况的大致估计，其中能源、资源和环境问题是资本主义起死回生的最大制约因素。目前我们看不到资产阶级克服这次资本主义重大危机的可能途径，全世界无产阶级反对资本的运动也将成为日常现象。

在这次危机中，除欧美外，被称为“金砖四国”（BRIC）的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尤其是我们关注的重点。这四个国家都有如下共同特征：一、高度依赖欧美帝国主义国家的市场；二、人口基数大，工人阶级数量和力量相对增长较快，斗争进一步在发展；三、都存在严重的能源、资源和环境问题。也就是说，是帝国主义的脆弱地带。

中国资产阶级目前还有一些本钱，即 2 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和殷实的财政收入及较强的投资能力。在全球危机进一步加深的情况下，其财力却也是个不断消耗的过程。美元贬值导致外汇储备缩水，外贸顺差转变为逆差，国内税收逐渐减少和挽救危机不断消耗财政资金的过程。期间也不排除出现阶段性繁荣的可能（当前中国金融货币状况理应处于资产阶级可控制的范围内。出口减少主要打击私营企业，不会对整体经济造成致命的影响。就业问题引发社会群体事件是个逐渐表现的过程）。但是，随着以美国为核心的超帝国体系走向瓦解，中国的中央集权体制也将是个分化瓦解的过程。它的两根支柱（中央军队和中央财政）之一的中央财政趋于枯竭可能会导致政治危机的发生。中国的政治危机更可能的是中央集权制的瓦解。

面对危机，中国资产阶级究竟采取何种政治统治形式，他们内部是存在分歧的。一般来说，资产阶级为了自身的统治，总是要加强专政的。只有当自己的统治面临危机，无产阶级的力量足够强大的时候，他们才会做出让步以保全自己。当前，中国统治集团坚持采取一党专制是有利于整个资产阶级的（今年两会强调“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而谢绝“三权分立”，证明是在统一认识——政权的稳定，抑制工人的斗争是资本增殖的保证）。只有当危机深化，“‘下层’不愿照旧生活而‘上层’也不能照旧维持下去”的时候；资产阶级面临被无产阶级革命所推翻时，为避免革命的发生，资产阶级便有可能利用人民痛恨“党腐败”和渴望“民主监督”而做出表面的让步，即玩弄欺骗人民的两手：一手“打倒共产党”，并宣布共产党非法，共产主义者为恐怖主义；一手实行“宪政民主”，推行议会民主制度，以此把小资产阶级争取到自己一方面来。但是资产阶级的这种类似演双簧的伎俩，却使一些所谓左派人士一时欢喜一时愁。某些“保皇派”人士把人民的民主要求看作洪水猛兽，对人民遭受的专制压迫视而不见，鼓吹统治集团内部存在着什么“社改派”与“资改派”，进而用“资改派”的“颜色革命”吓唬人民，用“社改派”的“和谐社会”让人民产生希望，这种行为不是愚蠢便是反动。另一些“开明派”人士却不能正视政权的资产阶级一党专制的性质，时不时地把它同无产阶级一党专政相提并论，这种混淆阶级专政甚至拒绝承认阶级专政的思想，使他们完全陷入了“民主”的空想，其结果不能不成了资产阶级的尾巴。事实上，统治集团中根本不存在什么“社改派”和“资改派”之分，而只有资产阶级一党专制与多党制之别。“零八宪章”分子只不过是后者的摇旗呐喊者、资产阶级队伍中的投机分子罢了，但是，它却产生了显著的效果，这就是对小资产阶级的迷惑作用。

（二）左翼改良派

改革的极右道路把广大劳动人民推向了对立面，对市场经济抱有幻想的小资产阶级也随着危机的加深逐渐成为“改革”的反对者。他们的加入使得左翼阵营壮大了，伴随人数的增长所必然产生的思想混乱也逐步加剧起来。分

歧尤其表现在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上：中国社会的性质及其主要矛盾，以及对它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还是改良的任务选择上。

改良派的基本认识是：中国是依附性资本主义，主要矛盾表现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同广大人民之间的矛盾，“民族资产阶级”是人民的一部分。社会主义革命不能毕其功于一役，经济上需经一个混合经济的阶段，发展一段国家资本主义；政治上须经一个民主革命的阶段，主张建立无产阶级和所谓进步资产阶级联合执政的多党民主政治体制。但改良派在实现途径上有两种不同的主张：一部分人主张通过加强“共产党内社改派”的力量，促其左转，最后“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另一部分人则主张通过与所谓“民族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派联合，结束一党专制，实行议会民主道路，实现社会民主主义。左翼改良派的共同特点是惧怕资产阶级，惧怕革命；缺乏对无产阶级的信心，本质上是一条精英思想路线。

改良派不能认清或承认中国资本主义的实质就是依附于美帝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一党专制正是资产阶级的一党专制，工农被剥夺了管理国家和经济事务的权利。他们往往通过强调中国对美帝的依附性买办性而掩盖它本身正在膨胀的帝国主义倾向，从而错误地把革命目标确定为本国范围内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鼓吹国家资本主义和工农民主政权（同时打着为我所用包装起来的“毛主义”和民主自由两面旗帜）就是他们的既定政策。这只不过表明了一些人寄托于“党内社改派”（似乎对国有经济成分逐年减少的事实视而不见）对工农的开明，另一种寄托于“工农民主要求”对统治者的胁迫罢了（后一种认识往往基于如下借口：今天的腐败独裁专制制度即将崩溃，代替它的将是民主监督的多党制度，工农将在未来的民主政治结构中拥有一定的权力，从而能够与“民族资产阶级”形成力量的制衡）。

我们认为这是小资产阶级立场在对待中国革命问题上的当代反映。一方面，他们否认今日中国资本主义是由社会主义直接复辟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一事实（忘记了这是一个在帝国主义时代积极参与帝国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推行新自由主义的“改革开放”过程），从而要么把这种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误

判为政权上的社会主义与经济上的资本主义的混合物，幻想在这个基础上由“党内社改派”加大国有化成分把中国“改回”到社会主义（应该是邓小平时期的国家资本主义）；要么把资产阶级简单地划分为腐败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所谓进步的“民族资产阶级”，并夸大两者之间的矛盾，幻想后者具有革命要求，企图与其建立统一战线的关系。促成他们宁走改良道路而不思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另一方面原因是，他们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进行了错误的总结并从根本上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对工人阶级未来作为革命阶级和领导阶级丧失信心，形而上地理解暴力革命甚至惧怕革命从而失去了革命的想像力。由此看来，如果说刘少奇当年的“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是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停止不前，那么，左翼改良主义的路线在今天就是一种历史的倒退。

今天看似进步的改良派，由于它的主张满足了一部分群众的要求和愿望，因此会得到部分急切希望改变自身处境的群众的追随和呼应。但由于它最终将把无产阶级引入到资产阶级的制度体系中这一根本性的错误，从而削弱无产阶级的力量并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取得成功的重要干扰力量。

（三）社会主义革命者

社会主义革命者比较完整地继承了马列毛主义关于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认为当今中国是一个资产阶级全面复辟的资本主义社会，主要矛盾是不断激化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革命的性质是消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者不会简单地理解中国的资产阶级，我们认为这个资产阶级的形成、壮大及其所表现出来的阶级特征，是与修正主义集团复辟、国际垄断资产阶级施行的政策（新自由主义）以及共同瓜分公有财产、剥削压榨工人农民紧密相关联的。中国的资产阶级从历史形成来看，主要来源于两个部分，一部分来源于走资派修正主义集团，一部分来源于修正主义政策培养的新兴资本家。由于现代修正主义是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国际垄断资产阶级政策的产物，所以它对外极具投降

买办性，对内推行大官僚资本集团专制；而新兴资本家阶级不仅继承了中国历史上资产阶级两面性和软弱性的传统，而且形成于修正主义卵翼之下共同瓜分公有财产，具有资本原始积累特征的短期暴富，所以精神上自满，政治上幼稚胆怯。它不但惧怕和屈从于美帝国主义和中国官僚专制集团，同时惧怕任何形式的革命打烂自己的坛坛罐罐。因此，社会主义革命者既不会寄希望于腐朽腐败的官僚买办集团改弦易辙，也不会对新兴资本家阶级抱任何革命的幻想。但无产阶级革命并不排除对在修正主义政策下缓慢积累资本的部分资本家以社会主义改造的机会与政策。

社会主义革命者认为，只有工人阶级才是与社会主义的命运息息相关的一个阶级，农民阶级是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必须始终坚持以工人阶级为领导阶级，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基本方针。指导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思想理论基础是一以贯之的马列毛主义，反对任何人将马列主义与毛泽东主义割裂和对立起来，采取为我所用的伎俩诠释和包装“毛泽东主义”。一个社会主义革命者，不仅要承认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还要始终贯彻“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的毛主义群众路线。反对以任何借口以任何形式推行那种“相信少数，依靠少数，发动少数”来“运动群众”的反动精英路线。

（四）中国工人阶级

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向中国大举输入资本获取超额利润的同时，中国修正主义集团为了自身利益，不惜与跨国资本合流把中国劳动人民创造的公共财富进行了最直接最野蛮的剥夺。如果说这是一次阶级报复，一次反攻倒算也是毫不夸张的。摧毁公有制经济导致老工人丧失了稳定的工作岗位和福利保障，迫使他们成为待价而沽的商品；中止了农村集体化进程排挤出大量的青壮年农民，迫使他们背井离乡充当了国际国内资本增殖的廉价劳动力，劳动力商品化的这一过程伴随着的是工人的自相竞争加剧，众多的老工人或者接受工资福利的消减，或者被排挤出了生产领域。伴随着中国成为世界加工

厂，新工人的数量也在急剧增长，然而经济危机的发生迫使资产阶级必须毁灭掉一部分生产力，这其中就包含一部分资本家不再使用的劳动力——越来越多的人失业了，其他的人为了保持住工作岗位不得不接受更加苛刻的条件。这就使工人越来越意识到自己同其他商品一样，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只有交易成功或者卖个好价钱才能生存。

但是，工人毕竟是人，它除了具有商品的一般属性外，还有其特殊性。这一特殊性就是他能形成阶级联合并与资本相对立，否则，他将会任由资本来宰割。最能体现无产者反抗力量的是工人作为阶级的组织力量和思想精神力量。犹如衡量一个人的机能和健康状况往往从他的肌体协调性和大脑思维逻辑性两方面进行考查一样。那么，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的反抗力量究竟会是个什么样子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必须对中国工人阶级队伍的特殊组织成分做出说明。

中国工人阶级的时代特性需要从这个阶级的形成过程中得到考察。它的独特性是基于其间出现了一个社会主义阶段，从而中断了“劳资对立形成阶级”的传统形式。归根结底，它与中国近六十年来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复辟道路的交替具有直接相关性。有鉴于此，我们把中国工人阶级队伍的组成按照他们的形成历史和条件分为老工人和新工人这两类来说明这一问题。

老工人不完全是一个年龄的、个体的概念，他们是指这样一类工人：都具有在公有制经济单位中体验一定阶段工人角色的经历，并能够把个人与单位集体看作为一个共生的统一体；观念上把自己所属单位的生产资料看作为集体创造公共所有而非官僚或经理私有，一旦管理者对单位用工制度、生产制度、分配制度或所有制进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变更时能够意识到自己的被剥夺被雇用处境。新工人同样不完全是一个年龄的、个体的概念：他们是随着中国城乡资本增殖扩张、境外资本输入所建立起来的劳资关系中成长起来的雇用工人。这类工人的基本共识是：企业是企业家或资本家的企业，自己是仅靠工资为生的、别无其他出路的劳动者。

关于中国工人，我们常听到一些议论，归纳起来表述如下：中国的大多数老工人已经被排除在生产领域之外，失去了组织起来的条件，就职于企业之中的此类工人由于官方工会的控制和工作岗位的竞争，完全趋于保守；他们的阶级意识是毛泽东时代因为政治斗争的需要附加上去的，随着原来公有制体系的崩溃，他们便成为了散兵游勇，阶级意识随之消散；如果他们有斗争，也只是为了眼前的蝇头小利；他们怀念历史只是一次回光返照，他们没有未来。新工人是中国工人的主体，他们居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中，此起彼伏的罢工斗争说明他们正在经历着“劳资对立形成阶级”的进程中，毫无疑问，他们将在汲取国内外工人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中成长，其斗争成长的轨迹完全符合马列关于欧洲工人阶级的论述。鉴于列宁曾经讲过：“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而工联主义正是意味着工人受资产阶级的思想奴役”，它的“阶级觉悟只能从外面灌输给工人”。因此，今天社会主义革命者的主要任务不是去关注老工人而是要向新工人灌输社会主义的理论。

前面提到，有一种改良派他们形而上地割裂历史联系地把中国的资产阶级划分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所谓民族资产阶级，然后把前者说成是坏资产阶级，后者看作为好资产阶级并企图与其建立统一战线关系。显而易见，我们不能同意这种人为地割断历史，任意扼掉了几乎 60 年社会主义建设和资本主义复辟过程的分析方法，似乎今天的中国资本主义只是消除了土地封建因素并在量上发生了一些赋有时代特征的变化，其社会性质基本保持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前的状态，从而得出须经一个民主革命阶段的结论。同样，社会主义革命者不能像上述改良派一样也犯割裂历史的错误，把中国的工人阶级简单地划分成所谓保守的老工人和激进的新工人，并断言背负“伤痕历史”、丧失斗争手段的老工人退出革命的舞台是生命的自然规律所决定的，而新工人是工人运动的主体，并肩负着未来则是不言而喻的。这种分析思路，联系到今天大量的农民处于小生产状态、新工人大量来自于农民这一事实，得出社会主义革命须经一个民主革命阶段的结论也不是不可能的了。因此，我们

不但要用辩证统一的历史的观点分析认识中国的资产阶级，避免将资产阶级的成分进行简单地切割和对立，同样必须运用这一观点分析认识中国的工人阶级，从而才能说明为什么我们的革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而不是民主革命性质的。

中国的老工人，也可以称作为城市传统工人，是伴随着中国 30 年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进程和 30 年资本主义复辟过程形成的。这一过程包含着两个对立的社会制度的交替，但对老工人而言时间上是连续的，无论就某个个体来说他处于时间序列的哪一个点上。如果我们能把其阶级的组织化程度和阶级意识进行量化并作为纵坐标，时间作为横坐标，那么，有人也许会得出两者在六十年里的变化轨迹均表现为一个正态分布的结论。我们认为这是不符合实际的。工人的组织化程度由于容易受外力干预，比如国家政权的扶持或打击，它的确更接近于一个正态分布；而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却是由无数个个体的经验和认识统一形成的集合体，同时，两个阶级的对立越激烈越显著，就越会加强各自的阶级意识，对资产阶级是这样，对无产阶级也是这样。例如对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的评价，老工人与修正主义集团得出的结论则是完全对立的，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尤其能说明这一问题。因此，老工人的阶级意识不是一个呈现正态分布的状态，这个曲线呈现出来的恰恰应该是一个逐步增长增强的趋势。但是，综合考虑老工人群体的年龄因素、组织化程度和阶级意识，显现在我们面前的却更像是一个头脑发达、肢体残缺的事物，无产阶级这样的状态将怎样同有组织的资产阶级决战呢？这个问题我们留待后面做进一步的阐述。

中国的新工人，通常被认为形成历史短暂，只有不到 30 年。有两个方面似乎可以说明这一结论：一是这一群体本身的形成历史时段，二是从它被隔断与老工人之间的阶级意识联系。前者容易理解，它形成于 30 年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过程。第二个方面我们需要做些分析（由于中国的新工人没有自己的政治和社团组织，甚至缺乏形成“工联主义”的组织条件，所以后面在分析新工人的时候忽略了对他们的组织化程度的考察。）。这里讲的新

工人，主要来源于农民和城市工人的后代（大中专院校毕业生分别按出身包含在各自部分），显然农民占其中的最大多数。无论从农民的视角，还是他成为工人，即便是接受了大中专教育之后成为工人的视角，他们眼中的老工人都有着完全不同于自己的历史。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是工作还是生活，他们很少能够把自己与老工人建立起什么联系。即便是在某些存在新老工人工作岗位混合的场合，这些有“特权”的老工人也是新工人表示不公平的对象。就是对那些下岗工人，他们一方面认为自己比他们强（自己有土地保障和竞争力），另一方面对这些“计划经济的弃儿”、“吃大锅饭的懒汉”仍然获得政府的经济补贴深表不理解和不认同。总之，不了解及认同度低是来自农民的新工人对老工人的基本认识。尽管这些老工人中的相当大一部分都是上世纪来自农村的农民，是这类新工人的先辈，但这却是他们所不知道的，也很少有人向他们提供了解这一历史事实的材料。在这里，新老工人的历史是断裂的。但是，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在统治阶级利用种种手段制造新老工人之间隔阂的时候，我们不能把这种结果加罪于农民及新工人。众所周知，疏于同老工人发生联系的新工人获得信息的主要来源是主流媒体和官方的宣传，那么在他们的头脑中形成这种对老工人乃至与老工人的命运紧密相联系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扭曲的认识就不奇怪了。当资产阶级学者以专家教授的名义向他们大量灌输毛泽东时代“城乡二元结构”导致城乡对立、导致城市传统工人优越于农民的时候，新工人能有什么样的阶级意识和阶级觉悟抵挡得了这些精英们的说教呢？没有，他们刚刚形成的一点劳工阶级的意识和经验会被这种“权威解释”击得粉碎。这种无非是要分裂新老工人阶级队伍，堵塞新工人产生丝毫社会主义要求的伎俩，要被这类新工人彻底看穿还需要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资产阶级学者是会不断制造出种种谬论迷惑和麻痹工人为建立劳动解放制度进行斗争的意志。可以设想，某一天由精英们普遍呼吁“组织独立工会，争取罢工自由权”的时候，我们也不会感到有多么令人惊奇。相对于修正主义集团开出的“农民工是中国工人阶级的重

要组成部分”、是领导阶级成员的空头支票，实则默认甚至怂恿“血汗工厂”的存在而言，精英们的“呼吁”对新工人来说要更吸引人一些。

那么，那些是为老工人的后代的新工人有什么样的阶级意识呢？首先，他们是在耳闻目睹自己的长辈被推入深渊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毫无疑问，他们不会简单接受主流宣传加在老工人身上的种种诬陷，但同时，长辈的悲惨命运也促使他们产生强烈的摆脱本阶级队伍的愿望，然而，其中的大部分最终还是成为了雇佣劳动者，从逻辑上讲这种新工人正是联系新老工人之间阶级意识和阶级历史的一个纽带。首先，他们清楚地看到，老工人是个由企业的主人自上而下进入劳动力商品市场的过程，来自农民的新工人是个由下而上进入劳动力商品市场的过程，最后两者共同汇集到劳动力市场出卖自己，受资本家压迫和剥削。其次，他们从父辈那里得到了一些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模糊认识，同时又能深刻体会到血汗工厂对工人的摧残，这样，我们可以把这一群体的特征看作为联系新老工人的过渡状态。过渡状态是一个力量相对均衡的状态。但是，鉴于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阶级对立的客观存在，阶级力量的对比是个不断发生变化的过程，因此，本阶级内部的这种均衡就只能是相对的暂时的。如果资产阶级的危机引起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在近些年来广泛展开，老工人因为仇恨和绝望所产生的清算修正主义集团的斗争必将达到一个新的政治高度，那么其后代的政治意识就会向着自己长辈的水平看齐，并将这种力量传导给新工人的主体部分，使其阶级意识迅速迈过“工联主义”实现阶级意识和政治意识的跨越式发展；如果资产阶级的力量长期保持优势于工人阶级，那么，兼具无产阶级政治意识与资产阶级经济意识的这类新工人被以农民为主体的新工人的工联主义倾向所拖累的可能就会大大增加。因此，如果我们静态地观察中国工人阶级的队伍组成，并忽略掉来自老工人的后代建立在新老工人之间的历史联系，且假设资产阶级长期处于优势地位，那么，新老工人之间的阶级历史就中断了，我们就可以做出新工人的阶级历史不到 30 年的结论。而要改变这一结论的，将是一场把所

有工人阶级都卷入其中的大规模的阶级斗争，这一阶级斗争的方向将是指向社会主义革命的。

（五）社会主义革命

革命的爆发总是要具备一定的主客观条件，尤其社会主义革命，是否取得成功还需要满足更多的条件，其中革命路线正确与否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力量对比是决定胜负的关键因素。

从世界体系来看，今天垄断资产阶级已经把全球联系成一个更加紧密的、结构分明的整体，帝国主义的腐朽性和垂死性表现得更加明显了，无产阶级的贫困化在不断加剧。包括国际资产阶级在内的有识之士也不得不承认，以美国为核心的超帝国主义世界体系正在走向衰落，那么，列宁关于链条将在帝国主义最薄弱环节断裂的观点能否再次成为现实，这是每一个社会主义革命者都特别关注的问题。前面提到的被称为帝国主义脆弱地带的“金砖四国”，其中就包括中国，而且在帝国市场依赖、无产阶级的数量质量以及能源资源环境问题三个方面较其他三国表现得更为突出。从亚洲来看，唯一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日本十多年来经济低迷，它在能源和资源上又严重依赖国际市场，可以预计，这次持续的全球危机必将重创日本经济，进一步消弱日本资产阶级力量。俄罗斯横跨欧亚大陆，是一个资产阶级主要依靠能源资源和军事力量（所谓井架加导弹）维持统治的国家，危机不仅对它的能源出口国地位产生微妙的影响，同时使其安抚俄国无产阶级的能力大打折扣。印度同中国一样，是亚洲一个人口大国，全球危机致使国内两极分化越发严重，它的持续蔓延的人民武装力量为世人所瞩目。可以说，全球“金砖四国”中有二个半在亚洲，占全球人口总数的大约五分之二。

中国除了具有“金砖四国”的上述一般特征外，还有着自己突出的一面，这就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和严重缺乏基本保障的数量达三亿之众的阶级队伍。修正主义集团在摧毁社会主义工业体系的同时又把中国变成为帝国主义的世界加工厂，这就不可避免地为自己锻造了一个置自身于死地的庞大

的革命无产阶级队伍。中国一旦发生社会主义革命，不仅会对世界各国无产阶级革命产生辐射作用，而且将大大加速世界帝国主义体系的崩溃。

中国资产阶级的腐朽腐败与堕落遭到全国人民的唾弃为世人所共知。不仅如此，他们的贪得无厌和短视、他们同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的勾结致使中国东部和西部发展差距与贫富两级分化均超出了临界状态，这无异是掘好了埋葬自己的坟墓。中国的东部及沿海一带是资本主义相对发达的地区，国际垄断资本和中国的大资本家也主要盘踞在这里，大量来自外省城市和农村为他们服务的无产者却只能取得“暂住”的条件。资产阶级借用“户籍制度”来达到自己最反动的目的，使这种居无定所、岗位不稳定的无产者不断处于流动状态，这无疑会消弱无产阶级的凝聚力量和队伍的稳定性，成为资产阶级取得对当地无产阶级绝对优势的重要影响因素。相反，中国的中西部是资本主义欠发达的地区，它没有能力吸收和消化因大量国有集体企业私有化或产业向东部转移而排挤出的老工人，另一方面，这一地区又是新工人劳动力的主要供应地，当经济危机导致失业发生时，他们往往必须从东部退回到当地，这就为中西部新老工人阶级对当地资产阶级形成力量上的优势创造了重要条件。其次，西部是少数民族聚居区，不断激化的民族矛盾本质上是阶级斗争的反映。应该说，中国是全球帝国主义体系的一个缩影。全球有“金砖四国”，中国也有“金砖西部”。

那么，中国的无产阶级应该怎样利用国际国内的有利条件壮大自己的力量，力争中国首先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呢？

超帝国主义体系走向衰落是作为外因影响着中国革命的发生和发展的，中国革命的是否发生并取得一定胜利，归根结底在于中国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力量对比，以及无产阶级采取正确的战略路线。这就是，找到中国资产阶级的薄弱地带，充分发挥工人阶级的革命优势。

中国的地区发展严重不平衡，贫富两级分化加剧是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垄断资本的本性所决定的，是其自身无法克服的。经济危机只能加剧而不是缓解这一趋势。中西部一方面是东部沿海一带的能源、资源和

廉价劳动力供应地，另一方面又是东部金融资本输入和商品倾销地。同时，东部及沿海一带又连接着世界帝国主义市场，充当着国际垄断集团蓄血池的角色。因此，切断西部与东部之间的输血管道，无疑将会削弱核心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重创国际跨国集团和中国买办集团，增强东部沿海一带无产阶级的力量，改变这一地区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优势地位。

中西部地区是近现代革命爆发的策源地，无论是资产阶级的辛亥革命，还是无产阶级的土地革命均是从这里发生发展的，因而是一个具有革命传统的地区。近年来频频发生的直接挑战当地政权的群体性事件，就主要集中在这一地区。今天，这一地区又集中了中国最革命的阶级——中国工人阶级的一支特殊队伍：千百万曾受社会主义大工业三线建设训练，深得毛泽东革命思想影响，后遭修正主义集团阶级报复，生活极其艰辛而渴望革命改变自己命运的老工人；数量庞大的遭受资本家“血汗工厂”压榨今又因危机而承受更加严酷剥削的以及失业回乡才真切体验到自己一无所有而艰难寻找出路的新工人。

从以往老工人的反私有化“护厂运动”以及近年来为争取生活保障待遇同地方政府发生对峙和新工人为争取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进行的罢工斗争来看，他们均缺乏有形的组织而表现为自发运动。这一方面因为专制政权不择手段地压制和打击，工人没有条件建立自己的组织；另一方面，恰恰因为不存在有形的组织才使得斗争以群众运动的形式表现出来。这种群众运动的形式通常都局限在一厂一事的范围内，资产阶级力量的强大很难使他们跨越这一范围进行更广泛的动员。然而，无论是有组织的抗争，还是群众运动，都是斗争的外在形式，真正推动运动前进的是斗争的实际内容。对于老工人而言，他们的斗争内容是分层次的，既有最低要求也有最高目标。最低要求就是大家通常看到的，表现为经济的内容，反映的是个体生活的要求。诸如“要吃饭，要生存”的口号便是这一目标的表述。这一要求能最广泛地动员群众，也可以最大限度地保护工人免遭政权的打击。其次是保护或夺回工厂的斗争，具有反私有化的性质，表达的是一个单位工人集体的共同利益。这一

斗争反映的是工人这样的理念：工厂企业是工人们的劳动积累而不是资本家的，是政府做嫁通过官商勾结私分了工人的财产，打碎了工人的饭碗。因此，工人们的斗争矛头直指当地政府，而较少与资本家或管理层发生纠葛。“保护国有资产”、“惩治腐败分子”等口号便是表达这一层次斗争内容的。如果需要用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概念来表述，那么，这一阶段的斗争就是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之间的过渡。老工人的最高要求便是政治的并涉及社会制度的要求，这一层次的要求很少在可观察到的现实斗争中表现出来。2002年东北一个地级城市辽阳发生的工潮，是在同一个城市由多家工厂联合并有数万工人参加的持续数日的群众运动，他们打出的主标语“罢免XXX，解放辽阳市”就表现出了浓厚的政治斗争取向。这可以说明，工人的斗争一旦超出工厂范围并表现为阶级的行动，便可能向着政治斗争的方向发展。

在修正主义集团的专制统治下，老工人无比艰难地进行着反复辟斗争，新工人还处在为争取工资和劳动条件的自发斗争中，还没有建立起为自己的未来进行斗争的阶级意识。这时候我们一些革命同志便产生了悲观的情绪，认为既然没有暴力革命的条件，资产阶级的多党制度总是要比专制来得好一些，它至少可以给工人以组织的权利。怎样看待这一问题呢？首先，今天的资产阶级是有民主自由的，这可以从资本的自由程度上来考察；如果说还不充分，那是因为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已成历史，中国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之故。缺乏民主和自由的正是工农劳动人民，老工人缺乏抵制企业私有化的民主自由，新工人缺乏实行罢工对抗资本家的民主自由，农民缺乏反抗官僚压榨的民主自由。工农的民主自由多了，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就少了，资产阶级怎么会赐予工农民主自由来反对自己呢？其次，如果资产阶级开放党禁，那只能是因为他们面临被推翻危险的时候，或者如俄罗斯的叶利钦一般，只为了最上层的官僚和大资本的利益不惜牺牲整个资产阶级利益和国家民族利益的时候。这种民主既然是资产阶级为一时之利对无产阶级的让步，那么，一旦他们的统治得到巩固，马上就会收回这种民主自由的承诺，甚至向人民的民主发起进攻。叶利钦炮轰俄国议会应该还存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俄国

工人阶级至今不能有效组织起来捍卫自己的利益，根本的原因是俄国的工人阶级没有真正的民主自由。多党制对于无产阶级来说，只不过是一种资产阶级玩弄的游戏。中国工农渴望真正的民主自由，但这只能由工农自己去同资产阶级战斗来争取。今天，工农的斗争表现为群众运动的形式也是有着它的优越性的。小规模不断的群众斗争，剔除了群众团体固有的顽疾，即团组织条件下的个人利益追求和官僚气息，从而能够筛选出最优秀的最能代表群体利益的先进分子；自发的群众运动也是一个群众自我教育的过程；群众对组织的渴望，会在一定条件下成为组织起来的强大动力。

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一定的地区一定的条件下，工人斗争表现为阶级的联合斗争后，斗争的方向将是指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而不会停留在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自由要求阶段。其理由是，一、今天老工人的处境完全是由于企业的私有化造成的，这一点他们有着深刻的体会并已经认识到了。二、清算官僚和资本家是他们的强烈愿望，这种清算不是简单的经济补偿（谁为他们补偿？），而是政治的清算。日常的斗争已经使他们看到，即便自己提出的要求是经济的内容，却也在经济的范围内得不到解决。大多数老工人都有向一个目标——当地政权示威的经历，他们只需要一个能使自己产生联合的机会或条件。三、一旦群众运动充分展开，不但会按照历史上革命运动的一般规律发展，而且老工人将很容易回忆起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斗争经验——自下而上地充分动员起来，组织起来，夺取政权！四、新工人掌握着生产，但却没有维护自己利益的组织。但是我们可以作出大胆的预见，由于工人阶级利益的一致性，他们将被政治觉悟高、斗争经验丰富的老工人引入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上来，到那时，将是老工人的政治觉悟同新工人的革命热情充分结合的时候，阶级意识的“灌输”将会在短时期产生出显著的效果。五、斗争会使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充分涌现出来，一个党只有由这样的先进分子组成，才能领导无产阶级战无不胜。无产阶级的团结和组织的有力本身就是一种暴力。五、由于老工人有过当家作主的经历，新工人渴望当家作主，因此他们将有能力管理好一个企业，同样有能力管理好一个国家。

在一九六五年九十月间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接着十月在与各大区第一书记谈话中，毛泽东又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造反，各省有了小三线，就可以造反嘛。”历史似乎就是按照他的预计发展着。他为中国西部留下了三线建设的巨大成就，同时也为西部造就了一个经过社会主义大工业建设训练的先进的工人阶级队伍。今天修正主义集团再为自己造就了一个年富力强的掘墓人——新工人阶级队伍。

2009年4月初稿

分清敌我友，坚守独立性

路石（2013年12月18日）

“重庆模式”被否定后，左派整体受到压制，发展陷入了低潮。济南审判后，三中全会新的私有化方案出台，新自由主义大行其道，社会主义运动的上空笼罩了一股阴霾，失望和迷茫在左派内部弥漫。这是相持阶段的一种普遍现象，也是以往运动主流受小资产阶级团体的牵引所产生的冷热起伏所致，同时也与我们对一些问题的认识模糊有很大关系。这就是，敌我友不分，远期和近期目标不清，工作方法和手段不当。我们依次来讨论这些问题。本期时评先讨论敌我友的问题。

大家都熟知毛泽东的一句话：“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今天还要加上一个问题：谁是我们的同志？

（一）划分敌我友的政治意义

首先讨论为什么要做这样的鉴别。

毛泽东曾说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就是把敌人搞得少少的，把朋友搞得多多的^①。据说曾国藩也有过类似的表述：政治就是把支持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不论曾国藩说过还是没有说过，也无论敌我，这样做的目的，首先都是为了夺取国家政权或者巩固自己的统治。

古往今来，一切阶级斗争都是围绕利益和政权在展开，而“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灭亡了”。为了战胜敌人，避免本阶级被统治压迫或灭亡，就要时刻把握阶级斗争双方的力量对比变化，实时并准确地制定出团结谁、联合谁和打击谁的政策策略。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这就是说，做出敌我友鉴别的意义，就在于促进阶级力量对比向着有利于本阶级的方向变化，以取得或者巩固政权。

对于革命阶级来说，某一个阶段的革命任务又规定着划分和鉴别敌我友标准的不同，有随着主要矛盾的转化有所变化的可能。比如，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封建地主阶级就曾经历过从我们的敌人到朋友再到敌人的变化过程。

资产阶级奉行实用主义原则，主张“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这个利益就是资产阶级利益。在保障自己的利益不受侵犯和政权在握的前提下，它的敌我友的划分，也是随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

左派队伍中当前表现出的乱象，首先是没有一种有效的形式解决好谁是我们的同志的问题，或者说还没有找到适合当前条件的为大家所认可的解决办法，致使无产阶级的政治独立性表现不出来；其次，由于今天的社会是经由社会主义复辟而来的，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没有经验可循而呈现出万般的复杂性。一些挂羊头卖狗肉的、甚至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修正主义分子和机会主义分子必然充斥在我们的队伍中，使人真假难辨，并令人难于准确划定敌我友的边界。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现一次较大的政治事件，甚至某个重要政治人物的沉浮，更甚至某个总书记的一个行动一句表态都将影响业已形成的左派脆弱的团结局面。

（二）关键是解决好我们是谁的问题

怎样摆脱这一困境呢？

以往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组织，无论是地下的还是公开的，都是借用资产阶级的政党政治组织形式的外壳，用民主集中制的内容来规范和识别自己的同志的。面对当前中国的专制体制，能不能借用先辈们的经验，直接建立或秘密或公开的组织形式呢？我认为还不行。革命家组织是为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为工农阶级斗争服务的，没有一定数量的与工农阶级斗争紧密相连的得到斗争锻炼和考验的觉悟分子存在，组织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末。况且在今天交通通讯以及侦查手段高度发达的条件下，这无异于将鸡蛋集中在一个篮子里交给统治机关，丢失自己仅有的一部分有生力量。那么，能不能像在一些原来实行专制统治的国家或地区一样，比如韩国、马来西亚和我国的台湾地区，先争取资产阶级的民主形式，然后建立自己的左派组织呢？可以，但这种组织仅限于在资产阶级的宪法框架下活动，进行议会选举，而不能倡导革命。这样的组织在资产阶级的统治下不但为无产阶级的服务很有限，而且普遍被边缘化也是事实。革命家组织，比如菲律宾共产党、印度的毛共纳萨尔派，在其号称实行民主多党竞争的国家里是被宣布为恐怖主义的。

不能用传统组织形式鉴别谁是我们的同志，我们就不能摆脱眼下的困境了吗？我认为不是的。按照马列毛关于政党建设的理论，无产阶级革命的首要任务是夺取国家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为此建立起来的革命家组织首先是一个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其中每一个组织成员都是无产阶级觉悟分子，都有为无

产阶级的解放事业做出贡献的能力和牺牲的勇气；其次，他们共同遵守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再次，共同实行“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三大工作作风。在当前缺乏有形组织的情况下，却能遵守上述原则者，被称为无组织有信仰，或者无组织有纪律等。它对每个成员有更高的要求，那就是在缺少强制力的条件下，就要充分发挥每个成员的高度自觉性以及集体的协商协作精神。总之，我们每一个革命同志，就要象一粒种子，撒到哪里，就要在哪里生根发芽。

其实，是内容规定着形式，而形式总是多样的而非单一的。比如，同为资产阶级统治，有的实行民主共和制，有的实行君主立宪制，还有的实行一党专制。事实上，有内容的事物必然有它存在的形式，只不过这种存在形式因为不同于传统形式而被人们所忽视。

我们知道，在实行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国家中，无产阶级被允许建立合法政党，为自己所代表的无产阶级进行力所能及的鼓与呼，甚至上台执政。在不威胁资产阶级统治的前提下，无产阶级可以利用这种民主形式，争取一些合法利益，实现某些局部的改良。为此，我们有些左派朋友主张，今天首要的任务是联合一部分新型资产阶级一同去首先争取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而后再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在一个实质上由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里，仅仅因为新型资产阶级与官僚资产阶级存在一定程度的并可以调和的矛盾，就幻想这部分资产阶级与自己一道争取为通向社会主义所需要的民主，这种逻辑如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最后实现共同富裕”一样的荒谬。对于我们的革命同志来说，就不应该犯这种刻舟求剑式的形而上学的错误。实现社会主义革命是我们的实际内容，日常的阶级斗争本身就是人们在争取民主，而形式只是一种条件。为了阔步前进，我们要因地制宜地寻找条件、创造条件。有一位富有实际斗争经验的老革命提出了一项值得重视的主张：以反对修正主义的形式进行阶级斗争！的确，统治集团暂时还不能甩掉红帽子，脱掉红马甲，我们除予以揭露外，还要让它为此付出代价。人民就可以利用这种条件争取自己的利益，左派团体就应该利用这种条件争取自己的活动空间。其实群众早已经这样做了。他们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宣扬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揭露资本主义的丑恶行径，进行频繁的聚会、学习、开展活动以及阶级斗争的组织工作。这便是我们在“特色资本主义”条件下能够为我所用的“民主”形式。

总之，我们相信，只要遵照马列毛总结的基本组织原则，人们将会在阶级斗争的实践活动中，因地制宜，创造出各种各样的识别自己的同志，团结自己的同志，发展自己的同志的有效形式。

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自己的革命同志在哪里？就在进步知识分子、革命干部和群众以及广大的无产阶级队伍之中，尤其是站在阶级斗争的前沿，起着宣传、组织和发动工作的人们中间——这包括把共产主义作为自己坚定信仰的革命知识分子，参加过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迄今坚持继续革命的老干部和各界群众，以及深受私有化之苦并领导工人进行艰苦卓绝斗争的工人领袖们。

（三）分清敌友，分别对待

我们的同志组织和团结起来，为的是广泛组织和发动群众进行轰轰烈烈的阶级斗争，进而夺取政权以消灭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制度。那么，依靠所占有或控制的生产资料进行剥削和压迫劳动人民的资产阶级及其附庸就是我们的敌人。而当前最主要的敌人是官僚资产阶级和境内外大中型资本家及其反动的帮闲文人。

大致确定了谁是我们的同志，谁是我们的敌人后，其余的便是数量上仅次于无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而争取小资产阶级，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谁战胜谁的关键。对这部分人怎样认识，认识得清楚不清楚，是确定敌我友边界的关键，也是最容易扰乱我们视线的一个问题。

首先，我们相信能够做出认识。中国资本化进程至今 35 年，变动的社会各阶级阶层基本上固定下来了，这为我们做出较为可靠的阶级分析提供了前提。但小资产阶级阶层的变动分化在当前却是最为剧烈的，这与资本主义危机导致的两级分化加剧关系极大。另一方面，小资产阶级容易产生分化，在于它的两面性——既是劳动者，也是有少许生产资料或特殊技能作为资本投资获利的一个群体。

通常来说，资本主义处在繁荣时期，小资产阶级就会与资产阶级结成暂时的同盟；当资产阶级出现统治危机时，小资产阶级就会分化。其一部分就有可能和无产阶级结盟，做了我们真正的朋友；还有一部分会跑到我们的对立面，成为我们的敌人；其余部分还对统治阶级存有这样那样的幻想，在幻想没有破灭前会跟着资产阶级跑一程。但他们注定是动摇不定的，还将继续分化下去。一些人会成为我们最近的朋友，一部分会跑到我们的对立面去了。

今年 9 月份，远航一号为红色中国网撰写的《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还能存活多久》时评中对小资产阶级状况有较好的描述，这里主要引用他的分析：

“在一个半外围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小资产阶级往往同时受到帝国主义（通过跨国资本）、本国资本家以及本国资产阶级政府的压迫。于是，一部分小资产阶

级幻想通过支持本国政府实行比较‘进步’的国家资本主义政策来提高本国资本主义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地位，进而改善本集团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因而往往采取民族主义的或‘左翼’的政治立场。”

的确，面对美日帝国主义、本国专制政府和资本家的压迫，这部分小资产阶级对民族主义、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都是可以接受的，因此，毛泽东也是被作为近现代以来中国的民族英雄，一个敢于反抗霸权和统治集团压迫而不是一个追求共产主义的无产阶级领袖受到推崇的。在当前形势下，他们愿意支持一个推行国家资本主义政策的（国进民退）、由普京或查韦斯式的人物统领的政府。

一个国家鼓吹民族主义，小资产阶级通常是其最热情的支持者。在中国，他们往往把社会主义的爱国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民族主义相混淆，以为“国强民富”在两种制度下都是一致的，而错误恰恰就出现在这里。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当家作主，“国强”意味着“民富”，反之亦然，二者是一致的。资本主义国家是资本寡头统治的，他们对外鼓吹民族主义，往往是在本国出现资本主义危机及其政治统治危机，民众开始变得贫困，不满资本现存统治秩序的时候。这时候统治集团祭起“强国梦”的大旗，一方面以此消解劳动人民对生活本身的关注，使人民误认为自己的行为是不顾民族大义，是一种耻辱。另一方面，资产阶级也企图以此避免割肉，吐出更多的财富来安抚民众。所以，官僚资本统治集团鼓吹民族主义，一般而言，反映的正是“国”和“民”之间的矛盾对立的加剧。当前中日之间的情景就是这样的。

“另一部分小资产阶级（通常是与跨国资本有较为密切联系的小资产阶级上层），则幻想通过向帝国主义和跨国资本靠拢，实行全面‘开放’、即新自由主义的政策，来减少资产阶级政府对本集团的压迫，从而改善本集团的经济和政治地位。小资产阶级的这一部分往往构成亲西方、亲美帝的小资产阶级右翼；其基本政治主张，是在推行新自由主义即全面私有化、买办化的前提下，实现美帝国主义庇护下的‘自由民主’。”

小资产阶级右翼是全球化的受益者，通过与跨国资本的交往或者为跨国资本的服务，他们获得了比较其他小资产阶级的优越感，从而消解了他们的民族自卑感。他们厌恶民族主义，尤其是社会主义，认为它们代表了愚昧、狭隘、封闭和落后，并把这种混合物统称为民粹主义而唾弃。他们厌恶现政权的唯一理由就是，它不是多党竞争、自由选举产生的。

“在中国，由于中国资产阶级残酷地剥削广大廉价劳动力，一度大大提高了中国资本主义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因而‘综合国力’得以大幅度提高，因而出现了一批‘强国派’、‘自干五’小资产阶级。他们幻想依靠现有的新

自由主义经济发展路线，只要中国能够继续无限制地牺牲本国劳动人民的利益，中国就能够实现‘强国梦’，甚至挑战美帝的霸权地位。这些小资产阶级构成中国小资产阶级的‘中派’。直到不久以前，小资产阶级中间派还是中国资产阶级政府最忠实、最可靠的社会基础。因为薄熙来事件，这个基础无可挽回地瓦解了。”

整日为生计和前途奔波的文员、小业主、企业中层人员和一部分农民构成小资产阶级的中间派。他们一般来说没有明确的政治态度，对毛式社会主义有偏见，对西方民主自由可能带来的社会动荡心有余悸，“随波逐流”是其主要政治特征。他们最大的愿望是自己或后代能爬上去，最怕的是落入贫困的无产阶级队伍。面对当前经济政治形势，“七上八下”是他们的内心写照。他们希望政治经济稳定，现政权强而有力，社会公平和谐。因此，对日益严重的不平等和党政干部的腐败充满着抱怨和担忧。他们同情薄熙来，认为薄是清官，是受到了政治迫害。更重要的是，他们认为薄是有能力的人，是干出实事的人，不是靠官场而是靠能力走出来的人。这是符合一般劳动者的思维主张的。

“在薄熙来被审判、被迫害以后，中国的一切反对资本主义复辟、反对最反动的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在中国已经与‘改革开放’成为同义语）的各阶级、各种政治派别的联盟就初步形成了。这个联盟，首先包括无产阶级中的‘老工人’以及小资产阶级左翼。小资产阶级的中间派现在正在大量地加入这个联盟。小资产阶级右翼中的少数，也开始加入这个联盟（表现为参加‘挺薄’斗争）。这个联盟所反对的，是以大官僚买办资本家为主体的中国资产阶级的政权。目前，只有小资产阶级的右翼（主体）还在有条件地支持现政权。这个条件，就是‘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即坚持新自由主义以及向美帝投降不动摇）并且在未来的某个不确定时期实行‘政治改革’（即承认小资产阶级右翼的政治地位）。”

综合以上所述，为了推进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团结我们的同志，联合我们的朋友，打击最主要的敌人，我们必须活学活用马列毛主义，事实求是地分清敌我友，避免被资产阶级所利用，甚至小资产阶级的错误引导，丧失了无产阶级的政治独立性。为此，我们目前的方针应该确定为：全心全意依靠和组织工人阶级，联合那些赞成和同情社会主义的进步力量，同一切资产阶级的反动势力做坚决的斗争。

注①见郑必坚《在胡耀邦同志身边工作的回顾和感言》，《中共党史研究》2011年第1期

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路石（2014年1月3日）

原编注：这是红色中国网编辑部纪念毛主席诞辰 120 周年系列文章的第九篇（也是最后一篇），由路石同志撰写。

上个月，我们在红色中国时评《分清敌我友，坚守独立性》一文中讨论了左派队伍当前思想行为混乱的几个原因以及分清敌我友的政治意义，有同志和朋友就文中涉及到的某些问题提出了建议和意见，结合这些问题我又重读了毛主席几篇重要著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矛盾论》和《论持久战》等。为纪念主席诞辰，红色中国网主编安排我们撰写纪念文章，这里谨以此文纪念毛主席诞辰 120 周年。

今天我们着重讨论怎样认识一些问题，具体干什么以及怎么干的问题。

我们相信，腐朽的资本主义难以为继，反动统治阶级腐败昏庸，工农要革命，社会主义有着光明的未来。可“扫帚不到，灰尘是不会自己跑掉的”，没有消灭私有制的具体方略和手段，我们就会像蜜蜂撞在玻璃墙上，有光明没前途。

当前，由于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危机，使得小资产阶级处于政治活跃期，左派队伍中，又以左翼小资产阶级最为活跃，主要表现为与资产阶级营垒里的右派进行口诛笔伐，可是其困境也在于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另一方面，因大规模私有化引起的城市传统工人的剧烈反抗进入相持阶段，农民向新工人转化的同时尽管已经能够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工人阶级的组织性，但这种以争取改善劳动条件为目标的团结斗争毕竟才刚刚起步，无论老工人还是新工人，其斗争还没有呈现出鲜明的政治性，这就出现了左派队伍当前进行的思想舆论宣传斗争与广大工农进行的实际阶级斗争相脱节的现象。这种各自为战的现象背后隐藏的是斗争的自发性，从而，思想斗争的混乱不一和工农斗争的屡屡失败就在所难免。怎样解决这一理论与实际不能结合，知识分子与工农不能结合的矛盾呢？这就要求我们不但要斗争，还要善于斗争，总结和掌握阶级斗争的规律。

“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不是一句简单的过时的口号，它包含着 we 取得胜利的一切秘密。它是最擅长斗争的无产阶级领袖经过漫长的革命实践总结出来的。

毛泽东还指出，“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目就是我们的具体目标和任务。同时，“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

根据毛主席所讲的上述要点，下面我们分不同层次不同方面讨论这一问题。

一、以阶级斗争为纲，纲举目张

1、进行阶级斗争，就要做阶级力量对比分析，做到知己知彼。这首先就是分清敌我，以确定抓好主要矛盾。

毛泽东就说过，“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在革命同志中基本已经达成共识，这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革命的总任务就是开展深入的阶级斗争，推动矛盾转化，以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消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今天，一些敌人是披着羊皮的狼，识别它们是这里的关键。其方法还是要坚持阶级分析，并在实际阶级斗争中加以甄别。

但是，在左派队伍中，谁究竟是敌人并没有达成一致，甚至相反，认敌为友。有说敌人是美帝及其在中国的代理人买办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是朋友；有说敌人是官僚资产阶级，新型资产阶级即所谓民族资产阶级是朋友。各自还声言要保这一个打那一个，结果左派内部先打将起来。你要反对，他却说官僚资产阶级内有健康力量，或者所谓民族资产阶级内有进步力量。以点带面，一叶障目，完全没有阶级分析。

2、在实际阶级斗争中区分敌我友，坚守独立性，扩大群众基础。

上一篇文章中我们说到，当前在革命同志中间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敌我友不分，远期和近期目标不清，工作方法和手段不当的问题。敌我友不分，不重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和政治独立性问题，只求一团和气，抱团取暖，热热闹闹，在当前统治阶级的“红袍子”还在迷惑人，小资产阶级左右摇摆或者冷热起伏严重影响群众的时候，我们如果顾此失彼，没有确定的工作目标和扩大群众基础的有效方法和手段，就会陷于“中国梦”的梦呓之中昏昏然，就会做了小资产阶级的尾巴，随着人家瞎跑，或者拒绝与左翼小资产阶级的团结，遭到孤立。西方有句谚语说得好，“如果你不知道要到哪儿去，通常你哪儿也去不了。”那就只好梦游了。所以，首先搞清“谁是我们的同志”，同时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

和独立性很是重要。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失败和第二次合作的成功都可以归因于这一点。

我们认为，造成我们当前目标任务不明，缺乏有效手段这种状况的原因之一，是由于不抓实际阶级斗争，从而不能科学区分敌我友，进而顾此失彼造成的。

我们的目标总的来讲就是，为实现无产阶级的专政，组织我们的同志，团结我们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真正的敌人。而这首先要分清敌我友。如果敌我友不分，就不能有效地组织起我们的同志，实现坚强的领导核心和战斗团队，就拿不出一个统一可行的任务和方法；也无法真正团结我们的朋友，陷我们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也就不能攻击我们的敌人，却更可能被敌人所打击。要分清敌我友，最科学有效的方法就是阶级分析法，对社会各阶级阶层进行一个大致的划分。这部分内容我们上篇文章已经做了初步的讨论。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在纷繁复杂的现实面前如何处理好这个问题。

我们都承认，阶级分析法是我们分清敌我友的原则和方法基础，而现实中如何做到呢？事实上，如果社会是个存在实际阶级斗争的社会，那么，敌我友就是在阶级斗争中得到澄清的，也只有现实发生的阶级斗争才能厘清这种关系。而不是某人讲了几句马列毛主义的好话，我们主观上就认为他是我们的同志或朋友；我们缺钱缺经费，就不加思索地把资本家（即便是所谓红色资本家）拉来当同志；我们需要鼓动、串联，就把流氓无产者和投机客拉来充当我们的同志，做我们的摇旗呐喊者。部分小资产阶级团体无时无刻不在做着这样的事，那是他们的营生，也是他们的投机性所决定的。如果我们也这样做，其结果就是扰乱了我们的视线，涣散了我们的队伍，为人作嫁跑龙套，更严重的后果是工农无产阶级与我们保持了距离，让我们丧失掉最广大的无产阶级这个基础。

如果由于缺乏直接接触工农阶级斗争的条件，我们又无视身边发生的各式各样的大大小小的群众斗争（大量存在着由直接的阶级矛盾转化而成的社会矛盾），不去进行力所能及的调查研究、直接参与和宣传教育，只是三五成群，谈古论今，期盼时运；埋怨朋友，诅咒敌人，发发牢骚。朋友只会越来越少，我们自己也必将会成为孤家寡人。这就是脱离群众的后果。

因此，“以阶级斗争为纲”是我们处理好敌我友关系的又一个准则，也是我们制定目标任务的前提。日常的阶级斗争考验着我们，锤炼着我们，我们将在阶级斗争中识别同志，在阶级斗争中结交援助我们的朋友，在阶级斗争中了解我们的敌人，了解敌我力量对比的变化。而主要矛盾规定着我们的主要任务，我们的分散在各地的各同志中的具体目标任务，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因地制宜地得到确定的。

重庆事件是不是阶级斗争，我们认为是阶级斗争。它是在资本主义发生经济危机和统治危机的情况下，大官僚买办、大资本家组成的资产阶级统治集团与政治上活跃的进步小资产阶级之间的一场斗争。薄熙来是进步小资产阶级的优秀代表，他是我们的朋友。因此对于整个事件，我们一方面指出，在当前危机加深，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异常尖锐，统治集团恐惧革命（居然把改良说成“文革余孽”）而又拒绝改良的时候，改良主义没有出路；同时，面对反动势力的反攻倒算和打击报复，我们给予了力所能及的坚决的斗争。我们认为，反动派把“重庆模式”贴上毛式社会主义进行攻击，不仅是为了保护其巧取豪夺以及“黑社会化”获得的利益，还在于要削弱一切人民的进步力量和消除任何社会主义的因素，同反社会主义的美帝同流合污。事实证明，这种倒行逆施遭到全国最广大主张正义的受压迫人民的不齿。我们参与这一场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完全在于为了团结那些赞成和同情社会主义的进步力量，这股力量在重庆事件之前是没有充分展示出来的。在这一斗争过程中，左派队伍中有人采取了关门主义，结果脱离了群众，使自己成为孤家寡人；还有不少人，摇摆不定，混淆敌友，“拥X挺X”，涣散了自己的团队，丢失了自己的群众。正是在这一场斗争中，我们对敌我友进行了一次有效的甄别。

3、争取小资产阶级，是敌我斗争中谁胜谁负的关键。

重庆事件很好地说明了，当前以至今后很长一个时期，我们的一项重要工作内容就是做好团结和争取小资产阶级进步力量的工作，把它引导到实际的阶级斗争之中。改良主义失败了，大资产阶级不允许；“强国梦”毕竟是一场梦呓，他们何去何从？这部分小资产阶级，今天也有称其为中产阶级，他们对社会主义的态度比较接近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民族资产阶级对共产党的态度。正如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指出的那样：在革命和反革命两大势力作最后斗争的局面下，“那些中间阶级，必定很快地分化，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没有他们‘独立’的余地。所以，中国的中产阶级，以其本阶级为主体的‘独立’革命思想，仅仅是一个幻想。”

但是也要注意，今天跑进左派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有不少是被体制内或者市场经济排挤出来的“失意者”，他们的政治热情是间歇性的（所谓三天的革命性），就目前来说最多的也是以三五年为一个周期。在以往的革命实践中，如何正确对待小资产阶级也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有一位党史专家曾这样总结道：小资产阶级“自发”思想的核心是对私有制的眷恋和对资本主义“自由”的向往，革命中，它又可能变成“随时会叛变”的投机性和“身在曹营心在汉”的“两条心”问题。

今天，革命同志手头的资源是有限的，不能因为急于要争取到活跃分子和青年力量，过度使用我们的人力财力和时间。这方面需要很好地探索出一条行之有效的办法，但要求他们结合实际认真学习马列毛经典（不是单纯去啃《资本论》）和深入到实际阶级斗争中与工农无产阶级结合并进行阶级意识的训练改造却是必不可少的。正如红中网编辑水边同志主张的，鼓励有为青年以各种方式去“给资产阶级增加负担”就是参与现实阶级斗争的一种很好的办法。与此同时还要认识到，在无产阶级还没有表现出团结、强大和有力之前，还没有制定出科学的未来发展战略和正确的政策策略之时，他们是不能被真正广泛吸引过来的。打铁还要自身硬就是这个道理。

我们在积极促进青年进步，在等待实际阶级斗争迫使他们做出转变的同时，一定要顽强地宣传马列毛主义的革命理论，宣传社会主义的辉煌历史及其优越性，讨论文化大革命的现实意义，在思想舆论上同反动派做坚决斗争中正本清源，教育人民；与此同时，要彻底批判那些为服务于自己的民族主义主张，把毛泽东思想篡改为“中华传统文化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的反动思想，或者把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理论机械地嫁接在今天，企图把国际主义的毛泽东改装成民族主义的毛泽东，把当前主要矛盾的阶级矛盾扭转为极力夸大的民族矛盾，为其“保皇救驾”主张服务；还要批判那些把马列毛主义关于民主革命的思想简单搬运过来为其主张的、倒行逆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服务的错误观点。这是我们当前思想舆论斗争的一项重要任务。

上述两类小资产阶级旗手，他们一手举着马克思主义，尤其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以此招揽自己的群众（说什么马列主义是外国货，舶来品不服水土，不好消化；毛泽东思想是本土货，易消化，货真价实。这种政治骗子，割裂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的真正动机，就在于抽掉无产阶级解放理论中一以贯之的阶级斗争学说，并把毛泽东思想按自己的需要进行解释包装，以阉割其革命灵魂。这种要人只吃第三个馒头就能果腹的雕虫小技，对那些不善学习思考的人是有着蒙蔽作用的）；一手牵挂着统治阶级中的这个（走资派转化而来的官僚资本集团）或那个集团（改革开放政策培育出的或者引进的新型私人资本集团），利用他们的御用身份或者学者头衔，借助笔杆子和网络优势造势，极大地扰乱了群众的思想。他们从不进行真正意义上的阶级斗争，却将此谓之策略，声言这是保护自己，迷惑敌人，岂知迷惑的恰恰是广大群众。对于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我们必须严肃对待，进行思想理论上的清算。

有人也许会担心，我们这样做会造成更大的分裂，达不到团结的目的。我们说，批判小资产阶级错误思潮以教育和争取群众，是马列毛主义思想理论斗争中不可或缺的任务。实际上，马列的鸿篇巨著，大部分内容是针对机会主义

的，毛主席亲自主持的中苏十年论战的意义并非邓小平这种实用主义者所能理解的（“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只要不是为批判而批判，为自己的小集团利益对他人进行百般攻击，尽量做到就事不就人，批判的目的是为澄清问题教育群众，那么，我们一定能够团结到真正的朋友，发展到真正的同志。我们的批判或者批评一定是要有原则的。我们的同志一定是有共同的无产阶级立场的，同志之间在原则问题上必须保持一致，在非原则性的具体认识上有可能不同，我们要允许保留意见；我们的朋友，小资产阶级，在立场和观点认识上都可能同我们存在一定差异，只要不是完全对立的，不是蓄意欺骗群众的，我们就应该求同存异。否则，把朋友当同志来要求，最有可能的结果却是，不但做不了同志，甚至连朋友也做不下去。

在前面一篇文章中我们提到过，由于今天的社会是从社会主义复辟而来的，因而在社会阶级阶层的划分上呈现出纷繁复杂性，没有经验可循，为我们分清敌我友带来不少困难。我们过去常说，承认不承认“文化大革命”是鉴别是否为同志的一块试金石，今天看来其局限性是明显的。首先它是非阶级分析法，是唯心主义的；其次，它分不清我友。比如，文化大革命为我们留下的其中一份宝贵遗产就是有这么一批人，他们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肯定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复辟。在左派队伍中最典型的就是文革造反派和革命老干部及其文革保守派，他们或早或晚都遭受过修正主义集团的打击和排挤。但是他们其中除少数把共产主义作为终身信仰，心系工农，一贯坚持进行实际阶级斗争外，相当一部分是为争取自己的名誉或政治经济待遇而斗争的小资产阶级。他们有着自己的特殊身份和社会地位，而不同于一般的普通工农群众（工厂企业中以普通工人退休的造反派保守派有所不同，他们没有离开本阶级队伍，没有改变工人阶级的属性。甚至当年的保守派，由于有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比起那些“永远的造反派”在现实斗争中表现得更为彻底）。今天还在坚守信仰的老干部们是被三十余年的资本主义现实所教育，但他们却受制于今天的“党纪国法”，或者斗争不得法，或者担心“颜色革命”使革命果实尽失，进行斗争时如履薄冰，投鼠忌器，不能坚决彻底。坚持继续革命理论的造反派们，他们不少人遭受反革命迫害后，被打入社会底层，同时由于统治集团三十余年来对文革的歪曲宣传及其耍弄嫁祸于人的伎俩，使他们完全背负了文革负面的罪责，被群众所误解，事实上造成了与人民群众相隔离。加之反攻倒算诛连亲人，他们的子女得不到正常人的发展机遇，家庭生活陷入窘迫。但是，他们毕竟是“能人”，利用市场经济及其原有的人脉关系，逐渐过上了比较城市工人较好的中产生活。由于这种特殊背景，他们也很容易被那些一手高举毛泽东大帜，高呼着为文革平反的口号，一面又遮遮掩掩主张“保党救国”或者“左右合流”的“左派精英”所左右。这是他们认识上的局限性，但我们相

信，他们中的绝大部分至少是革命的同路人，是最近的朋友，随着阶级斗争的广泛而深入的发展，一些错误思潮的充分暴露，他们必将加入到轰轰烈烈的革命洪流之中。

二、无产阶级的斗争策略

造成我们目前诸多问题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不能从阶级斗争的视角观察当今世界资本主义发展规律以及找准资本主义复辟后进行阶级斗争的形式，从而缺乏长远的发展战略和斗争策略及其革命必胜的信心。

我们常听到一些议论，说美帝国主义很是强大，对我实行军事包围，阴谋以转基因灭绝中国等等；又说中国将“大国崛起”，有可能成为称雄一方的中华帝国。总之，资本主义不但不会灭亡，资产阶级还很强大。与此相反，听说欧美工人阶级已经消失，变成中产了；在现实中看到的景象更加悲惨：那些有政治觉悟的城市老工人屡战屡败，被逐出了工厂企业，成为散兵游勇，失去了工人阶级属性；新工人为改善劳动条件刚刚学习团结斗争，但毕竟还是在为卖出一个好价钱进行着抗争，还处在自发自在的状态下，还没有一个 100 多年前马克思时代的工会组织等等。如此看来，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人阶级斗争解放的理论似乎过时了，或者不适合中国当代国情了，怀疑、改造和创新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变成了时尚，各种理论五花八门，无产阶级的思想陷入了一片混乱。

我们不否认上述现象的存在，而且某些方面还严重地存在。但它毕竟是现象，不能代替事物的本质。我们必须透过现象看本质。

我们都熟知一句话：“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今天我们还要补充一句，不能活学活用马列毛主义的革命理论，不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总结出阶级斗争的新的方式，同样不会有革命的运动。

（一）链条最容易在薄弱环节断裂

500 年前的中世纪，人们的头脑完全受宗教所控制，儒家封建皇权、穆斯林封建皇权和基督教封建皇权三分天下统治着这个世界。其中基督教世界的封建中央集权最为薄弱，资本主义萌芽便在这个薄弱环节找到了突破口，随着商品交换范围的扩大，使得统治欧洲人的“上帝”逐渐由金银代替了耶和华，商品拜物教在贵族商人中实际地取代了基督教，野蛮的原始资本积累开始了。暴力掠夺一方面把财富集中到少数人手中，一方面造成了大量的颠沛流离的流民；一方面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却破坏了传统宗教信仰导致人们的道德沦丧。即便是现代资本主义，同样也是一面物欲横流，一面是精神道德的沦丧，

无法根治。可见，这是从娘胎里带来的。我们还是来重温《共产党宣言》中的一段精妙绝伦的文字吧：“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

统治阶级上层的有教养人士为拯救人类精神免于崩溃，为人类描绘了另一种社会状态，在那里，财产是公有的，人民是平等的，实行着按需分配的原则，大家穿统一的工作服，在公共餐厅就餐，官吏由秘密投票产生。并认识到私有制是万恶之源，必须消灭它。这就是 500 年前一位叫托马斯·莫尔的英国大臣在他的《乌托邦》一书中为人类描绘的理想国（也叫乌有之乡）中的情景。由此，莫尔也就成了空想社会主义的创始人。由此可见，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犹如一对孪生兄弟，它们的对抗基因几乎是同一时间产生的。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资产阶级统治确立还不到 100 年的时候，马恩不仅发现了这种对抗的真实存在，并且提出了解决这一对抗性矛盾的规律，它不是描绘和设计出人类解放的蓝图，乞求资产阶级“流淌道德的血液”实现“和谐社会”，而是依靠无产阶级，以革命的暴力铲除私有制度。正如《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生产力），它还产生了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人——现代的工人，即无产者。”

马克思恩格斯为无产阶级创造了自我解放的理论，只要资本主义存在一天，他们的基本原理还是适用的。但他们提出的社会主义革命首先会在几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的设想，并没有实现。这是由于他们所处的时代是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当时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趋势并不明显，甚至还谈不上。

列宁出生在 1870 年，这个时期正是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向垄断过渡的初始时期，在他 46 岁那年写成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文，指出了帝国主义时期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性，并运用矛盾不平衡原理提出了链条可能在最薄弱环节断裂的主张，为俄国这种不发达资本主义国度进行一国社会主义革命奠定了理论基础，并最终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

1930 年前后，在中国这样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当无产阶级革命处于迷茫彷徨，既没有马恩的也没有列宁的现成方案可循的时候，毛泽东天才地运用了他后来概括为《矛盾论》的基本原理，先后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和《反对本本主义》等文章中指出，中国革命的薄弱环节在农村，斗争的方式是武装割据，以此挽救了

中国的革命。直到后来形成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民主革命路线，实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终胜利。当然，“改革开放者们”同样也进行了哲学的思考，也使用了矛盾发展不平衡原理下的薄弱环节理论，以农村这个社会主义的薄弱环节为突破口，采取“农村包围城市”，培植资本和劳动力商品化的路线，稳步取得了资本主义的统治。事实上，只要条件具备，规律就会出现，原理即可运用，均是手段，区别只在于目的不同罢了。

（二）阶级斗争的新形式

1、当前的中国与世界

毛主席在世时，由于拥有了原子弹氢弹这样的“干货”，又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把那些对社会主义中国深有疑虑的、但却也不愿意加入美、苏阵营的广大不结盟国家团结在了自己的周围，最终形成了中苏美三足鼎立的世界格局。中国不仅成为全球反霸的领导者，也使 500 年以来逐步衰落的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们甚至可以假设，如果社会主义阵营没有变修，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在那个时代还是可以设想的。当然。历史不能假设，现实是残酷无情的，其结果不是资本主义的灭亡，而是社会主义的全面失败。

三足鼎立的世界格局，由于一张投名状而崩溃。1979 年中越战争打破了社会主义阵营，中美进入蜜月期，二大于一的力量加速了苏联的崩溃，由此形成了今日美帝独大的世界体系。然而，同历史上所有强大的帝国一样，顶峰是走向衰落的转折点。只是美帝的衰落由于中国的贡献而延缓了进程，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拯救了世界资本主义 30 年。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东战争导致的石油价格上涨，就像一棵压垮骆驼的稻草，几乎将经济滞胀的西方经济摧垮。资本过剩，商品过剩，资本家无利可图。正如 1985 年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的朋友时所担忧的那样：“欧美国家和日本是发达国家，继续发展下去，面临的是什么问题？你们的资本要找出路，贸易要找出路，市场要找出路，不解决这个问题，你们的发展总是要受到限制的。我过去跟很多日本朋友谈这个问题，跟欧洲朋友、美国朋友也谈这个问题，他们脑子里也是装了这个问题。”当里根、撒切尔夫人的美英政府在本国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主要方式是国企私有化），削减工人福利企图降低成本遇到工人罢工斗争时，恰逢中国“改革开放”，资本家便以再罢工就关厂和迁移工厂到中国相威胁，这自然削弱了工人斗争的手段。只不过当时的国际资本是伪装成“爱国华侨资金支援社会主义建设”进来的。如此这般，利用农民工打败了国营企业工人，又以中国工人打败了欧美工人。全球资产阶级联合起来了，工人阶级成了孤军奋战的散兵游勇。利用毛泽东时代奠定的门类

齐全的工业基础，以及不怕污染，不怕能耗，还有税费减免的好政策，更有数量庞大的由政府管制不准罢工的廉洁劳动力，可以说中国完全成了资本输入的天堂，也由此确立了中国成为“世界加工厂”的角色。从此，中国与世界资本主义形成了生死与共的关系。

2008 年以来的世界经济危机，让我们看到了这样两点：一是美帝独大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在衰落，而且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的寄生性、腐朽性和垂死性尽显其中。二是看不出有哪个资本主义国家能够同美国相抗衡，包括俄国和中国。即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看不到有爆发帝国主义战争的可能。

1958 年毛主席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对当时国际形势总的特点做过这样的概括，即“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经过 55 年的曲折迂回后又重现了。敌人在下坡，我们在上坡，下坡者失去了控制，上坡者艰难爬行，但上坡毕竟是可控的，是在向上前进。正可谓“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2、无产阶级的前途

关于中国工人阶级，有两点是客观存在的，是任何人也无法否认的。第一，在国际工人阶级队伍中，中国城市传统工人阶级具有最为先进的阶级意识。他们在建国的前三十年社会主义建设中充分发挥了自己的巨大能量，他们以当家作主的主人翁姿态确立了自信，释放了潜能，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得到的阶级斗争锻炼，是任何资本主义国家的雇佣工人所不能企及的；如果说只有毛主席时代的 30 年，中国工人阶级的意识还不完整的话，那么，在“温水煮青蛙”的后 30 余年的资本主义进程中，他们完全认识到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当家作主意味着什么；什么是资本的力量，受雇佣意味着什么。前后三十年的正反面经验教训，使得中国工人阶级完全认识到了他们的命运是与社会主义制度有着生死与共的关系，争取社会主义就是在争取自身的解放。第二，中国工人阶级数量巨大。60 多年前的建国初期，中国工人有 800 万人，400 万就业、400 万失业，今天包括新工人在内有 4 亿之众，增长了近 50 倍，这是世界上数量最庞大、最集中的工人阶级队伍。

有这样一只先进而庞大的工人阶级队伍，在这样一个具有革命传统的国家里，又有那么多掌握了先进的无产阶级解放理论的人才，没有人愿意承认自己是井底之蛙，那么为什么就对社会主义革命信心不足呢？难道我们果真成了那只撞在玻璃墙上的蜜蜂？

显然问题没有这么简单。革命的发生是需要具备一定主客观条件的。列宁曾把爆发革命并取得胜利的条件归结为三条：一是统治阶级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二

是被统治阶级不能照旧生活下去，三是要有一个能够制定正确的政策和策略的先进的党。前两条是客观条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后一条是主观条件，是需要发挥主观能动性的。

关于有形无形组织问题，上一篇文章中曾有过讨论，这里还是讨论阶级斗争问题，并着重讨论在当前形势下可能采取的新的阶级斗争形式问题（鉴于人所共知的原因，讨论只能是提纲挈领、抛砖引玉式的）。

读毛主席著作，给人最大的启发，一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二是极为重视矛盾的转化。

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在蒋介石军事统治条件下的阶级斗争，那么所采取的方式就是武装斗争的形式，以革命的武装反抗反革命的武装。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文化大革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阶级斗争，所采取的斗争形式就是“文斗”，文化思想领域的斗争形式，即无产阶级的专政，劳动人民享有最广泛、最充分的民主权利的同时，将敌人置于劳动人民的监督之下。今天我们实质上完全处在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之下，并且是统治阶级以单方面制定的各式各样的法律法规对劳动人民进行着专制统治（不同于某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法规是阶级斗争妥协的产物），除去一些起着国家管理职能的法律法规外，那些起着镇压反抗职能的法律法规，其现实作用犹如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这类“法”几乎成为束缚在劳动人民头上的紧箍咒，而且老百姓离开了“法”的路径就变得手足无措。比如《失业保险规定》中规定，工作满一年被辞退并缴纳过保险金的工人，失业后可以领取一定月份的保险金，但办理条件却规定，必须由原单位前往失业中心办理，不对个人办理，而且需要单位出具解除劳动合同的证明。试想，有几个资本家愿意为他所辞退的工人办理这样的手续？如果我们按照某些人士的主张，推动修改法律法规，只要想一想刚刚废止的劳动教养法规已经造成多少冤魂便可明了一二了。

要找到在当今条件下的阶级斗争方式，我们还是应当回到实际的阶级斗争中去观察，而不能单纯通过理论逻辑推导得出办法。毛主席曾精辟地概括出：“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这个“理”在理论层面上讲，是马克思主义的两个基石，剩余价值理论和唯物史观。它解释了世间一切产品都是劳动者创造的，剥夺剥夺者是理所当然的；它解释了历史是劳动人民创造的，人民理应而且能够当家做主人。日常生活中也有约定俗成的东西，叫做“合理合法”，而不是倒过来说的。法不责众就是一种普遍的现象。这就是说，“理”字当先，要因时因地让“理”字站稳脚跟，同时，“众”是强大的后盾，力量的源泉。“理”不见得是讲给斗争对象听的，而主要是讲给斗争的群众听的（现实中经常遇到的“你讲理他不理睬你，你不讲理他抓你”就是没有解决

好“理”和“众”的问题所致)。正如马克思所讲的：“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的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这其实还是那个老问题，革命同志与进行实际斗争的工农群众的结合问题。不可只想着政权的最终解决，小觑一次次的实际斗争。毛主席领导的武装斗争，在夺取政权之前，也是一块块根据地的艰难积累过程。所以，在现实斗争中，究竟采用“以反对修正主义的方式进行阶级斗争”，还是“依理维权”为好（不可“依法维权”，“法”在专政机关手中，否则会掉进“法”的迷宫受人摆布），应该针对不同的群众或斗争对象，因地制宜地做出选择。

毛主席重视矛盾的转化，在他的许多著作中都有体现，《论持久战》是其集大成者，“保卫延安”是他的经典案例之一。所谓矛盾的转化，首先是抓主要矛盾，其次，当我们处在矛盾的次要方面，处于弱的一方，陷于被动状态时，要客观地分析形势，辩证地看到我方强势和敌方弱势，综合进行敌我力量的对比分析，采取有效措施，以我之强克敌之弱，以我之柔克敌之刚，推动矛盾转化，使我由被动转为主动状态。

既然无产阶级要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制定自己的战略前景，就要掌握《矛盾论》的精髓，运用矛盾不平衡原理，找到薄弱环节。所谓薄弱环节，就是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无产阶级的力量暂时地在某个时间某个区域对资产阶级形成了优势，并可一举攻克之。所可能采取的形式无非是上述阶级斗争方式以更深入更扩大的状态的一种表现。中国的革命无疑将会对美帝独大的资本主义体系以毁灭性打击。这方面的内容，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程广胜写的《当前形势与社会主义革命》一文（**编注：见本文集第 3 页**）。

谁是我们的“同志”？谁是我们的“朋友”？

左向前（2014年1月7日）

原编注：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在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样的大是大非问题上尤其要说老实话、办老实事。是一个战壕的战友就并肩战斗；暂时不是一个战壕的，也不要勉强，尤其不能搞阿 Q 的精神胜利法，抱团取暖、自我安慰，那是没有用的，还会给革命事业带来损失。革命队伍的壮大，不是靠小恩小惠，不是靠抹稀泥，更不是靠出卖原则。归根结底，革命队伍的壮大靠的是无产阶级的壮大和成长，靠的是资本主义矛盾的发展将其他各被剥削阶级转变为无产阶级的同盟军。

以下几段文字，是左向前同志在路石同志“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后面的跟贴，现略加整理成文，供广大红色网友共同探讨。

认真读过路石同志的文章后，个人认为，其堪称现阶段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经典论述。尤其是在如何判定我们的“同志”这个问题上，作者所持阶级分析法的观点极有价值。

在此之前，我们通常习惯于把凡是承认毛主席继续革命理论，承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都视为左派同志。而事实证明，头脑里没有阶级斗争，行动上不参与阶级斗争，仅仅从口号分同志，以旗子找同志，只会让左派队伍越来越混乱，思想越来越糊涂，极容易让某些不讲马列主义、片面理解毛泽东思想，甚至有意歪曲毛泽东思想、把毛泽东思想当实用主义工具的骗子成为我们的同志乃至“旗手”，使大部分左派群众跟着他们瞎跑一气，不是去“保党救国”帮地主甲维稳，就是“左右合流”替地主乙充当炮灰。更不用说完全蒙蔽了眼睛，把“打着红旗反红旗”的黑老大也引以同志，视为领袖。

所以，本人认为路石同志的文章，十分及时地指出了这个问题，对于真正高举马列毛旗帜、以重建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己任，并愿意切实付诸行动的革命同志而言，极具现实指导意义。相信真正思考左派前途问题的人，读了这篇文章之后，都会不由自主的对照自己想一想：我是什么人？我的所思所为，是否可以称为同志，或者只能算作朋友？我原来眼中的同志，是否真正的同

志，还是距离最近、到一定阶段才有可能成为同志的朋友？甚或比较远的朋友？

虽然如此“从灵魂深处拷问”的结果，很可能会令很多人心里不舒服，因为对照路石同志的观点，竟然发现原来自我期许的定位跟现实不是那么一回事，甚至个别人可能还会因此触到痛处跳将起来，但这种重新思考定位或者“排队站队”却是十分必要的，有益无害的。真正的同志，只会是完全接受马列毛主义、认同阶级斗争理论并言行一致地投身到实际阶级斗争中去的人。舍此，不管口号喊得再响，旗子举得再高，也顶多是我们的朋友，甚或自娱自乐的“票友”！

但我们并非简单的划出同志、朋友之后就把自己孤立起来，“躲进小楼成一统”，而是首先要以真正的同志为核心，形成坚定的“无组织有信仰、无组织有纪律”，适合当前阶级斗争形势的高度自觉的革命者队伍，让我们的革命主张在每一个有同志的地方生根发芽，然后以点带面，尽可能去团结争取影响我们的朋友，“把我们的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我们的敌人搞得少少的”，打击敌人完成我们的革命任务。

至少从目前来讲，弄清了同志与朋友，原来困扰我们的很多疑惑、矛盾都可以释然而解，不必再把原本属于同志之间的原则问题去和朋友争得面红耳赤，一厢情愿的以同志的标准苛求朋友。其结果，不是委曲求全获得了“团结”却丧失了本该坚持的原则，自己反倒沦落成了朋友屁股后面的一条尾巴；就是为了坚持原则却失去了本来就不该苛求的朋友。

实事求是的讲，这些都是本人在现实中深有体会并为之头痛过的问题，所以读了路石同志的文章真有一种眼前豁然一亮的感觉，而且举一反三，类似的许多困惑迎刃而解，所谓“拨云见日”无非如此。

相信真正的同志，是禁得起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是能够通过这种基本而又严格的标准判定出来并凝聚一起的，这应该是革命者的当务之急。只有首先解决了这个问题，才有条件去谈左派前途。

而对于革命的同路人，我们的朋友来说，可能无法理解我们坚持的原则，拿路石同志的文章一对号入座，似乎就要与我们保持距离了，于是造成“左派”分裂了、不团结了，但这一定只是暂时的，这个“代价”也是应当付出的。随着敌人一天天烂下去的客观形势发展，我们一天天好起来的主观上的积极努

力，同时那种似是而非的、理论上的不彻底所必定要导致的现实中的碰壁，最终会促使那些距离我们最近的朋友接受正确的思想、回过头来成为我们的同志，这个过程是必须要有的，根本无法靠委曲求全或者拔苗助长就能省略掉；即便距离我们较远的朋友，只要我们坚守独立性，坚持正确方向，表现出无产阶级应有的力量，也一定能把他们紧紧团结在我们周围。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阶级斗争，一抓就灵”，革命导师早就为我们总结了很多宝贵的革命经验，但我们在学习理论的时候，却又总是难以与实际工作结合起来，找不到正确解决问题的方法。本人就此曾与路石同志有过深入交流，尤其感慨的是，路石同志坦言，这篇文章中涉及到的那些错误认识，都是他自己所犯过的，也是他自己思想认识过程的一个总结。

可见，没有革命同志不走一点弯路、不经一个过程就能提高认识掌握正确理论的。如果我们只是坐在书斋里学习理论，研究推理革命问题；或者几个人坐而论道、抱团取暖而不参与阶级斗争实践，恐怕永远都不会为自己的思想认识做出这样一个总结。因此更应相信我们真正的同志一定会通过这样一个相同的过程走到一起；更有信心容许我们最近的朋友也来经历这样一个过程。

路石同志的文章高屋建瓴，不仅为现实阶级斗争总结了经验；而且从运用矛盾不平衡原理，找到薄弱环节入手，为革命同志勾勒出了一幅推动矛盾转化，变被动为主动的无产阶级战略前景，相信认真思考革命前途的同志都会有所启发。本人仅就“同志”这个问题，谈谈个人理解，愿与真正的革命同志共勉。

致天津市部分网友代表的复信

远航一号（2014年1月21日）

天津市部分马列毛网友代表同志：

你们好！由唐齐庆同志执笔、并由45名同志署名的“天津市部分网友代表致革命网站的慰问信”，我们已经看到了，并且已经在红色中国网发表了。发表时，根据来信的原意以及当前各左派网站的实际情况，将标题修改为天津市部分网友“致各马列毛网站的慰问信”。

首先，作为红色中国网主编，请允许我向战斗在反对资本主义复辟、争取社会主义胜利前线的天津市各位同志致以崇高的敬意，感谢你们的支持和鼓励，马列毛的革命事业正是靠着千千万万的像你们这样的同志才蓬勃发展起来的。

你们的信是写给“毛泽东旗帜网”、“乌有之乡”、“红色中国网”、“东方红网”、“红歌会网”等各网站的。作为马列毛主义的信仰者，我们不讳言，上述各个网站的同志们之间，是存在着分歧的。就我们红色中国网来说，无论是与乌有之乡、红歌会网方面，还是与东方红网、毛泽东旗帜网方面，都是存在分歧的。这些分歧，有些是原则性的，有些是策略性的；有些是关于立场观点的，有些是关于方式方法的。我们认为，对于这些分歧，应当正视。

为了澄清一些分歧，我想借此机会，与天津市的同志们商量几个问题。你们在来信中说：“马克思主义的一条颠扑不破的定律，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如果让私人资本占主导地位，工人阶级还能作为党的领导阶级存在吗？能指望资本家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吗？我们党的根本宗旨还能保持不变吗？习总书记反腐倡廉一系列的良好政纲还能得以贯彻执行吗？”

这些话似乎是在说，目前在中国占据统治地位的还是“我们”的党，它的“根本宗旨”还没有变，工人阶级还是党的“领导阶级”，私人资本还没有占据“主导地位”，习总书记的“一系列政纲”都是良好的。这样说，不知是否合乎各位同志的本意。

各位同志都是站在马列毛立场上的，是“捍卫马列毛革命真理”的，自然知道，早在1976年反革命政变以后，中国的政治舞台就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政权就落到了走资派手里。自那个时候起，中国资本主义复辟的步伐就没有停止过。

在经济基础方面，早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各种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在工商业部门中就已经取得了优势。可以说，自那个时候起，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就已经取得了统治地位。在经历了九十年代的大规模私有化以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优势进一步扩大了，确立了绝对统治地位。所以，至迟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为止，中外私人资本就已经在中国经济中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换言之，资本主义复辟已经完成了。既然资本主义复辟已经完成，并且正如你们所说，“马克思主义的一条颠扑不破的定律，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那么，党的“领导阶级”、“根本宗旨”就不可能不发生相应的变化。

正如你们在来信中所说的，很多马列毛积极分子，“都曾遭遇过当权走资派的打压、跟踪、监控等不公正的非法‘优待’，朗朗乾坤、光天化日之下，。。。人们在参加

纪念抗美援朝战争胜利 60 周年、参加反对转基因主粮的活动、参加纪念毛主席诞辰 120 周年的活动过程中，竟然屡屡发生匪夷所思的见不得阳光、摆不上台面的卑鄙行径。”凡此种种，不都是上层建筑早已经发生根本变化的具体表现吗？凡是符合资产阶级利益的，就大力主张与推行；凡是不符合资产阶级利益的，凡是遇到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反抗资产阶级的，就大力镇压。这不就是资产阶级专政吗？

私有化了，资本主义复辟了，资产阶级专政了，是不是说，“中国就完了”，没有希望了。各位同志都是毛主席的追随者和信仰者。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搞了一辈子革命。在近代中国那样黑暗的历史条件下，毛主席什么时候说过、写过，哎呀，不得了，如果我们革命搞不成，如果蒋委员长不听我们的，中国就完了？即使是在革命最困难、最险恶的时候，毛主席也从来没有动摇过对革命的信心、对劳苦大众的信心、对中国人民的信心。

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中国人民有几千年的光荣革命传统。从陈胜吴广的时候算起，就有“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革命精神。中国人民受了几千年的压迫和剥削，同样有几千年的反抗和斗争；有失败，也有胜利。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暂时挫折了，资本主义复辟了，没有什么了不起，另起炉灶、推倒重来就是。

你们说，“当前的斗争形势是严峻的，任务是艰巨的，回归社会主义的道路是曲折的，但前途是光明的。”关于“前途是光明的”，我们是完全同意的。但是你们又说，“只要我们能审时度势，正确地运用策略方法，团结广大爱国人士，学习毛主席著作和习总书记十八大以来的系列讲话，我们一定能战胜汉奸、叛徒、卖国贼，取得贯彻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最后胜利！”你们建议其他马列毛同志“学习毛主席著作”，并且还要学习“习总书记十八大以来的系列讲话”，不知道是不是要我们学习习总书记的“改革开放永无止境”，是不是要学习习总书记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不是还要学习习总书记在纪念毛主席诞辰 120 周年座谈会上所说的“毛泽东同志在晚年的严重错误”？

关于“团结广大爱国人士”的问题，我们与你们的理解有所不同。在我们看来，今日中国真正有力量的，既不是“爱国人士”，也不是资产阶级，更不是“习总书记”。当然，资产阶级掌握着财富、掌握着政权。自古以来的一切剥削阶级都是如此，但是最终都免不了被劳动人民的造反所推翻，更阻挡不了历史前进的步伐。

在我们看来，今日中国，唯一真正有力量的，是正在蓬勃兴起的无产阶级。中国未来的命运，掌握在他们手中。中国的各种政治力量，凡是不懂得依靠无产阶级，凡是不善于与无产阶级密切联系、打成一片的，最终都必然失败。反之，凡是真正了解无产阶级、依靠无产阶级并赢得无产阶级信任的，就有希望领导中国的未来。

马克思说，“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借此机会，我们预祝，天津市的同志们能够深入学习、活学活用马列毛主义，与天津市的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打成一片，在斗争中学习斗争，将马列毛主义转变为二十一世纪的巨大的物质力量！

远航一号

2014 年 1 月 21 日

红色中国网《国内周刊》创刊了

左向前（2014年1月26日）

原编注：各位同志，红色中国网编辑部近日新增加了一名同志，就是左向前同志。下面是左向前同志为创刊的红色中国网《国内周刊》撰写的“编者的话”。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编者的话

各位左派网友：

正值辞旧迎新之际，红色中国网《国内周刊》创刊了。我们希望谨以这样一份微薄的礼物，向广大有志于传播马列毛主义革命理论，确立无产阶级专政，重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同志，送上我们新年的问候！

2012年“重庆事件”之后，红色中国网与国内其他左派网站一起，遭到反动当局强行关闭。为了坚守阵地，坚持斗争，红色中国网随即搬到了国外。此后一年多来，我们在揭批、抵制私有化，反对新自由主义等方面做出了一定的努力；特别是对妄图借审判薄熙来、打击“重庆模式”以削弱进步力量、消除社会主义因素，进而否定整个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反动势力进行了力所能及的坚决斗争；同时在这场斗争中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团结了一大部分包括海外华人在内的同情或赞同社会主义的进步力量。我们始终相信，只要坚持真正的马列毛主义革命理论，坚持正确的革命方向，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

就一定能在看似困难的阶级斗争相持阶段找到一条符合实际的革命道路，最终取得无产阶级的胜利。

但敌人不会甘心于最终的失败，他们要利用一切手段阻挠革命的进程。尤其是这个从社会主义复辟而来的资产阶级政权，他们最好用的手段就是假借共产党的外衣，打着红旗反红旗。而且愈是在危机深重的时候愈是要紧紧攥住他们“革命的道统”，以各种似是而非的、抽调了阶级斗争灵魂和彻底革命精神的“马列毛理论”来迷惑群众，欺骗人民。这就需要我们大家进一步扎扎实实地学习、宣传革命理论，不上敌人的当。红色中国网毕竟在国外，被敌人封锁屏蔽，国内大部分同志不会翻墙上网的方法，我们之间缺乏相互联系，不能及时有效的交流学习和沟通思想。为此我们希望能以《国内周刊》这份电子刊物来互通信息、增强了解，打破敌人的封锁。尽管如此，我们目前掌握的国内同志的电子邮箱也有限，仍无法大范围发送，况且有不少同志原本就不上网。所以衷心希望能够看到这份资料的同志代为传播扩散；更希望大家本着同志之间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负责任的态度，对刊物内容多提批评、指导意见，给红色中国网以真正革命同志的支持，达到我们相互提高，共同进步的目的，为我们共同追求的事业贡献一份力量！

致以革命的敬礼！

红色中国网《国内周刊》

2014年1月26日

与清水同志商榷 —— 兼谈社会主义革命的策略

远航一号（2014年2月1日）

首先，感谢清水同志创作的“社会主义革命者到农村去”一文。认真阅读了清水同志的文章以后，我认为，在若干问题上，我与清水同志的看法是一致的或基本一致的。清水同志正确地指出，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不是所谓的“中国人民与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清水同志正确地指出，改良的路已经堵死了，幻想通过“特色党权贵们”良心发现来实现“社会主义回归”已经不可能了。清水同志正确地指出，唯今之计，只有坚决依靠工人和农民的力量，把工人和农民组织起来，团结小资产阶级，推翻旧世界，建设新世界。

但是，在我与清水同志之间也确实存在着若干重要的分歧。这就是在对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方面以及争取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基本策略方面，我们的看法不尽一致。其他同志、网友，已经指出清水同志关于通过农村包围城市（实际上即效仿尼共毛、印共毛）的方法来发展社会主义革命的思路是不符合中国当前实际的。在本文中，我着重谈谈当前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问题。

清水同志一开篇，就阐述了他对于中国近代革命史一些经验教训的看法。清水同志说：“自 1840 年到辛亥革命，自辛亥革命到 9.18 事变，自抗战胜利到建立新中国，中国人民的主要矛盾分别是中国人民和封建清王朝，中国人民和封建军阀，中国人民和蒋家王朝之间的矛盾。否定了这一点，中华血性儿女义和团被腐败的清王朝利用，错误地把抗击帝国主义作为主要矛盾来解决，最终被清王朝出卖，被清王朝和帝国主义联合绞杀了；肯定了这一点，辛亥革命取得了胜利，推翻了清王朝，北伐战争取得了胜利，打败了封建军阀，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打败了蒋家王朝，建立了新中国。”

在列举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主要矛盾的时候，作为中国人民的对立面，清水同志分别列举了“清王朝”、“（北洋）封建军阀”和“蒋家王朝”。这些，都是某一个时期人民革命的具体对象，因为他们分别是各个历史时期反动剥削阶级赖以维持其统治的国家政权的具体形式。但是，我们知道，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外一些阶级的工具。任何国家，都是为了维护一定的阶级压迫和剥削才存在的。国家的存在，是深刻的阶级矛盾尖锐不可调和的产物。但是国家本身，并不等同于、也不能取代它背后实际存在的阶级矛盾。在社会生产关系以及基本阶级矛盾不发生变革的情况下，政权的更迭或者国

家形式的改变就不过是用一种统治方式来代替另外一种统治方式，或者用剥削阶级中的一批人来代替另外一批人。

在历史上，一次又一次伟大的农民起义，给封建地主阶级以沉重打击，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式封建社会，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农民阶级与封建地主阶级之间这一中国古代社会的主要矛盾。事实上，清水同志所列举的两次“胜利”的革命——辛亥革命和北伐战争，都是在形式上推翻旧的统治集团的同时，新瓶装旧酒，以新的方式继续维护旧的剥削阶级对广大劳动群众的压迫和剥削。在这个意义上，这两次革命事实上都是以失败告终的。辛亥革命失败的标志是宋教仁被刺和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发动的“二次革命”失败。1925-1927年的大革命失败的标志是蒋介石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汪精卫的七一五反革命政变。

在阶级社会里，一个社会的主要矛盾，只能是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级之间的矛盾。熟悉中国革命史的同志都知道，自近代以来，中国就沦落为一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内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社会的主要矛盾，只能是包括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人民大众与帝国主义（即外国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即买办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人民革命的基本历史任务是反帝反封建。

早在1925年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毛主席就指出：“综上所述，可知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毛主席在这里所说的“半无产阶级”就是后来一般所说的农民阶级中的绝大部分——“贫下中农”。毛主席在这里所说的“中产阶级”就是后来一般所说的“民族资产阶级”。

1941年，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主席详细解释了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任务：

很清楚的，中国现时社会的性质，既然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它就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改变这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中国现时的革命，是在走第一步。

这个第一步的准备阶段，还是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来，即中国社会开始由封建社会改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来，就开始了的。中经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直到今天的抗日战争，这样许多个别的阶段，费去了整整一百年工夫，从

某一点上说来，都是实行这第一步，都是中国人民在不同的时间中和不同的程度上实行这第一步，实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为了建立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而斗争，为了完成第一个革命而斗争。而辛亥革命，则是在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开始了这个革命。这个革命，按其社会性质说来，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革命。

在以上段落中，毛主席明确指出近代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自太平天国运动以来中国人民历次革命斗争的主要任务就是“实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

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时刻，毛主席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在解释“人民”的概念的时候，毛主席指出：“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实行专政，实行独裁，压迫这些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

这里，毛主席明确指出，作为人民敌人的“国民党反动派”是代表“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实行反动专政的，而后者又不过是帝国主义的走狗。

在以上著作中，毛主席运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分析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基本性质和社会主要矛盾。今天，我们要正确认识中国社会的基本性质、主要矛盾并形成正确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策略，还是要采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

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是与历史唯心主义的方法相对立的。历史唯心主义的方法从主观出发，夸大个人的作用或小集团的作用，夸大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在一定的条件下，历史唯心主义又会转化为形而上学或机械唯物主义，孤立地、静止地看问题，将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暂时的强大固定化或绝对化，看不到或者不承认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必然导致危机以及危机必然导致无产阶级革命。

历史唯物主义则是从现实存在的社会经济关系出发，从中了解发现社会的主要矛盾，并且在实践中逐步认识现有矛盾发展变化的规律，并且根据这些规律寻找到无产阶级由弱到强、资产阶级由强到弱的具体条件。

就当前的中国来说，至迟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中国的资本主义复辟就已经全面完成。今日中国，是标准的资本主义工业社会，是世界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主要基地。所谓“特色党”，其实就是当前中国条件下资产阶级国家的具体形式，它的经济基础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它的基本职能就是镇压无产阶级、为资产阶级发财致富充当打手和保镖。

在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对无产阶级的剥削是资产阶级发家致富的最基本的条件，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社会的主要矛盾。“特色党”，作为管理资产阶级共同事务的委员会，只不过是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在必要的时候，资产阶级完全可以“改旗易帜”，更换其政治代表，继续对无产阶级剥削和压迫。近年来东欧、中亚、中东的多次所谓“颜色革命”都说明，无产阶级做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尾巴，只反独裁、不反资本，到头来得不到任何东西。因此，所谓“当今中国的主要矛盾是中国人民和特色党之间的矛盾”是站不住脚的。

清水同志认为，中国的工人运动仍然停留在“福利和增加工资等低层面上。。。中国工人运动斗争的主要对象错了，不是资本家，而（应该）是特色党”。

无产阶级革命的最高目标是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马列主义一向反对将工人斗争限制在经济斗争的狭隘范围内。但是，马列主义从来不反对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的正常统治时期为了限制和减轻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而展开经济斗争，并且绝不轻视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只有通过长期的、大量、经常的、反复的经济斗争，工人阶级才能够逐步地学会组织起来进行战斗，同时在斗争中积累经验并提高阶级觉悟，逐步地认识到个人的利益是与集体的利益进而与整个阶级的利益是根本一致的。只有在这样的经济斗争的基础上，工人运动才能够进一步发展发展为政治斗争，并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发展为整个阶级的革命运动。

以上这些，不仅对无产阶级和工人运动适用，对于其他各劳动阶级（包括农村半无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同样适用。农民阶级或农村半无产阶级也不是天然就要求革命的。无产阶级和其他各劳动阶级只有经过长期阶级斗争的实践，再加上具备了马列主义理论知识的革命知识分子的灌输，才能具有完全的阶级觉悟，进而要求社会主义。

如果说，农民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力军。那么，在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中，主力军非无产阶级莫属。

清水同志列举了一些对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不利的条件：“在现阶段，中国工人运动的这个目标（推翻特色党）显然很难实现，原因是工人集中的地方一般在城市，城市往往有特色党重兵把守，交通便利，中国工人却手无寸铁，不掌握武装，并且中国工人起来暴动的时机还不太成熟。因此，两者力量对比悬殊，目前想依靠工人运动来推翻特色党统治，实现社会主义伟大回归不太现实。”

这些都是事实。历朝历代的统治阶级对于劳动人民的反抗采取的都是“重兵把守”、残酷镇压的方法。然而，这并没有挡住人民革命的浪潮，也

没有使历史上的反动派免于灭亡。俄国十月革命走的是城市武装起义的道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持久人民战争的道路。每一个国家、每一代人都必然要根据新的、原来没有的历史条件创造新的革命形式。未来的中国革命也必然有自己新的革命形式。这种新的革命形式既要反映中国无产阶级的特点，也要反映中国资产阶级的特点。

与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相比，中国的无产阶级有三大优点。首先，中国的无产阶级规模庞大，是目前世界上人数最多、发展最迅速的无产阶级。中国的非农产业就业人口已经从三十多年前的仅占全部就业人口的约百分之三十发展到现在的近百分之七十，其中绝大部分属于现代的雇佣劳动者即无产者。其中也包括清水同志所说的受剥削最深重的“农民工”。

第二，中华民族是历史悠久的民族，中国人民有几千年光荣的革命传统。经过长期的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作为主体民族的汉族内部以及汉族与多数少数民族之间高度融合，虽有地域差别，但是没有严重的语言、文化、宗教的隔阂。除了新疆、西藏等少数地区以外，没有严重的种族和宗教冲突。这就有利于以汉族为主体的广大劳动人民在阶级的基础上形成团结，减少了资产阶级利用种族、宗教冲突对劳动人民分而治之的危险。这就与南亚、中亚、中东等地种族、宗教主导政治斗争的局面形成了鲜明对比。

第三，中国的无产阶级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有社会主义革命和资本主义复辟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教训。老工人向往社会主义，具有高度的阶级觉悟，并且正在将自己的斗争经验和政治觉悟传授给新工人。这就使得中国的工人运动以及中国无产阶级的觉悟能够以比一般资本主义条件下更加迅捷的步伐向前发展。

与其他国家的资产阶级相比，中国的资产阶级有三大弱点。首先，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了几十年，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落了一个高不成、低不就，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尴尬位置。作为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专门从事出口制造业的半外围国家，既不能像西方帝国主义国家那样靠剥削外围国家、转嫁危机来享受“霸权红利”，也不能像外围国家的资产阶级那样仗着无产阶级的弱小和分裂以及帝国主义的庇护混日子、“照旧统治下去”。一旦来日出口陷入危机，能源原材料短缺，中国这家“世界工厂”就只有关门大吉。中国资产阶级的日子也就到头了。

其次，中国资产阶级的统治是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中国的资产阶级的财富大多是靠巧取豪夺、侵吞国有和集体资产积累起来的，缺乏一般资本主义财富的“合法性”。中国的资产阶级精神空虚，没有信仰，也没有自己独立的意识形态。资产阶级内部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离心离德，充满了末世心态。一旦有事，没有多少资本家、多少官僚会死心塌

地为他们的本阶级充当宁死的“男儿”，因而其整个统治基础外强中干，实际上十分脆弱。

第三，中国的资产阶级失道寡助，外无外援、内无内援。为了他们自己发家致富，也为了给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打工，中国的资产阶级不仅残酷地剥削无产阶级，而且残酷地剥削农村半无产阶级，并且严重地侵犯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利益，从而一方面削弱了自己的社会基础，一方面扩大了无产阶级的同盟军。

在国际上，中国资产阶级甘心投靠美帝国主义，陶醉于“夫妻关系”之中，背叛广大亚非拉人民的反帝和民族解放事业，从而导致自己众叛亲离，没有任何一个真正的盟友。一旦中国有事，不但一般中小资本主义国家不会干预，就是美帝国主义也会由于中国版图辽阔、人口众多、地理距离遥远以及美帝自身力量衰落等因素，将无所作为。这就为中国人民将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准备了有利的国际条件。

无产阶级最大的优势、资产阶级最大的劣势，就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资料事实上掌握在工人手里，资本家的机器要靠工人才能够运转。早在十九世纪后期，恩格斯以及当时的国际工人运动领导人就曾经考虑过，未来的工人革命将以总罢工的形式爆发。俄国 1905 年革命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普遍的、群众性的、自发与自觉相结合、经济罢工与政治罢工相结合的总罢工作为一种革命形式的威力。近年来，埃及、乌克兰等地的群众运动，虽然是由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领导的，但是在形式上具有群众性总罢工和总示威的特点。这些国际工人运动的经验表明，在资本主义城市化、工业化的条件下，无产阶级革命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其爆发的频繁程度、动员人口的广度和深度以及迅速威胁统治阶级统治中心的能力，都远远超过历史上的农民革命。

在农村包围城市的持久人民战争的历史条件已经不再具备的情况下，我们完全可以相信，中国的无产阶级必将拿出他们全部智慧和勇气，发扬革命的首创精神，披荆斩棘，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中国的无产阶级不仅将敢于斗争，而且将敢于胜利！

工人阶级的解放只能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

许志永在当代中国有进步意义吗？

赤旗、远航一号（2014年2月1日）

赤旗：

许志永代表的是自由主义左派，一方面如远航说的陈有西等宪政派大右派已经抛弃他了，因为他走底层民粹动员的道路，中国的自由派坚决反对这样走，因为这条路在中国很容易导致民粹左倾。如刘晓波等人言论反对革命也是这个意见。但另一方面，许志永有其进步的一点，他代表的是在城镇化和工业化中大批出现的小资和工人阶级上层的观点，关于教育平权和公开财产等。（金融时报又夸大其词，教育平权运动解决不了几亿农民工子弟入学的问题，公平教育是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可能解决的问题）。据我所知，公民对新自由主义政策还是有一定批判性的，不同于当年的08宪章，因为他们要动员底层民粹。

远航一号：

他们对新自由主义批判表现在什么方面？另，“教育平权”是一个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工人上层的口号吗？

赤旗：

我觉得判断一个人的情况需要从他的言行各方面来看，而且需要长期地一贯地整体地看。我对许的判断是自由主义左派。许志永在政治模式上更倾向的是北欧式的社会民主主义（也就是王希哲他们相信的那种），而不是经济上的完全自由市场。在人员构成和动员上他走的是底层动员的道路，他从读研究生起就是搞农民征地维权之类的，后来主要搞访民维权出的名。

说实话，根据我的接触和理解，在中国十几年搞访民维权最扎根的就是当初的公盟了。许本身是极为贫穷的河南民权农村子弟出身，没有什么背景，完全是靠读书，对底层人民的同情还是比较真挚的。

他抨击中共很厉害，对前30年和对后30年都是拼命抨击，但是把两者之间割裂开来抨击，这与自由主义右派又是不同的。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前30年斯大林毛泽东模式共产主义，后30年权贵资本主义，称赞北欧福利模式，这是西方自由主义左派的路数。

许志永和新公民运动这次重判，我的感觉其实主要就是“不打硬的，不打软的，就打不服输的”。许是有过前科，也坐过牢的，还搞新公民运动，你主张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今天能几千人聚会吃饭，鼓动几百人上街，等明天改个名字就能登记几百个候选人竞选，几万人投票。这才是要命的。

马厚芝等人的经历也是如此，你主张什么没人理你，在网上意淫法西斯主义，大汉民族主义的多了，但你要是付诸言行，搞几十人开会封官派任务，就是麻烦了。。。

据我“道听途说”的，许志永在和“有司”交流时，经常爱用“社会主义”说事，说与你们相比，我应该更算个“社会主义者”。

“我的理想其实和“社会主义”原初的理想并不相悖，社会主义追求公平正义，必然离不开民主法治，社会主义需要发展生产力，必然离不开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绝不等同于一党专制、计划经济、公有制。社会主义有多种，1949年后中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公有制的“科学社会主义”，1978年以后推行产权私有化和市场经济，正是这些文革中被大力批判的“资本主义”制度带来了中国三十年的经济发展。其实什么主义都是次要的，解决国家的问题给国家带来自由民主进步才是重要的。”

中国存在这么一批“对社会民主派”抱有幻想的自由主义左派，如王希哲和许志永。（其实我觉得“马列托”在这个方面不是很“托”，当然中国自称“托派”的有些就是自由主义左派转变的）。根据我的接触和了解，他们在小资和学生中还有一定支持度的。。。当然如何判读和对待这些“自由主义左派”值得研究。。。

远航一号：

我也在想，社会民主主义者（赞同福利国家，但是却反对国有制，反共、反对历史社会主义的）在中国这样的条件下是否有进步意义？社会民主主义，一般来说，在西方、在日本历史上是进步的。但是你了解，八十年代以后，特别是自从布莱尔第三条道路以后，早已经发生变化，堕落为温和新自由主义。尽管如此，总还是多少代表一些工人阶级利益，起着一点迟滞新自由主义的作用。

然而，在外围和半外围的环境下，从广大的失败国家到几个主要的“新兴市场”，我实在是想不到社会民主主义起着进步作用并且在群众中有显著影响的。拉美可能是最接近的，但是拉美的左转政权普遍打着激进社会主义的旗号而在

事实上实行进口替代工业化的国家资本主义政策。这是不同于简单地乞求资本家让步的“社会民主主义”的。这些恐怕不是偶然的。

那么，像今天这样，许这种运动有没有进步意义呢？根据你讲的许的经历，当属于反映了一部份下层小资产阶级的政治幻想和主张，又掺杂了小农的落后性。首先一点，今日中国，无论左派右派，不发展工人运动，最后都是无前途的。我与路石的看法仍然是，目前在新工人运动中，无论左派右派都没有扎住根，新工人运动有它自己的规律。而在老工人运动中，我们是开始扎住根的。老工人实际上并不见得老，下次回国，给你介绍一些并不老的老工人，关键是他们有群众。

其次，今日中国，工农群众对毛主席的感情是实在的、普遍的。谁反对毛主席、反对社会主义，那就得罪至少半数工农群众。另外半数（青年中的大多数），在未经教育的情况下，固然没有什么对毛主席的感情，但想要让他们如许一样仇视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在乞求资本家的同时，坚持不忘念叨反毛，实际上自己把自己孤立起来，或者起着在群众运动中制造分裂的恶劣作用。对于许来说，反毛反社会主义，无非是想靠上帝帝国主义和自由派这颗大树。毋庸讳言，中国的自由派，是有帝国主义和买办背景的。我当然反对乌有等所说美帝一天到晚就想搞垮中国。但是美帝将中国的自由派作为他们在中国的政治备份，这个作用还是有的。

在外围和半外围的环境下，新自由主义最主要的表现形式，就是对前三十年的反动。在苏东中国，就是对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的反动；在拉美、中东、印度、非洲，就是对进口替代工业化的反动。许以为市场经济、产权私有化都是所谓进步，可见其无知、庸俗及反动，事实上完全无视中国工人阶级以及后来劳动农民在阶级利益方面的重大损失。这方面，我认为许代表着旧小农最狭隘、最落后的方面。

至于争取自由的问题，毛派中的一部分（所谓二次革命论者）、托派中的大部（秋火、工国委）似乎都主张左派应当支持自由派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这里有个问题，首先，怎么支持，拿什么支持？这些同志经常说的就是，有了政治自由，工人运动能有更广泛的空间。那么问题就来了，自由派有本事独立争取到政治自由吗？如果没有本事，他们愿意发动工人阶级吗？靠什么发动？自由派怕不怕暴民专政？这些，我认为是 1989 年的主要教训，是怎么估计也不为过的。我个人，除了政治上以外，从心理上、从思想感情上，最反对的，就是中国工人阶级把 1989 年白白流血的老路再走一遍。

今日中国的现实就是，要争取政治自由以及其它一切民主权利，不把工农成分发动起来是不可能的；而要发动充分发动起来，不靠社会主义、毛泽东主义也是不可能的；而革命社会主义一旦掌握了工农运动领导权，断没有拱手相让的道理。

所以，就小资产阶级方面的工作来说，反对自由派（包括许之流的“自由主义左派”）仍是主要任务。工农斗争方面，目前主要特点是经济斗争，左右派都无能为力。我们有办法的地方，都是工人已经较有觉悟的。将来的出路，可能还是以老工人、有觉悟工人带动一般群众。

最后，关于社会主义，你我都知道，社会主义决不是什么“公平正义”。从许对北欧的描述来看，此人对西方的现状极其无知。许与王希哲亦不相同。王政治经验更丰富，并且毕竟是造反派出身，对文革知道做二分法，而且从推翻中共的目的出发，愿意与左派合作。这些是差别。

东亚各国各地区资产阶级之间没有根本不可调和的矛盾

远航一号（2014年2月9日）

原编注：这是笔者在张文木“中俄结盟的限度、目标和意义”一文下面的跟贴，现略加修改单独成文发表。

目前，中国的左派发展处于一个转折过程。在新的革命高潮来临之前，国内各种阶级矛盾的发展是曲折式的、渐进式的。另一方面，由于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地位有所上升，这就增强了中国小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希望依靠中国资产阶级提高中国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地位进而改善本集团社会和经济地位的幻想。在这种幻想的刺激下，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左派”声嘶力竭要团结在“习总书记”周围，并与中国资产阶级中的所谓“鹰派”相配合，大事渲染东亚地区的所谓“战争气氛”。那么，在中国、日本、台湾、美国、俄罗斯等国（地区）的资产阶级相互之间真的存在所谓尖锐不可调和的矛盾吗？这种矛盾，真的已经尖锐到战争一触即发了吗？笔者认为，这些论调，是完全不符合当前国际阶级斗争实际的。

要正确分析当前的国际形势，就必须批判、摈弃资产阶级各种腐朽的、反动的国际关系理论。目前，在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左派”以及所谓“鹰派”的资产阶级学者中流行的是反动的资产阶级“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以及与之相关的各种形形色色的地缘政治理论，主张所谓国家之间“没有永久的朋友，也没有永久的敌人”。

只有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学说，才可能从根本上正确地认识和分析国际阶级斗争以及各国资产阶级相互之间的斗争。当前国际形势的主要特点是：各国资产阶级与各国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和被压迫人民之间的矛盾，是国际主要矛盾；各国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次要矛盾。

就中国资产阶级来说，与美国、日本、俄罗斯资产阶级，相互之间，都没有根本的、不可调和的冲突。恰恰相反，中国资产阶级目前主要还是依赖美帝国主义充当维护世界资本主义秩序的主要力量。只要美帝能够维系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保障中国资产阶级发财致富，中国资产阶级是不惜抛弃雅尔塔体系的。具体来说，就是与日本达成谅解，抛弃北朝鲜。这实际上是中国近年来外交政策的总构想。问题是，由于美帝衰落，美帝已经越来越无力维持世界资本主义的大局。

中国资产阶级与日本资产阶级之间围绕东海油气田等问题，有次要的经济利益冲突。但是这种冲突远远不至于让双方放弃由整个东亚资本主义分工体系所决定的根本利益。

虽然中、日、台资产阶级相互之间不存在根本的矛盾，但是由于其国内矛盾（或地区内矛盾），作为统治阶级的资产阶级不得不在一定条件下表现出维护“民族国家”整体利益的姿态。

中国资产阶级，由于从资本主义复辟演变而来，其国家形态、政治合法性有赖于对历史上民族解放运动的继承，并承担着解决一些悬而未决问题的义务，包括台湾问题和钓鱼岛问题。这些义务，对于中国资产阶级来说，与其说是自觉自愿承担，倒不如说是“历史包袱”。在实践上，中国资产阶级对于这些义务，一般是能不承担就不承担，但是一旦受到国内无产阶级，特别是小资产阶级的压力，不能不在外交上表示一下。

日本方面，国内资本主义危机加深。在美帝为其提供军事保护能力与意愿逐步衰落的情况下，日本资产阶级要求成为所谓“正常国家”，即独立面对并处理日本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遇到的各种问题。日本资产阶级的这种要求，与中国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之间并没有冲突，但是与中国以及亚洲其它各国历史上民族解放运动的要求（以及这种运动在目前所遗留的各种悬而未决的问题）之间，却存在着根本冲突。

台湾方面，台湾资产阶级在九十年代以来的经济转型中，早已经将大量资本转移到大陆，因而与大陆资本主义形成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另一方面，这种联系又是美帝保护和批准的。

台湾内部，台湾资本家将他们剥削大陆和东南亚工人所得的超额利润，拿出一部分来，形成了台湾内部的阶级妥协和福利国家体制。但是这种体制，在世界资本主义和台湾资本主义危机的大背景下，又朝不保夕。在这种形势下，台湾内部代表工人贵族和小资产阶级的政党（民进党）便打着台湾“民族主义”和“独立”的旗号，将台湾内部的各种反资产阶级因素引导到反大陆和狭隘民族主义的方向上去。

同样由于美帝国主义的衰落，以及中国资产阶级对海外能源、原材料依赖的加深，中国资产阶级内部开始出现了独立维护海外市场 and 原材料来源安全的欲望，于是造航母、扩大海军，在东海、南海“宣示主权”，突破岛链之类，甚嚣

尘上。这些都不是挑战美帝霸权，而是试图填充美帝衰落以后的空白。但是事实上，中国资产阶级又力所不能及，在中东、印度洋等广大地区完全无力染指。即使在东亚、东南亚，仍然要仰美帝鼻息。

欧亚大陆各主要资产阶级，目前只有俄罗斯资产阶级与美帝有着较为严重的利害冲突。其主要原因是，俄罗斯资产阶级高度依赖石油天然气出口，这就与美帝试图控制世界各主要能源原材料基地、压低能源价格并破坏欧、俄联合等战略意图发生了严重冲突。但是，即使是在俄、美之间，冲突也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

再来说说朝鲜。朝鲜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由于国内国际各种原因，主要是在苏联解体和中国资本主义复辟以后，被甩出了世界资本主义分工体系。其统治集团，为了自身生存，一方面残酷压榨朝鲜人民，一方面周旋于各大国之间，不得已，走上了核武以自卫的道路。对于美、中、日、南朝鲜等资产阶级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包袱，又是一个奈何不得的定时炸弹。

中国资产阶级对于朝鲜，早就没有了什么“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也不会真的在惜朝鲜所谓作为与美国势力范围之间缓冲区的“地缘政治价值”。其真实的情况，恐怕是这样的。中国资产阶级早就准备抛弃朝鲜，希望美帝和南朝鲜将朝鲜接过去。但是美帝和南朝鲜又都不敢接这个烫手山芋，一定要中国资产阶级继续维持其与朝鲜已经名存实亡的“盟友关系”，同时又坚持要中国资产阶级“负责任”。而朝鲜统治集团，又不甘心自己的灭亡，十分有效地利用了中、日、俄、南朝鲜等国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于是就维持了下来。

总之，在东亚各国、各地区资产阶级之间并没有根本不可调和的矛盾。但是由于整个世界资本主义危机的深化，以及由于各国各地区内部阶级矛盾的增长，各国各地区资产阶级相互之间的矛盾确实在增长。这种矛盾的增长，未来可能会反作用于资本主义各国的国内阶级矛盾。但是，这只是未来的一种可能性，并且目前来看，尚且不是一种主要的或重要的可能性。

中国的马列毛左派，应当不理睬各种小资产阶级幻想狂的战争叫嚣，并在必要与有利时（所谓有利，即在有利于群众理解时），坚决揭露之，将我们的全部精力投入到国内的革命阶级斗争中来。

谈谈乌有之乡

郭松民（2014年3月11日）

乌有之乡自创办以来，已经走过了一段辉煌而艰辛的历程。2012年后，乌有之乡再次来到了一个历史转折点，她面临着一个重新定位和重新选择方向的问题，如果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乌有之乡将再次走向辉煌，如果做出了错误选择，乌有之乡将无可挽回地走向没落，沦为历史名词。

乌有之乡曾以一小网站之力抗衡整个主流舆论界

乌有之乡创办于2003年。当时的大背景是，改革开放已经使中国被深深的被纳入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当中，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恶果，如贫富分化、环境污染、腐败、黑社会及黄赌毒再度出现等，已暴露无遗。因此，1990年代中后期开始，原来统一的中国自由主义启蒙思想界逐步瓦解，从自由主义阵营出走的“新左派”就私有化、市场化、国家安全、如何看待“文革”等问题已经同自由派发生了激烈的争论，2003年由学者祝东力等人编辑出版的《思潮》一书就反映了争论双方的主要观点。这种争论的意义是历史性的，它表明中国的知识界、思想界已经走出后文革时代，其深厚的左翼传统开始复苏。

不过，虽然思想界争论的很激烈，但由于主流媒体封杀左翼声音的“默契”，这些争论并没有在大众媒体上得到任何反映，一般民众对知识界的分化浑然不觉。主流媒体仍然在起劲的宣传市场乌托邦，其传递的全部暗示就是“美国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

在乌有之乡网站出现之前，体制内的“老左派”也试图发出不同的声音，以军旅作家巍巍为主创办了《中流》、《真理的追求》等杂志，笔者曾经看到过几期，深感他们的担忧是合理的，对问题的剖析也是尖锐深刻的，但老左派最大的问题话语体系过于陈旧，这限制了杂志的影响力。后来，这两份杂志因为对“三个代表”的提法有所批评而被停刊，“老左派”遂转移阵地，创办了“毛泽东旗帜网”，但影响力远不如乌有之乡。

从2003年到2008年，乌有之乡以讲座、网站、书店三位一体的方式运作，成了泛左翼学者集体发声的平台。在自由主义思潮统摄了全部主流媒体，严密封杀左翼声音，官方媒体又对自由主义舆论曲意迎合的大背景下，乌有之乡以一个小网站抗衡了整个主流舆论界。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乌有之乡，新世纪前10年的中国舆论界真可谓万马齐喑，乏善可陈，这是乌有之乡最光辉的时刻，必将载入中国当代思想史。

在早期的乌有之乡，有三个人的名字不能不提，那就是韩德强、左大培、杨帆。他们当时被称为非主流经济学家（杨帆一直不承认自己是左派，只承认自己是非主流）的“三剑客”。韩德强以《碰撞》、《竞争经济学——萨缪尔森批判》两书知名，当时主流经济学正处于“经济学帝国主义”的鼎盛时期，舆论普遍认为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可以自动解决一切问题，但韩德强却以毫不含糊的语气指出，由于市场中“信息不对称”和“力量不对称”的普遍存在，“马太效应”不可避免，在很多时候，市场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而是问题产生的根源，这一论断在当时给人以空谷足音的感觉。韩德强并预言10年之内资本主义必将爆发大危机。而左大培对国有企业存在的必要性及历史功绩的论证，杨帆对国家经济安全、经济自主权的强调，都令人耳目一新。乌有之乡给在新自由主义话语霸权下令人感到窒息的舆论界吹进了一股清新的风。

非主流经济学和主流经济学的争论，随着“郎顾之争”的登场及顾雏军的落马而获得了完胜，主流经济学因此变得声名狼藉，虽然主流经济学家还占据各种有利位置，但话语霸权已经开始从他们手中滑落了。

在同一时期，黄纪苏、祝东力、孔庆东等学者对文化界崇洋媚外的恶劣风气也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关于《色戒》的讨论可谓石破天惊，连一向目空一切的南方系媒体也开始关注。此外，民间学者老田对文革史的研究，李昌平、童小溪对三农问题的研究，中国农业大学教授何慧丽在兰考进行的合作社实验的经验等，也都通过乌有之乡的平台向外传播。

在笔者和乌有之乡接触的过程中，有几件事情令我印象深刻。2004夏天的一天，第一次到乌有之乡书店听讲座，当时书店还在北航西门外的一幢小楼上，底层卖书，上层办讲座。那次是童小溪讲三农问题，我去的时候，听众已经坐满了，基本都是大学生，连楼梯上都坐满了人。当时正值酷暑，书店里没有空调，听众个个挥汗如雨却又神情专注，令人动容。

和乌有之乡“掌门人”小范的相识也十分有趣。有一次讲座后我提了几个问题，结束后正要离开，一个30岁左右的年轻人从后面拉住我，自我介绍“是乌有之乡的”，希望认识一下，他就是范景刚！小范身材矮胖，窝胸凸肚，憨厚一笑满口黄牙，操着带浓重河南腔的普通话——这副形象和我原来想象的玉树临风，俊秀飘逸的青年革命者的形象大相径庭。但后来的事实证明，在小范朴拙的外表下，有一颗火红的赤子之心，他是一位真诚的理想主义者，为乌有之乡的发展呕心沥血。

那几年周末在乌有之乡听讲座的日子是快乐的，往往在讲座之后还有电影沙龙，我对电影的兴趣就是从关于《色戒》的讨论开始的，后来竟出版了《电影的战术》一书。往往活动结束后，几个相识或不相识的朋友，相约到街边民工消费的“无产阶级大排档”以AA制的方式一起吃饭，虽然清苦，却其乐融融。

转折：从争夺文化领导权到争夺政治领导权

2008年，乌有之乡发生了重大转折。如果说在此之前，乌有之乡还是一个泛左翼学者共同发声的平台，主要功能还是和主流精英争夺文化领导权的话，那么从2008年开始，乌有之乡开始转向参与争夺政治领导权，她看上去也越来越像是一个“政治团体”了——尽管我认为乌有之乡从来都不是一个组织严密的政治团体。

乌有之乡发生转折的主要原因有三个：一是右派抛出了《零八宪章》，明显表现出要在中国策动“颜色革命”的态势，试图“三年决战”。一直希望中国回归社会主义的左翼学者和群众不能不对此作出反应，把注意力从启蒙转向预防颜色革命的政治动员；二是从左翼学者和群众的角度来看，启蒙的工作也已经基本完成，比如关于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与功绩的问题，文革的问题、大跃进的问题，改革开放的性质问题等等，在左翼内部已形成共识，政治斗争的问题已提上日程。

乌有之乡发生转折的第三个原因是个人性的，那就是张宏良的横空出世。

从任何意义上说，张宏良都不像是一位传统意义上的“学者”，而更像是一位极富感染力的宣传鼓动家和演说家。2006年，张宏良以一篇《当前中国左派和右派的斗争》进入人们的视野，他在文章中梳理了“老左派”先做“投降派”后做“吴三桂”的政治经历，令人拍案叫绝。我的感觉是好像还从来没有如此清晰准确地为1976年10月以来的“老左派”画过像。

此后几年中，张宏良以乌有之乡的网站、讲座为平台发表了大量的文章、演讲。他看问题往往入木三分，一针见血，他的演讲极富感染力，令人热血沸腾，他还善于创造新名词，比如“美国鹦鹉”、“大众民主”、“精英政治”（当然，有些词不是他原创，但是经由他反复使用，而为广大左翼群众所普遍接受）等等。很多网友就是为了专程听他的演讲而来到乌有之乡的，对于乌有之乡在2008年之后影响力的急剧增大，张宏良的确居功至伟。

在张宏良的万丈光焰下，其他左翼学者显得有些黯然失色，这引发了一些摩擦和不愉快。此外，对张宏良提出的，可以被简单概括为“保党救国”的政治路线，也导致了泛左翼内部“乌有之乡”和“旗帜网”两大山头的争论，但总的来看，乌有之乡仍然是泛左翼共同认同的精神家园。

2008年后，由于种种机缘，乌有之乡逐渐形成了两大精神领袖的格局。一位是张宏良，他为乌有之乡网友提供了一条政治路线，后来概括为十六字方针：“反腐锄奸，整党救国，大众民主，共同富裕。”严格说起来，这一方针的发明权应属于张勤德，但由于张宏良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张勤德，所以网友们又往往把这一路线和张宏良联系在一起。另一位就韩德强，他奠定了乌有之乡的哲学基础，就是“文化决定论”，简言之就是通过培养“新人”来构建“新社会”。

我这里使用“精神领袖”一词，只是一个比喻性的说法，意思是他们当时在乌有之乡的网友中影响力比较大，非其他左翼学者可比，但这并不意味着在乌有之乡出现了对他们的膜拜，也不意味着他们拥有强制别人的权力。

但张、韩两位在哲学上都存在明显的短板，这成了他们后来逐渐失去影响力的原因之一。简言之，张宏良在哲学上有形而上学的倾向，他经常会做出一些绝对化的全称肯定判断或全称否定判断，如2006年底十六届六中全会召开，张在演讲、文章中将其和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并列为第三次“伟大的转折”，在当时非常鼓舞人心，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转折”并没有出现。这样的事情多了以后，自然会影响到他在网友当中的威信。

韩德强在哲学则具有唯心主义的倾向，事实上，他也从不掩饰他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批判，笔者曾开玩笑地将其称之为“韩克思主义”。唯心主义导致他在政治上经常做出错误判断，提出一些饱受争议的政治主张，比如“支持梁稳根进中央”等。当然，影响最大争议最激烈的口号，莫过于“XX当总理，人民共富裕”，他并不是这一口号的唯一提出者，但却是左翼学者当中影响最大者。

需要强调的是，尽管张、韩两人在哲学上、政治上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但以我近距离的观察，他们都是纯洁的理想主义者，我没有看到他们利用自己影响力牟取私利，他们都过着清贫的学者生活。

隐然成为一种政治运动的乌有之乡之所以由盛而衰，除了张、韩两大精神领袖在哲学上存在的短板外，最主要的外部原因当然是2012年的重庆事变。

如果说，2007年“重庆模式”的横空出世，使左派看到了依托体制内健康力量，实现社会主义复兴的可能性的话，则2012年重庆模式的被绞杀，则使得这一主张受到严重质疑，乌有之乡两大精神领袖的格局也随之解体。

乌有之乡和重庆的关系一直被外界揣测，但据我所知，这更像是一场单相思的爱情——重庆模式受到乌有之乡的热烈拥护，但由于乌有之乡早早地被人贴上“极左”标签，重庆方面对乌有之乡一直是极力避嫌的，并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至于“巨款资助”云云，就更是秦火火、薛蛮子之流欲置乌有之乡于死地的无耻谣言了。重庆模式被绞杀后，乌有之乡之所以没有被像右派所希望的那样被一网打尽，两者之间只有精神上的联系，没有实质上的联系，应该算是一条最根本的原因。

但遵循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的不变规律，重庆事变给乌有之乡造成了严重影响——网站被封闭，讲座被禁止，只剩下书店苟延残喘，乌有之乡一时间门可罗雀。两大精神领袖因为备受质疑而失去了光环。据我了解，张、韩二人目前和乌有之乡的关系都已经转变为“普通左翼学者和红色网站之间的正常关系”，而不再享有原来的特殊地位和特殊影响力。

乌有之乡向何处去？

2013年，乌有之乡书店从靠近人民大学的北三环，搬迁到了四号线的北方终点“安河桥北”，这是她第一次远离北航、北大、人大等著名高校云集的海淀区中关村附近。虽然这次搬迁主要是出于经济原因，但这更像是一个象征：乌有之乡从中心走向边缘。

严格说起来，现在的乌有之乡已不再是乌有之乡，而是“乌有之乡的废墟”。乌有之乡早已风光不再，似乎已人老珠黄。

难道不是吗？说她是一个政治运动吗？那么她的主张是什么呢？说她是一个泛左翼共同发声的平台吗？现在还有那位左翼学者需要通过乌有之乡来发出自己的声音呢？

曾经盛极一时讲座、座谈会、电影公社（沙龙）等活动早已成为一种美好的回忆。取代原乌有之乡网站的“乌有日刊”网站，其影响力和点击率同前者根本不可同日而语。到目前为止，似乎只有“红色旅游活动”在顽强而寂寞地坚持着，但是，难道乌有之乡要作为一家“红色旅行社”而存在吗？

两大精神领袖的离去为乌有之乡的再出发提供了机会，但他们所留下的巨大空白也随即被人们感受到了——无论如何，张、韩都是能够提出主张和愿景的人。但现在，乌有之乡似乎失去了主张和愿景，变成了一个布满了主张和愿景残骸的“平台”。

乌有之乡再出发，需要总结经验和教训，从2012年到2014年，两年过去了，经验是什么？教训又是什么？没有人知道。

乌有之乡面临困难的选择。她能洗刷干净被强行泼在身上的牌号为“极左”的红色油漆吗？她能回归泛左翼共同发声的平台吗？她能继续作为一个左翼政治运动而存在吗？

在我看来，乌有之乡可以做的事情其实有很多。10年来，乌有之乡积累了深厚的理论资源，但还没有据此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更没有将其打造成强有力的理论武器。乌有之乡需要利用这些理论资源，有组织地开展理论工作，在世界已经分化为1%对99%的今天，99%不能只是高喊“另一个世界可能的”，他们还应该知道另一个世界——新社会主义的世界——是什么样的？应该有一张关于未来社会的理论蓝图，那怕很粗糙的，也至少可以作为完善和讨论的基础。

我想，未来撰写思想史的人，如果发现尽管经历史无前例的大论战，但最终没有形成“乌有之乡学派”，那该是一件多么令人遗憾的事情？

乌有之乡应该作为一个民间的、社会主义取向的政治运动继续存在，而不应该简单地拥抱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目标，也不应该只是简单地怀旧，乌有之乡不能只是靠对毛泽东的缅怀来寻找存在感，而更应该继承毛泽东未竟之业。应该善于把工人、农民、农民工、失业学生、下层白领的呼声归纳为政治主张，并旗帜鲜明地提出来。只有举起有感召力的旗帜，乌有之乡才能恢复生命力。

作为一个民间的，并且甘于民间的具有社会主义取向的政治运动是有前途的——这也是我作为一个和乌有之乡相伴 10 年，一路走来的资深网友对乌有之乡一点期待吧！

我对乌有之乡仍然是抱有希望的，最后用我在 2011 年创作的《乌有之乡之歌》来作为本文的结尾——

黑夜沉沉不见星光，
一支火炬在远处闪亮，
乌有之乡聚集着年轻的理想者，
背负着人民的希望艰难在成长。
继承先辈接过红旗勇敢向前闯，
披荆斩棘遍洒火种胸中有朝阳！
社会主义是我们的理想，
平等自由是我们的向往，
乌有之乡聚集着热爱真理的人，
毛泽东的嘱托我们来承当。
追求正义追求民主不惧风和浪，
未来世界属于我们光明在前方！

世界是我们的，做事要大家来！

马列毛主义者把握农村问题的几个方面

水边（2014年3月18日）

从资本主义诞生以来，农村就成了一个问题。具体到中国当代，对于某些“左派”来说，农村是个可怜的三农问题，农村太穷太苦，需要人道主义和政府援助；对于右派来说，农村是个待开发的资源，农村的土地，人口，乃至风俗无不是可以作为商品买卖，为资本主义增添燃料的东西。

对于马列毛主义者，农村问题是一组关联甚多的政治经济问题。我们先不用说别的，农村问题对于我们，首先是：农村在社会主义革命中会扮演什么角色？我们又要怎么处理农村生产关系？要理解这个大问题，需要很多的讨论研究，我的这篇时评提出几个思考的角度，完全是抛砖引玉，希望能够引发读者的探讨。

第一， 辩证的认识小农经济的持久性。

马克思主义的早期思想家们曾经非常乐观的预计，小农是一个暂时的现象，资本主义天天都在摧毁小农，发展出大的资本主义农场，所以到了革命的时候，农村生产关系已经完全变成雇佣劳动关系，从而可以直接搞公有制社会主义。

但是革命是不能等待的，长远的理论分析不能取代现实的政治策略。就在共产党宣言发表不久，路易波拿巴这个小丑就借助小农的支持窃取了法国革命的成果。这就给了人们一个深刻的教训：小农的作用是不能轻视的。

从马克思的年代到现在又过了 100 多年了，资本主义生产有了巨大的发展，但是小农还是广泛大量的存在着。这里面有什么原因呢？可能有这么两条：

首先，小农虽然比较辛苦，但是对应的，单位产量也不低，不会直接的因为与资本的竞争而破产。所以在没有别的出路的情况下，小农总是一个能够谋生的选择，尽管不是一个赚钱的行当。

其次，资本未必愿意跑到农村去，尤其是基础设施不好，管理麻烦的地方。很多发展中国家巴不得能招商引资，让农村发展资本主义，可是就是没有资本愿意去费事。从资本主义的需求来说，资产阶级需要农村稳定的供给粮食，除此之外，资产阶级并不在意粮食是小农出产还是大农出产。

但是这并不是说小农经济的持久是一个神圣的东西，是一个我们不能动的东西。有些所谓左派（也就是列宁批判的那种小农民粹），就拿小农的持久来批判合作化和人民公社，这种牢骚是没什么意思的。我们要清楚的看到，小农经济的持久并不是说这个行当给了小农自由，给了他们权力，恰恰相反，这是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一个表现，农村成了被资本以及城市所遗忘的角落，这些小农要生存，就得不断的压迫自己和家庭成员，要夹缝中求生存。这种生存在资本主义条件可以持续相当长的时间，但是在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完全

可以给小农新的出路，让其选择。资本主义不去农村，社会主义是要去的，具体的方面在后面谈。

第二， 在当代中国农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占有主导地位，但不是主体地位。

在中国当代，经过了毛主席领导的土地革命以及合作化运动之后，旧时代的宗法关系以及一切带有人身依附关系的农村制度被一扫而光。邓小平等把农村集体搞掉之后，农村实际上形成了无数小农家庭农场。

要是你粗看起来，似乎当代中国农村的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非常有限。比如，如果我们从雇佣的情况看，根据农产品成本收益统计年鉴，在 2012 年，粮食生产每亩用工差不多 6 天半劳动时间，而雇佣工人只占了 0.32 天，占总体的 5% 左右。从这一点来看，工业领域的雇佣关系没有在种植业大规模的发展起来。

但是从另一个方面看，当代农村有很多生产都是上年纪的农民进行的，他们并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一个维持温饱的生计。这批人的数量有多大呢？根据全国人口抽样调查，农村人口里面 50 岁以上的占 28% 左右。这样，在与资本主义直接有关系的农业生产中，雇佣比例肯定要比前面的数字看起来高一些。

更重要的是，当代的农村家庭，收入越来越来自于非农的部分。在 2012 年，农村平均每人年收入是差不多一万元，这里面有将近 40% 都在来自于工资收入和财产性收入，这就主要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获得的收入了。另外，剩下的 60% 基本是所谓家庭经营收入，这个经营收入自然也包括了资本主义性质的所得（包括工资或者利润）。我想总的来说，当代中国农村一半以上的收入来源都是直接参与资本主义经济活动得来的，应该不冤枉。

就算一个农村家庭没有直接搞资本主义生产，其生产方式也大大区别于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小农，当代农村大部分的劳动还是为了生产资本主义所需要的各种商品，是当代中国乃至世界资本主义当中一个不可缺少的小齿轮。没有城市资本主义的需要和支持，农村经济就要崩溃。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资本主义在当代农村虽然没有占据主体地位，但是却构成其增长的动力，提供了大部分收入，所以占据了主导地位，农村处于依附地位。

第三， 农村与革命。

既然资本主义主导了农村，那么农村的斗争也必然从属于全国推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一部分，而且是重要的部分。

但是到了今天，我们不可能去简单重复毛主席领导的革命道路。那个时候农村有相当的独立性，撇开城市和资本主义也能存在。而且土地有大量的兼并和集中，大量底层农民的矛头是具体的，指向压迫他们的地主恶霸。而今天的农村并不完全具备这一点，我们不可能

把本来就为其占有的土地再分给他们一次。不同于城市的私有化，农村的土地到户基本是非常公平的，不容易有群众性的翻改制旧账的浪潮。

由于农村在今天实际上已经是资本主义城市的附庸，所以我个人认为，撬动农村的杠杆还是在工人，在城市。如果城市和工业能有变化，农村的变化就顺理成章。农村的小土地所有制，是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一旦资本主义发生了变化，小土地和小农也要变化。

这种变化，不能是拍脑袋想出来的，而应该是切实符合大多数农村劳动者的利益，也符合整个社会长远发展的利益的。一方面，我们保护合法承包土地的小农经营，另一方面，对已经形成资本主义生产的部分大农场，进行民主改造。各种政策的落脚点，是**保障农村劳动者的权利，给小农一个好的出路，也保障城市的原材料供给。**

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可以设想一些具体的思路：

——在土地集体所有的前提下，我们在农村要尊重承包土地的权利，尊重小农的权利，允许合同长期不变。对已经形成资本主义经营的，要进行民主改造，作为新的合作社。国营农场，矿山等依旧国有。

——查处一批有民怨的地方恶霸（尤其是跟矿产，房产相关的，以及城市资产阶级的各色代理人），没收其通过各种手段占有的土地和财产，作为当地国营单位的补充。

——调整农产品价格，在适当的条件下，部分重新建立统购统销制度，保障农民的收入。在农村适度的发展绿色工业，建设基础设施，扭转恶性城市化的趋势，切实改善农村状况，也为小农改变生存方式提供另外一种出路。

——鼓励建立合作社。在有保障，有工作以及条件适宜的情况下，鼓励农户把手里的承包土地随时转让给农村合作社，或者直接加入合作社。

薄熙来与辽阳铁合金厂的工人运动

路石（2014年3月24日）

原编注：在寒流急同志文章“中国社会性质的定性”下面，路石同志跟贴，介绍了一些薄熙来任辽阳省长期间与辽阳铁合金厂工人运动之间的情况，很有参考价值。单独编成一文。

（寒流急）原文说：“把本是国有资本集团中一员干将的薄熙来（在辽宁当政时期极力推行国企改制，造成几百万工人下岗）肉麻地吹捧成自己的精神领袖”。

作者大概不了解朱镕基推行的 1997-2000 年的全国“抓大放小，三年搞好国有企业”政策，其实就是国企大规模破产，工人大批下岗的一段时间。要踩地雷阵，不惜万丈深渊的豪言就是这个时期发出的。按照作者的思想，朱镕基干得好啊，消灭了官僚资本，应该给这位资产阶级别动队队长发一枚无产阶级的勋章的。但这里嫁祸于薄却好像有失公允。看薄的履历：

1993—1999 年 辽宁省大连市委副书记、市长

1999—2000 年 辽宁省省委常委、大连市委书记、市长，省委常委、大连市委书记

2000—2001 年 辽宁省委副书记、代省长

2001—2004 年 辽宁省委副书记、省长

还有人说薄是镇压辽阳工人运动的黑手，这跟用法国别墅加罪薄道理是一样的。辽阳工潮发生后第三天我们就到达了现场，当时还有几架直升机盘旋在辽阳市的上空，空气非常的紧张，说是工人要举行城市起义云云。我们前后到达辽阳五六次，最后写了详细的调研报告（见：辽阳铁合金厂的改制过程和工人的反腐维权斗争 <http://zlk.wyzxsx.com/Article/shidai/2009/09/714.html>）。

报告中有记载：

【据工人们说，破产实际是当时的辽宁省省长、腐败分子张国光（张国光 1998 年任辽宁省省长，2001 年 2 月调入湖北任省长、省委副书记，2002 年 10 月辞去省长职务。2004 年 2 月 24 日新华社报道，张国光因“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移交司法机关依法处理”。但他的假破产却让工人承受了代价，至今没有哪一级政府负责）授意搞的。2000 年春节时张来辽阳，不管铁合金厂的资产、债务对比情况以及经营状况如何，指示铁合金厂应该分离重组。开始市委书记陈世南不同意，后张又派秘书来辽阳开秘密会议，再次要求破产。。。。2001 年 1 月 5 日，张国光再次到铁合金厂现场办公，说：这样的企业怎么能不破产？】

工潮发生后，全总在接受境外媒体采访时说，姚福兴等人是恐怖分子。恰逢小布什提出全球反恐战略之时。

在我的记忆中，这次的工潮善后大部分工人还是比较满意的：“偿还了数以亿计的拖欠职工的包括工资、劳保等项的大部分欠款，连一些久已拖欠的、个别老工人至死也不报偿还希望的大笔医疗费这次也一并偿还了。”

还是看报告原文吧。当时没人想为“国有资本集团中一员干将的薄熙来”说好话。

发信人: quaecumvera (irrational), 信区: NewExpress

标 题: 从辽阳铁合金厂的工人运动看不厚

发信站: 水木社区 (Wed Apr 11 13:39:35 2012), 站内

要点：

1. 1998年辽宁人大选举时就有“国光”和“富士”之争，“国光”就是指张国光，“富士”是指薄熙来，辽南是富士苹果的产地，辽南的代表希望大连市市长薄熙来上台，提出了“要富士不要国光”的口号。最终张国光成为省长。张国光培植了一个腐败集团，慕、马就是其核心成员。

2. 铁合金厂工人于2002年3月5日、8日两次召开职代会，选举代表，组织纠察队，3月11日、12日的两次大规模游行示威。工人抬着毛主席像，打出了“罢免龚尚武，解放辽阳市”的横幅。辽阳市市委书记、市长吓得当天坐直升飞机走了，出来接见工人的都是副手，整个辽阳市处于无政府状态。

3. 辽阳铁合金厂工人表现了高超的斗争水平，在游行前广泛散发和张贴了《罢免龚尚武，解放辽阳市——致辽阳市人民各届同胞书》、《反腐告御状 四年无结果 工人受迫害 书记要做主——致中共中央江泽民总书记的一封公开信》、《辽阳腐败横行、省长应该私访——致辽宁省长薄熙来的一封公开信》。

4. 由于组织到位、声势浩大，辽阳铁合金厂工人赢得了巨大的经济成果。游行后2个月，2002年5月，市政府偿还了拖欠工资的50%，2003年6月全部偿还拖欠工资。2002年将工人的医疗费全部报销。

总体看来，薄熙来在辽宁也是很得民心的。辽阳铁合金厂的工人运动能够收到良好的效果，薄也应该扮演了积极角色。

21 世纪与共产主义

远航一号（2014 年 3 月 25 日）

成都白果林文艺讨论会是西南地区有影响的左翼进步文艺团体。这个月度，白果林的同志们计划以“国际共运再认识”为题组织讨论，并希望我以此为题提交一份讨论稿。

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什么是共产主义？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共产主义革命者的历史任务又是什么？这确实是一个迫切和重大的问题。正确认识这个问题，有利于加速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历史进程，也有利于为未来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找到正确的方向。

共产主义的问题，在人类阶级社会的历史上，就是被压迫与被剥削的各劳动阶级如何才能取得反压迫、反剥削斗争的胜利，争得自身的解放，并按照自己的意志建设和改造社会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自有阶级社会以来，共产主义的理想就在广大的被压迫、被剥削劳动群众中普遍地、隐隐约约地存在着。

到了近代资本主义工业革命以后，随着工业无产阶级的产生、发展和壮大，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逐步地提出了全社会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思想。这就是现代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的起源。但是，正如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这一经典篇章中所论述的：“自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历史上出现以来，由社会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常常作为未来的理想隐隐约约地浮现在个别人物和整个整个的派别的脑海中。但是，这种占有只有在实现它的实际条件已经具备的时候才能成为可能，才能成为历史的必然性。正如其他一切社会进步一样，这种占有之所以能够实现，并不是由于人们认识到阶级的存在同平等、正义等等相矛盾，也不是仅仅由于人们希望废除阶级，而是由于具备了一定的新的经济条件。”

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学说，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学说，而不是对于抽象的“公平”、“正义”的小资产阶级的感伤，这一重要原则，是怎么强调也不过分的。只有真正了解和运用这一原则，才能正确总结 20 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也才能为 21 世纪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胜利找到方向。在当今中国的千千万万自觉的或不甚自觉的马列毛主义者中，能够经常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来分析中国革命历史经验教训的同志，是为数不多的。

下面这一段恩格斯的经典论述，为很多中国的马列毛主义者所熟知，却也为很多中国的马列毛主义者所忽视：

社会分裂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是以前生产不大发展的必然结果。当社会总劳动所提供的产品除了满足社会全体成员最起码的生活需要以外只有少量剩余，因而劳动还占去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全部或几乎全部时间的时候，这个社会就必然划分为阶级。在这个完全委身于劳动的大多数人之旁，形成了一个摆脱直接生产劳动的阶级，它从事于社会的共同事务：劳动管理、政务、司法、科学、艺术等等。因此，分工的规律就是阶级划分的基础。但是这并不妨碍阶级的这种划分曾经通过暴力和掠夺、狡诈和欺骗来实现，这也不妨碍统治阶级一旦掌握政权就牺牲劳动阶级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并把对社会的领导变成对群众的加紧剥削。但是，即使阶级的划分根据上面所说具有某种历史的理由，那也只是对一定的时期、一定的社会条件才是这样。这种划分是以生产的不足为基础的，它将被现代生产力的充分发展所消灭。

恩格斯在这里论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只要社会的物质生产力还不够发展，“因而劳动还占去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全部或几乎全部时间”，“社会就必然划分为

阶级”。在“完全委身于劳动的大多数人之旁”，就必然形成一个“摆脱直接生产劳动的阶级”，这个阶级“从事于社会的共同事务”并独占社会的剩余产品。“因此，分工的规律就是阶级划分的基础。”

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现代资本主义的历史贡献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为社会物质生产力的大幅度增长创造了条件。随着“现代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从而绝大多数人生产必需品的劳动时间大大缩短，从而使得社会的大多数成员而不仅仅是少数人可以从直接生产劳动中解放出来并从事“社会的共同事务”，进而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只有在这样的物质生产和生活条件下，才可能从根本上消灭阶级划分在历史上存在的“理由”。

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在十九世纪。现在我们知道，自十九世纪以来，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物质生产力的大幅度增长，就其物质基础来说，主要是依靠以煤、石油、天然气等不可再生的化石燃料全面替代传统的可再生生物能（人力、畜力、动物粪便、各种植物等），通过将自然界在数亿年中积累起来的太阳能在一两个世纪的时间中充分释放而取得的。

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物质生产力的增长，不仅导致了各种不可再生资源的枯竭，而且正在将全球生态系统推向崩溃的边缘，已经威胁到了整个人类文明的存续。在 21 世纪，人类已经面临着全新的历史条件。人类在当前的历史任务，不再是如何积极与充分地利用现代资本主义所创造出来的巨大的物质生产力；而是尽快摆脱对资本积累的无限追求，一方面根据生态可持续性的原则合理地限制和分配各种物质资源的消费，一方面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基本需要，将文明从全球生态崩溃的噩梦中解救出来。

在这样的历史关头，什么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任务又是什么？

共产主义与 20 世纪

在回答上述问题之前，让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 20 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

马克思曾经多次写道，资本主义的历史使命就是创造一个统一的世界市场。但是，只是到了列宁的时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才以现实而残酷的方式摆到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前。

自从十六世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以来，在地理上就划分为外围、半外围、核心三个结构性层次。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阶级斗争一般是在民族国家范围内、以民族国家为单位进行的。这就造成了，处于不同结构性层次的各国工人阶级以及其他各劳动阶级在客观上存在着阶级利益的差别。这种差别，最终导致国际工人运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发生了决定性的分裂。

这种分裂，一方面导致了第二国际改良主义（修正主义）在西方工人运动中取得了完全的统治地位，另一方面也促成了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俄国革命胜利以后，布尔什维克党很快就不得不面对一个很不“经典”的历史任务：确保苏维埃国家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存在下去并以最快的速度完成国家的工业化。在斯大林派取得了党内斗争胜利并开始了“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以后，以苏联为首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就已经在事实上演变为激进的民族解放运动。这一演变，在 1943 年通过共产国际的解散完成了法律手续；又在 1949 年通过中国革命的胜利达到了其在历史上的顶点。

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有着伟大的历史意义。由受西方思想影响的先进知识分子领导、由各劳动阶级先进分子积极参加的苏联、中国等国的共产党，将整个的社会底层完全发动起来，将旧的统治阶级完全打倒、消灭，这是世界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为若干国家劳动人民在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发展创造了最有利的条件。

在打倒了旧的统治阶级以后，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将经济剩余掌握在自己手中，开始了工业化进程，在自己国家的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现代经济增长，提高或者巩固了各民族国家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地位。

但是，只要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基本运动规律不改变，这就是一场各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赢得的竞赛。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垄断着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并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技术封锁。现代科学技术发展，需要巨大的资金和高科技人才的投入。除了个别领域，社会主义国家在资金与人才方面，不可能与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竞争。

在经历了一个时期的经济发展以后，各社会主义国家逐步实现了工业化和城市化。新兴的城市工人阶级要求有更高的物质生活水平。由于修正主义集团放弃了世界革命和共产主义理想，只能用“物质刺激”的办法来缓和特权官僚集团与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结果势必造成工人阶级中的一部分落后分子向往西方高消费的物质生活。当这种要求得不到满足的时候，又导致工人的劳动积极性普遍下降。到了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后期，劳动力成本普遍上升，积累基金逐步匮乏。

不仅如此，社会主义国家只能依靠本国资源谋求经济发展，而不能像西方帝国主义国家那样掠夺外围国家的资源。到了上世纪七十和八十年代，原社会主义国家的煤炭、石油、铁矿石等各种资源开采成本迅速上升。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大环境下，劳动力和资源成本迅速上升，然而又不能通过对外围国家的剥削得到补偿，势必导致原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经济竞争力不断下降，最终导致债台高筑，经济增长难以为继。

在不改变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基本运动规律的前提下，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长期保持相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竞争力，这（而不是所谓计划经济的“僵化”、“低效”）就是上世纪七十和八十年代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困难的根本原因。

在不改变世界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要克服这些经济困难，只有努力降低劳动力成本和资源成本，重建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降低劳动力和资源成本的主要方法就是剥夺劳动人民的各项经济和社会权利、大幅度降低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原社会主义国家的特权官僚集团，抓住了这个历史机遇，对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发起了一场全面的阶级战争，通过反动的私有化，全面摧毁了工人阶级曾经赢得的各项历史权利，实现了资本主义复辟。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后半期，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开始了新一轮快速扩张。在这一时期，中国资本主义经济逐渐成长为世界资本积累的新中心。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长时期高速增长，有赖于三个方面的条件。首先，通过资本主义复辟，中国的新兴资产阶级打垮了城市的工人阶级，又将农村数以亿计的劳动力转变为资本主义积累所需要的廉价劳动力。其次，中国的煤炭资源丰富。廉价的、数量充足的煤炭供应为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增长奠定了能源方面的基础。第三，为了克服上世纪七十和八十年代的经济危机，西方帝国主义国家迫切需要寻找新的投资领域，并将原有的一些工业生产能力转移到成本较为低廉的外围和半外围地区。由于以上这几个方面的条件，就使得中国在本世纪初成为整个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制造业出口基地。

中国工人阶级的时代到来了

自 2008-2009 年世界经济危机以来，上述三个曾经有利于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繁荣的方面都正在或即将走向自己的反面。经过几十年的资本主义发展，中国已经形成了一支庞大并且初步觉悟的工业无产阶级队伍。中国的工业无产阶级队伍是世界上最大的，并且积累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和资本主义复辟时期正反两方面的阶级斗争经验教训。根据各国工人斗争的历史经验，再经过五至十年的成长和锻炼，中国工人阶级的组织能力和斗争能力很可能会上一个台阶，从而迎来中国工人运动的新高潮。

一旦中国工人阶级开始提出广泛的政治和经济要求，并且通过自己的斗争迫使中国资产阶级接受其中的一部分乃至大部分，在中国投资的资本家就将不得不面对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乃至劳动力成本上升速度超过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情况。作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一个半外围国家，中国资本主义积累所依赖的主要条件就是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一旦中国的劳动力不再“廉价”，一旦资本家的利润率不断趋于下降，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就要丧失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

在不久的将来，中国的阶级斗争将迎来一个重大的转折点。随着中国工人阶级的最低要求突破了中国经济所能承受的最大界限，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将陷入无可挽回的危机，在这个经济基础上竖立着的整个复辟与倒退的上层建筑也将陷入无可挽回的危机。

这场阶级斗争，无外乎是两个结果。或者，工人阶级取得对资产阶级的决定性胜利，从而废除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并按照自己的意志完成对社会的改造。或者，资产阶级取得对工人阶级的决定性胜利，迫使中国工人阶级放弃他们的一切政治和经济要求，恢复和巩固“血汗工厂”的剥削制度，在未来的十几年乃至几十年，长期坚持廉价劳动力剥削体制不动摇。

在这两种结果当中，其中的第二种结果，将是不可能的。这首先是因为，中国的工人阶级正在强大起来，即将强大起来。中国工人阶级的这种强大，不是主观想象的，不是外界力量赐予的，而是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客观发展的结果。只要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在发展，尤其是，只要中国资本主义摆脱不了作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制造业出口基地的地位，资本积累在客观上就会不断地、反复地增加工人阶级的数量，增强工人阶级的组织程度，教育工人开展阶级斗争，从而制造一个规模越来越大、斗争能力越来越强的工人阶级。

但是，除此以外，还有一个更根本的原因。那就是，在经历了几个世纪的无限度的资本积累以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以及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无限扩张，在物质上已经达到了极限，因而已经不可能了。

资本的极限

所有阶级社会的基本特点是，绝大多数人从物质生产劳动，但是不占有社会的剩余产品；少数人摆脱了直接生产劳动，专门从事“社会的共同事务”，并独占社会的剩余产品。在资本主义时代以前，社会剩余产品的绝大部分被统治阶级挥霍浪费或用于其它非生产性目的，因而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增长十分缓慢。

在资本主义时代，社会剩余产品采取了商品和货币的形式，因而转化为剩余价值。由于市场关系占了统治地位，资本家之间、资本家集团之间、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相互之间激烈竞争，在竞争中失败的资本家会破产、丧失作为资本家的资格，在竞争中失败的资本主义国家会沦为“失败国家”，进而瓦解、崩溃。为了在竞争中取胜，资本家、资本家集

团和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将剩余价值的绝大部分用于资本积累，这就造成了资本积累无限扩大的趋势以及呈几何级数不断扩张的经济增长。

一切人类社会都有赖于与自然界的不间断的物质交换才能繁衍和发展。人类为了从事物质生产，必须从自然界获得各种可再生物质资源（如水、土壤、森林、鱼类等）以及各种不可再生物质资源（如各种矿产资源）。人类的物质生产和消费活动，还必然产生各种物质副产品，造成对生态环境的污染。

在资本主义时代以前，人类从自然界获取的各种资源以及人类的物质生产和消费活动所产生的各种污染，总的来说是比较有限的。在历史上，曾经多次出现局部的、区域性的资源枯竭和生态危机；但是在以往的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出现过全球性的生态系统危机。

但是，到了资本主义时代，人类的物质生产和消费活动在很短的时间内爆炸性地增长，对各种物质资源的消耗以及各种污染物质的排放，不仅极大地超过了以前的各个历史时代，而且也突破了全球生态系统的极限。随着石油峰值、沙漠化和土壤退化、水资源危机、气候变化危机等全球生态危机的到来，全球生态系统已经到了全面崩溃的边缘。在某些方面，甚至可以说这种崩溃已经开始了。在这个意义上，人类在 21 世纪的历史行为或许会决定人类文明在未来能否延续。

以 2012 年《生命行星报告》所发表的统计数据为例，2008 年，全球每人平均的“生态脚印”（为了提供人类所消费的可再生资源以及吸收污染排放所需要的土地和水域面积）达到了 2.7 公顷。但是，全球每人平均的“生态能力”（生产性的土地和水域面积）仅有 1.8 公顷。也就是说，按照现有的全球物质消费和污染排放的情况，世界每年需要大约一个半地球的自然资源。全球生态系统在赤字的压力下运行的。按照现有趋势，全球“生态赤字”将会从现在的半个地球增加到 2050 年的整整两个地球。

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中国由于文明历史悠久、人口众多，生态资源条件更加紧张。2008 年，中国的人均“生态脚印”达到了 2.13 公顷，但是人均“生态能力”仅有 0.87 公顷。或者说，要满足中国现在的物质消费和污染排放，大约需要 2.4 个中国所能够提供的自然资源。

无论是中国的还是世界的生态系统，都不可能长期在赤字的压力下运行。如果要使全球生态系统在 2050 年恢复到基本平衡的状态，全球的生态脚印必须从现在开始平均每年下降 1.1%。如果要使中国的生态系统在 2050 年恢复基本平衡，中国的生态脚印必须从现在开始平均每年下降 2.5%。

按照资本主义经济辩护士的观点，虽然经济增长要付出一些环境方面的代价，经济增长仍然是必须要追求的。只要经济增长到了一定阶段，随着技术进步以及各种“绿色技术”的采用，就可以逐步减少经济增长对环境的影响，乃至最终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可持续性两不耽误的所谓“可持续增长”。然而，现实是，这种所谓的“可持续增长”从来没有实现过，将来也不可能实现。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整个世界，各种生态环境系统都在逐步恶化并且濒于崩溃。

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资本家为了追求利润以及与其他资本家竞争，必然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但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如果劳动生产率提高，资本家所需要的劳动力就会相应减少。比如，劳动生产率提高了 3%，但是经济增长只有 2%，就业人数就会下降 1%。如果劳动力供给又增加了 1%，失业率就会增加 2%。如果失业率不断上升，就会危

及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和社会稳定。就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来说，一般经济增长率要达到 3%或以上，才能保证失业率稳定。

如果经济增长率是 3%，每年通过技术进步所带来的每单位经济产值的环境影响的下降率只有 1%；那么，经济每增长 3%，由于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各种资源消耗和污染就会增加 2%。那么，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是否可能通过采用各种先进的“绿色技术”，来减少对环境的影响，从而实现“可持续增长”呢？

对于资本家来说，要采用新的设备和技术来减少资源消耗和污染，意味着增加成本。如果成本增加的幅度太大，导致资本家的利润率大幅度下降，资本主义经济就会陷入危机。此外，技术进步有自己的规律，采用新的技术和设备也需要时间。在一定时间内可能的技术进步速度是有限的。

假设一个资本主义经济每年淘汰大约 5%的旧的机器设备，另外为了满足经济增长的需要，每年新增加 3%的机器设备。这样，这个资本主义经济每年可以更新相当于原有机器设备总量 8%的机器设备。再假设，新技术的进步幅度非常大，与旧技术相比可以将每单位经济产值的环境影响减少 50%。这样，全部更新的机器设备其生产能力相当于原有机器设备总量的 8%，但是其产生的环境影响只有原来整个经济环境影响的 4%。

然而，原有机器设备中的 95%仍然在继续使用，仍然使用旧的技术，因而其产生的环境影响相当于原来整个经济环境影响的 95%；与更新后的机器设备所产生的环境影响相加，技术进步以后整个经济的环境影响相当于技术进步前的 99%，也就是仅减少了 1%。

可见，即使采用了非常乐观的假设（什么样的新技术能够使所有的新机器设备都将环境影响与旧机器设备相比减少一半），这个资本主义经济的环境影响也仅仅减少了 1%。相比之下，要在 2050 年以前消除全球的“生态赤字”，全球生态影响必须每年减少 1.1%以上。

就中国来说，每年仍有大约 1000 万的劳动力由农村向城市转移。为了吸收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以及为了抵消劳动生产率的快速增长，中国经济每年必须增长至少约 7%才能维持基本的社会稳定。

如果中国经济每年增长 7%，仍然假设每年淘汰大约 5%的旧的机器设备，那么中国每年更新的机器设备就相当于原有机器设备总量的 12%。即使假设新技术可以将每单位经济产值的环境影响减少 50%，更新后的机器设备所产生的环境影响仍将相当于原来整个经济环境影响的 6%；与原有机器设备中的 95%仍然在产生的环境影响相加，技术进步以后的整个经济的环境影响相当于技术进步前的 101%，也就是增加了 1%。按照这种趋势，中国的生态赤字不仅不能缩小，而且还会不断扩大。

可见，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各个资本家、资本家集团以及资本主义国家，都必然追求资本积累的无限积累，这就必然导致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一旦中国的和全球的生态系统全面崩溃，中国文明和世界文明就将面临灭顶之灾。

生态社会主义专政

要挽救中国与世界的生态危机，唯一的办法，是由整个社会按照民主的方式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以及社会的剩余产品，并且根据生态可持续性以及满足全体人民基本需要的原则，对整个社会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实行改造。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主席都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由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必经阶段。在 21 世纪的历史条件下，为了拯救中国与世界的生态系统，一旦未来的政治条件许可，无产阶级就必须在夺取政权以后，对包括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在内的整个人口实行以恢复生态可持续性为目的的生态社会主义专政。

就中国来说，除了总的生态环境危机以外，中国的资本主义积累已经在如下的几个关键领域造成了严重的不可持续的趋势。

首先，由于中国国内石油资源的逐步枯竭，以及中国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盲目追求能源密集型的美国式生活方式，中国对进口石油的依赖越来越严重。1993 年，中国仍然是石油净出口国。2000 年，中国石油净进口量 6200 万吨，占当年中国石油消费量的 28%、当年世界石油产量的 1.7%。2012 年，中国石油净进口量达到 2 亿 7600 万吨，占当年中国石油消费量的 57%、当年世界石油产量的 6.7%。

2000-2012 年，中国石油净进口量占世界石油产量的份额平均每年上升 0.5 个百分点。按照这个趋势，至 2020 年中国石油净进口量占世界石油产量的趋势就会达到 11%；至 2030 年，就会达到 16%。相比之下，2012 年，美国石油净进口量占世界石油产量的份额约为 10%。未来几年、十几年乃至几十年，世界经济与政治都将长期动荡。中东地区尤其属于高风险地区。作为世界第一大产油国的沙特阿拉伯，内外矛盾都十分尖锐，在未来很有可能发生政权更迭。一旦沙特阿拉伯政局动荡，世界市场石油供应量锐减，中国海外石油进口来源将面临被切断的危险。

农业私有化以后，中国大部地区土壤严重退化，农地被污染，地下水逐步枯竭，加之许多耕地被抛荒，粮食产量增长缓慢。近年来，真实粮食产量可能出现了停滞或下降。另一方面，中国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浪费大量粮食，饮食结构已经从以素食为主过渡到以肉食为主。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中国对粮食进口的依赖逐年加深。2000-2012 年，中国谷物和大豆进口总数从 1600 万吨增加到 7200 万吨。2012 年，中国的谷物和大豆进口量相当于官方统计的国内粮食产量的 12%，相当于当年世界市场谷物和大豆总出口量的 19%。

按照现有趋势，至 2030 年，中国的谷物和大豆进口量将增加到 1.6 亿吨，占世界谷物和大豆出口量的份额将可能增加到 40% 以上。在世界粮食产量增长缓慢的情况下，中国粮食进口的大幅度增长，将可能引起世界粮价在未来暴涨，触发中国和世界的粮食危机。

此外，由于中国经济高度依赖煤炭资源，再加上城市居民的私人汽车拥有量大幅度增长，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空气污染的重灾区。一年数度的严重雾霾，波及大面积国土以及主要的经济中心，严重危害了人民的生命和健康。

为了挽救中国的资源和环境危机，必须由民主产生的计划机关对于整个社会的关键资源（如能源和粮食）实行统筹规划的计划管理，由国家统一组织生产、统一定价、统一分配。

中国的严重空气污染和大面积雾霾主要是由于煤炭燃烧造成的，其次则是由于城市中的私人汽车排放的大量尾气。煤炭燃烧主要是用于发电，其次是用于炼钢。在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所有的电力生产都必须由国家计划机关统一管理，将全国的发电量和电力消费量固定在一个合理的水平，不再增长。只有停止经济增长或者将经济增长率限制在很低的水平，才可能通过不断的技术进步，将全社会的环境影响逐步地降低下来并最终消除生态赤字。

在电力生产不再增长以后，就可以通过每年建设一批可再生电站，逐步淘汰、减少火电站的办法，逐步减少由于电力生产引起的空气污染。

在钢铁生产方面，中国目前大约有一半的钢铁产量用于出口，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服务。在无产阶级政权成立以后，应该将所有用于出口并导致大量污染的钢铁企业都逐步关闭。由此产生的大批失业人员，一律由国家创办新的公有制企业加以吸收，从事不以增加利润为目的而以满足社会需要为目的的各种生产活动。地方政府因此而损失的税收，由中央政府通过增加对资本家的税收来补偿。

在石油方面，无产阶级政权应该将一切石油生产、加工和销售企业收归国有，对全国的石油生产和消费实行统一计划管理，按照社会需要的重要性，依次满足各个部门对石油的需要。比如，国防和农业生产所需要的石油，应当优先予以供应；其次是一些关键的工业生产部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私人汽车消费以及航空旅行消费，则完全没有任何社会价值。

解决中国石油困境的唯一办法，是大幅度减少石油消费。为了这个目的，无产阶级政权必须下决心，坚决打垮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一切可能的反抗，同时克服工人阶级中落后分子的抵制，要像斯大林不计一切代价实现快速工业化那样用最短的时间将中国的石油消费水平降低到国内生产水平以下。为此，首先应取缔私人以消费为目的的一切航空旅行，然后力争用几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完全停止私人汽车的使用。与此同时，在国民经济整体计划的指导下，对全国的公共交通部门实行电气化改造，并增加自行车的生产，逐步建立以电气化公共交通和自行车为主的交通模式。

在经过了了几十年的经济发展以后，中国农村的经济基础以及政治、社会状况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无产阶级政权想要在短期内恢复农村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将面临很大的困难。另一方面，中国现在尚有少量的国有农场，农业经济中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有一定发展。无产阶级政权应该接管所有现有的国有农场，同时对所有租地经营的资本主义农场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将以上两类农场直接改造为新兴的社会主义国营农场。这样，社会主义国家就可以掌握全国粮食产量的相当一部分。

从长远来说，资本主义式的现代化学农业导致土壤严重退化，并且消耗大量能源和水资源，是不可持续的。中国农业必须逐步地过渡到有机生态农业。但是，这种过渡必然是长期的、逐步的。在短期，可以先在社会主义国营农场试行有机生态农业，总结经验以后逐步推广。

在粮食收购与销售方面，要恢复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统购统销制度。依靠统购统销制度，一方面逐步引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另一方面对城市居民实行定量供应，保障城市劳动群众的粮食安全，同时引导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居民节约粮食、改变饮食结构，使全体城市居民都吃上更健康、更安全的食品。在全体人民的饮食结构由以肉食为主逐步恢复为以素食为主以后，就可以逐步减少粮食进口量，恢复粮食自给。

21 世纪与向共产主义过渡

自从阶级社会产生以来，始终是少数人占有社会的剩余产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缓慢。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或者任何市场关系占统治地位的经济条件下），资本家之间的相互竞争迫使资本家将剩余价值的绝大部分用于资本积累，这是不以资本家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各个民族国家也受同样规律的制约。在 20 世纪，前社会

主义国家同样受到世界资本积累基本规律的制约。只要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继续存在，社会主义国家就会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危险。

在世界资本积累无限扩张规律的作用下，人类的物质生产和消费爆炸式地增长，导致了资源枯竭和世界生态系统崩溃的危险。中国与人类在 21 世纪所面临的基本问题，是如何在满足全体人口基本需要的同时，在生态可持续性的基础上建立新的经济体制。

中国目前是世界资本积累的中心。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造成了新的历史条件。劳动力成本和资源、环境成本的上升将有可能在未来几年导致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爆发严重的、不可克服的危机，并颠覆中国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由于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在整个世界工业体系中的中心地位，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危机将有可能引起整个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危机。在美帝国主义衰落的条件下，世界资产阶级将失去有效组织和反抗的能力。随着世界人民革命斗争的高涨以及若干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的建立，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将土崩瓦解，其基本运动规律将不再起作用。也就是说，未来的社会主义政权将不再为工业化、资本积累、经济增长等 20 世纪的问题所困扰。

在世界资本主义的废墟上，未来社会主义政权首先面临的挑战，是要将社会的物质消费水平稳定在一个相对合理的水平上并满足全体人口的基本需要。当社会主义政权对能源、粮食等关键资源实行统一计划管理以后，大批依靠剥削廉价劳动力、廉价资源来谋取利润的低效资本主义企业将陷于破产。一部分工人会失业。资产阶级可能利用这种经济困难向无产阶级政权展开反扑。

无产阶级政权必须坚决地打垮资产阶级的反扑。首先，必须取缔一切私人的资本输出、杜绝资本外逃。其次，立即将所有的失业工人组织起来，由国家提供最低收入，提供劳动培训或用于公共工程建设。然后，迅速地发展公有制企业，将所有剩余劳动力都利用起来。与此同时，对对外贸易实行国家垄断，取缔一切非必需品的进口，节约外汇，减少对残余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依赖。通过上述这些方法，力争用一两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实现国民经济的完全的社会主义化。

在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由于整个社会的物质消费水平不再增长或只有很少的增长，就可以逐步减少全体劳动者的劳动时间。资本主义时代遗留下来的大量非生产部门，如销售、广告、律师、臃肿的官僚部门、浪费性的医疗活动、各种奢侈品等，都可以逐步取缔，从而节约大量的社会劳动时间。劳动者的劳动时间减少以后，就可以逐步增加对各类公共事务的参与，并利用自己的自由时间从事各种创造性活动。

或许只是到了这个时候，共产主义，作为一种在人类自觉运用所认识的自然规律的基础上自己创造自己历史的“自由人的联合体”，才能够成为历史的必然。

从两件事看中国资本主义的依附性

刘杰（2014年4月1日）

第一件是世贸组织（WTO）在限制稀土出口一案中判定中国违规。此事意味着中国要向美国、欧洲、日本敞开稀土供应，而这些国家事实上拥有大量稀土储量或储备。事后，《光明日报》有一篇评论员文章，不仅没有为中国战略资源的流失感到担忧，反而率先自省起来，扪心自问这是哪里做错了——何等恬不知耻？这位评论员说，

“中国加入 WTO 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借助其规则的冲力，来冲击国内一些被利益固化了的不合理的生产和出口制度。这里所谓不合理，首先不是对国外贸易者的不合理，而更主要的是对中国国内市场主体的不公平。因此，借助 WTO 的冲力顺势而为，改变国内一些只能导致双输的不合理制度，这其实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这段话倒是说对了一点，加入 WTO 就是要加速改造生产关系，铲除走向资本主义的障碍。中国为什么要开放？开放为何与改革相提并论？在改革发生之前我们就曾大规模的引进技术设备，难道那不是开放吗？改革旗帜下的“开放”关键是引进所谓“先进的管理经验”，改造生产关系。在改革者看来，外来的资本主义的管理方式是“先进经验”，而社会主义的管理方式是落后经验。90年代末，“开放”具体化为加入 WTO 这一目标。入世谈判被渲染成为一场为了重回世界大家庭而进行的旷日持久的消耗战，反过来为“减员增效”和国企私有化提供合法性。

中国资产阶级通过加入 WTO 压制了本国工人阶级，顺利取得了对中心国家的依附地位。《光明日报》评论员的恬不知耻对于中国资产阶级来说是普遍的，他们公然把压榨劳动、破坏环境当作维持中国资本主义依附地位的筹码。你欺负我，我就讨好你；你不合作，我还讨好你；你反对我，我依然讨好你。

第二件事是反《服贸》。从3月18日开始，台湾学生占领台湾立法院，反对国民党迅速通过所谓《两岸服务贸易协议》（以下简称《服贸》）的企图。到目前为止，运动已经持续了13天，学生不仅占领了立法院，而且还一度占领了行政院，并且在立法院外面还聚集着大量支持者。

表面上看，这是个民主问题。国民党原本就在立法院占多数，所以即使让立法院投票表决，《服贸》也能通过。可是《服贸》对台湾究竟影响如何？这个问题引起大量争论，所以国民党就想强行迅速通过立法程序，以免夜长梦多，耽误了马英九任期之内的唯一“政绩”。在这件事上学生运动中有左、中、右，但其主要理论基础是狭隘的民主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反《服贸》是因为反对立法过程“不民主”，并且反对“人权恶劣的中国”在政治和经济上渗入台湾，危害“全球华人社会的民主典范”。

民主问题、蓝绿问题、阶级问题，三种矛盾在台湾同时存在。两岸的资产阶级把民主问题和蓝绿问题当成主要矛盾，台湾说大陆没有人权，大陆说台湾民主乱象，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加紧联合，在政治上维持分裂。台湾的民主是假民主，走到头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不可否认，台湾社会各阶级是有斗争意识的，可是资产阶级各党派却在利用群众的斗争意识达到自身的政治目的。并且，这种斗争意识也并不阻碍两岸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的联合。

大陆从社会主义变成资本主义，对台湾的政策从“解放台湾”变成收买台湾，争取的对象从台湾受压迫阶级变成“台胞”，进而“台商”。大陆的资产阶级想统一，于是尽其所能收买台湾资产阶级，而台湾资产阶级则想保持长期分裂，从而可以充分利用大陆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同时达到压制台湾工人阶级力量的目的。两岸问题说到底还是阶级问题。如果不把阶级矛盾当作主要矛盾，那么民主问题、蓝绿问题就得不到解决，台湾的社会和经济问题就往往从复杂走向更复杂，进而长期搁置、不断累积。

两岸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的联合，既是阶级利益的驱使，也是全球资本主义客观矛盾的结果。全球资本主义发生危机之后，资本主义中心国家经济陷入低迷，依附于它们的外围国家一方面受到出口市场萎缩的影响，另一方面本国工人阶级斗争出现不同程度的高涨。各国资产阶级应对这一局面的策略之一就是贸易自由化。表面上看，贸易自由化通过减少各国之间的贸易壁垒可以扩大贸易量，促进各国经济增长；实际上，贸易自由化通过生产的转移迫使各国工人阶级之间相互竞争，从而起到压制工人阶级力量的作用。所以，危机之后各国资产阶级都很饥渴，争先恐后地搞自贸区、签自贸协定。

中国资本主义的依附性决定了它离不开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所以就尽其所能融入这个体系，哪怕是出卖国家安全。如果中国的资产阶级有个称霸全球的中国梦，就会国有化稀土产业，然后仍旧出卖工人阶级的利益从其他方面补偿中心国家资产阶级的损失。但是，随着中国工人阶级斗争的增长，中国的资本主义积累矛盾日益加重，中国的资产阶级有没有能力继续收买、讨好中心国家的资

产阶级？如果没有这种能力，中国的资产阶级是不是就要出卖国家的战略资源，从经济和政治上都彻底依附于中心国家的资产阶级？

从中国资本主义的历史来看，稀土案和反《服贸》这两件事在时间上的重叠或许不是偶然。中国的资产阶级迫切希望通过贸易自由化解决资本积累的矛盾，这就必然要维持中国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位置，因此也就必须继续讨好中心国家的资产阶级，甚至不惜出卖国家的战略资源。这两件事或许表明中国资本主义的依附性正在加深。

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普遍实行生态农业 ——读蒋高明同志“生态农业与生态系统健康”有感

远航一号（2014年4月1日）

蒋高明同志是当代中国生态农业理论与实践的先锋。他以“生态农业与生态系统健康”为题所做的讲座，系统分析了现代资本主义农业（包括其各种形式，如资本主义大农场、“家庭农场”、公司加农户等）对环境的破坏及其不可持续性。现代资本主义农业严重依赖不可再生资源 and 化学原料，破坏了农业赖以继的土地和水资源。在中国资本主义条件下，搞这样的所谓“现代农业”，早晚是死路一条。从长远来说，中国农业必须走有机生态农业的道路。关于这个道理，蒋高明同志讲的很充分、很透彻，值得所有关注社会主义未来的人士学习。

蒋高明同志对于资本主义农业（也就是蒋高明同志所说的“市场化农业”）是批判的，但是在蒋高明同志的讲座中，对于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不可能真正实行生态农业以及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优越性，还是分析得不很充分、不很透彻。有感于蒋高明同志的论述，我简单谈几点想法。

蒋高明同志分析了，要实行有机农业，生产成本要提高。有机农业是比较劳动密集型的，所以有必要提高农产品价格，从而吸引农民（即农业劳动者）返乡务农。蒋高明同志建议，粮食价格可以从现在的一元钱一斤涨到五元钱一斤。

从政治经济学的观点看，粮食消费是劳动力成本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资本家来说，劳动力成本越低越好。中国现在的人均粮食消费约 500 公斤，折合 1000 市斤。粮食单价上涨四元，每人每年就要多支出 4000 元。按照平均一个劳动力养活 1.5 人计算，每个劳动者的年工资（或者农业劳动收入）就必须增加 6000 元。中国大约有 8 亿劳动力，那么全国的劳动者收入就必须增加约 5 万亿元，相当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约 8%。

这笔钱由谁来出？由国家来出，赤字如何弥补？现在国企都快卖光了，国家以后的财政收入从哪里来？由资本家来出？中国 2013 年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才 6.3 万亿元（其中国有工业企业利润仅 1.5 万亿元）。如果中国坚决走资本主义道路，敢于剥夺剥夺者，在实行公有制的大前提下，剥夺资本家、补贴有机农业，这自然没有问题。但是在坚持资本主义道路的情况下，如果按照蒋高明同志提议的涨粮价的办法，依靠血汗工厂、剥削廉价劳动力的中国资本主义立刻就要破产，这也是毫无疑问的。

中国农业未来的出路到底在哪里？蒋高明同志比较了几种农业经营的模式，对于资本主义的“家庭农场”、“公司加农户”等模式有所批判，对于“合作农业”有所肯定。蒋高明同志自己领导的弘毅农场实际上也是依靠集体所有的土地、以集体合作经营的方式才办起来的。

令人遗憾的是，蒋高明同志对于公有制农业的肯定还不够充分、不够坚决，乃至错误地认为，公有制农业有“容易产生大锅饭”的缺点。或许是受了温铁军、贺雪峰等人的影响，蒋高明同志多少有些美化小农经济，认为小农经济加上新的技术，可以是高效率的。

中国历史上的传统农业在农业生产劳动方面确实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很多仍值得我们今天借鉴。但是，所谓纯而又纯的、田园牧歌式的小农经济是从来不存在的。中国历史上的小农经济实际上是以地主阶级占有绝大多数土地的地主土地所有制为基础的，是历代中国式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在所谓小农经济条件下，中国的广大劳动者几千年中都生活在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与压迫之下。把小农经济美化成是可持续的、高效率的、“符合传统”的，就像流亡的西藏奴隶主阶级将农奴制统治下的旧西藏描绘为是“香格里拉”世外桃源一样荒唐。

在现代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所谓小农经济更不可能独立存在。试问，温铁军、贺雪峰等人主张的小农家庭，要不要与外界交往，要不要与城市发生商品交换？如果要与城市发生商品交换，如何保护小农免受城市资本家的剥削？在资本主义的大环境下，农村的商品交换能够制止吗？只要有商品交换，如何

避免农民内部的两极分化，如何避免在长期发生土地兼并和土地集中？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几千年都没做到的事情（让小农经济长期稳定发展、避免土地兼并与集中），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条件下，靠政府的一纸改良主义法令就可以做到吗？

在过去几十年，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大环境下，中国在农村不就是实行了法律上“集体土地所有制”条件下的小农经济吗？当下中国的农村如何，社会环境如何，自然环境又如何？

中国的资本主义复辟已经三十多年了，其反动面目已经充分暴露。今日中国的社会主义者不应当再拾资产阶级学者的牙慧，动不动就唠叨什么社会主义公有制大锅饭、效率低一类。如果没有毛主席领导下的人民公社的“大锅饭”，就不会有大规模的水利建设，灌溉农业就得不到发展，也就不会有中国粮食产量自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后的持续增长，更不会有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国在人均预期寿命等生活质量指标方面领先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骄人成绩。

一种经济制度，基本上消灭了剥削和压迫，还能够发展生产，还能够不断地改善人民的生活质量（表现在健康与教育方面），还能够基本上不破坏环境与产生污染（与资本主义复辟以后相比），这就很伟大了。

至于所谓大锅饭养懒汉的问题，这一部分是资产阶级对社会主义劳动者的诬蔑，一部分是对于社会主义优越性缺乏正确的理解。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主要的优越性，就是把劳动者当人看。既然把劳动者当人看，而不仅仅是当作资本积累的工具，那么血汗工厂就是不允许的，超长的劳动时间是不允许的，危害工人健康与正常发展的、不合理的劳动强度也是不允许的。社会主义的劳动者是有休息权的，理应获得与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者相比较多的休息时间，这是十分正当的，也是符合生态可持续性精神的。

最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者相互之间，在政治觉悟和生产技能等方面，当然也会有所差别，也会有少数的落后分子。毛主席时期中国社会主义的实践表明，对于这些少数的落后分子，一般只要采取群众之间的批评教育，就可以帮助他们提高。对于严重破坏社会主义劳动纪律的，还可以采取群众监督

以及无产阶级专政的办法。对于群众的先进分子、有觉悟分子，则予以表彰和鼓励。

历史已经证明了，未来还将继续证明，只要无产阶级和其他的各劳动阶级，敢于承担其属于自己的伟大历史使命，解放思想，打破资产阶级以及历史上各个剥削阶级强加于自己的一切迷信与胡说，就必然可以创造出剥削阶级以及他们的御用辩护士们根本不能想象的人间奇迹。

社会运动中的精英主义 —— 评少年中国评论《社会主义者当前的问题和任务》

丁学雷（2014年4月21日，转自进步青年网）

黑牛的文章因某网站的进厂号召而起，与此相配的还有另外一篇《对左翼青年进工厂问题的思考》。这两篇文章都渗透着浓浓的精英主义色彩，渗透着“知识分子”（其实是无产化的脑力劳动者）的令人作呕的优越感。

黑牛的文章建立在对形势的这样一种分析上。他认为当前工人运动总体上仍然处于落后的工联主义阶段。而左翼的发展相较于工人运动则更为落后，而运动的不发展造成了左翼中“手工业方式”的流行。所以无产阶级要实现无产阶级解放，就必须要建立能适应当前环境的核心政治组织。而要发展核心组织，只有从资产阶级最薄弱的地方着手，发展革命知识分子。而发展革命知识分子的要点是要占领阵地，比如大学讲堂、报纸杂志、娱乐界等等，或者利用一些群众性的组织，通过理论探讨与交流培养革命知识分子。所以黑牛认为，作为小资产阶级的自己跑到工人中间，把自己锻炼为一个普通的鼓动家，甚至只是成为一名“普通工人”，是没有看到当前的主要任务所在，是一种没有任何意义的“真诚”。

黑牛包括 YCA 的整体理论中深深渗透着西马的色彩。且不说西马理论中浓重的非马克思主义色彩，脱离西马产生的具体的社会历史环境，把“市民社会”发达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理论机械地照搬到中国，必然会产生搞笑的效果。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主义者永远不可能占领大学讲堂、报纸杂志以及更扯淡的娱乐界，在主流意识形态领域永远会处于边缘的地位。但是这对工人来说无所谓，工人进不了资产阶级的大学讲堂，也很少看资产阶级的报刊杂志，工人是被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的群体。资产阶级最薄弱的薄弱环节恰恰不是知识分子，而是千千万万个工人，千千万万个普通劳动者。他们受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最少，毒害最浅，而且他们实际地处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中，因而最容易接受社会主义思想。而知识分子头脑中恰恰充满着各种资产阶级社会灌输给他们的主流意识形态，充满着依靠个人奋斗改变命运的小资产阶级幻想，攻克一个知识分子的思想要比攻克一个工人的思想难得多。

黑牛以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的最薄弱环节为由，把知识分子的工作作为当前主要任务，而不用去从事工人工作的看法是极端错误的。黑牛基本没有做过实际的工人工作，也鄙弃抛弃“当前主要任务”而跑去到工人中间锻炼成“普通鼓动家”左翼青年，生活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理论探讨”的圈子里，充满着这种小资产阶级的幻想和呓语并不奇怪。

社会主义革命不是靠一些在网上扯淡的“革命”知识分子完成的，而是要靠千千万万个革命工人。而这千千万万个革命工人并不会在工人运动中自发产生，是要靠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把社会主义意识灌输给工人。

黑牛虽然也抽象地谈论自发性与自觉性的关系，虽然在理论上抽象地反对自发性，但是一旦涉及到现实的工人运动的问题，就立刻变成一种隐蔽的自发性。在黑牛看来，无论有多少学生进入工厂进行鼓动，工联斗争整体上仍然是自发的，因为这种进程是由市场经济的规律决定的。也就是说，在当前整体上工人运动还处于工联斗争的时候，在工人中间灌输社会主义意识的工作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因为不管你怎么灌输，工人运动都处于自发运动的水平。只有等到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工人的工联斗争发展到一定阶段，发展成全行业或全国的联合后，才有条件由自发斗争转化为自觉斗争。这不是经济主义是什么？

如果黑牛这儿还说得比较隐晦的话（我至少花了半个小时来理解他那段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对左翼青年进工厂问题的思考》（这篇文章虽然水平差些，但还是能够反映 YCA 的整体思想的）就说得更为明确一些，“工人运动目前还处于自发斗争阶段。工人运动依自己的规律而发展，无论有多少左青进工厂，都不能使工人运动很快超越这个自发斗争阶段。所以，我们应当将自己进工厂的目的确定为锻炼自己，而不是直接促进工运。”

工人一定要等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建立了充分发达的工联组织之后，才能有社会主义意识，才能有自觉斗争吗？为什么不能先灌输社会主义意识，再由这些先进工人（从目前来看，这些先进工人的觉悟、组织能力比黑牛这样的“革命知识分子”要强千百倍）组织工会，鼓动斗争，促进工联的发展呢？在 YCA 看来，工人由自发转为自觉的过程，完全成了“客观经济规律”的任务，也就是说是一个自发形成的过程，左青到工厂里顶多能锻炼自己，而不能促进工运，这不是典型的盲目崇拜自发性的经济主义观点吗？

列宁从 19 世纪 90 年代就开始深入到工人中间（他竟然没有把主要精力放在占领资产阶级的文化领地，培养扯淡知识分子的工作上）做工作，通过厂内外的工人小组向工人灌输社会主义意识。这个时期俄国“市场经济的规律”使工人运动摆脱了自发的工联斗争阶段了吗？当时在彼得堡也就极少数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他们投入了工业区之后是不是“石沉大海，翻不起一点波浪”？

总结一下，黑牛的核心观点在于：当前的主要任务是通过知识分子的文化“阵地战”来培养接受社会主义意识的知识分子，并以此为基础削平各个“山头”，建立统一的无产阶级核心政治组织（当然个别先进工人也是可以纳入的，前提是其转化成了“进步知识分子”）；而工人运动的发展阶段是由市场经济的规律决定的，当前仍然整体上处于形成工联的自发运动的阶段，我们要“促进当前工人的争取直接经济利益的自发斗争”，我们只能加速自发运动的发展而不能跳过这一阶段，自觉斗争是“未来”的事情。

这样，培养“先锋队”的工作就和工人运动完全割裂开来了，“先锋队员”们是在书斋里浸透了各种西马理论的理论大牛，能解答群众的各种问题，他们还通过削平山头扫除了“理论交流”的障碍，思想的碰撞进一步提升了大牛们的理论水平；而工人运动基本上由市场经济的规律决定，在往工联的道路上自发发展着。这样，先锋队灌输社会主义的工作就停留在了抽象层面，最后的结果就是形成一个个脱离广大工人的孤立的精英主义小圈子，而工人运动仍然在自发的轨道上向“工联”前进，这就是 2011 年埃及革命前的状况。

“先锋队”不是建立在一群敲着键盘喝咖啡、高谈阔论的“理论大牛”的基础上，而是能实际领导、组织工人运动的社会主义先进分子坚强组织。学生和知识分子的工作虽然仍然是当前的重要工作，但是“知识分子”（暂且沿用这个称呼吧）培养出来后，只有深入到工人中间做实际的灌输和组织工作才是有意义的（不进厂要看实际的工作需要和个人选择）。革命知识分子要深入到工厂和工人中去，在工厂中培养出有社会主义意识的革命工人小组，通过这些小组组织工人斗争，推动工人运动由自发走向自觉，并在此基础上，组建真正的社会主义核心政治组织，领导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这才是当前的主要任务。千千万万个工人生活的工厂中间，而不是任何其他地方（不论是网络还是“主流”、“大舞台”），才是社会主义者主要战斗的舞台。

黑牛：社会主义者当前的问题和任务：

<http://review.youngchina.org/archives/5019>

尘沙：对左翼青年进工厂问题的思

考 <http://review.youngchina.org/archives/5054>

精英主义与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机会主义 —— 二评少年中国评论

丁学雷（2014年4月21日，转自进步青年网）

针对笔者上一篇文章，黑牛回应了洋洋洒洒的一篇雄文《是小资，还是脑力劳动无产者》。可惜通篇文章硬伤百出，却自以为是“创新”了马克思主义。

黑牛认为，笔者的文章“讲道德，讲理想，有觉醒，还有对工人运动的展望，慷慨激昂，内容丰富，但唯独缺少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而缺少的原因是笔者没有看到知识分子无产化以及体力工人脑力化的历史趋势，因而忽略了脑力无产者这个群体在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作用。在黑牛看来，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机器的使用和自动化的推广，史无前例地提高了脑力劳动在工人阶级中的总比。因而虽然目前工人阶级的大多数仍然是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但是未来从事体力与脑力相结合或者纯脑力劳动的技术工人将会成为主流。无产阶级队伍由以体力工人为主发展为包括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两支基本力量的队伍，进一步向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结合并以脑力劳动为主的方向转化。

黑牛对脑力无产者的阐述，恰恰表明了其对马克思主义和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惊人的无知。在资本主义产生之前，在行会中劳动的小手工业者都既是体力劳动者又是脑力劳动者，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是统一的。当时西欧的手工艺人为了有能力从事生产，必须要学习许多那个时代的科学知识，要学习数学，要学习物理学和工程制图。即使在资本主义发展早期，工人阶级也表现出了对知识和脑力劳动的极大兴趣，伦敦工人甚至组建了自己的数学学会。在这种情况下，掌握生产技术的熟练工人对工厂内的运作有相对比较大的控制权和议价权。资产阶级为了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就逐步通过采用机器等手段，通过泰勒制和福特制等血汗工厂制度，把技术职能和管理职能从工人身上剥离出来，由专门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来承担，专门从事脑力劳

动的脑力无产者阶层就是这样产生的，与此相伴随的，是广大的工人阶级从根本上被剥夺了从事脑力劳动的权利，日益变成了流水线上从事简单重复劳动的机器的附属品。一部分脑力无产者的产生，正是以更多的体力无产者被剥夺了脑力劳动的权利为前提的。因此，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趋势，不是使体力无产者脑力化，恰恰相反，工人阶级“去脑力化”才是资本主义的必然趋势。脑体分工正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才极端化的，要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消灭脑体分工，是一种无知至极的幻想。

黑牛这样的脑力劳动者已经毫无疑问成了雇佣劳动者中的一员，笔者从没有否认过这一点。但是脑力无产者阶层永远不会是工人阶级的主要部分，在脑力无产者数量增多的同时，体力无产者的数量在以更大的比例增长。所以认为工人阶级“脑力劳动化”，把脑力劳动者作为未来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运动的主体的说法完全是无稽之谈。

黑牛认为，不能仅仅从具体的工作环境、意识、理论水平，甚至是谈吐和外在形象等方面来确定人们的阶级成分，而应该按照他们在剥削关系中所处的位置来划分。这是对的，笔者从来没有反对这一点。但是，即使同是处于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关系之中无产者，脑力无产者所面临的生存条件与体力无产者相比也是大不一样的。脑力无产者有着有别于产业工人的相对特殊的经济、社会地位和思想意识。与产业工人相比，他们更多地接受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教育和熏陶，充满着依靠个人奋斗爬向资产阶级上层，有一天能够骑在人民头上拉屎撒尿的幻想。他们对于资产阶级有较强的幻想和依附性，虽然对于自身的雇佣劳动地位极为不满，但是不敢对压迫自己的资本家作出丝毫的反抗，害怕失去自己那花费了千辛万苦才找寻来的不同于普通工人的一个饭碗和摇摇欲坠的“小资”地位（自以为是的“小资”），所以在与资本家的斗争中表现出极强的软弱性和动摇性，或者说是完全没有任何斗争性！

黑牛既然觉得脑力无产者应该是社会主义运动的主力，那么他自己整天生活在苦逼悲催的 IT 民工中间，有没有把这些脑力无产者组织起来，去和剥

削你们的万恶的资本家做斗争呢？不要说像黑牛这样的高工资的 IT 民工，就是把一些工资比农民工还低的办公室白领组织起来，也是比登天还难的事情。在体力工人的自发的集体抗争已经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的时候，“有知识有文化”的脑力工人们连个体的抗争都没有几个。因此，脑力无产者工人阶级中最落后和最保守的部分，它只有在工人运动日趋高潮的时候才会卷入进来。这这一点上，与小资产阶级是一致的。

而且黑牛忘了的一点是，人的思想意识与其现实的阶级地位并不一定是统一的。在马克思那个时代，小生产者在资本主义的冲击下大批地破产。可是屁股变了，并不代表脑袋会变，从“他们在剥削关系中所处的位置”来划分，他们毫无疑问已经成为无产阶级的一员，但是他们仍然保留着自己所脱胎的小生产者的意识和幻想，这是蒲鲁东、魏特林等等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社会基础。今天也是一样，当大批“知识分子”落入无产阶级的队伍中来的时候，他们必然会把由于其自身成长环境所造成的幻想带入社会主义运动中来。笔者批判的对象从来不是脑力无产者，而是一部分“脑力劳动者”沦落入无产阶级的队伍之后带入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思潮。

在今天的中国，大批的大学毕业生毫无疑问已经落入无产阶级的队伍中来，残酷的现实粉碎了知识分子们凌驾于人民之上的精英梦想，许多人在这样的背景下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的。这些在书斋里成长起来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们，在残酷的现实和斗争中表现出很强的软弱性、动摇性、不彻底性以及一定的投机性（这是脑力无产者有别于体力工人的特殊地位决定的，笔者见过一些接受了社会主义意识的工人，他们那种坚定性和彻底性是绝大多数左翼知识分子达不到的）。他们认为自己有知识有文化，从来不把自己看做是工人阶级的一份子，而是看成是一个有别于工人阶级的一个特殊群体。因为他们有社会主义意识，因为他们懂得马克思主义理论，所以他们天然就应该是工人阶级的领导者，他们把他们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所实现不了的精英梦想带入社会主义运动中来。

列宁的《怎么办》就在这种背景下被歪曲的。列宁在批判“经济主义”的时候强调，工人阶级只能自发地产生工联主义意识，社会主义意识需要由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灌输给工人，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需要一个坚强有力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领导。一些左翼“知识分子”就紧紧抓住这句话并把它片面化和歪曲化。先锋队的领导作用被歪曲为懂得一点粗浅马克思主义理论、脱离现实阶级斗争实践的“知识分子”的领导作用。这样，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和“社会主义核心政治组织”就可以在脱离工人阶级现实的阶级斗争的条件下，在书斋里和网络上诞生出来。

笔者去年曾被人无端扣上一顶“经济主义”的帽子。理由是笔者“虽然”做了一些灌输社会主义意识的工作，但是由于没有一个“社会主义核心政治组织”的领导，所以笔者还是“经济主义”。笔者自认为读的书不算少，但这个“经济主义”的新定义还是第一次听到。看来《怎么办》已经过时了，当代列宁已经横空出世了。笔者一直希望某些人能够详细地阐述下这个“新经济主义”的具体内涵，可惜未能如愿。

如果按照这个定义的话，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之前，列宁一直是个“经济主义”者。他竟然在还没有一个“社会主义核心政治组织”的情况下就去工人中间做灌输和组织工作，这不是彻头彻尾的“经济主义”吗？

YCA 和某些人所急于建立的“社会主义核心政治组织”，只不过是一个类似于普列汉诺夫“劳动解放社”那样的针对知识分子的文化宣传团体，但所能起到的作用“劳动解放社”的必然不及“劳动解放社”的千万分之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不是建立在“劳动解放社”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许多个实际地组织、领导工人斗争的“斗争协会”的基础上。这个先锋队是实际领导工人阶级进行阶级解放的组织，而不是一个脱离工人的知识分子的宣传团体。

毫无疑问，劳动解放社对于在知识分子中间宣传马克思主义主义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培养了整整一代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培养出来的列宁这样的马

克思主义者如果不深入工人阶级，实际地推动工人阶级的现实斗争，那么结果只不过是多了几个在报纸、杂志（当时还没有网络）上扯淡的“泛左翼”或“合法的马克思主义者”而已。如果到了 19 世纪 90 年代，还有人鼓吹应该把主要工作放在在知识分子之间进行理论宣传和舆论斗争上，反对投入现实的工人运动，那么这些人已经是毫无疑问的反动分子。YCA 现在就起到这样的作用，它让一些有热血有理想的左翼青年脱离工人阶级现实的阶级斗争，而投入到抽象的、空洞的理论宣传和“探讨”上来（而且宣传的是用一些“西马”词汇装点起来的吓唬人的半吊子马克思主义理论），这正是统治阶级所希望看到的结果。

我们看到，YCA 是从反“经济主义”的角度出发，把“灌输社会主义意识”的工作极端化和片面化，变成了有社会主义意识的知识分子的精英主义。而这种精英主义又必然会导致脱离工人和工人斗争，就必然会导致社会主义意识与工人运动的脱离，造成工联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的扩散和发展。正像经济主义和恐怖主义看起来是两个截然相反的极端，但同根同源一样，精英主义和经济主义也是一母双胞胎（对于 YCA 的经济主义，笔者上一篇文章已经做过分析，如果把黑牛的一些言论与经济派当年的言论做对比的话，就会发现几乎是一摸一样）。

这种精英主义已经渗透到 YCA 的骨子里。YCA 前精神领袖马前卒要像搞工程设计一样，要详详细细地在社会主义 gm 还处在娘胎里的时候，就把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每一个细节在现在规划出来（笔者与其见面两次，争论两次，都是围绕着这个问题）。黑牛就更牛了，要在还没几个左翼在真正地、实际地在无产阶级中从事现实的、实际的阶级斗争的时候，就要把工人阶级的系统的、长期的斗争计划设计出来，只有在这个理论和计划设计出来后，左青们才能按照黑牛这个总设计师设计出来的理论，去从事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

列宁如果没有在彼得堡等地实际从事工人运动的经验，会有布尔什维克的先锋队理论吗？毛泽东如果没有实际地从事武装斗争的经验，能够在秋收

起义之前就把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给设计出来吗？看来黑牛从娘胎里生出来的时候起，就已经能充当工人阶级的 gm 领袖，为无产阶级指出光辉道路了。

这些进厂的左青们当然并不能一下子就能找到正确的方法和道路，可能要经历一定的挫折和碰壁。但这是正常的，正确的 gm 理论总是在现实的实践过程中总结出来的，即使要经过很多的曲折和挫折。而像黑牛这样，要想在脱离实践的精英主义的大脑中把正确的道路给设计出来，一万年也不会有结果。脱离现实的实践而“思考”出的理论，只能惹人发笑，看看他这两篇文章就知道。

笔者与 YCA 也算老交情，这次之所以揪住 YCA 不放，是因为笔者对这种屌丝精英主义（本身是屌丝，却自以为是“领袖”）痛恨至极，YCA 只是很不幸被笔者当成了靶子而已。在经过 10、11 年改良与革命的大论战之后，这种知识分子的精英主义便成为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主要祸害。近一年来笔者见识了好多：有的人想在自己头脑里把未来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规划出来；有的人想要站在工人阶级之外，喝着咖啡指导革命；还有的人不愿意在工人阶级中间做一点一滴扎扎实实思想和组织工作，反对与工人阶级相结合，觉得这样太慢了，太手工业了，太经济主义了，所以他们总想在“主流”和“大舞台”中寻找机会，好不容易找到一个他们自认为的“机会”，就费尽心机绞尽脑汁“积累政治资本”，为了抓住这个“机会”不惜叛卖掉自己的原则和灵魂，也不知道最后是玩了别人还是被别人玩了。

相关文章：

黑牛：是小资，还是脑力劳动者

<http://review.youngchina.org/archives/6531>

黑牛：社会主义者当前的问题和任务：

<http://review.youngchina.org/archives/5019>

尘沙：对左翼青年进工厂问题的思考

<http://review.youngchina.org/archives/5054>

所谓社会主义核心政治组织 —— 三评少年中国评论

丁学雷（2014年4月23日，转自进步青年网）

在 YCA 看来，在乌有之乡覆灭后，全国的左翼组织失去了统一的权威和核心，陷入了“山头”林立的状态，“人为地阻隔了当前最缺乏的严肃理论交流”。因此，当前最主要的任务是是把各个知识分子左翼小圈子统一起来，组建一个统一的社会主义核心政治组织（以方便左翼内部进行“严肃理论交流”），而这个历史使命就光荣地落在了 YCA 头上。

笔者打了这么多的笔仗，核心观点在于，任何一个有志于无产阶级解放事业而不是打嘴炮的左翼知识分子，都应该走进工业区，走进产业工人中间（笔者一再强调不一定非要采取进厂的方式），做产业工人的组织和灌输工作。在形成了许多个实际领导工人斗争的社会主义工人小组之后，必然会产生在更大范围内统筹、协调这些小组的工作和斗争的需要，这样就需要一些来专职从事统筹、协调工作的人，就需要更大范围内的统筹、协调组织。社会主义核心组织与专职的革命家正是这样适应现实的阶级斗争需要而逐步产生和发展的，而不是从天上、从某些人头脑中突然间掉下来的。

事实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就是通过这样的过程建立起来的。先是散布在各个工厂的知识分子和工人相结合的小组，然后是更大范围的统筹协调组织——“彼得堡工人解放斗争协会”以及其他各个城市的斗争协会。然后就产生了统一协调、领导各个地区工人运动的需要，于是统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就这样建立起来了。

而 YCA 则相反，他们要在完全脱离工人阶级现实阶级斗争的情况下，在书斋里和网络上、在扯淡知识分子群体中间把这么一个社会主义核心组织搞出来。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黑牛说，要有核心组织，于是就有了核心组织，要有职业革命家，于是就有了职业革命家。

而在这个社会主义核心政治组织形成之前，任何的工人工作和灌输工作都是不可能的。比如柳知秋认为：“我们也在做工人工作，但很明确目标，就是学习锻炼，发现、保护、培养工人积极分子。而不是推进经济斗争，乃至灌输。没有核心组织根本谈不上任何推进工人运动和灌输。”

这就奇了怪了！难道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形成之前，列宁那些年的时间都去哪儿了？

“起初，列宁首先注意扩大和加强同工人群众的联系，发现和培养先进分子向他们灌输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为了适应和推动工人运动的发展，1894年秋，列宁建议自己的小组不削弱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的情况下，转入在工人群众中进行经济鼓动和政治鼓动。”

“随着斗争协会的建立，彼得堡鼓动性传单大量增加，大大地激发了工人的斗争意志，增强了他们必胜的信心。1895年发生的十五次罢工，有九次获得了胜利。”

“1896年夏天，斗争协会领导的彼得堡三万多纺织工人大罢工，持续了半个月之久。消息传遍全国甚至传到了国外。沙皇政府慑于罢工规模之巨大，不得不在1867年颁布一道法令，把工作日限定为十一时半。

……

我实在不想过多引述这种常识性的材料，任何有哪怕一点点客观精神的人，都会认识到柳知秋这句话的荒谬之处。在YCA看来，在没有社会主义核心政治组织的情况下，任何的灌输和组织工作都是不可能的。所以当前的最主要任务不是与产业工人相结合，而是在“资产阶级最薄弱的地方”——知识分子中间进行思想工作，并在知识分子的小圈子内搞出一个社会主义核心政治组织与“职业革命家”。这个领导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在脱离工人阶级的情况下诞生的，然后突然掉落到工人中间，充当工人阶级的领导者和领袖。

笔者一再强调，在脱离工人阶级现实阶级斗争的情况下，YCA和某些人所急于建立的“社会主义核心政治组织”，只不过是一个类似于普列汉诺夫“劳动解放社”那样的针对知识分子的文化宣传团体（但所能起到的作用“劳动解放社”的必然不及“劳动解放社”的千万分之一）。这样在人人网上为了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每天转两条YCA状态的“左翼知识分子”们，也都可以把自己纳入这个社会主义核心政治组织的范畴。

笔者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一切反对在现阶段与产业工人相结合的人，都会把这种“职业革命家”提到非常重要的位置。这些人不是从工人运动的现实需要出发来看待社会主义的核心政治组织与职业革命家，而是把这种形式本身当成了追求的目的（为了向人们说明这种形式的重要性，甚至不惜明目张胆地歪曲历史和理论）。

如笔者上文所说，YCA盲目追求这种形式的结果就是造成一种知识分子的精英主义，而这种精英主义又必然导致脱离工人和工人斗争，就必然会导致社会主义意识与工人运动的脱离，造成经济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的扩散和发展。为了追求形式而完全抹煞了核心组织本身的意义，甚至走向其反面，结果变成了一个经济主义的“先锋队”。

而盲目崇拜这种形式的目的是什么呢？百思不得其解。

区分脑力无产者的意义是什么 —— 四评少年中国评论

丁学雷（2014年4月20日，转自进步青年网）

作者按：二评发表后，引起了很多关于脑力无产者和脑体分工的讨论。这些讨论大致有两种意见，一种是以搅屎棍（即“马列毛”、“心左”）为代表，认为脑力无产者和体力无产者的划分是繁琐哲学，是有意制造工人阶级的分裂。另一种意见以黑牛为代表，黑牛发表了《漫谈脑体分工》一文，继续为其观点辩护。黑牛一方面承认了笔者所说的资本主义社会脑体分工的强化及“去脑力化”的历史过程，但同时又认为劳动力工资的提高必然会促进生产自动化的发展，而生产自动化的发展又必然会使脑力劳动者逐渐代替体力劳动者，变成一个以脑力无产者为主体的社会。黑牛的这一错误判断，是其一系列错误思想的根源。笔者认为，脑力无产者的问题涉及到了左翼知识分子自身的定位以及当前的主要工作方向和方式等问题，探讨这一问题是非常有必要的。

在搅屎棍看来，脑力无产者与体力无产者的划分是繁琐哲学，难道“体力劳动不用脑，脑力劳动不用手啊”？如果按照这种说法，那么人类历史上就从没有存在过脑体分工。难道那些官老爷们没有从事体力劳动吗？人家有时候签个“同意”都签的腰酸背痛腿抽筋。难道流水线上的工人没有从事脑力劳动吗？除非是植物人，否则干活的时候脑子都在活动。难道因为流水线工人在从事简单重复劳动的时候脑子还是活动的，官老爷签字的时候手和脚活动了一下，就能认为他们都是在从事无差别的脑体统一的劳动吗？这是一种毫无意义的搅混水的行为。

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一书中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恰恰在于它把各种不同的劳动，因而也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或者说，把以脑力劳动为主或者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各种劳动分离开来，分配给不同的人。”脑力无产者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分工的发展而客观存在的一个阶层。这个阶层包括专

业人员、技术人员、管理人员以及办公室的职员等，这些人接受过高等教育，在企业、政府机关、从事着行政、管理、技术等以脑力劳动为主的工作。搅屎棍所说的程序猿，小文猿，包括基层公务猿，都是这个阶层。布雷弗曼认为：“这批人像工人阶级一样，没有经济的或职业的独立性；他们受资本及其支系雇用，除受雇之外无法进入劳动过程或接近生产资料，而且为了生存，必须不断地更新自己的劳动以供资本使用。这部分就业人口包括工程科技人员，较低级监督和管理人员，在购销、金融和组织管理机构等方面，以及不属于资本主义工业本身，在医院、学校和政府部门从事工作的大量专门和‘专业’雇员，等等。”

毫无疑问，脑力无产者们也深受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压迫，处于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关系之中，属于没有任何生产资料而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笔者任何时候都没有否认过这一点。但是笔者一直强调的是，不能因为其处于雇佣劳动关系之中，就把他们看作是与普通产业工人无差别的一个群体。

有的人抱怨，难道我们这些每天画图的白领一天到晚不是累的腰酸背痛腿抽筋吗？难道我们不是深受“三座大山”的压迫吗？难道我们的工资不是比建筑工人还低吗？就跟那些在农村干了几天活就要控诉一辈子的知青一样，这些话里深深地渗透着一种知识分子的矫情。让这些矫情的白领们到工厂里去，恐怕一天也干不下来。他们的这种地位，正是普通体力工人所羡慕而不可得的。

脑力无产者这样的一种地位与行业无关，IT行业的从业者固然可以领取高工资，挣得更高的剩余价值。但是即使是在一些利润比较低的行业，即使是对于一些工资比农民工还低的小白领来说，这种差别都是客观存在的。相比于体力无产者来说，脑力无产者一般拥有较高的收入，较好的工作环境，所受的压迫要比一般的体力工人轻很多；他们在不同程度上拥有对自身生产劳动的控制权，所从事的劳动活动个体性较强，组织性比较差；他们在不同程度上拥有通过升职等途径向上流动，进一步改善自己状况的条件。哈维尔·克雷斯潘认为：“无产阶级化这一概念包含的不仅仅是靠工资生活，还有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必须承认技术人员的确也出卖劳动力，靠工资为生。但是，他们在社会

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他们在领取应得的那部分社会财富时的态度不同，这也是事实。”

这种差别与工人阶级中其他群体之间的差别还不一样。体力工人中的几个群体如工厂工人、服务业工人、建筑工人这几者之间是以轮换的，服务业工人干一段时间去可能会去工厂，工厂工人干一段时间去也可以去建筑工地。但是在脑力无产者群体和体力无产者群体之间，则横亘着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一个大学毕业的脑力无产者娶一个在工厂里工作的产业工人，肯定会被认为是一件令人比较难以接受的事情。左翼知识分子走进工厂做普工，要经过非常艰难、痛苦的抉择和思想斗争，本身就表明了脑力无产者阶层与产业工人之间客观存在的鸿沟。这个鸿沟体力无产者跨不过去，脑力无产者不愿意跨过来。在这种情况下，仅仅因为两者都处于雇佣劳动关系中，就把两者都看成无差别的群体，这不是自欺欺人的事情吗？

这种差别的存在，导致了脑力无产者的思想意识、斗争性、组织性都是与普通体力工人有着巨大的差距。学界对这一阶层的定位本身就是有很多争论的，但是没有任何一个严肃的学者把这一群体看成是与体力无产者无差别的一个群体。近几年来，中国工人阶级的集体行动绝大多数发生在产业工人中间，而脑力无产者只有极个别的个体抗争。这难道不是说明了脑力无产者相较于体力无产者来说，是一个更为保守的阶层吗？（凡事总有例外，有的人专门挑保安、监工、城管这种资本家的打手和走狗来反驳笔者的说法，只不过是一种毫无意义的胡搅蛮缠）。

如果按照搅屎棍的说法，“要么是资本家，要么是无产者，要么是小资”，除此之外全是鬼话。这就把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方法变成了对现实毫无分析力的教条。讨论这个问题，不是要有意制造工人阶级的分裂。客观看到这种差别的存在，对于左翼知识分子对于自身的定位以及确定现阶段的主要工作方向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首先，当今中国多数左翼知识分子都属于脑力无产者这一阶层，如果对这一阶层的性质不加以细致客观的分析，会导致两种错误倾向。

一种倾向是认为，大部分左翼知识分子本来就是无产阶级的一份子，为什么还存在世界观和立场的改造问题呢？

很多左翼青年在学校的时候热血一阵子，毕业之后就很快就流失了。很多人觉得自己相对于工人来说是有退路的，离开这一事业自己还可以过一个相对安稳、“小资”的小日子，而投身这一运动则意味着自己要丧失已有的地位和安稳的小生活，失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往上层社会流动的可能性和希望。这种想法与一般受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蒙蔽的工人想要做小老板的幻想不同，这是一些经过系统的马列主义学习，深刻地认识到了资本主义的本质和发展趋势的左翼知识分子的想法，这不是一种幻想，是一种基于自身地位和利益的理性选择。在强大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下，普通的产业工人中间大量存在着要通过个人奋斗摆脱现在的无产地位的幻想，但是残酷的现实很快会教育他们。而这些工人一旦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就会表现出无比的坚定性和彻底性，因为他们没有任何别的“退路”或出路，他们在社会主义运动的过程中，没有任何可以失去的东西。与这些工人相比，脑力无产者则在社会主义运动的过程中表现出了更多的动摇性和不彻底性。

另一种倾向是，认为左翼知识分子的小资产阶级的地位决定了其立场和世界观是不可改造的。他们的理由是以前多数左翼知识分子离开学校后就流失了，过自己的小生活去了。既然知识分子的立场和世界观是不可改造的，那么就没必要提出改造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和立场、与产业工人相结合的口号。他们感觉现在还处在共产主义运动的低潮期，那么左翼知识分子现在最主要任务就是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往上爬，等到革命形势高涨的时候再投身进来。这不是革命者，这是投机主义者。

这两种倾向都是错误的。而这两种错误倾向的根源，都在于脑力无产者有别于一般体力工人的这样一种特殊地位，导致其不是站在整个无产阶级的立场，而是站在自己的特殊立场来思考问题和选择人生道路。因此，对于有志于从事无产阶级事业的左翼知识分子来说，到产业工人中间接受立场和世界观的改造是非常有必要的一件事情。而且在当前情况下，从已有的经验来看，左翼知识

分子进厂做普工是在一个地方打开局面，推动工人小组的最有效最快捷的方式（当然并不是说要知识分子长驻工厂永远待下去，在厂内还是厂外要看实际的工作需要）。

第二点，是分析脑力无产者阶层在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地位及当前的主要任务问题。

《漫谈脑体分工》一文一方面通过对《资本论》的分析，承认了笔者所说的资本主义社会脑体分工的强化及“去脑力化”的历史过程。但同时又认为劳动力工资的提高必然会促进生产自动化的发展，而生产自动化的发展又必然会使脑力劳动者逐渐代替体力劳动者的进程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

这篇文章其实还是为《小资，还是脑力无产者》一文中的一段话做注脚：

“虽然目前工人阶级中的大多数仍然是从事简单体力劳动的工人，但可以预见到的趋势必然是，从事脑力和体力相结合，或者纯脑力的技术工作的工人将会成为主流。脑力工人的出现使无产阶级发展成为一个具有较高科学文化知识和技术水平的阶级，无产阶级队伍由以体力工人为主发展为包括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两支基本力量的队伍，进一步向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结合并以脑力劳动为主的方向转化，这无疑是历史的进步。”

这段话是从某篇文章中一字不落地抄过来的，这篇文章的题目是《论战后西方发达国家的脑力劳动无产阶级》，仿佛黑牛不是生活在伟大的特色社会主义天朝，而是在万恶的资本主义美国指导革命运动一样。毫无疑问，二战结束以来，发达国家中的脑力劳动者的数量确实出现了非常快的增长，甚至某些国家已经变成了一个以脑力劳动为主的社会。但是，脑力无产者这样一种增长，并不代表自动化的发展已经消灭了体力劳动。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脑力化”的趋势相伴随的，是大量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是更大规模的发展中国家的小农、小生产者落入无产阶级的队伍中来，日益变成流水线上从事简单体力劳动的机器的附属品。看起来苹果公司已经变成了以研发人员和管理人员等脑力无产者为主体的公司，但是这是以富士康等上百万流水线工人作为其生产实体手机为前提的，而且富士康工人的扩张速度要远快于研发

人员的增长速度。

黑牛认为，随着劳动力价格的上涨，自动化的生产设备取代体力工人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中国、拉美、东南亚和印度的廉价劳动力实际使得机器代替人的进程减缓了，但是一旦这些劳动力变得昂贵，自动化的进程就会加速。”看起来好像很有道理，可是再一想，资本积累的过程总是把劳动力的工资压低到适应资本增值的水平，自动化进程的加速会造成大规模的失业现象，产业后备军的增多又会压低劳动者的工资，使“昂贵”的劳动力变得便宜，而这难道又不会阻碍自动化的发展进程吗？

从现实情况来看，在劳动价格上涨的时候，多数资本选择的不是用自动化生产设备取代劳动力（这是技术调整），而是向劳动力更为廉价的地方转移（空间调整）。因为使用自动化生产设备必然要付出极大的成本，而使用劳动力会比使用自动化设备廉价得多，技术调整相对于空间调整来说，只是一小部分。

黑牛引了《美国蓝领岗位持续减少 10 年间工人数量降 3 成》这篇文章中的一段话，以此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从 1999 年到 2009 年的这十年间，工厂的裁员如此之快，以至于他们几乎抹去了过去 70 年间所有的就业人口红利。差不多每 3 个制造业的相关岗位中，就有一个消失了，也就是说，大约 600 万人遭到了裁员。目前，在美国制造业工作的工人数量和大萧条结束之后的工人数量差不多，但是美国如今的人口却是当时的两倍以上。但当下，美国本土的制造业正在制造和销售的产品数量几乎是历史上最多的。仅就过去十年而言，美国工厂的出口，在考虑通胀因素的情况下，依然上升了 1/3。”

单纯看他引的这段话，好像印证了黑牛的观点，可是我们再看看这篇文章中的其他段落，好像不是这么回事：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以及随后中国对于国际市场的开放，使得位于中国和墨西哥的工厂可以以更为低廉的成本制造和输出棉纺制品，这直接导致了南卡罗林纳一家又一家棉纺织工厂的倒闭。”

“直到上个世纪 80 年代末期，标准机电的工厂还位于纽约。但是在纽约进行生产的成本显然太高，于是，工厂开始向一些成本较低的地区转移，比如墨西

哥、波兰，当然，还有美国本土的格林维尔。今天，这座昔日的工厂只剩下了标准机电的高层管理者。”

“标准机电两位工程师——约翰和马迪说，就在几个月前的会议上，他们评估了另外一种精密产品——点火线圈。他们惊喜地发现，来自波兰的产品不但成本低廉，而且在那里也能找到高技术的工程师。因此，标准机电开始准备在波兰建立离岸工厂。这些决定最终将导致标准机电的数十种工作岗位向国外转移，或者说，也可能在美国创造新的工种。往往一种新的产品刚刚开始生产的时候，它会选择把产品线放在美国本土（这也就是为什么一些初级劳动者会得到工作的原因），但随后，当技术已经成熟，为了节省成本，他们就会向更低成本的地区，比如中国转移。在中国制造为标准机电节省了很多成本，尤其是那些简单的零部件，有时候甚至能省下 80% 的成本。”

这篇文章不仅不能印证黑牛的观点，恰恰相反，它说明了相对于“空间调整”来说，“技术调整”只是支流，不占主体地位。目前从世界范围来说，体力无产者仍然是无产阶级的主体力量，不存在向“脑力劳动为主的方向转化”的趋势。以中国的情况来看，近几十年内也不会变成一个以脑力劳动者为主体的社会，这是笔者的一个基本判断。正是因为中国变成了“世界工厂”，成为了世界上产业工人规模最大最集中的地区，所以也使中国成了资本主义各种矛盾最尖锐最集中的地区，成为资本主义最薄弱的环节。

有的人借黑牛的观点攻击笔者，认为既然产业工人是一个日趋没落和减少的群体，脑力无产阶级才是未来社会主义运动的主力，那么做一个没落的群体的工作有什么意义呢？那么照此推论，对于处于脑力无产者地位的左翼知识分子来说，就没有必要到产业工人中去（“难道我们这些脑力无产者不是工人阶级的一份子吗？”）

这些人心里也非常清楚，在现阶段做脑力无产者的组织和斗争工作是希望很小的事情。我早就问过黑牛，他整天生活在苦难深重脑力无产者中间，有没有可能去把他那些同事组织起来去和万恶的老板做斗争？每个已经工作的左翼知识分子都会明白这个现实，只不过有些人出于特殊的目的不愿意承认而已。

有些人提出“到一切阶级中去”的口号。抽象地讲这句话当然是没有问题的，不要说脑力无产者本身就是无产阶级的一份子，就是在资产阶级中间也需要有人去做工作。但是工作要根据不同阶段的实际情况区分主次，在当前左翼力量还很弱小的情况下，我们必然要集中主要力量到压迫最深，斗争精神最强，组织性最好的产业工人中去，这是我们的力量源泉和基础，其他任何工作都是围绕这一中心工作的辅助性工作。脑力无产者当然是无产阶级的一份子，但是这一群体只有在产业工人的斗争日趋高潮的时候，才会卷入进来，因而必然不是现在的主要工作。列宁说：“我们的工作首先是最注重城市工厂工人。俄国社会民主派不应当分散自己的力量，而应当集中力量在工业无产阶级中间进行活动，因为工业无产阶级最能接受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在智力上和政治上最发展，并且按其数量以及在国内巨大政治中心的集中程度来说，又是最重要的。因此，在城市工厂工人中间建立坚固的革命组织，是社会民主主义者首要的迫切任务，现在放弃这个任务是极不恰当的。”

这些人只是把自身的脑力无产者地位作为逃避实际工作的借口，他们一方面强调极力抬高脑力无产者在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地位，另一方面又认识到在现阶段做脑力无产者的组织和斗争工作是基本没有希望的，这导致的结果就是把在脑力无产者群体之间的宣传工作（这些宣传不会对产业工人产生任何影响）看做是当前的主要工作和核心工作，也就是把夺取意识形态领导权，占领大学讲堂、报纸、网络看作是最主要的工作，这也是他们极力抬高葛兰西等人的根源所在。

最后谈一谈脑体分工消亡的问题。在黑牛看来，生产劳动全面的脑力化，无产阶级全面的知识化，会为一劳永逸地解决官僚化、资本主义复辟等生死攸关的问题奠定基础。黑牛的错误之处在于，把脑力分工的强化和消失看作是跟所有制无关的东西，而是一个纯粹的技术过程的结果。黑牛明确地讲“这一脑体分工的加强，甚至与所有制无关”。资本主义条件下，任何技术的发展总是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联系在一起的。脑体分工的强化，机器的推广和产业工人的“去技能化”，这些现象都是适应资本主义剥削工人的需要而产生的，不是一

个纯粹的技术过程。比如说当年英国生产出来的机器只有在美国才能使用，资本家只有在使用机器比使用工人更廉价的情况下，才会使用机器，这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不是技术过程决定的（资本主义条件下技术的发展方向本身就是由生产关系决定的）。这种现象也正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需要消灭的现象。脑体分工不会在技术的发展过程中自然而然地消失，只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技术的发展才会朝向有利于劳动人民当家做主和全面发展的方向发展。“鞍钢宪法”正是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下，让工人能够参与到管理和技术活动中，逐步消灭脑体分工的伟大探索，这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是不可能的。

苏联的错误就在于，只改造了资本主义的所有制，而保留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劳动过程，保留了资本主义条件下智力对体力的统治。斯大林的“干部决定一切，技术决定一切”就是这种思路的体现，在企业管理中推行一长制，在技术过程中仍然让一小部分人垄断技术权力，结果造成工人阶级对生产资料只有形式上的所有权而没有实质上的所有权。这是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失误的地方，而黑牛却把这种错误当成脑体分工与所有制无关的证据。按照黑牛的逻辑，得出的必然结论是，在生产力没有达到完全的自动化以让脑力无产阶级替代体力无产者之前，任何的社会主义都是不可能的，因为必然会产生官僚化的现象。黑牛眼中脑力分工消灭的过程，就是一个与生产关系和社会性质无关的纯粹的技术发展过程，这是一种变相的唯生产力论的观点。

相关文章：

黑牛：《漫谈脑体分工》 <http://review.youngchina.org/archives/6655>

黑牛：《是小资，还是脑力劳动者》 <http://review.youngchina.org/archives/6531>

工人争取历史欠账斗争翻开新篇章 裕元四万工人大罢工预示革命潜力

（工评社社论，红色中国网 2014 年 4 月 24 日转载）

【工评社 2014 年 4 月 21 日社论】今天东莞裕元鞋厂大罢工已超过一周，进入第八天（另一说从 4 月 5 日算起今天已是第 17 天了），罢工势头仍强劲不减。虽然工人对是否组织起来存有顾虑和争议，斗争还主要依靠着自发冲击力而非组织力，但工潮仍呈现出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深厚动力，工人贴出的大字报誓言要把大罢工坚持到 5 月 1 日国际劳动节。不过天朝的中央喉舌官僚们似乎前两天才刚刚睡醒，人民日报海外版、新华社先后发文回应裕元大罢工。值得注意的是，新华社 19 日有关报道把裕元大罢工归因于资方对工人社保、公积金的“历史欠账”（<http://t.cn/8sYAZRK>）。另外，罢工时期厂区内还有人贴出大字报，除了责问社保问题，还写道：“工厂已经改名，换法人代表，合同必须重签，工龄买断，不然不谈。”（<http://t.cn/8sjg8BA>）

实质上，裕元大罢工是资产阶级长期超额剥削下积怨的集中爆发，更是工人争取历史欠账斗争潮流的最新升级里程碑。这场罢工反映的问题和诉求早已不限于社保问题，更涉及到资本家长期欺骗并超额压榨工人、因而对工人欠下了巨大的历史债务问题。当人们越来越多把目光聚焦于裕元大罢工，开始探讨斗争方式、策略和具体特点等问题时，工评社更注意到近两三年尤其 2011-13 年以来，工人争取历史欠账的斗争愈演愈烈，已经出现了某些甚至具有革命意味的苗头。在这个日益重大的工运新形势下，这场数万人的大罢工并非偶然爆发，恐怕更是翻开了争取历史欠账斗争的新篇章，升级着中国工业区的阶级斗争，预示着社会革命的潜力。

回顾近五年的中国劳工运动：2008 年劳动合同法的颁布开始了新的重要鼓舞（此项立法其实也与此前的工潮刺激有关，包括 2007 年深圳港口连锁罢工潮 <http://t.cn/z8KN4s4>）。但直到 2009 年，新劳动法才被用于追讨历史欠账——积欠的加班工资。直到 2010 年富士康跳楼风波后的加薪及本田罢工潮，迫使沿海资本加速内迁，随后，工人根据新劳动法逐渐地纷纷争取工厂搬迁补偿金。2011 年 11-12 月，随着上海赫比罢工、百事可乐五厂联合罢工和深圳海量的大罢工，把搬厂求偿为形式的争取历史欠账的斗争推向了第一个小高潮。此后，工人争取历史欠账的斗争一发不可收拾，逐渐蔓延。例如 2012 年 9-10 月，新加坡伟创力集团在上海嘉定、深圳横岗的两家分厂就先后发生 6 千工人规模和 2 千工人规模的大罢工，争取搬迁或清零员工工龄的补偿金。此外，2010 年以来，争取多年积欠加班费（如 2011 年 10-11 月日资西铁城代工厂深圳沙井冠星表链厂罢工 <http://t.cn/8sYVX0V>）、争取多年积欠社保的斗争（2012 年 3 月深圳坂田欧姆电子厂罢工 <http://t.cn/zW47Xx4>、2010-12 年广州恒宝饰物厂工人维权 <http://t.cn/zHr7OHx>、2013 夏秋深圳宝德玩具厂工人维权 <http://t.cn/8sYVChA>）也日益兴起，越来越多工人加入到清算资本家超额剥削史、争取历史欠账的伟大斗争潮流中。最近爆发的东莞裕元罢工，是中国工人争取多年积欠社保斗争的新升级，更有合并了争取其他历史欠账（如要求工龄补偿、加薪以改变长期低工资等）的苗头趋势。工评社强调指

出：这不是偶然爆发的孤立事件，而是近几年来中国工人阶级争取历史欠账越来越多斗争，由量变叠加累积而爆发飞跃的伟大质变。

2013年以来老板跑路更加激增，中国工人阶级争取历史欠账的斗争更加频繁密集，许多人都发现工人求偿标准越来越多地高过法定标准。去年夏天，南方工运的草根研究者秋火同志对此专门做了分析，指出：近几年工人求偿越来越多高于法定标准，有三方面原因：资本家欺骗工人偷偷搬厂；受工人群众长期斗争的鼓舞，参照其他成功案例提出诉求；“更深刻根源在于，资本家的长期压榨下工人吃尽了苦头”，工人终而爆发。秋火同志为工人争取更高的赔偿金辩护，一竿子捅到底指出：“资本家全部‘私有财产’都是工人的血汗劳动乃至断指、尸骨堆起来的！工人不应只满足法定的待遇了，更要寻思夺回自己的全部劳动果实”（<http://t.cn/zQx7Ozk>）。

这种形势下，统治阶级新一届政权在撤改了旧的“政法委”后，对大资产阶级让利、对城乡小资产阶级（包括一部分所谓中产阶层）示好，却对底层的产业工人阶级和拆迁户打压越来越残酷狠毒。面对上层洗牌新形势，部分改良主义的劳工组织认为“一些地方工会开始担当起代表工人的职责，而一度遭严禁和打压的部分民间维权机构生存空间也有所宽松”（援引纽约李强的中国劳工观察 <http://t.cn/8sYfS3k>），或认为“习总”其实是想为工人改良的、全总却迟迟无作为（参见韩东方、蔡崇国的中国劳工通讯评论 <http://t.cn/8sYfiEu>），纷纷做起了海内外自由派资产阶级对新一届极右铁腕撤改“政法委”后的民主自由新幻梦。但工评社认为，实际上无论是罢工工人还是工人维权 NGO，在十八大以后处境都更加严峻，对待我们工人阶级简直堪称“特警治国”“维稳专政”，虽见当局貌似对个别工运“剿抚并举”，但远未能改变高压加剧的大势所趋。

即使少数罢工出现了较为有利的条件、甚或令劳工组织介入更深（例如广州恒宝厂、深圳宝德厂、深圳先进微电子厂的维权运动），可又有哪一样进步不是首先、主要、根本上依靠我们工人集体自己努力争取来的？资本家及其政府真的会主动大发慈悲吗？当局对工运高压维稳的态势，真的朝向和缓而非加紧吗？2013年工人争取历史欠账的斗争，恰恰是遭到天朝河蟹打压最厉害的案例，早已有超过天朝镇压反强拆户、访民的势头，——我们注意到，阶级对抗的升级明显从2013年春节后开始（以下据工评社不完全统计）：

2013年2月28日起，浙江杭州天马轴承集团2000多工人大罢工、堵路，追讨搬迁补偿。罢工第三天，数百工人去省政府讨说法，被警察拦阻；同日，浙江湖州子公司全体工人罢工声援。<http://t.cn/8sY5Ecc>

2013年3月6日起，东莞市常平镇安美时电子公司近千员工大罢工，抗议公司搬迁赔偿不合理。许多员工走出厂游行，造成东莞火车站附近交通堵塞。大批防暴警察将工人赶回厂区内。该公司是加拿大 Celestica 集团的全资子公司。<http://t.cn/8sY5MSm>

2013年4月25日，浙江三门县亚达科技公司逾千工人到县政府示威讨说法，因公司面临倒闭，近2000多员工被欠薪3、5个月不等。工人准备上高速路口时被武警拦截。<http://t.cn/8sY5Vx8>

2013年5月13-14日凌晨，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大塘村，上百警察、城管进村查消防强行搬走某制衣厂设备，引发数千工人聚集。视频及照片见 <http://t.cn/8sY5rsM>

2013年5月23日，深圳南山区中兴通讯下属睿德电子厂全厂近千员工罢工堵路，抗议资方搬迁补偿不公。当局出动数百防暴警察携多头警犬镇压，据传警方施放催泪弹、暴打工人、强迫工人回厂。<http://t.cn/8sYLwBi>

2013年5月，深圳宝安松岗台资企业金顺台工艺品厂 248 名工人连续半个月集体行动，抗议台商老板郑荣文跑路，争取大量经济补偿金、工伤职灾补助及欠薪和社保金。5月20日上百工友被抓进派出所。<http://t.cn/8sY5qW6>

2013年5月，深圳石岩迪威信数百名工人集体行动持续半个月，争取搬迁补偿。5月23日工人向市政府请愿路上被上百警察拦截、抓捕。其中，工人代表吴贵军被关押至今长达11个月，被当局指控“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成为越来越多世人关注的中国政府空前打压迫害罢工工人的典型劳工政治案件。<http://t.cn/z8pbzt6>

2013年6月9日，深圳市宝安区港资企业璇瑰塑胶公司上千人罢工，上百工人堵厂门，并拉横幅抗议资方侮辱员工、变相裁员、搬迁拒赔。工人阻止资方搬机器，与保安员冲突，及后二三百工人上街堵路，当局出动武警、特警、警察等六七十名警力驱赶工人回厂。<http://t.cn/8sYtfd6>

2013年6月18日开始，深圳坂田安特塑胶厂全厂千人大罢工，抗议资方获政府2亿人民币搬迁补偿却不告知员工，要求先赔偿再开工。工人堵门阻止出货，当局出动大批警察，帮老板冲散员工强行出货。工人到市里上访，被警察围捕、用大巴拉回厂。<http://t.cn/8sY5NHe>

2013年6月24日，深圳大鹏新区葵涌镇，专铸金属制品厂数百工人集体抗议，要求两个月欠薪、停工待料期间社保和如果解散时须支付工龄补偿金。却遭到当地派出所、武警部队和大量黑社会分子抓人、恐吓。该厂主要为法国 AnTop1、LV 和日本万美等世界著名品牌生产手表表带、名牌手链。<http://t.cn/8sY56UI>

2013年7月23日，因老板跑路，四川成都市盛通物流近300工人到市政府讨薪。百名特警戒备。<http://t.cn/8sYL9ku>

2013年7月25日，因厂方拖欠工资，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大龙玻璃厂工人罢工，数百工人阻断工厂门前交通进行抗议，大量特警出动警戒。<http://t.cn/8sY5DVW>

2013年8月5日，广东省惠州市天缘电子公司因老板跑路欠薪，当地政府补发欠薪承诺到期未兑现，数百工人堵路讨薪，遭警察镇压，多人被殴打。<http://t.cn/8sYtzFj>；深圳商报报道 <http://t.cn/8sYtyFF>

2013年8月5日，上海狮城纺织有限公司工人全体罢工，抗议公司克扣对工人的搬迁赔偿。7日警察镇压，多名工人被打伤、抓捕。<http://t.cn/8sYtLh2>

2013年8月6日，广西贵港市建玮电子厂上千工人阻断贵港市南站十字路口交通罢工，与500警察对峙，多名女工与警察发生冲突。该厂以放假为由支开工人，偷偷搬走厂内设备拒绝赔偿，工人到市劳动局请愿无果后集体罢工抗议。<http://t.cn/8sYtPTz>

2013年8月8日，深圳宝安公明镇的新兴厂橡根部员工开始罢工，反对资方逼老工人离职、规避经济补偿。罢工一周后，老板扬言“把钱丢河里也不给工人补偿金”，并解雇工人代表。16日开始工人组织游行，一路打横幅“把河水抽干也要拿到钱”等标语及高喊口号，向公明街道办请愿。21日光明新区信访办驱赶送餐给工人的人，不准工人吃饭，信访办主任称“这是我的地盘”。28日工人坐厂外静等厂方通知时，突遭大批警察和治安员殴打、抓捕。文字+照片：1：<http://t.cn/8sYtomi>；2：<http://t.cn/8sYt9pd>；3：<http://t.cn/8sYtunJ>；4：<http://t.cn/8sYtkbt>

2013年8月28日，广东顺德容桂的新容新厨具公司70多名员工手举标语上街，抗议老板欠薪跑路，民警与工人冲突，工人指责“警察不问来由地就抓人”，民警还用警棍攻击一名女士及其12岁女儿的头部。南都报道：<http://t.cn/8sYt8hf>

2013年9月10日，因工资被拖欠达两月，江西信丰县港资企业高飞数码科技有限公司工人罢工讨薪，有特警出动戒备。该厂有员工2300名。<http://t.cn/8sYcwKA>

2013年9月15日，浙江宁波镇海区庄市，康达鞋业百名工人在被欠薪数月情况下，阻断交通示威，50余特警出动阻拦。<http://t.cn/8sYMti4>

2013年9月22日珠三角最大包装厂之一东莞快联达实业公司突然倒闭，老板失踪。大批工人聚集讨薪当局出动武警特警并公告：5000元鼓励工人举报集体行动组织者。<http://t.cn/8sYM6Lv>

2013年9月23日，浙江宁波雅戈尔集团工人罢工抗议搬迁赔偿不合理，大批特警出动镇压，多名工人被殴打抓捕。<http://t.cn/8sYMXPN>

2013年10月10日，东莞市南城祝合鞋厂老板跑路，工人讨薪，大批特警出动放狗咬人、殴打工人，深圳劳工界活动者发视频、照片上网公开揭露。南城区党委匆忙率领一大堆官僚到现场安抚工人。1 微博大量照片 <http://t.cn/8sY2sZi>；2 官方报道 <http://t.cn/8sYMooh>

2013年10月10日深圳石岩威骏鞋厂工人堵路讨薪，大批特警暴力驱散，多名工人被抓捕 <http://t.cn/8sYMBBe>

2013年10月14日深圳沙井台资企业世鼎卡片礼品厂老板失踪三个月，近600工人生活困难，数百工人罢工围堵沙井宝安大道与南环路交叉路口，警察暴力驱逐、抓捕工人 <http://t.cn/8sYxAGU>

2013年10月17日，浙江永康市城西工业区一家工厂老板跑路，拖欠工人三个月工资。上百工人被骗到永康农村合作银行领取工资不见人，特警野蛮殴打、暴力抓捕工人。<http://t.cn/8sYLhOF>

2013年10月22日，苏州台企可成科技数千人罢工抗议搬迁赔偿不公，警察封锁厂门 <http://t.cn/8sYx5Uh>

2013年10月23日，深圳石岩万大工业区金良华公司老板陈举良欠薪，三四十名工人封堵工业园大门，上千工人无法进园上班。两名试图强行出货的资本家走狗用美工刀刺伤讨薪工人，工人抄起家伙群起而上欲痛扁这两名工贼，警方随即朝天鸣枪，恐吓讨薪工人，救走工贼。工人手持木棍铁棍在园区内游行，威慑工贼。<http://t.cn/8sYxS8H>

2013年10月24日江苏吴江，嘉元箱包厂老板跑路，数百工人游行到市政府讨薪遭大批特警镇压 <http://t.cn/8sYJmyq>

2013年10月31日，深圳盐田沙头角先进微电子厂5千工人大罢工，要求搬迁赔偿2N+1、加薪三千。罢工持续到11月21日，长达22天之久。工人最终争得N+1赔偿、加薪20%的较大胜利。罢工全记录 <http://t.cn/8sYx1W2>

2013年11月1日，东莞东城区温塘工业区捷铃箱包厂倒闭，数百工人维权求偿，警察镇压，多名工人被打被抓。<http://t.cn/8sYJMXj>

2013年11月1日，深圳市宝安区明炜皮革有限公司倒闭，400工人阻断国道讨薪遭警察镇压，有工人被打伤，多人被抓。<http://t.cn/8sYJNPA>

2013年11月3日，深圳市宝安区公明镇，东山精密制造有限责任公司工人罢工堵路，争取搬迁补偿，遭警察镇压，有工人被打伤。<http://t.cn/8sYJoyw>

2013年11月4日，工厂即将转卖，深圳宝安区福永镇成霖洁具厂4000工人罢工求偿，大量警察先发制人堵厂门、阻止工人外出示威。该厂是亚洲最大的水龙头制造商和出口商。<http://t.cn/8sYJd9O>

2013年11月5-6日，日资南部塑胶工厂转卖，东莞、苏州分公司工人罢工要求赔偿
<http://t.cn/8sYJFUe>

2013年11月5-6日，四川内江威远煤矿倒闭已三个月，矿工游行聚集县府门口讨生存
<http://t.cn/8sYizce>

2013年11月6日，深圳宝安第28工业区的凌进电子厂工人罢工，阻止老板逃避赔偿的搬迁。次日晚，老板请来防暴、特警打伤工人，强行冲散、抓走阻止出货的工人。13日，老板请大批防暴队在厂门口游行示威，还搞了个宣传车宣传上访违法！派出所还直接到出租屋抓捕跟防暴队发生过冲突的工友。<http://t.cn/8DF0zuN>

2013年11月7日，东莞虎门镇南泰玩具厂老板跑路，200工人堵路讨薪遭警察殴打抓捕
<http://t.cn/8sYivFE>

2013年11月7日，东莞市十和田电子有限公司2000工人大罢工，要求搬迁补偿。罢工持续一周，政府勾结资本家拒赔给工人，便衣警察抓捕工人，与工人冲突。全体工人围堵警车迫使警察释放被捕工人并道歉。1: <http://t.cn/8sYJOdV> ; 2: <http://t.cn/8sYJOdc> 3: <http://t.cn/8sYiyow>

2013年11月15日浙江温州宝中宝实业有限公司倒闭，工人堵路讨薪遭警镇压
<http://t.cn/8sYiGyG>

2013年11月19-22日东莞诺基亚罢工：警察殴打、拖走员工，特警开进厂内野蛮镇压。数百特警群殴、拖走多名工人(多为产线女工，包括1名孕妇)。1: <http://t.cn/8sYcbUB> ; 2: <http://t.cn/8sYiaVT>

2013年11月20日深圳龙岗宜和玩具厂老板跑路欠薪，两百号工人报警政府不管。工人拉横幅步行到龙岗区政府讨说法，政府无人出面，媒体装聋作哑，警察驱赶工人。
<http://t.cn/8sYi91y>

2013年11月21日深圳艾默生全厂1700工人大罢工抗议公司搬珠海赔领导层3N+1却只赔员工N+1要求2N+11: <http://t.cn/8sYcbUB> ; 2: <http://t.cn/8sYiaVH>

2013年11月21-22日江苏苏州：哈金森橡胶制品厂要搬迁，工人罢工争补偿，警察出动戒备、威吓工人。<http://t.cn/8sYcpxE>

2013年11月25日浙江湖州：双雄门厂倒闭 数百工人罢工堵路特警公安交警齐出动。
<http://t.cn/8sYcOeE>

2013年11月25日东莞长安：特利时玩具厂倒闭、老板失踪，百名特警先发制人围堵工厂、阻止工人外出讨薪 <http://t.cn/8sYMY8X>

2013年11月26日福建厦门海沧区：TPK威鸿光学倒闭工人堵路抗议公司拒发遣散费，公安交警齐出动 <http://t.cn/8sYcQ4u>

2013年12月9日，浙江丽水先丰合成革有限公司三百名工人围堵绿谷大道讨要工钱，造成丽水市区前往工业园区交通瘫痪。当地政府出动近200名公安干警维持秩序。
<http://t.cn/8sYMEys>

进入2014年以来，工人追讨历史欠账的斗争仍然丝毫未减，尤其开春以来，仅深圳就接连爆发3月3日IBM公司深圳工厂上千工人针对联想收购交易的罢工，抗议新条款约定工薪和离职赔偿方案不合理，以及3月10日开始的深圳赐昱科技有限公司员工罢工，抗

议工薪急降，工厂克扣加班工时、品牌更换不赔偿。去年 11 月广州海珠区的沃尔玛店员维权，与今年 3 月以来逐渐成为全国聚焦热点的湖南常德沃尔玛店员维权，都是工人争取历史欠账斗争的一部分。工厂地带产业工人走在了前列。

据工评社 4 月 13 日聚焦《国内资本搬迁转型工人抗争愈演愈烈》，仅 2014 年 4 月上旬国内就发生至少八起因搬厂或转型赔偿问题引发的工人斗争。让人有点出乎意料、却又在评估逻辑中的是，就在 2014 年 4 月 14 日东莞裕元爆发了 4 万工人大罢工，目前已持续一周多，成为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工运升级大事件。东莞裕元大罢工是中国工人争取历史欠账伟大斗争的一大飞跃升级，其规模和坚韧时长、觉醒速度、力度、深度都是中国工人运动十多年来所罕见的，可以预见工潮迟早要扩展到更大范围的广度（目前已扩展到江西分厂，裕元集团在大陆 16 万工人迟早也要全部受影响，更不用说高步工业区乃至东莞数十、数百万工人这样的影响广度）。相对于 2007-2010 年日益兴起的加薪斗争，工人追讨历史欠账的斗争更具有坚韧持久的特征，因而比加薪罢工更具有工人自组织的突破可能。

但是由于中国产业工人阶级的相当多数，仍未意识缴纳社保的重要性或者仍然不信任社保基金，即使已经开始越来越多工人也开始关注社保问题，但争取积欠社保的斗争目前仍更多引起工作年限较长的老工人的关注，年轻工人对这一诉求的关注仍然很不够。这种情况下，一些战斗性工人开始学得更聪明：把争取历史欠账的诉求与争取加薪的诉求结合起来！这就意味着要把老工人与新工人结合起来，让全厂工人不论是否想离职还是想在职留守的工人团结起来！去年 10 月底爆发的深圳盐田先进微电子厂大罢工，就是这样的伟大创举。5 千先进工人坚持了长达 22 天的有力斗争，最终争得了 N+1 赔偿与加薪 20% 的较大胜利，并且带给了中国工人运动新鲜而丰富的启示。

据秋火同志整理的先进微大罢工第 16 天简报，先进工人首创了在罢工中喊出“历史工资补偿”这一诉求概念，并详细引用了深圳红花草维权者在罢工中对这一创新概念的阐述（<http://t.cn/8DFkjj5>）。从而工人更可以理直气壮争取 2N+1，通过“工资”这一理论概念把上述两种斗争结合了起来。在工人运动导师马克思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里，基本工资只是劳动者创造的一部分价值，资产阶级法律中定义的什么加班工资、经济补偿或赔偿以及社保金等等，都是劳动者创造的一部分价值。先进工人在大罢工的战斗中可谓还原了“工资”的政治经济学本质，把资产阶级劳动法所定义的“经济补偿金/赔偿金”重新定义为“历史工资补偿”，即可理解为资本家阶级在历史上超额榨取的工人所创造的劳动价值，本质上就是超额掠夺的工人工资！因此，不是工人依什么法讨要资本家的补偿、赔偿，而是工人阶级要理直气壮地夺回自己的劳动果实！

因而我们认为，“历史工资补偿”以一种大罢工的阶级斗争方式提出，是对中国工人近几年争取历史欠账斗争的创新概括；“历史工资补偿”的提出，并通过阶级斗争实践与追求体面工资的大幅度加薪诉求结合起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一种具有革命意义的新锐创举。因为，这种工人大规模追讨历史欠账的斗争与要求大幅度加薪的斗争结合起来，如果一旦大范围地扩展开去，那将意味着一场席卷神州大地数亿劳工的社会总清算。

工评社欢欣鼓舞地看到：4月14日爆发的东莞裕元大罢工，一开始就有着把大幅加薪诉求（+30%）与追讨历史欠账斗争结合起来的公开呼吁，并且一些积极工人试图继承从2010佛山南海本田罢工到2013深圳先进微大罢工的未竟理想——改选工会，发展工人自己的组织！但是，我们同时充满忧患地认识到，在当局高压火力压制下，伴随着大量网特、5毛、搅屎棍之流的明枪暗箭，官方工会试图进场，改良主义劳工界一时乏力以及在新事变中可能的分化，都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拖扯这一波工人大规模进攻的后腿。多数工人尚且对“理性维权”“警察不敢打压理性的工人”抱有浓厚幻想，甚至还有许多人认为不必组织起来、仅凭坚守厂内罢工就能胜利。工人的类似思想落后保守，并不只是因为某些改良主义者或祖巴托夫分子的煽动，更因为许多工人尚且初次认真开始集体行动，他们需要自己学着趟过血与火的道路、吃下教训的苦果，才会逐渐觉醒，但我们深信工友们必将继续加速觉醒。共产主义者需要把眼光放得更长远，更有耐心，更扎根到工人深处去，我们的追求是工人的自我解放。我们并不嘲笑其他工友们的幻想和错误，我们应该与工友共同前进、一起成长，哪怕他们还没有充分发掘出自己的智慧和力量。中国工人阶级的挫折、痛苦与光荣，让我们一起承担。

工评社并不像某些悲观消极思想迂腐老化、甚或对工人的血与火冷嘲热讽的所谓左派分子那样，把自己置身于历史事变之外，或以“观察、资料整理”为借口只主张一味静等工人觉醒；我们也要尽一切可能妥善地帮助工人加速觉醒。但我们积极努力并呼吁更多同志与战斗工人一道群策群力之时，也深知工人暂时不可能指望很少数的革命派分子发挥多大作用，但我们至少可以尝试为前线战斗者，提供前瞻的观照、分析和预警。工评社认为，仅就工人追讨历史欠账这一斗争潮流来说，今后的继续升温乃至大范围的激化，是任何社会阶级、集团、乃至武装力量都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对于中国工人阶级来说，重大的历史变局可能将要迫近。从上层到下层，尤其是社会中层，都有一大批“聪明人”等待着抢食瓜分工人的血肉，从而构筑自身在资本主义秩序中长治久安的和谐美梦；但是我们中国工人阶级也正在逐渐增长自己的头脑、看到自己的面目，正在加速觉醒的工人大众也必将全面清醒认识自己的阶级利益所在，必将能够超越一切企图操控利用它的各种外部势力，发展出自己独立的自我解放力量。中国工人终将要像埃及工人那样大规模自我动员起来，最终要自觉地起来全面追讨资产阶级的历史欠账——那将是**社会总清算**——我们毫不讳言：那将是**21世纪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

向东莞裕元4万罢工工人致敬！你们翻开了中国工人阶级追讨资产阶级的历史欠账之斗争潮流的新篇章。这还不是革命，但已经预示着工人革命潜力。当有一天全国劳工大众向你们学习时，中国无产阶级的社会总清算就要像埃及工人革命那样吹响号角了。东莞裕元4万工人前路荆棘满布不容乐观——资本家、警察、5毛、工会、媒体、学界枪手等等正在全力合围阻击，工人需要从内到外加强团结凝聚、群策群力，决定性的关键在于战斗的工人集体本身。我们需要把更多精力、耐力和智力贯注于这场工运，坚信胜利必将属于战斗的工人阶级。

裕元工人大罢工 —— 中国的“廉价劳动力”时代即将终结

柴晓明（2014年4月27日）



美国真实新闻网采访：三万中国工人罢工反对耐克运动鞋的制造商

该采访是在4月24日晚进行的，当时离工人复工和张治儒被释放还有2天时间

编辑米歇尔·陈和教师柴晓明将讨论工人人们的诉求和罢工是否预示中国廉价劳动力供给的枯竭

米歇尔·陈是美国《国家》（The Nation）杂志和《当今时代》（In These Times）杂志的撰稿人，也是《当今时代》和《文化罢工》（Culture Strike）的编辑，同时还是太平洋 WBAI 电台亚太论坛的共同制片人。她的文章散见于《国家》和《每日新闻》等众多网站。

柴晓明是北京大学继续教育部门的教师，也是数个中文网站的时务评论人。此前他曾在中国大陆、香港和欧洲为数家非政府组织（NGO）工作过。他的主要研究兴趣是劳工运动、社会冲突和全球化对中国的影响。

杰西卡·德瓦里厄（Jessica Desvarieux，真实新闻网 TRNN 制片人）：

欢迎来到真实新闻网（The Real News Network）。我是来自巴尔的摩的杰西卡·德瓦里厄（Jessica Desvarieux）。三万中国工人已经持续罢工两周时间，以对抗世界上最大的运动鞋生产商。他们为你们所知道的那些著名大牌公司生产运动鞋，诸如耐克和阿迪达斯等。

工人罢工已经导致裕元公司停工，并致其股价大幅下跌。工人们宣称公司没有按规定缴纳足额的社保费用，养老金和住房公积金等。现在有两位客人加入我们关于该场罢工的讨论。

米歇尔·陈（Michelle Chen）是《国家》（The Nation）和《当今时代》（In These Times）杂志的撰稿人，也是《文化罢工》（Culture Strike）的编辑。同时我们还邀请了来自中国的柴晓明。他是北京大学继续教育部门的教师。感谢两位加入我们的讨论。

米歇尔·陈（《国家》杂志撰稿人）：

谢谢。

柴晓明（北京大学教师）：

谢谢。

德瓦里厄：

米歇尔，我们由你开始吧。裕元罢工被认为是中国数十年最大规模之一的罢工。你能告诉我们为什么有这么多工人罢工？和他们有什么要求？

陈：

基本上工人只是希望公司能履行中国法律规定的相关义务，也就是缴纳社会保险费用。许多工人说公司大规模拖欠根据新近改革的《劳动法》规定的社保费用，诸如养老金、失业保险、基本社会福利保障等。众所周知，这绝不是个例，也并不是只有一家公司推卸其企业责任。公司违反规定欠交社保费在劳动力市场是个普遍现象。但这些工人觉得当下形势已经到达这样一个危机点，所以他们宁可走上街头。

此外，另一个大问题是公司欠缴的住房公积金。而随着生活成本的上升，许多工人都面对难以承受的住房费用。而且不幸的是，他们的工资收入上涨无法赶上生活成本上涨的步伐。所以，我们看见有数以万计的工人进行罢工，——我相信在最高峰时罢工工人达到 3 万多人。当然其中很多人只是上班刷卡报到，但并不进行工作。所以，他们采用着多种不同的方式进行抵抗。

西方公司对此猝不及防，因此产生了一些影响。正如大家所知道的，在一个没有独立工会和劳工活动受到压制的国家，工人采取这种罢工行动是非常罕见的。

德瓦里厄：

是啊。你刚才提到这是不同寻常的。但（注：位于深圳的）中国民间智囊机构当代观察研究所表示，自从今年三月以来已经出现了至少涉及 50 名工人的 30 场罢工。因此，看起来似乎出现罢工数量上扬的趋势。现在我想由柴晓明来谈谈你的观点。我们是否看到罢工增多的趋势？

柴：

确实。我认为这是多年来我们第一次看到如此庞大规模的罢工，即使在广东地区也不多见。但在当地也经常出现一些其他不同的罢工，甚至包括一些知名大品牌的公司，诸如 IBM 和诺基亚等。而到现在为止，这场罢工已经持续超过两个星期，事实上罢工最初开始于 4 月 5 日。我认为这是相当惊人之举，而且工人仍然有相当信心继续他们的斗争。

德瓦里厄：

你能告诉我们——我得到的感觉是工人通常能在最终获得胜利。公司能真正同意工人们要求的可能性有多大？

柴：

好的。我会说现在仍然处在一场拉锯战中。我们已经听过很多事情，比如，数十名工人被当地政府盘问，甚至遭到逮捕。一些劳工维权分子遭到当地警察或当地政府的软禁，例如张治儒等。但工人对斗争仍保持较高信心，因为两小时前我刚参与过一个罢工工人的 qq 群讨论，这可能是裕元工人组织的数个罢工 qq 群中的规模较大的一个。有 300、400 工人参与讨论，他们当时正在讨论他们的计划，以及大家对今天和这几天的感觉与反馈。他们表示仍将继续罢工直到五一劳动节。如果不达到他们的目标，他们绝不会轻易放弃。我感觉工人们还是相当自信和充满斗志的。

德瓦里厄：

好的。

陈：

我想补充一点。在很多类似的工人抗争中，当你看到工人进行罢工，最终仍会以某种妥协宣告结束。通常情况下，管理层会做一些让步。但你们知道，要真正取得一场巨大的彻底的胜利是非常罕见的。坦率地说，管理层往往只是希望人们回去工作，工人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而当他们得到他们所希望的，事情就会回归正常。我的意思我们可能不会看到很快发生巨大的激进的街头行动，但当工人们有具体目标的时候，他们知道如何进行组织，采取非常有针对性的战略行动。

德瓦里厄：

好的。让我们转而谈一些劳工维权专家张治儒的情况。根据英国《卫报》的报道，张治儒已经失踪超过 24 小时，而他的妻子怀疑他被当局有关部门扣留了。晓明，你能告诉我们张治儒在这场罢工中的角色和作用吗？

柴：

好的。实际上我不会说他是这场罢工的组织者，因为罢工是自发的也仍然没有良好的组织。它基本上还只是一个自发的现象。这场罢工是由工人策划的，或者更准确说只是由工人发起的，而并不是策划的。张治儒是深圳和东莞当地一个较为知名的资深劳工维权人士。他大概是在4月12日之后开始参与罢工，但罢工本身在这之前早已发生。张主要是希望能够在法律上和技术上为工人提供建议和其过去的经验，包括如何组织维权团体等。张治儒被地方当局扣留到现在已经是第三天，他的妻子仍然联系不上他。事实上也不仅张治儒一个人，还有一些其他劳动维权分子和支持者也遭到了地方政府和警方的讯问和扣留。

德瓦里厄：

米歇尔，劳工维权者经常会遭到恐吓或拘留吗？

陈：

是的。正如你所知的。任何人试图在中国从事大胆的政治活动经常会遭受某种恐吓或骚扰。这并不意味着说总会有人被拘留，但是，这些事情并不罕见。关于劳工维权的问题，正如刚才晓明提及的，这往往是来自工人草根的自发性反抗。因此，对于当局来说，希望通过拘留个别他们认为是工运组织的领导人来结束罢工是非常困难的。

坦率地说，虽然我是从远方进行观察，但对于一场数以万计的工人参与的罢工而言，永远不可能是一个人能领导发起的，这其中肯定存在一些别的东西。我想尽管发生有工运人士被拘留的这种现象，这场罢工仍然可以存在下去。如果有可能的话，希望这将为持不同政见者开辟更多的空间，使领导者多一点喘息的空间。因为作为组织者他们能将工人的意见带到谈判桌上，从而更好地帮助双方进行协商。毕竟政府无法同时面对三万人。如果有人愿意

自己出面代表全体员工的利益，那么他们就需要这些人。政府不能只是把他们关进监狱里。

德瓦里厄：

好的。米歇尔，我想问你最后一个问题。你是否认为我们会看到从西方跨国公司把投资和生​​产转移到世界上其他地方去？这是否意味着中国提供廉价劳动力的终结？

陈：

我不确定说任何信号意味着中国廉价劳动力的终结，因为它长久以来一直是美国消费者的忠实服务者。但是，正如众所周知的，我们看到越来越多在中国的公司正发生资本外逃。正如我们看到大量美国的制造业岗位被外包；今天你也可以看到，很多曾经在中国进行大规模生产的公司正在慢慢地转移了生产设备，转向那些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诸如印尼、柬埔寨和孟加拉等国。我们已经看到近来在那些国家地区发生的悲剧。因此竞次效应（Race to bottom）仍然继续存在。但我认为，在这个方面中国工人还有很多可以讨价还价的杠杆。你知道，面对 12 亿人，不是一个跨国公司可以掉头不顾，随便一走了之的。因此，如果合理可以使用这一杠杆并用它来推进政治和经济正义，这将可能改变中国，也会使制造业变得更好。我希望阿迪达斯和其他公司能真正开始倾听，以免为时已晚。

德瓦里厄：

好的。米歇尔·陈和柴晓明，感谢两位接受我们的访谈。

陈：

谢谢。

柴：

谢谢你。

原英文文本和链接：

http://therealnews.com/t2/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31&Itemid=74&jumival=11777

《怎么办》的启示 —— 也谈社会主义者当前的问题和任务

葛平（2014年4月28日，转自进步青年网）

前段时间，《少年中国》网站发表了黑夜里的牛的一篇文章《论社会主义者当前的问题和任务》（链接：<http://review.youngchina.org/archives/5019> 以下简称“社文”），引起了“泛左翼”圈中的一些讨论。该文实际上是要为左翼今后的发展提出一个全面的路线图。而笔者拜读此文后，认为该文提出的路线图是错误的。最近，笔者重读了《怎么办》，感到对判断当前左翼的主要问题和首要任务、批驳“社文”有着很大的启发，因此整理成文，望能引起同志们的思考和讨论。

《怎么办》的时代背景

列宁写作《怎么办》时面临着怎样的时代背景，他想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

19世纪最后十年，沙俄资本主义大工业有了长足发展，工人阶级人数和质量都有了很大提高。在此过程中，工人阶级反抗资本家剥削压榨的自发性斗争也逐步高涨。

另一方面，在欧洲，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日益发展，使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日益增强，在俄国也获得了广泛传播。许多不满沙皇反动统治的进步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这些进步分子在全国各地结成了许多秘密的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党小组，这些小组积极与工人群众相结合，在工人阶级中努力开展活动，产生了一定影响。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有了初步的结合。

但各个小组往往各自为政，几个人、十几个人小打小闹的“手工业”方式盛行，而没有结成有机的联系，凝聚成全国统一的革命力量。同时在这些小组中也产生了只重视工人阶级的日常斗争、经济斗争，而忽视革命的政治斗

争，认为只要经济斗争发展了，就能自发推动政治斗争和革命斗争的经济主义思潮。

这就是列宁写作《怎么办》的时代背景。通过《怎么办》，列宁所要解决的就是如何把分散的进步分子和革命工人的小组整合成统一的、纪律严明的无产阶级先锋党，如何把工人阶级自发的经济斗争提高到自觉的革命政治斗争、不使革命者成为工人自发斗争的尾巴的问题。

列宁的计划

列宁在《怎么办》中提出了解决上述问题的计划。那就是创办在全俄范围进行政治性鼓动的秘密报纸，以这张报纸为搭建无产阶级先锋党的脚手架。通过围绕这张报纸形成的撰稿、提供信息、翻印、分发的代办员网络，来把分散的革命小组联系起来、整合起来，形成实现紧密的分工合作的全国性的革命者组织。并通过这张报纸，针对全俄阶级斗争的形势，集中全国革命运动的经验，开展政治鼓动、提供斗争策略。从而能使先进分子使用这张报纸提供的材料在工人中进行长期的、一贯的政治鼓动，从而培育出众多具有政治觉悟的革命工人，以这些革命工人为骨干带动千百万工人的斗争，把工人运动从自发的经济斗争提升到自觉的革命政治斗争。同时这张报纸又能为全国的革命组织提供统一的策略和方针，从而使全国革命组织能够像一支军队一样，针对全国阶级斗争形势采取有计划的统一的战略战术，从而不断发展壮大自己、削弱敌人。

列宁的计划正是后来形成布尔什维克党的基础。

从《怎么办》看当前的主要问题

我们把《怎么办》写作时的形势与当前相比较，就可以发现当前左翼运动的主要问题

主要问题就是还没有实现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初步结合。也就是说，在接受左翼思想的进步分子中，还没有出现广泛的与工人群众积极结合、在

工人中努力开展群众工作的浪潮，没有形成全国星罗棋布的进步分子与先进工人结合的小组。马克思主义还没有在工人运动中形成一定影响。现在的左翼运动主要还是一些宣传和思想的小圈子。

《怎么办》是在全俄已形成了众多与工人群众相结合，在工人运动中有一定影响的革命小组的基础上，才开始着手解决如何建立统一的无产阶级先锋党来领导工人运动和整个人民革命运动，实现工人阶级及广大劳动人民的自发斗争向自觉斗争升级的问题的。而现在的左翼运动连这一基础也还没达到。

而这绝不是因为工人阶级力量的弱小或者工人运动的不开展。当前工人阶级的数量和质量都早已远远超过沙俄，而工人的自发斗争这些年也一直处于高涨的态势。

因此，造成当前左翼运动主要问题的，只能是左翼自己落后于群众运动的发展。而左翼之所以落后，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

一是由于历史的原因，以 XX 之乡为代表的打着红旗的保皇党、民族主义者长期在左翼中有着较大的影响，他们当然是不能进行真正的工人群众的工作的。而他们的思想和活动严重误导了左翼的方向、毒害了左翼的思想，束缚住了左翼与工人群众结合的手脚。

二是当前左翼形成的方式也一定程度上不利于与工人群众相结合。当前左翼主要是依托互联网形成的。互联网的好处是能够打破地域的界限，交流联系起来迅速方便。但也正因为此，使得左翼往往围绕某个网站形成一个个小圈子，而小圈子成员在地域上又分布极广，使得在一地力量薄弱，不能开展在地的的工作。而当年俄国的进步分子则一开始就是形成本地的小组，能够立刻开展在地的的工作。

发展革命知识分子，还是到工人中去？

了解了当前左翼运动的主要问题，就能明白当前的首要任务必须要能够解决这一主要问题。

因此，当前的首要任务，只能是“到工人中去”。即左翼进步分子采用一切可行的方法，积极与工人群众相结合，在工人中努力开展工作，形成星罗棋布的、在地的、具有多种灵活形式的与先进工人的紧密联系。从而实现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初步结合，为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

所以，黑夜里的牛在“社文”中提出的首要任务：“.....从资产阶级控制最弱的地方入手，发展革命知识分子。之所以要把知识分子放在当前工作的首要位置，不仅因为知识分子一般说来善于做组织工作，更是由于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学生思想比较活跃，也往往对劳动人民有同情心，是人民群众中比较容易接受社会主义思想的一部分。”是不符合当前形势的，是**错误的**。

黑夜里的牛认为，革命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义运动的自觉力量，似乎只有这个自觉力量发展到一定程度了，才能与自发的工人运动相结合，担负起领导工人革命运动的任务。然而这是不符合革命运动发展规律的。自觉力量绝不是主要依靠革命知识分子发展起来的，而恰恰是只能在进步分子与工人群众相结合的过程中发展起来。

诚然，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兴起，必然要经历一个思想准备阶段。在这一阶段，主要是通过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来争取进步分子，形成左翼的最初力量。但是**这一阶段恰恰是运动的自发阶段**。这时候形成的左翼分子还不是无产阶级革命的自觉力量，而顶多是自觉力量的萌芽。而只有左翼分子自觉地去与工人群众相结合，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带给工人群众，实现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这时候才形成无产阶级革命的自觉力量。这也就是列宁“灌输论”的精髓。“灌输论”绝不是说先形成强大的、精通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知识分子队伍，再由他们一下子把革命思想灌输给群众。而恰恰是强调，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进步分子要到工人群众中去，通过长期、细致的群众工作和政治鼓动，使工人群众接受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领导，从而形成自觉的工人革命力量。

而当前面临的主要任务，早已不是思想准备了。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左翼已经逐步走出了文革被颠覆造成的白色恐怖，开始了新的发展。特别是

抓住了互联网带来的机会，通过互联网进行了长期的宣传，再加上阶级矛盾的尖锐化，使得左翼现在在思想上已经有了一定的影响力，已经形成了一个虽然规模还不大，但也绝不是无足轻重的左翼思想、文化圈子。而且左翼的思想也正在迅速成熟，改良主义和保皇党已经受到严肃批判、越来越被唾弃。当然，思想理论和宣传工作仍应是左翼的重要工作，但是左翼现在面临的主要问题恰恰不是“缺少革命知识分子”，而是落后于群众斗争的发展，是把自己局限在宣传和思想的小圈子、不去与工人群众相结合。而没有工人运动的群众基础，思想、宣传工作搞得再好，占领再多“阵地”(黑夜里的牛在“社文”中推崇葛兰西的“阵地战”，认为要发展革命知识分子，“斗争的要点就是占领阵地。大学讲堂、报纸杂志、娱乐界等等都应该是我们占领的地方”)，也最多只能形成资本主义社会的亚文化，而不可能成为真正改造世界的力量。

因此，现在就应该在左翼中大声疾呼：“到工人中去！”，一切左翼进步分子现在都应积极到工人中去，或者为到工人中去服务。

如何到工人中去

要到工人中去，就必须突破现在左翼活动方式的局限性，也就是说突破互联网的局限，努力发展在地的力量。要把一切可以投入的力量，都尽量投入到在地的与工人群众相结合的工作中去。

与工人群众相结合，可以根据具体的情况采取多种灵活的方式。既可以利用 ngo 等各种改良组织，也可以利用工作的关系尽量能与工人群众多接触（这就要求在求职时尽量选择能与工人群众密切接触的，但又不与工人群众相对立的工作），也可以直接到工人聚居区去搞调研、交朋友。最高的形式，就是摆脱原有社会身份，直接到工厂中去成为普通工人。对于愿意做出这样选择的同志，要积极鼓励，同时也要充分指出可能面临的困难，使其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从而能够长期坚持。

与工人群众相结合，绝不是说要开展任何当前形势下冒险的、冒进的活

动。也决不能仅仅停留在体验生活、改造自己的层面。而是要使进步分子真正成为一粒种子，在工人群众中生根开花。就是说，要真正与工人群众建立密切联系，在工人群众中进行长期的、细致的群众工作，进行系统的、巧妙的政治鼓动，用灵活形式参与、引导工人群众的自发斗争，使左翼能在工人阶级队伍的深处扎下根来。从而能为运动进一步的发展奠定基础，并在将来发挥巨大的作用。

与工人群众相结合，也不说要放弃其他方面的工作，而是说要使其他方面的工作都围绕这一核心工作，为其服务。比如，我们不应像黑夜里的牛在“社文”中鼓吹的，把在青年学生中传播左翼思想作为首要的工作。但绝不是说要放弃这一工作，而是要使这一工作主要为鼓动进步青年学生与工人群众相结合服务，使其能直接服务于壮大在地工人工作力量，而不是停留在搞学生社团、讲座、沙龙。

有了《怎么办》为代表的过去无产阶级斗争的先进经验，再加上互联网的有利条件，我们还可以尽量避免俄国革命运动走过的一些弯路。

也就是说，一开始就可以努力尽量打破各地的分散孤立状态，打破手工业方式，通过互联网站来一定程度上发挥《火星报》的作用。使互联网站成为在地工作者思想交流和联系的平台；使互联网站成为积极开展思想斗争、批判错误路线，从而在思想上发挥领导作用的平台；使互联网站及时分析阶级斗争的整体形势，及时对国内外重大事件进行马列毛主义的评论，从而成为给在地工作者提供政治鼓动材料的平台；使互联网站成为总结在地工作者经验，为斗争提供策略的平台。这样我们就可能尽量缩短运动的这一阶段向下一阶段——即黑夜里的牛所说的建立社会主义者的核心政治组织——过渡的时间。但是，只有通过“到工人中去”的这一阶段，才可能进入下一阶段。任何其他道路只能是小资的幻想。

高居矛和袁庚华在政治上有区别吗？——谈相持阶段的一些思想问题

水边（2014年4月29日）

左向前同志在最近的一篇广受热议的文章中（“堕落的造反派领袖”）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那就是在目前的相持阶段，是左派整理思想，整理队伍的好时机，要为了未来的革命形势进行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顺着这个号召，我来利用网上的知名理论家高居矛和袁庚华最近出现的分歧，简单说说值得注意的几个方面。

高居矛近期发表了一篇批判袁庚华的长文，条分缕析，对袁庚华这位永远的造反派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将其定性为资产阶级里面的社会民主主义派，而不是毛派，左派。高本人当然是以所谓“无产阶级彻底革命派”的立场来做这个鉴定的。那么，高是如何得到这个结论的呢？高居矛和袁庚华当真有那么大的分歧吗？根据高的文章，我把其与袁的思想主要相似和不同点整理如下。

两人的相同点：

第一，对各种政治力量的认识相同，具体的说，就是认为中国无产阶级力量弱小，不足以自己搞一套。而无产阶级的敌人呢，又被分为两种，一种是现在的政权（有时候也被称为特色派或者官僚派），还有一种是资产阶级民主派（或者在野派，西化派）。而这两种敌人有主次之分，现政权是最可恶最主要的敌人，而民主派西化派次之。

第二，对于革命战略认识相同，那就是要首先把矛头对准共产党，建立一个“民主制度”，在这个过程中可以与资产阶级民主派合作。

两人的区别：

第一，革命长期目标不同。据说搞了所谓民主之后，袁庾华没有进一步的明确思路，而可能要准备长期搞社会民主主义（或许也跟邓小平的招数类似，要等 100 年左右才谈得上社会主义的问题），而高居矛则准备迅速进入社会主义，也就是要用某种方法进行第二次革命，就算有过渡期，高也认为毛派应该激化过渡期矛盾。

第二，对于无产阶级的地位认识不同。袁庾华的左右合流，对于谁占据主导地位语焉不详，而高则强调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表态说，如果不能占据主导，左派也不是非要搞左右联合不可。

从上面的对比来看，我们可以有一个简单的结论。这两个人的思想基础和主要思路实际上完全一致，而区别只是在于立场和态度，那就是如果说袁庾华的理论实际是在左右派之间耍滑头，坚定的做一个永远的政治掮客，那么高居矛则是一个严肃认真的理论工作者。从这个意义上说，高居矛是一个纯粹的袁庾华，前后逻辑一致的袁庾华，是一个真心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袁庾华。

所以，从思想的说，左派只要能正确的评价高居矛的观点，就能说清楚袁庾华的东西最多值多少钱。这篇短文当然不可能全面的批判高居矛的思路，但是生活中我们都清楚，要证明一个东西是假的，我们只需要举出一个反例就行。我们在下面可以提出几个实质的批评，读者们可以顺着这些角度做出自己的思考和判断。

首先，不管咱们怎么委婉的描述，高居矛和袁庾华都在某种程度上支持所谓左右合流，也就是要与一部分资产阶级合作来推翻政权。这种思路总是需要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存在这么一个神秘的“资产阶级民主派”，这个名字可以多变，有时候也叫民族资产阶级，右派也叫民间资本等等。这个派别不仅需要痛恨现在的资产阶级政权，而且其痛恨程度还要让其愿意与无产阶级合作。

我一直很好奇，这些资产阶级是从哪个星球移民到中国来的呢？又是在哪个山区隐居？

中国的政权，就是中国资产阶级的政权，而不是资产阶级哪一派的政权。资产阶级民主有各种各样的形式，当代的中国政治制度也许不是中国资产阶级最满意的，但是至少运行的很有效率，让大家都发财。如果搞了有所谓高福利高税收的“社会民主主义“，那就是让资产阶级（无论是哪一个产业）都少赚钱，资产阶级是开心还是不开心呢？

而且中国的资产阶级的财富不是从天上掉的，都是靠私有化和血汗工厂得来的。在这个背景下，有人做起了梦，希望有一部分资产阶级要背叛自己的阶级，破坏整个资本主义的秩序，去和跟自己有血海深仇的工人做朋友。我想，这个梦的虚幻程度不亚于习近平的中国梦吧？

其次，无论是高居矛和袁庾华，都对某些资产阶级民主形式有着极大的信心，与此同时，对于无产阶级的力量却是极度的没有信心。对于资产阶级民主的信心，无非就是想象着，等到革命了，资产阶级会友善的分给我们一点赏赐，比如报刊合法传播，组织合法存在等等。

他们其实是希望资产阶级里面的“民主派”能够无条件的把权力分给无产阶级。资产阶级难道是傻子吗？如果他们的统治形式发生了变化，形势不稳定的时候，最有效的手段是什么？是戒严！在阶级社会，一切权力的限度是不威胁统治阶级的统治，所以各个资产阶级国家所能实行的资产阶级民主都是不一样的。不要总看着美国西欧的状况发花痴，要看看俄国，看看埃及，政权变更之后，是谁在掌权？是寡头，军阀，黑社会。

在对于资产阶级抱有希望的同时，他们不谈工人，尽管他们可能都认为自己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的。工人的力量究竟怎么样？红色中国网已经进行过很多重要的讨论，读者可以自行查看。现实当中，各地都已经出现了成规模的工人运动，不管是老工人的维权，还是新工人的斗争，都已经是重要的政治力量了。不看到这些中国工人力量的蓬勃发展，不看到工人斗争水平和觉悟的迅速提高，还谈什么革命！对无产阶级没有信心，才会去别处找答案。

再次，对于革命的团结对象，双方都说是资产阶级的某一部分（民主派，西化派）。我们上面说了，这是不靠谱的。团结大多数，究竟指谁呢？指的就是在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夹缝当中的进步小资产阶级。高居矛虽然也承认团结大多数也包括小资产阶级，但是有一个奇怪的观点，他说：“绝大多数的小资产阶级已经形成“救党保国派”和“挺薄派”，他们站在革命的对立面”。

真的如此吗？小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面，想过得好，但是呢，又经常过不好。随着资本主义矛盾的发展，小资产阶级越来越分化，有一大批小资产阶级从过小日子的状态，被生活现实逼得开始关心政治，关心社会。中国从 80 年代到现在，就经历了小资产阶级从被资产阶级收买到被资产阶级抛弃的历史过程。不看到这一点，就不能明白在过去这些年，乌有之乡的发

展，以及大批小资左派的出现。这批人数量巨大，也痛恨现在的资本主义制度，正是我们革命的团结对象。

这些小资产阶级当然可能受保党救国的影响，当然可能受改良主义的影响。但是资本主义的现实矛盾要让他们一次次的失望。买不起房子，结不了婚不就是让他们对现体制死心了吗？薄熙来的遭遇不就让很多支持薄熙来的小资产阶级激进化了吗？

当然，正如路石同志之前论述的，对待朋友和对待同志，肯定是两个标准。对于进步小资产阶级，没有必要，也不可能要求他们一定要马上革命，而是要引导，要帮助。事物是发展变化的，咱们搞革命，更是不能刻舟求剑，用静止的观点看问题，要看历史变化，天下大势，要真正的认识到修正主义，资本主义不得民心，而咱们的马列毛主义，则是得道多助的。只有这样，才不会产生“少数派”，“真理唯我独有”的悲壮心态，才能踏踏实实的，在目前的相持阶段中，广交朋友，共同进步。

这篇文章分析批判的只是左派队伍中两种具体的思路。这样的分析探讨，是我们左派到了现在，有了各方面的经验之后，完全有条件进行的一种思考。革命的战略和道路越来越成为所有左派需要思考研究的问题，我希望红色中国的读者在这些问题上能够做出突出的贡献。

少年中国评论批判大纲【草稿】

柴风（2014年5月1日，转自进步青年网）

一少中派的背景、成员的社会背景

二观点辨析概要：

A 进步的方面：集中见于《人人网左派青年的共识》，写于2011年。有以下几点：

- 1 当前中国社会的性质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资本主义。
- 2 中国已经进入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帝国主义阶段。
- 3 中国社会三十年来最大的矛盾不是民族矛盾，而是阶级矛盾
- 4 反对当前网络上盛行的民族主义与逆向民族主义
- 5 用唯物史观分析历史，反对神化与妖魔化历史
- 6 民主主义是左派必须坚持的一面旗帜

民主只是为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提供更好的条件。不应该因为资产阶级的民主的局限性，无视专制制度是当前工人运动的最大障碍这一现实而完全拒绝民主。官方反民主，五毛反民主，草泥马在搞臭民主，左派应该勇于扛起这面旗帜。

B 机会主义方面：见于《是小资还是脑力无产者》《论社会主义者当前的问题与任务》
《对左翼青年进工厂问题的思考》

YCA 黑牛总告白：社会主义者可以很明确地提出现阶段的任务：发展 Gm 知识分子、向青年学生传播社会主义思想、进入各种各样的群众组织、发展工人 Gm 家，促进全国性的社会主义者联合，以及确立现阶段的政治路线。

总概评：黑牛的文章建立在对形势的这样一种分析上。他认为当前工人运动总体上仍然处于落后的工联主义阶段。而左翼的发展相较于工人运动则更为落后，而运动的不发展造成了左翼中“手工业方式”的流行。所以无产阶级要实现无产阶级解放，就必须要建立能适应当前环境的核心政治组织。而要发展核心组织，只有从资产阶级最薄弱的地方着手，发展 Gm 知识分子。而发展 Gm 知识分子的要点是要占领阵地，比如大学讲堂、报纸杂志、娱乐界等等，或者利用一些群众性的组织，通过理论探讨与交流培养 Gm 知识分子。所以黑牛认为，作为小资产阶级的自己跑到工人中间，把自己锻炼为一个普通的鼓动家，甚至只是成为一名“普通工人”，是没有看到当前的主要任务所在，是一种没有任何意义的“真诚”。

-----选自丁学雷《shzy 运动中的精英主义——评 YCA《shzy 者当前的问题和任务》》
来源进步青年网

1 脑力无产者论与否定小资批评论是其一切歪理的基石：

脑力劳动者的兴起是当代资本主义阶级关系的重要特征。由资本主义竞争所推动资本主义企业，不断将科学技术运用于生产之中，在创造出巨大复杂的机器的同时，还创造出能生产和运用这些机器的技术工人。脑力劳动无产阶级是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分工发展

到资本主义阶段的必然产物，是新科技 Gm 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结果。生产的自动化，不仅造成机器排挤体力工人，还史无前例地提高了脑力工人在工人阶级总体中的占比。虽然目前工人阶级中的大多数仍然是从事简单体力劳动的工人，但可以预见到的趋势必然是，从事脑力和体力相结合，或者纯脑力的技术工作的工人将会成为主流。脑力工人的出现使无产阶级发展成为一个具有较高科学文化知识和技术水平的阶级，无产阶级队伍由以体力工人为主发展为包括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两支基本力量的队伍，进一步向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结合并以脑力劳动为主的方向转化。在这个生产日益被科学技术渗透的社会，脑力无产阶级所从事的劳动，是社会生产的核心部分。如果把脑力无产阶级放在一边，不去动员这支庞大的劳动者队伍，Gm 是很难取得成功的；不仅 Gm 难以取得成功，即使 Gm 成功了，Gm 后的建设也无从谈起。脑力工人同样受着压迫和剥削，在消灭资本主义的问题上，与体力工人的利益完全一致。

脑力劳动者缺乏体力劳动者的工作经历，对车间的工作相对陌生，所以当脑力劳动者出身的 Gm 青年要在体力工人中开展工作时，自然需要一个相当痛苦的学习过程。反过来也一样。体力工人对脑力工作也不了解，陌生程度甚至更高，如果要在脑力劳动者群体中做工作，一开始的学习过程也会是非常痛苦的。不应该只强调脑力劳动者要向体力劳动者学习，而不注重引导体力劳动者向脑力劳动者学习。

出身于无产阶级家庭和小资产阶级家庭的学生，一般不会因为接受了高等教育而上升成为资产阶级，而往往会成为掌握一定技能的雇佣劳动者。他们不属于小资产阶级，而属于无产阶级，也就是所谓的熟练工人。

当前有一种认为学生属于小资产阶级的论调。倾向于当前统治秩序的思想广泛地存在着小资产阶级由于自身的经济地位更容易产生这种思想。但这种思想不仅存在于小资产阶级中，而且存在于工人阶级中！可见，这种保守的思想，与其说是小资产阶级思想，不如说是无产阶级中广泛存在的保守思想。学生保守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学生与普通工人的差异，而在于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广泛影响。

无限地夸大学生与普通工人的差异，不是把工人当做客观存在的力量，而是把工人当成一种偶像去崇拜！把工人无限理想化，认为工人中没有保守思想，从而把所有的保守思想都当成所谓的小资产阶级思想——这就是把学生当成小资产阶级的根源。

从实践上来说，与普通工人同吃同住同上班，是否真正有利于工人运动的发展呢？我认为不一定，以其他有别于普通工人的身份介入工运，效果可能更好。一方面，熟练工人和非工人，如工程师、律师、医生、记者等，比普通工人有更多的时间、精力、资源去促进工运；另一方面，熟练工人和非工人，社会地位（注意不是阶级地位）高于普通工人。普通工人的思想，其实是社会上的主流思想，在这种主流思想的影响下，工人会更欢迎地位高的而又能帮助他们的人。

非工人不但可以成为马列主义者，而且可以成为促进工人运动发展的优秀的马列主义者，如马克思，恩格斯，施洋，向警予。资产阶级出身的左翼青年，选择职业时也应当以运动的利益为标准。例如，恩格斯选择了商人作为自己的职业，但这是符合运动的利益的。

当然，不能否认学生有进工厂的必要。但以现在左翼的实力来看，学生进工厂只能起到锻炼自己和增长经验的作用，而几乎起不到直接促进工人运动的作用。工人运动目前还处于自发斗争阶段。工人运动依自己的规律而发展，无论有多少左青进工厂，都不能使工人运动很快超越这个自发斗争阶段。我们要做的就是引导工人运动，这种引导在最初是以帮助

的形式出现的。要促进当前工人的争取直接经济利益的自发斗争，我们应当考虑如何才能帮助工人。工人当前最需要的，不是多一个普通工人去发动或者参加他们的罢工，而是在他们斗争时能获得特殊的帮助，包括法律上的、舆论上的，甚至是金钱上的。对于当前处于弱勢的左翼来说，把工人社区而不是工厂作为我们的突破点，也许是一个正确的思路。

另一方面，我们应当考虑如何给未来的自觉斗争做准备。在把工人自发斗争提升到自觉斗争的过程中，需要的武器正是马列主义的思想。这种思想的承载者，就是无产阶级先锋队，是无产阶级中最进步的一批人。发展进步知识分子队伍，将对未来的先锋队有决定性的作用。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工人不能参加这种队伍，不过他们不是以工人的身份，而是以进步知识分子的身份参加的。

2 工人斗争自发不自觉论、社会主义政治组织专业化分离于群众组织论

群众组织带较强的政治性会受到打压。因此只能是把原本需要形式上广泛的群众完成的高度政治性的工作分离出来，由主要是坚定的社会主义者组成的社会主义者的核心政治组织完成以避免危险。近几年工人阶级的自发运动开始高涨，建立独立工人组织的呼声越来越高，但运动的自觉方面而言，不仅缺乏社会主义者的核心政治组织，而且缺乏构成这种组织的材料。当前的主要任务还不是直接去建立核心组织。在左翼自身力量非常弱小，亟需壮大队伍的时候，应该着眼于 Gm 家团体的发展，从资产阶级控制最弱的地方入手，发展 Gm 知识分子。

3Gm 知识分子主体先行论：

推崇葛兰西之政党三要素论。工人阶级在政治谋划的意义上是作为客体出现的。领袖可遇不可求所以这个时代我们最值得追求的要素就只剩下一个，即中间要素——Gm 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一般说来善于做组织工作，特别是青年学生思想比较活跃，也往往对劳动人民有同情心，是人民群众中比较容易接受社会主义思想的一部分。只有左翼壮大了，其中愿意投身 Gm 事业的人才会多起来，同情并且愿意帮助社会主义运动的人才会多起来，社会主义者的核心政治组织也就有可能建立起来。

发展 Gm 知识分子的工作不仅在当前是急迫的，实际上，到 Gm 胜利前，它都一直会是我们的任务之一。群众工作是组织工作的基础，只有坚持在群众中扎根斗争，才会有机会影响大批有才干的分子。斗争的要点就是占领阵地。大学讲堂、报纸杂志、娱乐界等等都应该是我们占领的地方。除了占领已有的阵地，我们还要创造据点，要到所有劳动群众那里去把群众组织起来。在运动初期应该首先到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去建立组织。

4 工人受助论、工人社区结合论、自发斗争进程经济规律决定论

应该到工人社区去做工作而不是到厂里。社会主义者在社区做工作，招致资本家的反感会少一些，也能够建立与工人的联系；而如果在工厂里斗争，则是跑到资本家的老窝去闹事，自然会遭致最强烈的打压。

工人要在资本主义制度内获得生活条件的改善，能想到的就是团结起来进行经济斗争。作为商品的雇佣劳动者以厂为单位，随后走向整个行业范围内的斗争，这一工联斗争的发展进程是市场经济规律所决定的。不论这一斗争中有多少血泪，多少歌者诗人参与其

中，或者多少学生扔掉学生证或者毕业证跑到工人中进行斗争的鼓动，工联斗争从整体上讲仍然必须被视为自发。

社会主义者所要做的就是加速这一过程，并尽力提高运动的自觉水平。所以，社会主义者要做的不是直接去组织一般的工人，而是尽量发现、培养和保护工人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各种鼓动家和活动家。这些有斗争经验的工人就是运动最先进的部分。而要发现这样的工人，首先就要求社会主义者能够参与到与工人阶级有广泛联系的群众组织，或者是从事诸如劳动维权之类的能够辐射较大人群的工作。

如果工人的自发运动高涨，因罢工失去生计的工人组织活动家决不会是少数。社会主义者不应该是自己去完成一个普通的工人活动家就能完成的事情，应该利用自己的社会资源，去做普通工人完成不了的事情：帮助他们实现职业化（而不会为了生计每天工作11小时），培养其社会主义的政治意识等等。如果进入工厂的社会主义者发现到自己的鼓动能力可能不如先进工人的时候，也应该考虑是不是应该换一个高工资的工作，然后省吃俭用地把工资剩下来给这些工人鼓动家，让他们可以成为职业活动家。

5 左派联合论

运动的不发展使各种小团体流行。小团体没为当前的 Gm 指出一条路来，实际工作上也没什么真正的成就。今天小团体间的交流障碍是由于缺乏宽广的视野造成的小团体意识，人为地阻隔了当前最缺乏的严肃理论交流。就必然对社会主义者未来的联合造成阻碍。痛感当代中国左翼思潮内的意识形态混乱葬送中国的左派运动。左翼团体的联合应该而且只应该基于一个标准：是否有利于 Gm。宽泛地看，社会主义者的团体合并在一起肯定是最好的。应该大力提倡各个团体克服小圈子意识，让大家都充分交流起来，把自己的观点充分展示，让不同的观点在理性务实的氛围之中充分碰撞。

-----以上皆摘引自少中评的几篇具代表性的文章，为简明扼要，仅个别用语缩减。选用文章见本纲五。

三批判：

A 思想上

1 能占领还是边缘化

2 工人与知识分子对比

3 社会主义 Gm 主力军：产业工人（流水线工人）的受剥削压迫的深重性、斗争的彻底性、组织性、集中性与规模化。

4 工人斗争怎样从自发到自觉

5 先锋队与工人群众组织关系

6 所谓左派及其联合

7 脑体分工的实意及其客观存在：主要与次要。脑力无产者与体力无产者的区别：利益获取、流动性、思想的斗争性、斗争的组织性、彻底性与动摇性。脑力无产者与体力无产者的斗争之组织和斗争工作实况。脑力无产者与体力无产者的占比关系及时代发展。生产自动化与脑力无产者、失业大军与工资的关系。脑力无产者将是无产阶级的主体吗？资本增殖的面对工资抬升的技术调整与空间调整。

8 Gm 投机：现处低潮，各干本职工作，一待到高潮马上回归事业。

9 Gm 知识青年的自我改造手段

10 当前工人工作的最需环节与推进的有效手段：工人小组。工人骨干的培养。马列主义的传播。厂外与厂内关系与力量配比。

11 工作的重点与力量配比策略：“到一切阶级中去”之反动性。斗争是平均主义投入力量的吗？斗争的主次客观实在性。

12 脑体对立消亡、生产力高科技化与社会主义建设与资本主义复辟的关系。脑体分工的技术性与生产关系性。苏联的官僚生产体制的问题。YCA 的变相唯生产力论。

13 从学生社团建设的实践角度批判少中评的占领论、知识分子 Gm 论。从左派的阶级成分分析左派联合的虚幻性。

.....

B 实践上

1 少中评有没有具体地发展出左翼知识分子社团，持续地组织化的培养出 Gm 知识青年？成效如何？少中评怎样占领了大学讲堂、报纸杂志、娱乐界，领导推动着哪些知识分子与学生群众组织？

2 少中评鼓吹的左派联合实况及社会主义政治组织的实况与趋势？

3 少中评的人员究竟有没有具体进厂打工调查了解与锻炼？

4 少中评的毕业后人员有没有直接或间接地给予工人斗争以理论、物资、人力、法律上的帮助？成效如何？

5 少中评鼓吹的 GM 知识青年社会主义者，脑力无产者的斗争实况如何？

6 生活中的少中评论论家们是怎样进行斗争的？

.....

C 科学严谨性上与行为特性上：

1 诡辩手法：先正面肯定下，然后转折但、然而.....，没有具体严谨的对比分析，分出好与坏的主次之分，以形式地辩证法来回避客观辩证地分析来实现对于重要事实的歪曲，片面的夸大。或者混淆问题实质，歪曲或绝对化夸大论敌的论点来误导读者如：“无限地夸大学生与普通工人的差异，不是把工人当做客观存在的力量，而是把工人当成一种偶像去崇拜！把工人无限理想化，认为工人中没有保守思想”。这压根不符合事实。我们从来没有认为工人是理想化的，从来没有把工人当作偶像去崇拜！举证时剥离事例的具体背景抽象化片面来来印证.....动不动举辩证法、辩证逻辑来标榜自己。

2 主观臆断：对工人的运动斗争与所需所长、特质没有具体实践的调查研究与了解，就妄下论断。

3 伪装成纯粹马列主义者，尤其拿列宁来套，进行变相修正。

.....

D 实质上造成的结果

误导左翼青年的自我改造认识与思想认识，宣传精英主义政治组织建设路线、有碍具体的工人群众工作、分散事业的推动力量去空谈

四少中派错误思想路线的现实基础与历史必然性。机会主义派别在无产解放事业中的必然性及其现实基础。

本质：机会主义派别。修正主义、上层精英路线，误导 Gm 左翼从思想上脱离眼前的工人阶级斗争，实践上走向精英上层路线而不是具体参与与推动无产阶级事业。

现实：“这些人只是把自身的脑力无产者地位作为逃避实际工作的借口，他们一方面强调极力抬高脑力无产者在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地位，另一方面又认识到在现阶段做脑力无产者的组织和斗争工作是基本没有希望的，这导致的结果就是把在脑力无产者群体之间的宣传工作（这些宣传不会对产业工人产生任何影响）看做是当前的主要工作和核心工作，也就是把夺取意识形态领导权，占领大学讲堂、报纸、网络看作是最主要的工作，这也是他们极力抬高葛兰西等人的根源所在。”

阶级根源：小资产阶级与工人贵族（官僚、所谓脑力无产者的中上层直至下层）

.....

五研究材料

YCA:

黑牛：社会主义者当前的问题和任务：<http://review.youngchina.org/archives/5019>

尘沙：对左翼青年进工厂问题的思考 <http://review.youngchina.org/archives/5054>

黑牛：是小资，还是脑力劳动无产者

郑玮：人人网左派青年之共识

批判方:

shzy 运动中的精英主义——评 YCA 《shzy 者当前的问题和任务》

<http://advancedyouth.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97>

为什么要到产业工人中去——四评

YCA <http://advancedyouth.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58&highlight=yca>

精英主义与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机会——二评

YCA <http://advancedyouth.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60>

所谓社会主义核心政治组织——三评

YCA <http://advancedyouth.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59>

《怎么办》的启示——也谈社会主义者当前的问题和任

务 <http://advancedyouth.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54>

春木：论不该迎合左翼青年的自大情绪兼谈先锋队理

论 <http://advancedyouth.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0>

柴风整理，欢迎批判阵营批评指正，欢迎少中评论家们用实际行动与继续的理论诡辩来印证本批判大纲。

新生代的胜利——裕元工人的团结斗争

潘毅（2014年5月6日）

又到了五一国际劳动节。今年，这个属于工人的节日，对于东莞裕元鞋厂的工人来说，有着不一样的意义：他们胜利了！从今年4月5日至今，他们追讨社保的集体行动已经持续了二十天，4万至6万人参与其中。与以往追讨欠薪、要求加工资的集体行动不同，这次罢工有一个划时代的鲜明特征：工人们为了争取社保而团结斗争。城市社会保险，包括养老、医疗、生育、工伤、失业，是维持一个城市无收入人士的基本生活的保障。这次行动代表着，农民工从农村早已进入城市，要求在城市中生存、生活下来，这是他们对于从农民工彻底转化为新工人的一种呐喊。

与很多人想象的场景不同，工人罢工并不是血雨腥风——没有打砸机器、破坏厂房，没有流血冲突，甚至连游行示威都体现出少有的温和。工人们每天早上按时到车间打卡，之后不上班，而是去逛街，或回宿舍睡觉。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劳动才是工厂的命脉，只要足够多人参与，停止工作就可以威胁老板。可是不暴力并不代表不愤怒。这种愤怒呈现在他们口号中：“还我社保！”“打倒台湾老板”“大陆人卖国求荣”。各个厂区里工人处处散扬着公开信、打油诗、传单。这次事件中，他们讨论激烈、行动团结、步调一致，在不同的意见中，工人向资方索要社保的要求达到了基本的共识。

近几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各地的劳资冲突、罢工事件也不断发生。而在这众多的罢工之中，裕元鞋厂的行动，坚持时间之长、参与人数之多、影响范围之广、行动之成熟和理性，都是近几年来不曾有过的。

社保，为什么那么重要？

裕元集团是一家台资企业，为耐克、阿迪达斯等世界名牌运动鞋的全球最大代工鞋厂，可谓制鞋业的富士康。其生产基地主要集中在中国、印尼、越南、柬埔寨和孟加拉。其中最大的一家厂区就是这次发生罢工的东莞市高埗镇厂区，建于1988年，现有约6万员工。

据裕元工人介绍，当得知缴纳了15年社保的老员工退休之后只能拿到每月4、500元的养老金，公司上上下下都感到震惊和质疑，陆续去社保局查询自己的社保缴费情况，才发现厂方缴交的社保额度不足。其中有一名老员工每月总收入3000元左右，厂里本应为他缴纳社保330元，但是工厂以东莞每年最低工资为基础缴纳社保，如以今年1810元的最低工资标准，每月才缴纳27.15元，而几年以前，每月900元的最低工资标准下，公司为他缴纳的社保只有十几元甚至更少。

工人们激怒了，决定在4月5日一起向台湾老板讨要说法，数千人在厂区主要路口设立路障拦住高管们的车辆，要求公司补齐所有社保金。以裕元集团公布的年报，裕元在东莞的6万工人，即使按3000元工资计算，厂里每月需要缴纳社保费总共应有近2千万元，但实际可能只缴纳了163万左右，这样一来，一年厂方欠下的社保费用少有2亿元。2013年裕元的净利润是42899万美元，约合25亿7千万人民币。这样算来，裕元厂是完全有可能为工人付清这几年来该交的社保费的。

这一要求是合理合法的，高管们也无法拒绝，答应在4月14日前做出答复。待到那天，工人们等来的答复却是历史欠账无法补缴，只能从本月开始足额缴纳，这再次引起了大家的强烈不满。八厂、三厂、六厂、一厂的3万工人开始罢工，行动逐渐蔓延，直到6万工人全部参与到罢工行动中。

被拖欠社保的不仅是流水线上的底层工人。实际上，级别、工资越高的员工，厂方欠下的社保是越多的。也就是说，除了台方高管，所有中高层管理的利益都被严重侵犯，这也是此次保卫社保的罢工行动能够有如此之大影响力的关键。

走不出的劳资矛盾

这次行动不是偶然的、孤立的，而是三十多年以来资本主导发展模式的必然产物。随着改革的深入，我国进一步卷入世界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跨国垄断资本充分进入国内，中国的生产方式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劳动关系的性质也随之发生了巨大转变。以利润为导向的企业被认为是唯一富有效率的经营组织方式，一切都是对经济成本和利润率的考量，劳动者被置于次要的地位，仅仅作为资本积累的商品而存在，可是内生于这种生产方式的劳资矛盾是尖锐而不可调和的。近些年来，从民间到官方似乎都一致地认为农民工的称谓已经不合时宜，一些地方开始将农民工改称“新市民”、“新公民”等。这些尝试没有具体政策配套，甚至连基本的社保都没有落实。理想与现实的这种落差，使得废除“农民工”的称谓仅仅是文字游戏而已。

对于提高农民工的待遇和保障，我们往往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一方面内需不足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需要提高劳动者的收入；另一方面又担心劳动者保障的提高会增加企业经营成本，从而影响经济发展。这种自相矛盾的原因在于我们没有意识到造成这一困局的根源正是这种发展模式本身。中国凭借大量廉价的劳动力，融入到全球资本主义产业链条之中，造就了“世界工厂”的地位。这种代价使中国工人处于相对剥夺的境地，代工厂里的劳动者并非同时作为消费者存在，他们制造的产品被销往欧美发达国家。由于无需考虑其购买力水平，他们的工资被压到最低限度。这种发展模式一方面强化了资本尤其是国际资本对劳动者的支配，另一方面低工资、低保障造成了经济增长条件下消费不足这一怪象，中国出口额的高速增长并没有带来劳动者处境的根本改善，他们创造的价值变成了跨国品牌的利润。

面对严酷的劳动条件，中国工人从来没有停止过回应和调整。90年代，流水线的生产为工人带来了身体和心灵的创伤，但比较可观收入遮蔽了工人这种痛苦的本质来源，因而当时工人只能用身体的反抗——尖叫和梦魇来表达自己的不满；2010年，正当苹果手机风靡全球的时候，富士康工人用跳楼的方式向世界宣告着他们对工厂生产体制的不满。也就是这个时候人们才知道，流水线上的工人每天站在同一个地方重复枯燥的工作十多个小时；他们每月只能拿到不到1000元的低微工资，生产iPhone的工人一年攒下的钱还买不起一台iPhone；他们背井离乡，逼迫和家人和孩子分离，社会网络支离破碎，这一种生产体制往往使得工人们感到无奈、焦虑和彷徨。

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样的吊诡：一方面是工厂对高精尖而昂贵产品不断的追求；另一方面是生产这种产品的工人的工作条件和待遇难以改善。以这次发生罢工的裕元鞋厂为例，根据工人的讲述，他们成型车间95个人，每天工作12个小时，必须生产2400双耐克鞋，工作强度之大可见一斑。根据裕元集团2012年年报，我们可大致算出，一双在的中国耐克或者阿迪达斯鞋，工人能得到的全部酬劳仅18.6元。而一双鞋的平均售价约为

620元，工人的薪酬仅仅占到了3%。这两大品牌在全球的巨大销量却无法给产线工人带来任何好处，相反，仅从裕元2010-2012年的年报可以看出，工人工资占生产成本的比重逐年降低，从2010年的20%下降至2012年的18.87%，占营业额的比重也同样降低。

在这样不对等的劳资关系中，裕元工人选择用团结的行动为这种吊诡打开一道口子。但这也是没有选择的选择——他们大多是离乡打工20余年的工人，随着城镇化的推进，他们在家乡的土地大多早已流转，工资成为他们所有生活来源，社保是他们没有工作时的唯一保障，特别是在所有生活资料——食物、医疗、住房等都成为市场上越卖越贵的商品时，他们不得不联合起来打破这种格局，走出劳资矛盾的困境。

十字路口的抉择

工人们已经在劳资矛盾中做出自己的选择，资方和地方政府，要如何在这一经济发展的十字路口中做出选择？

4月25日，裕元罢工事件发生的第20天，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终于第一次咱在工人立场上明确地声明，东莞裕元鞋厂确实存在未如实申报社保缴费的问题，并责令整改（这是在富士康跳楼事件都未曾有过的！）。这或许是一种进步。

社保不仅仅是一个生计问题，在裕元的事件中，我们看到了它蕴含着的生产关系双重性。在劳资双方博弈中，一方面资方是否能够按时足额的为工人缴纳社保，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在长期默许资方的侵权后能否有勇气做出调整。这个问题如果处理不好，一个单纯的劳资矛盾很容易转化为政治矛盾。同时，我们也看到，在争取劳动权益、提高工人地位、夺取劳动果实的过程中，只有通过工人们高度的团结、坚定的斗争才能取得一定的胜利。

根据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经济发展的核心和灵魂是活劳动。只有对于劳动价值的尊重、对劳动者权益的保障，才是经济发展之道。唯有从根本上反思资本主导的发展模式，赋予劳动者以法定权利和主体地位，才能真正使劳动群众真正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

薄熙来在法庭上的最后陈述

(红色中国网 2014 年 5 月 7 日转载)

薄熙来最后陈述 (2013 年 8 月 26 日)

首先我想讲一讲，王立军的叛逃在中外形成了恶劣的影响，给党和国家带来了影响上的损失，在这个过程中我严重误判，行为鲁莽，我深感愧疚。但是，我没有滥用职权之心，这个问题很大程度上是我思想修养上的问题。

几十年来，党组织给了我一切，我从内心对党充满感情。我在这里保证，我从未有贪占之心，更没有贪污受贿。“一要干活，二要干净”，这是多年来我给自己立下的行为准则，并始终身体力行。

我对人民群众是有感情的，对党是忠诚的，从无二心。过去的几十年，我烟酒不沾，衣食无求，日以继夜，只迷恋于工作，这是我唯一的精神享受。我一直在努力的工作以求回报民众的期待和上级的重托，这就是我人生的全部精神寄托。

我自知是个很不完善的人，我主观主义、自以为是；行事草率、脾气暴躁，我有严重的过失和错误。想到共和国之创业维艰，我身负重任却又错失连连，我深感自责。尤其听到我身边的人犯错，我在震惊之余也深感自己治家无方，治事无能，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的影响，我诚恳地接受组织的审查，也接受司法机关的审查，并借此机会向国人深深地致歉。

我自认水平不高，但处事清白，对我贪腐的指控是不实的，是绝对经不起历史检验的。

王立军叛逃，在美国领事馆滞留一天的事影响恶劣，在这之前我万不该情绪失控打了他一个耳光，这实在是很粗暴的。因此事而审查我顺理成章。但我绝没有想掩盖 11:15 案件而徇私枉法，当时我确实认为他想诬陷谷开来，并以此要挟我，是人品不好；我绝没有弄虚作假，企图搞个什么虚假医疗证明；而那个微博短信我更是一无所知。我绝没有逼走王立军的意思。

静下心来我也在想，一个巴掌就能打出一个叛国者？

现在事实逐渐浮出水面。他给谷开来私下写的那些悔过书，里面充斥着暗恋谷开来，情感纠结、深陷其中，难以自拔的疯话：“我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等等不堪入目令人作呕的肮脏话。他没想到我当场把那些信收走了。他还自己打自己八个耳光。他侵害了我的家庭，侵害了我的基本感情，他知道我的性格。这恐怕也是他叛逃的一个重要原因。

近来我才知道王立军对外边说我想进常委，想当总理。这都是在造谣，在编故事。众所周知，十七大以后中央的领导人选其实已经确定，李克强同志当总理是已经被大家所公认的。还说我想当“中国的普京”，他怎么没有说我想当“中国的奥巴马”？还说我有一个国内和国际的政治计划，十八大以后就要开始行动，还要和基辛格串通等等。前天在庭上的时候，他含糊其辞，心虚语颤，胡说八道，他就是硬着头皮要把水搅浑。

去年春节我就草拟过一封信，想请中央批准我在十八大以后继续效力重庆。为重庆人民再服务一届。以建成我梦想中的宜居重庆、森林重庆、健康重庆、平安重庆和畅通重庆。此信就在我家中，去抄家的人应该能够看到此信，中央也应该能看到此信。我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不是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我没有政治野心。

徐明对我儿子如果有资助，那是我失察少教，难辞其咎。子不教，父之过。但我对他受助的机票、住宿、购物等事均不知情。我经历过文化大革命；我知道党的纪律和传统；我生活是简朴的，我在继承我的家风。我绝不会为自己的儿子做些什么而使他成为一个纨绔子弟。

谷开来与徐明在尼斯房产的事，至今我也莫名其妙。我对此房的产权、价值、及经营运作过程概不知情。对此办案人员也都是认可的。办案人员只关心，并一再的追问我“你知道不知道这个事？”其实与我有关的关于尼斯房产的联系，只是在办案人员提示下，我说过“十年前有一次偶然我回家碰见徐明和谷开来，谷开来曾经对我提起过几句，我当时点了点头，微笑了一下”。其实对这个情节我毫无印象。

工程款一事，实际上此事早已在我脑中没有任何印象了，这个工程从预算到完工我都不在大连，我已到沈阳，在省里上班。几乎所有涉及工程款的情节，都是我在纪委受审查的时候办案人员提示给我的。经过两天的法庭质证，在座的也都应该清楚了：其实上级机关早已明确 500 万元工程款是拨给大连市政府的；在质证时王正刚的话也证实，在此之前我已经两次明确告诉他该工程的请款去找李永金。这些请法庭去查阅有关案卷。我以为此款的运行过程我已经讲清楚了，大连市是计划单列市，对此款我没有直接的管辖权。怎么可能既不询问又无嘱咐，还当着王正刚的面，在电话里毫无避讳地，明确要谷开来贪占此款，这完全不符合基本常识。王正刚还说当着他的面我打了电话。而谷开来的证词又和他的证词在时间，地点，谈话内容上相互矛盾。

对于唐肖林 3 次送钱物的事，完全子虚乌有。他十年前就是个投机倒卖、假话连篇的人，我不想对他的这些证词再做任何评论。

在过去 16 个月的审查中，中纪委和最高检对我的生活是照顾的，谈话是文明的，多数同志是有素养的，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对我是有压力的。这两各单位共组织了二、三百名精明强干的人，系统的排查我已往三十多年来的全部工作档案和人事关系。而且，他们告诉我，“对你的案子我们用的力量是最大的，而且困难越大，我们将投入的力量越大”，“中纪委查案的力量是世界第一”。

我坦然面对这些，我觉得这个调查是对我人生的大梳理、大盘点，我对自己的清白很有信心。三十年来，我没有接受过任何人的金钱，公务活动中的礼品全部交公，大家有机会可以到商务部去看一下；一黑一白两个大厅，每个大厅都比这个厅大两倍，礼品架上摆满了我在商务部长任上交公的所有礼品。

三十年来，我对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的所有的批示均为公事公办，全都可以登报公示。

由于我自己涉世不深、马虎大意、学识浅薄、工作上有不少疏失。我能力虽有限，但日以继夜，我已经尽力了。但是有一条，我从无贪占之心。我认为党和国家已经给了我一切，还那么重用我，把我这么一个无足轻重的人提拔到政治局，我真不觉得自己还缺什么，还要去贪什么。

我唯一感到纠结的是，这 16 个月，我不是在敌人的牢房，不是在接受国民党反动派的审判，而是在自己人的监狱。而与生俱来的那种强烈的情感使我有相信和服从组织的思维惯性。所以在中纪委和最高检对我的审讯阶段，办案人员不止一次跟我讲：“中央还是对你有包容，有期待的，只要你态度好，可以给你保留党籍，”“我们总要向全国人民有个交代吧。”这话季新华（？）跟我讲过，其他人也讲过，“什么是态度好？”“就是认几个大

单”。为换取组织的谅解，我违心的认过一些事，甚至我曾想过我应该为党而忘耻，以特殊的方式来为党再做一个特殊的贡献。

谁知道，随后就是开除党籍，开除公职，通报全国，移送司法，这个过程来的如此突然和迅猛，我感觉我仿佛上了一个流水线，一发而不能收。办案人员多次跟我讲：“组织的力量大着呢，不可能让你一点事也没有”。我自知在劫难逃，无力自拔，顺其自然吧，所以在我的内心有过软弱的时候。当办案人员提供给我一些情节，告诉我“掀过这一篇吧”，我就接受了。

办案人说，你好好的配合，组织上还准备给你留套房子。我在这里向法庭说，我个人没有一处房产，我回北京住的房子还是商务部分配给我的宿舍，产权是商务部的。我现在郑重表示，把它退还给商务部。办案人还对我说，你好好配合的话，组织还准备照顾你，给你留些钱。我在此向法庭庄严地声明：几十年来，除了我的工资，我没有收过用过任何人的钱。家里的所有的钱，都和我都没有关系，我以后也绝不会用那些钱。

我现在深陷牢狱之灾，百感交集，也只剩余生。

在此我想对金州的同志们，大连的同志们，对辽宁、对商务部和重庆的同志们说，我怀念和你们共同走过的路，这是心中的阳光。我从来没有欺骗过你们，我没有偷懒，我更没有谋私。平心而论，作为一个部级干部，我没有衣食之忧，党和人民已经给了我很多。我唯一的爱好就是做一个工作机器，服务国家和人民。

我想对亲爱的父亲、母亲在天之灵说，你们是我心中的神圣。

我想对兄弟姐妹们说，我绝不是贪腐分子，我没有辱没家风。我现在穿的棉毛裤还是妈妈 60 年代出国时给我买的，我的西服，我的夹克都是金州乡镇企业做的。

我想对望知、瓜瓜说，爸爸想念你们。

我也想对谷开来说，调整好自己的心态，来日方长。我最近还听到有人说，你收了不少钱，的确是不应该的，但是我也听说，你收的钱里边大部分是合法的。

我今年 64 岁了，我生于新中国诞生的前夜，一个新中国，一个改革开放，我是全程经历者。我热恋着我的祖国，党的事业融化在我的血液里。在我如痴如狂拼命工作的岁月中，光阴似箭，时不我待，我根本无暇关注那些蝇头小利。

尽管我无力回天，三十年的奋斗均已化作尘与土，童年的憧憬止于苍天落照，但我仍发自内心的祝福祖国的强盛，这是我源自童年的美好的憧憬。

好像是有人说我是大老虎，这次我被带到山东送审，也让我联想到武松打虎的故事。其实他们说错了，我是属牛的，我就是个是拉车的，是个干活的人。

我再次强调起诉书对我贪腐的指控，是严重失真的，失实的，绝对经不起历史的考验。我没管好家人和下属，我有大过，对不起党的培养和群众的鼓励，但是我个人是清白的。王立军叛逃我有责任，但他的叛逃绝不是我逼的，如果就这样认定的话，将会歪曲这段历史。

这次审判用了五天的时间，控辩双方都有机会充分发表意见，听说还用微博传出了信息，可在我出庭之前，还有办案人员告诫我说：“在法庭上你讲不了几句话的”。这表明了中央搞清事实，追求审判公正的决心。我感谢中央，也使我对中国司法的未来又增添了信心。

在这里的看守所，我的饮食，医疗都很好，今天早晨还吃了山东微山湖的鸭蛋，山东人厚道，没有落井下石，我在此一并表示感谢。对于中纪委和最高检的绝大多数办案人员，我认为是有素养的，是文明的，我予以肯定。谢谢！

我也特别感谢我的辩护人非常专业的辩护，谢谢！

中国的阶级力量对比正在起变化

远航一号（2014年5月13日）

五一国际劳动节之前，东莞台资裕元鞋厂的大罢工引起了中国所有进步政治派别的热切关注。东莞裕元工厂的罢工不是孤立的。据“非新闻”统计，今年4月份，全国爆发千人以上大规模群众性斗争148起，日均约5起。五一以来，至5月6日止，全国已爆发大规模群众性斗争25起，平均每天约4起。这些工人阶级以及其他各劳动阶级的斗争，标志着中国正在掀起一个工人斗争以及其它各种群众性斗争的高潮，标志着中国的阶级力量对比正在发生着重大的变化。

过去十几年，中国一直是世界资本主义积累的中心。中国资本主义的“繁荣”完全依靠对广大劳动者的残酷剥削以及对环境的疯狂破坏。在经过了上世纪九十年代的私有化以后，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取得了暂时的优势，在血汗工厂制度下积累起来的超额利润为中国的资本积累机器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血液。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统治的基础，首先是资产阶级占有着社会上绝大部分乃至全部的生产资料，掌握着劳动者的饭碗。资本家根据他们谋取利润的需要，可以决定给多少劳动者“饭碗”，给哪些“劳动者”饭碗。资产阶级对生产资料的独占（也就是生产资料私有制）是他们一切政治与社会权力的源泉。在此基础上，资产阶级又进一步控制着国家机器，并利用国家机器来镇压劳动者的反抗。

生产资料私有制以及资产阶级对国家机器的控制确保了在一般条件下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统治和剥削。然而，在此前提下，资本主义社会中日常的国民收入分配还是要通过经常的、反复的阶级斗争来决定的。

为了在日常的、反复的阶级斗争中占得上风，资本家的魔法库中有三件法器。第一件法器叫做“产业后备军”，就是尽可能地扩大失业和半失业的劳动者队伍，给在岗的劳动者造成很大的竞争压力，迫使在岗的劳动者接受较低的工资、较长的劳动时间、较高的劳动强度以及较为恶劣的劳动条件。

第二件法器叫做“提高资本有机构成”，通俗地说，就是用机器替代劳动，通过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减少单位经济产量所需要的劳动时间，来人为制造失业，从而达到增加产业后备军的效果。

第三件法器，就是依靠资产阶级国家的警察和军队镇压工人阶级的反抗斗争，在中国就叫做“维稳”。这是资产阶级在通过正常的“市场规律”无法有效遏制工人阶级反抗的情况下不得不用最后一招。

中国资本主义的现实发展，正在一步步地削弱着资产阶级上述三件法器的“法力”。

在当代中国，产业后备军赖以存在的主要形式就是生活在农村的数量庞大的所谓“剩余劳动力”。在经历了几十年的资本主义积累以后，中国农村的产业后备军已经开始枯竭。据官方统计，全国“农民工”总数（即来自农村的新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由1990年的约1亿增加到2013年的2.7亿，其中对于城市资本主义至关重要的“外出农民工”总数由1990年的2200万增加到2013年的1.7亿。

就增长速度来说，全国农民工总数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年平均增长5.9%；2001-2008年下降到了2.5%。2009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期间，全国农民工总数增长了1.9%。2010年，全国农民工总数的年增长率回升到5.4%；2011年，下降到了4.4%；2012年，下降到了3.9%；2013年，下降到了2.4%。

外出农民工总数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年平均增长率高达17.2%。外出农民工数量的极大增长是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繁荣的主要阶级基础。2001-2008年，外出农民工数量年平均增长3.6%。2009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期间，中国外出农民工数量的增长速度仍然达到了3.5%。2010年，外出农民工数量增长了5.5%；2011年，下降到了3.4%；2012年，下降到了3.0%；2013年，进一步下降到了只有1.7%。

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队伍的逐渐萎缩，中国新工人的斗争意识与斗争力量逐步提高，迫使资本家做出越来越大的让步。上世纪九十年代，外出农民工月平均工资的年平均增长速度约为13%。在扣除物价上涨以后，农民工实际工资的年平均增长速度约为5%。2000-2008年，外出农民工月平均工资的年平均增长速度约为8%，农民工实际工资的年平均增长速度约为6%，大大低于同期工商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

但是，从2009年以后，形势开始发生变化。2009年，外出农民工月平均工资比上年增长17.6%；当年平均物价水平下降，实际工资比上年增长18.3%。2010年，外出农民工名义工资和实际工资的上涨幅度分别为19.3%和16.0%；2011年，分别为21.2%和15.8%；2012年，分别为11.8%和9.2%；2013年，分别为13.9%和11.3%。

在中国工人阶级斗争的压力下，资本家在过去几年中已经不得不接受工资增长速度超过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的局面。当然，这种局面，是在中国资本家长期地、残酷地、超乎常规地压迫和剥削中国工人以后才开始出现的。尽管如此，这仍然是中国工人阶级力量不断增长在客观上的反映。

从国家统计局今年一季度的统计公报来看，目前这种形势还在持续发展中。今年一季度，外出农民工总数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7%，外出农民工月平均工资增长了10.1%，扣除物价上涨以后实际增长了7.7%，农民工工资总额增长

了11.8%，扣除物价上涨以后实际增长了9.4%，超过了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7.4%）。

中国资本家赖以残酷剥削工人阶级的另外两件法器也已经越来越不灵了。用机器替代劳动的方法需要消耗大量的能源、资源并产生大量环境污染。随着国际市场石油和其它资源产品价格的高涨，随着国内各劳动阶级反污染、保环境斗争的增长，资本家想要像过去那样随便地浪费资源、污染环境已经不太可能了。相应地，资本家使用机器替代劳动的成本也越来越高了。

资本家通过勾结各级政府，可以动用警察乃至军队镇压一些地方、一些工厂的工人斗争。然而，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工人斗争的经验已经证明，通过武力镇压的方法，资本家至多只能取得暂时的胜利。整个阶级力量对比正在发生对工人阶级越来越有利的变化，这个大趋势，资本家是改变不了的。一旦工人斗争普遍化、大量化，数量有限的资产阶级军警将陷入疲于奔命、无可奈何的窘境；而工人阶级的斗争则可以星火燎原、遍地开花。资产阶级军警的镇压，更可以教育广大的劳动群众以及先进知识分子，引导人民群众将一般的经济斗争逐步发展为更高水平的政治斗争。

按照现有的趋势，中国工人阶级的斗争还将继续发展。在斗争中，工人还可以取得新的胜利，迫使资本家做出更多、更大的让步。那么，我们是不是因此就可以得出结论，只要满足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日常经济斗争，中国工人就可以一步步过上好日子，甚至有朝一日当上“体面的”“城里人”、进入所谓“中产”的行列呢？

这样一种幻想，恰恰是中国工人阶级从现在起就必须警惕并打破的。只要资本家掌握着生产资料，资本家从事生产的唯一目的就是赚取利润。只有在能够赚取利润的前提下，资本家才会投资办厂，才会雇佣工人，给工人“饭碗”。在资本主义的一定发展时期，在资本家长时期地残酷剥削和压迫工人因而资本家的利润已经很高的时候，面对日益增长的工人斗争，资本家可能会暂时做出一些让步。但是，一旦当工人的斗争从根本上开始威胁到资本家利润的时候，资本家就会露出其狰狞的本来面目，比保护他们自己的老命还要更加疯狂地保护他们的利润。

在国际工人运动的历史上，欧洲的工人、北美的工人、日本的工人、南朝鲜的工人、我国台湾省的工人、东欧的工人、拉丁美洲的工人以及南非的工人、埃及的工人在这方面都曾经有过惨痛的教训。从工人运动的长远前途来说，改良主义是走不通的。

就中国资本主义的具体特点来说，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核心部门就是依靠剥削廉价劳动力、廉价资源并为跨国公司和帝国主义国家市场供应廉价制造业产品的出口制造业。一旦中国工人的斗争使得中国的制造业出口品不再“廉价”，那就是威胁到了大大小小资本家以及整个中国资本主义的命根子。

一旦出现了这样的威胁，资本家就会将工厂转移到世界上其它更加廉价的地区，会将资本转移到非生产性的、投机性的领域（以减少制造业局部的生产过剩），会雇佣警察乃至黑社会来镇压工人运动，会逮捕工人的领袖和积极分子，乃至人为制造经济危机，通过提高失业率的办法来打垮有组织的工人运动。

面对资产阶级的这些反革命伎俩，中国工人阶级应该怎么办呢？一种办法，走落后的外国工人阶级的老路，在进行了一个时期的改良主义斗争以后，面对资产阶级的反扑，缴枪投降，放弃斗争，听任资产阶级的摆布，他们想怎样“改革”就怎样“改革”，他们想怎样“紧缩”就怎样“紧缩”，忘掉“加薪”、忘掉“社保”、忘掉“八小时工作制”，甘心情愿做“人下人”。这样一种办法，难道属于伟大的中国工人阶级吗？

还有一种办法，向历史学习，向中国工人阶级自己的光荣先辈学习，不怕鬼、不信邪，让思想冲破牢笼，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敢于挑战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私有制以及整个的资本主义制度，将经济斗争引向政治斗争，再由一般的政治斗争发展为争取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

当然，要进行这样伟大的斗争，仅仅靠新工人自己的斗争是不行的，依靠受帝国主义影响的右派小资产阶级“劳工团体”的“指导”就更加没有前途。中国工人阶级斗争发展和胜利的首要条件是有社会主义觉悟的“老工人”与正在成长壮大的“新工人”的团结。在此基础上，中国工人阶级还承担着领导和团结包括城市小资产阶级在内的一切劳动群众的伟大历史使命。只要有了这样的、广泛的劳动群众的团结，再加上正确的政治方向，伟大的中国工人阶级就必然无往而不胜！

当前左翼内部两条路线的争论概述

（2014年5月15日，转自进步青年网）

进步青年网编者按：马克思主义诞生至今，一直是在和各种思潮的交锋中发展前进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政治点金之术，只有在与以工人阶级为主的劳动人民深入结合时，才能迸发出令资产阶级胆寒的批判力量。在中国资本主义矛盾日益深化、工人运动崭露头角的今天，认识当前左翼的重大思想争论和路线分歧，无疑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早在去年10月末，少年中国评论的网站和人人主页上就赫然发出两篇文章《对左翼青年进工厂问题的思考》和《论社会主义者当前的问题和任务》。然而，直到今年4月，才在网上引发了较为激烈的争论，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薄熙来重庆主政引发了左翼内部关于改良与革命的争论。这场争论使左翼正式分为了改良及革命两个阵营。无产阶级革命派与小资产阶级改良派划分了界限，这是好事。自薄熙来事件后，各大左派网站纷纷被关闭，原有的大山头也纷纷解体。有的即使换了面貌存在，其影响也都大不如前。在这种时候，原先并不起眼的少年中国评论开始兴起了。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没有了乌有之乡、毛泽东旗帜网、红色中国网，还有少年中国评论。于是，少年中国评论的影响力日趋上涨。影响既大，其心也必然变大。于是，少年中国评论终于在去年10月份发了重量级的带纲领性的文章。

这两篇文章的直接诱因在于其对当前少数学生进工厂做普通工人持有不同看法。大网站倒台以后，“革命派”内部在路途中又有了分支：一派主张目前左翼要更加深入到工人中去，依靠工人壮大社会主义的力量；另一派则主张主要是开展文化阵地战，争取知识分子（或者说脑力无产者），而对于工人则只需注意发现、培养其斗争中涌现出来的鼓动家、活动家而已。也许原来只是看法不同，而这两篇文章的发表则标志着看法的不同正式升级为路线的不同了。

这里不妨从这两篇文章中摘出一些话来，以便于做直接的分析。这两篇文章中，《论社会主义者当前的问题和任务》为纲领文章，而另一篇则不过是其脚注而已。所以本文着重于摘引这篇文章。

首先，作者黑牛认为工人运动还处于初级自发阶段、经济较为强劲、政治没有民主、左翼极不发展。“当前的工人运动才刚刚起步，发展非常不充分。罢工事件虽然时有发生，但工人组织的建立却非常困难，而工人如果没有组织，就很难不断积累斗争经验，提高斗争水平[引用过多的话是不是可以换一种字体以示区分，或者单独成段落？]。”“实事求是地看，中国的经济形势相对于危机

前的确不妙，但在全球哀鸿遍野的衰败情景的对比下，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就业率等等指标都是非常乐观的。而且，随着中国在相当多的行业成功地实现了产业升级，传统的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产业对印度东南亚国家又仍然保持着优势，因此顺利成为第一工业大国，并且已经以前所未有的步伐向第一工业强国迈进。”“但中国公民的各项民主权利仍然只是在纸上，在现实中，政治自由还是一句空话。而没有政治自由，工人运动的发展就受到很大的阻碍，社会主义宣传和组织工作也受到很大阻碍。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还未达到这种程度，因此也就没有这样的自由。”“左翼看起来声势浩大，但其中真正愿意地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出钱出力，甚至全身心投入其中的人，绝对是少数。以社会主义者当前的规模，尚不足以承担提高一个地区工人运动水平的任务，更不用说推动工人运动在全国层面的发展。”

其次，黑牛认为核心政治组织对于运动的发展极为重要。“社会主义者的核心政治组织的功能就是组织和协调各个受社会主义者领导的群众组织、潜伏在其他阶层中的社会主义者、以及同情社会主义的其他个人或组织，汇集他们的作用，以发展社会主义的力量。”也就是说，核心政治组织是运动的领导者、组织者。可是，当前左翼的情况却是较为松散、分散，“手工业”方式盛行，小团体意识盛行，而且能够真正愿意出钱出力的也少，离社会主义核心政治组织还差得远。“运动的不发展带来了列宁所说的‘手工业方式’的流行。在泛左翼全国性组织由于感召力下降而失去了对左翼运动的控制之后，各种小团体就流行了起来。现在的问题是，小团体不仅没能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的客观实际相结合，为当前的革命指出一条路来，即便说实际工作方面，也没有什么真正的成就。同时，小团体间也缺乏有效的联系。”“尽管小团体意识的存在也有其客观基础和一定的合理性，但如果小团体意识过于强烈，把小团体的利益放在整个运动之上，那就必然对社会主义者未来的联合造成阻碍。”

再次，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黑牛提出了当前的主要任务。“发展革命知识分子、向青年学生传播社会主义思想、进入各种各样的群众组织、发展工人革命家，促进全国性的社会主义者联合，以及确立现阶段的政治路线。”在这样的基础上，核心政治组织也就能够建立起来了。那么怎样发展革命知识分子呢？要点就在于占领文化阵地，并且要充分利用现有的合法空间去同青年学生开展文化交流活动。通过对现实和理论问题的探讨和交流来普及社会主义。“斗争的要点就是占领阵地。大学讲堂、报纸杂志、娱乐界等等都应该是我们占领的地方。”“宣传不是忽悠，社会主义者在群众中活动的时候，也一定要坚持理性客观的精神，以真诚的态度与群众交流，通过对现实和理论问题的研究和探讨等方式，逐步在群众中普及社会主义思想。”怎样促进全国性的社会主义者联合呢？是通过充分交流和争论。“联合的努力必须切合实际。应该大力提倡各个团体克服小圈子意识，让大家都充分交流起来，把自己的观点充分展示，让不同

的观点在理性务实的氛围之中充分碰撞。切勿乱扣帽子，把观点差异无限拔高为立场差异，把同志间的讨论变成敌对阶级间的相互攻击。”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黑牛对于工人运动和左翼学生进厂的看法。黑牛不但认为现在工人运动是自发的运动，而且左翼学生进厂也起不了什么作用。工人运动仍然会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自发地成长为工联的斗争。而号召学生下厂做工人工作则是盲动，是民粹主义。“不论这一斗争中有多少血泪，多少歌者诗人参与其中，或者多少学生扔掉学生证或者毕业证跑到工人中进行斗争的鼓动，工联斗争从整体上讲仍然必须被视为自发。”“但以现在左翼的实力来看，学生进工厂只能起到锻炼自己和增长经验的作用，而几乎起不到直接促进工人运动的作用。工人运动目前还处于自发斗争阶段。工人运动依自己的规律而发展，无论有多少左青进工厂，都不能使工人运动很快超越这个自发斗争阶段。”“今天中国的民粹派们，好像也正在发动声势浩大的‘到工厂去’运动。他们穿着工人的衣服，深入到车间、网吧和台球室，号召工人起来革命。”“新时代的工人阶级和觉悟的非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必须超越有心无脑的‘民粹主义’路线，要全面深刻地认识当代社会，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研究阶级关系中的新变化，在此基础上提出与当前革命现实先适应的马克思主义。”于是乎，我们有一个疑问来了，既然当前左翼青年下厂对于工人运动没什么大的作用，是近乎民粹主义的行为，那么还要不要做工人的工作呢？怎样才算是正确的呢？“社会主义者要做的不是直接去组织一般的工人，而是尽量发现、培养和保护工人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各种鼓动家和活动家。这些有斗争经验的工人就是运动最先进的部分。”“社会主义到底应该是自己去完成一个普通的工人活动家就能完成的事情，还是应该利用自己的社会资源，去做普通工人完成不了的事情：帮助他们实现职业化（而不会为了生计每天工作 11 小时），培养其社会主义的政治意识等等。”也就是说社会主义者的主要任务是继续发展知识分子，而对于工人则只需要去捞那些在运动中冒出来的鱼就行了。而这些运动中冒出的鱼经过社会主义者的教育和培养也成了进步知识分子，也就才成了将来先锋队的一员。

这两篇文章的观点不可谓不新颖，不可谓不大胆。要知道，要发表出依靠进步知识分子去建立一个无产阶级先锋队而且贬低进工厂做工人工作重要性的观点是要冒着背离马克思主义的风险的，是极有可能要背骂名的。可是仍然发，只能说明作者是深信不疑，也更说明了这样一种思潮根源之深和来势之猛。怎样建立无产阶级先锋队呢？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才能够建立先锋队。光有马克思主义却与工人运动相脱离那只能成为文化界思想界的一派而已。而没有能够真正懂得怎样做工人的思想工作、鼓动工作和组织工作的进步知识分子及进步工人队伍，就不能说有一支无产阶级先锋队。知识分子可以成为先锋队的一员，但是这只能在其思想和行动都已经完成了转化之后才能够实现。

于是乎，这样的观点引发了激烈的争论。有人接连发了几篇文章来进行论战。论战人的意思是相比于知识分子（或如黑牛所说的脑力无产者），工人（或体力工人）受到的压迫最深、受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最小，因而其最容易接受社会主义思想，而且革命性更加彻底。而知识分子即使认识到了社会主义终将取代资本主义，认识到了工人阶级才是最有力量的阶级，也仍然会由于所受压迫稍少、经济地位相对比体力工人高、组织性较差、受统治阶级影响较多（如精英意识）等原因斗争性和革命性都较弱。相比于知识分子，工人才是社会主义最肥沃的土壤。而左翼知识分子进入到工厂去也绝不是仅仅去做一个鼓动者，而是要进行思想工作、群众组织工作和鼓动工作。这几者缺一不可，否则仍然会使工人运动沿着自发的工联主义路线行走。而如果按照少年中国评论的办法，则工人运动必然要倾向于按照资本主义可接受的改良主义、工联主义的道路行走。须知资产阶级自由派也在盯着工人运动呢。

“学生和知识分子的工作虽然仍然是当前的重要工作，但是‘知识分子’（暂且沿用这个称呼吧）培养出来后，只有深入到工人中间做实际的灌输和组织工作才是有意义的（进不进厂要看实际的工作需要和个人选择）。gm[这个词统一吧？缩写或者全称]知识分子要深入到工厂和工人中去，在工厂中培养出有社会主义意识的 gm 工人小组，通过这些小组组织工人斗争，推动工人运动由自发走向自觉，并在此基础上，组建真正的社会主义核心政治组织，领导工人阶级的 gm 运动，这才是当前的主要任务。千千万万个工人生活的工厂中间，而不是任何其他地方（不论是网络还是‘主流’、‘大舞台’），才是社会主义者主要战斗的舞台。”

虽然我们需要做一切被统治阶级的工作，甚至要派人到统治阶级中去工作，但是在目前左翼力量弱小的情况，无疑应当先集中力量于工人当中。“有些人提出‘到一切阶级中去’的口号。抽象地讲这句话当然是没有问题的，不要说脑力无产者本身就是无产阶级的一份子，就是在资产阶级中间也需要有人去做工作。但是工作要根据不同阶段的实际情况区分主次，在当前左翼力量还很弱小的情况下，我们必然要集中主要力量到压迫最深，斗争精神最强，组织性最好的产业工人中去，这是我们的力量源泉和基础，其他任何工作都是围绕这一中心工作的辅助性工作。脑力无产者当然是无产阶级的一份子，但是这一群体只有在产业工人的斗争日趋高潮的时候，才会卷入进来，因而必然不是现在的主要工作。”

而少年中国评论之所以会如此突出知识分子中的宣传工作，则是因为“这些人只是把自身的脑力无产者地位作为逃避实际工作的借口，他们一方面强调极力抬高脑力无产者在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地位，另一方面又认识到在现阶段做脑力无产者的组织和斗争工作是基本没有希望的，这导致的结果就是把脑力无产者群体之间的宣传工作（这些宣传不会对产业工人产生任何影响）看做是当

前的主要工作和核心工作，也就是把夺取意识形态领导权，占领大学讲堂、报纸、网络看作是最主要的工作，这也是他们极力抬高葛兰西等人的根源所在。”

这场争论还在进行中。这场争论的展开是工作前进的标志，也必将促进工作的前进。既然两条路线的分野越来越明显，那么也就必将促使那些还没有真正想好以后怎么办的左翼青年们深入思考问题，也必将对于左翼知识分子的自我改造起到很好的作用！

参考资料：

YCA：

黑牛：社会主义者当前的问题和任务：<http://review.youngchina.org/archives/5019>

尘沙：对左翼青年进工厂问题的思考 <http://review.youngchina.org/archives/5054>

黑牛：是小资，还是脑力劳动无产者郑玮：人人网左派青年之共识

批判方：

shzy 运动中的精英主义——评 YCA 《shzy 者当前的问题和任务》
<http://advancedyouth.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97>

为什么要到产业工人中去——四评

YCA <http://advancedyouth.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58&highlight=yca>

精英主义与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机会——二评

YCA <http://advancedyouth.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60>

所谓社会主义核心政治组织——三评

YCA <http://advancedyouth.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59>

《怎么办》的启示——也谈社会主义者当前的问题和任

务 <http://advancedyouth.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54>

春木：论不该迎合左翼青年的自大情绪兼谈先锋队理

论 <http://advancedyouth.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0>

希望红色中国网成为未来的新《火星报》

郭松民（2014年6月6日）

原编注：红色中国网收到郭松民同志的来信“谈谈当代中国左翼的两大学术任务”以后，远航一号（李民骐）即给郭松民同志去信，就文中提出的两大学术任务提出一些个人意见。郭松民同志复信。根据郭松民同志的意见，下面将郭松民同志的复信发表。

民骐兄好，来信收到，所言甚是。我的这篇文章，还只是提出问题，并不是对问题本身的探讨。对这两个问题的讨论，需要全体左翼共同参与才好。

我个人认为，中国由于有文革的洗礼，又是现在的世界工厂，所以最有可能引领下一波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成为新的世界革命中心，中国左翼人士应该有这样的雄心和抱负。我的那篇文章如果在红中发表，建议把你这封信作为按语同时发表。

目前红中已经是理论水平最高，观察中国社会问题最深刻的网站，未来有可能成为新的《火星报》。

郭松民

附：远航一号致郭松民

松民兄，

来稿收到，所提问题重要。随后将在红色中国网重点推荐发表。

关于新社会主义问题，我个人拙见，恐怕还是理论与实践并行，而不是先有完善或较为完善的理论，再照着做。郭兄所说，未来社会主义依托人民民主

和计划经济，所言甚是。但社会主义公民社会一说，是否妥当，尚可商榷。我个人想法，至少在过渡时期，无产阶级专政还是不可少的。无产阶级专政，又如何保障至少是劳动者的个人自由，保障到什么程度，乃至在过渡时期，是否要部分保障资本家的财产权，都只能在实践中一步步来。

无产阶级专政也是无产阶级民主，在统一战线条件下，也是人民民主。但民主到什么程度，既取决于领袖、先锋队，也取决于群众，取决于群众的觉悟和组织程度。群众自组织程度高，就能限制领袖和先锋队的专制和退化。群众自组织程度低，有些事情也是没办法的，只能按历史规律走，波浪式前进。

除了无产阶级专政和计划经济以外，我个人意见，生态可持续性、限制物质消费将是未来社会主义的一个主要任务。关于这个问题，无论工农还是小资，目前恐怕还只有比较模糊的认识。绝大多数小资，恐怕还是幻想既要有美好的环境，还要有美国式消费。类似这样的问题，恐怕还是要靠未来事实教育。从现实讲，中国石油进口不可能无限增加下去，国产石油也会逐步减少。要解决这些问题，骂中石油没有用，只有根本改变消费方式，尤其是逐步取消以私人汽车为主的消费方式，依托电气化公共交通、自行车。即使如此，工业用石油还是少不了。但是这样的纲领（我叫它“生态社会主义专政”），至少在短期是难以为大众所理解，只能随着事实教育，逼到那里了，群众才会逐步觉悟。

其他问题也类似。许多问题，目前提出再好的设想，群众也未必会马上理解。有些开始理解（如重庆打黑），但形势不允许，群众也只能观望。但是形势比人强，各种矛盾在发展。矛盾爆发时，群众自己会提出要求，逼着各派政治力量向前走。如未来经济危机，资本家就要砸工人饭碗，欠薪、逃跑，工人就要斗争，资本家不见了，就要找政府。工人要生存工资、要社保，小资要房子、反污染，都要侵犯资本家利益。这些斗争，未来会普遍化。成本上升，利润下降，资本家不投资了，政府税收就没有着落。如果未来有群众运动，把地方政权拿过来了，还是同样的问题。无论左派还是右派，经济上或者靠资本家、或者发展公有制。如果群众逼着新政权满足他们的要求（工资、社保、住房、环保），资本家又不交税，或者逃跑，新政府又无地可卖，这就逼着新民主政权搞公有制。没有钱投资，就要考虑靠清算历史私有化来积累民主政权的第一桶金。第一桶金积累到了，公有制经济办起来了，局面稳住了，以后的发展会有自己的规律，就可以一步步向人民民主和计划经济靠拢。

去年交流，郭兄深为国家前途担心，忧虑未来四分五裂的问题。但是有些事情也是没办法的。新疆问题，现在体制下，谁有什么办法？就是毛主席再世，挽救新疆，也非一日之功。近期、中期，形势只能继续向坏的方向变化，新疆恐怕要叙利亚化、阿富汗化。长远来讲，也只有中原安定了，走上正途了，才能逐次解决好边疆问题。所以当下，恐怕还是以内地阶级斗争为重。

一些不成熟意见，仅供郭兄参考。顺祝郭兄在与炎黄丑类的战斗中取得新的胜利！

李民骐

是“传统社会主义”失败了，还是黎亚彬先生的“没有雇佣劳动关系的市场经济”失败了——兼谈二十一世纪的“新社会主义”

远航一号（2014年6月16日）

郭松民同志最近发表的《谈谈当代中国左翼的两大学术任务》一文特别是其中提出的中国左翼需要“新社会主义论”的设想在各方面的左派同志和朋友中都引起了强烈反响。巩献田老师和其他一些同志已经针对郭松民同志的文章发表了商榷意见。刚刚看到，目前在海南省海口市的黎亚彬先生也参加了讨论。黎先生的文章除了批评巩老师以外，主要是认为，“传统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失败了，“全民所有制计划经济”失败了，未来的社会主义必须是既有“自由民主”，又以“没有雇佣劳动关系的市场经济”为基础。黎先生的文章，除了在一些左派朋友中传播以外，自由派的共识网也转载了，可见黎先生的文章确实提出了一些重要问题。

本来，郭松民同志的文章发表后，笔者一直想联系郭松民同志所提出的问题，就当代中国社会主义问题谈谈拙见。现在既然黎先生的文章也提出了一些重要问题，不妨就结合黎先生的文章，就新、旧社会主义等问题综合地陈述一下我个人的看法，供各位同志和朋友参考和批评。

“旧社会主义”失败了，那么资本主义呢？

郭松民同志并没有说“旧社会主义”失败了。我理解，郭松民同志所说的“新社会主义”主要是说，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需要适应新的历史条件、能够解决新的历史矛盾的、新时代的社会主义。另一方面，对于黎先生以及左面的和右面的很多朋友（或敌人）来说，确实是认为旧社会主义或者说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已经无可挽回地失败了，并且失败得很惨，甚至于在历史上没有留下什么正面的东西（至少黎先生没有强调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是否还有什么正面的东西值得二十一世纪的社会主义继承）。

就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在历史上已经不复存在来说（我个人不认为现在的朝鲜在任何意义上可以称为社会主义，这与坚决支持朝鲜国家和人民的反帝、反大国压迫的斗争并不矛盾；而古巴也正在发生重大变化），那么确实可以说“旧社会主义”已经失败了。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资本主义成功了吗？

二十世纪社会主义的危机发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但是那个危机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当时整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危机的一部分。还记得六十年代吗？还记得1968年吗？1968年以后发生了什么？不仅是历史社会主义国家纷纷陷入危机，而且整个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外围和半外围都陷入了危机。拉丁美洲的进口替代工业化陷入了危机。到了八十年代，就成了“失去的十年”。后来发现，拉丁美洲失去了何止十年？上世纪六十年代，非洲的问题还是“有增长无发展”；到了七十年代以后，索性连增长也几乎没有了。从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后，整个中东地区基本上就处于不间断的经济和政治危机之中。南亚（差不多占全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除了印度以外，其它如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基本上都是“失败国家”；而印度有至少一半左右的人口没有从经济增长中受益，毛泽东主义游击队的影响范围达国土三分之一。这是成功吗？东南亚的情况稍好

一些。如果不是沾中国的光，恐怕大多数东南亚国家在1997年经济危机以后也会一蹶不振。即使如此，泰国目前也在向失败国家方向发展。概括起来说，自二十世纪中晚期以来，绝大多数外围和半外围国家曾经尝试过的各种所谓“发展模式”或者已经失败了或者正在失败中（如“进口替代工业化”，已经弃而不用；再如各种新自由主义变种，或者被当地人民抛弃或者虽然尚未抛弃，却已经造成了各式各样的“失败国家”）。

或许有的朋友会有不同意见，认为“四小龙”是成功范例。这里姑且不说“四小龙”兴起的各种特殊历史条件。就以“四小龙”中人口和领土面积稍具规模的台湾和韩国来说，他们曾经赖以崛起的高度国家干预的“发展主义国家”模式（实际上就是依托强有力军事独裁政权的准计划经济）现在还在上述两地实行吗？为什么不呢？

如果说，外围和半外围资本主义国家的各种各样的发展模式都在失败之列，那么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核心国家（也就是“帝国主义国家”或者说所谓的“发达国家”）又怎么样呢？1979年撒切尔夫人在英国上台、1980年里根在美国上台以后，即在英美两国积极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也就宣告了此前在西方各资本主义国家流行的凯恩斯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模式的破产。自此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各国在战后一度出现的贫富差距逐步缩小的趋势被逆转，西方各国工人阶级不仅相对贫困化而且绝对贫困化，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经济危机也卷土重来。从这个意义上说，曾经流行一时、现在仍然被一些“左派”人士所向往的社会民主主义资本主义也已经失败了。况且，那也可以算做一种“旧社会主义”吧。布莱尔的“第三条道路”不就是要与“旧的”工党社会主义决裂吗？

不是还有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吗？大萧条和两次世界大战能不能宣告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彻底破产呢？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新自由主义在经济理念上企图恢复十九世纪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这在实际上当然是不可能的），已经造成了战后空前未有的经济大危机。虽然新自由主义的体制目前还在勉强维持，随着各种经济和社会矛盾的发展，最后被各国人民抛弃，是早晚的事情。这一点，或许黎亚彬先生也是不怀疑的。

所以，如果说，“旧社会主义”失败了的话，旧的或者“新的”资本主义也已经纷纷失败了。社会民主主义没有失败吗，没有被抛弃吗？发展主义国家没有失败吗，没有被抛弃吗？进口替代工业化没有失败吗，没有被抛弃吗？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没有失败吗，没有被抛弃吗？新自由主义没有失败吗，没有已经造成巨大的灾难吗？这样说来，一切在现代社会曾经流行过的主要经济模式，在历史上都曾经至少失败过一次。一切都失败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出路何在？是不是准备无所作为，坐下来等死呢？

那么，黎亚彬先生所钟意的“没有雇佣劳动关系的市场经济”又怎样呢？恕我直言。黎先生这样的“市场社会主义”理想，如果放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或许勉强还可以算一种“先进”思想。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黎先生重拾“没有雇佣劳动关系的市场经济”的牙慧，实在是令人联想起“不知有汉，何论魏晋”。黎先生还记得南斯拉夫吗？那可是“工人自治”的市场经济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至少在苏联、中国两个大国以及全世界五分之二的面积、三分之一的人口长期实践过，其中在苏联实行了半个多世纪。“市场社会主义”呢？这里面，难道没有客观规律可循吗？

“旧社会主义”真的失败了吗？

黎亚彬先生认定，传统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失败了。这里有一个问题，是人们的意识决定社会存在，还是反过来？略有马克思主义常识的人都知道，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要了解“旧社会主义”的成败，

就要到二十世纪及其之前的实际存在的世界历史条件中去寻找根据，并据此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嬗变；而不是从书本出发，并将丰富多彩的世界历史现实硬套在往往是被阉割了的各种理论框框里。

那么，在这个意义上，“旧社会主义”到底“旧”在哪里？实际上，了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人都知道，无论是列宁的、斯大林的还是毛泽东的社会主义都是相对于国际共运此前理论和实践的巨大创新，都在一定程度上了回答了马克思、恩格斯回答不了或者不曾设想的世界历史的新问题。

这个新问题就是，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广大的外围和半外围地区，一方面，由于帝国主义的剥削，资本主义得不到正常发展；另一方面，旧的统治阶级（无论是“封建的”还是已经“西化的”）都不能够建立资本积累（也就是所谓“现代化”）所需要的基本的社会和经济条件，也不能够建立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范围内正常的、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在旧统治阶级完全无力承担这样的历史任务的情况下，这个历史任务最后由俄国和中国的被压迫、被剥削劳动群众承担起来了，并因此造成了有利于整个外围和半外围地区发展的世界历史条件。这就是二十世纪“旧社会主义”在历史上存在的基本根据。

“旧社会主义”有没有完成它被赋予的这个历史任务呢？讨论社会、经济问题，还是要用数据说话。表一列举了前社会主义国家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历史上各个时期按照人口平均计算的经济增长速度。为了减少不必要的争议，表中数据不是依据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官方数据而是来自权威西方学者。

表一 世界各国人均 GDP 增长速度，1870-2008 年

	1870-1913	1913-1950	1950-1970	1970-1990	1990-2008
中国	0.1%	-0.6%	2.8%	4.5%	7.4%
前苏联	1.1%	1.8%	3.4%	1.1%	0.8%
东欧	1.4%	0.6%	3.6%	1.2%	2.6%
美国	1.8%	1.6%	2.3%	2.2%	1.7%
英国	1.0%	0.9%	2.2%	2.1%	2.1%
德国	1.6%	0.2%	5.3%	1.9%	1.5%
法国	1.5%	1.1%	4.0%	2.2%	1.3%
意大利	0.9%	1.1%	3.5%	1.8%	2.0%
日本	1.5%	0.9%	8.4%	3.4%	1.1%
印度	0.5%	-0.2%	1.7%	2.1%	4.7%
西欧	1.3%	0.8%	4.1%	2.3%	1.7%
西方衍生国	1.8%	1.6%	2.3%	2.2%	1.7%
拉丁美洲	1.9%	1.4%	2.4%	1.2%	1.8%
16 个东亚大国	0.5%	-0.0%	3.9%	3.3%	4.2%
30 个东亚小国	0.8%	-0.2%	1.7%	1.5%	3.0%
西亚	0.8%	1.5%	4.1%	1.0%	2.0%
非洲	0.6%	0.9%	2.1%	0.3%	1.2%
世界平均	1.3%	0.9%	2.9%	1.6%	2.2%

资料来源：麦迪逊，《世界经济历史统计》。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前苏联（当时即沙皇俄国）和东欧各国的经济有所增长，但是增长速度落后于除英国以外的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也落后于拉丁美洲。仅仅由于亚非广大地区在这个时期几乎没有什么经济增长，沙皇俄国和东欧各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才勉强处于世界平均水平。至于中国，在这个时期基本上处于完全停滞的状态，说明虽然有过所谓的“洋务运动”，但是腐朽的清王朝完全没有能力启动中国的现代资本积累。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东欧各国取得了民族独立，初步建立了资本主义制度。然而，在 1913-1950 年期间，东欧各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不仅大大放慢，而且显著低于这一时期的世界平均水平。至于中国，在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统治时期，完全无力保障国家的独立和基本安全，少量的工业建设成就掩盖不了整体的经济失败，人均收入水平甚至低于满清后期。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前，无论是东欧的资本主义社会还是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实际上即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外围社会）在资本积累和民族国家建设方面都是失败的。

相比之下，在 1913-1950 年期间，虽然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严重破坏，十月革命以后又有十四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和为时三年的残酷内战，但是依靠仅仅两个五年计划，苏联就完成了基本工业化，取得了当时世界上最快的经济增长速度。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 1950-1970 年，世界各国的经济增长速度都有所加快。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苏联和东欧各国在这个时期的经济增长速度，落后于日本、德国、法国，与意大利基本相当，好于美国、英国，也好于经济发展水平类似的拉丁美洲各国。持平而论，苏联和东欧各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在这个时期属于世界中上水平。

中国在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速度基本上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与周边国家相比，慢于日本和东亚“四小龙”，但是大大好过历史条件、人口规模相当的印度、巴基斯坦等国，与东南亚诸国大致相当。更主要的，在这个时期，中国第一次实现了现代的、按照几何级数的经济增长。自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完全制止了中国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相对地位每况愈下的长期历史衰落，为后来的经济崛起奠定了坚实基础。

1970-1990 年，苏联和东欧各国的经济遇到重大困难，经济增长速度显著放慢。然而，在这一时期，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也大大放慢了。西亚、拉丁美洲、非洲经济增长速度大幅度下跌的程度不亚于苏联和东欧各国。实际上，苏联和东欧各国在这个时期所遭遇的危机并非社会主义国家特有的危机，而是当时整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大多数外围和半外围国家所面临的危机。

危机引起各国社会矛盾激化。各国统治阶级以此为“契机”，有的在西方帝国主义的压力下，有的则是主动“改革开放”，纷纷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大搞市场化、私有化。其根本原因，不是什么市场经济的“高效率”，而是通过市场化、私有化来彻底撕毁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度形成的比较进步的“社会契约”，从而通过大大降低劳动力成本（也就是大大降低各国人民的生活水平）的方法来恢复资本家的利润率，进而提高“出口竞争力”，重新加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而对于前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战后一度形成的对劳动人民比较有利的根本“社会契约”就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这样的“向底线竞赛”到底是社会主义的失败还是资本主义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呢？

中国在这个时期的经济表现比较有意思。就 1970-1990 年的整个时期来说，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属于世界上各主要国家中最快的。其中，1970-1980 年间，中国人均收入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 3.1%；同期，世界人均收入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 1.9%。1980-1990 年，中国人均收入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 5.8%，世界人均收入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 1.3%。

在 1970-1980 年间，中国实行的是完全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制度。1980-1990 年间，中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公有制经济仍然占优势地位，主要物资、价格以及大的投资项目仍然由计划调控。也就是说，在实行完全或半计划经济的条件下，中国已经取得了世界上比较上乘的经济增长速度。如果说，中国在这个时期的计划经济失败了，那么世界上绝大多数经济增长速度比中国慢甚至负增长的市场经济国家，算不算失败呢？

1990 年以后，中国走上了“市场经济”的道路，经济增长速度确实加快了。当然，在过去二十多年中，中国为了经济增长在社会和环境方面付出了巨大代价。东欧各国资本主义复辟以后，经济增长速度与 1970-1990 年相比有所加快，但是并没有达到 1950-1970 年间的水平。可见对于东欧各国来说，经济发展也不是“一私就灵”。至于前苏联，资本主义复辟以后，经济增长陷入了历史上最差的低谷。到目前为止，苏联时期仍然是前苏联整个历史上经济发展最快、最好的时期。至少对于前苏联来说，市场经济还没有表现出任何的优越性。

综合来看，各个前社会主义国家在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时期，在经济增长速度方面，有时领先于资本主义国家，有时落后于资本主义国家，在有的历史时期是全世界最快的，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不是全世界最差的。在实行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以后，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普遍地大大超过以往历史上的任何时期；而在发生了资本主义复辟以后，经济增长速度有的有所加快，有的则大幅度放慢。

如果做一个比较平实的结论，现有证据足以表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在推动经济发展方面，其平均表现不逊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平均表现。这应当不算夸张吧？

“旧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人均收入水平的增长速度仅仅是反映了一个国家物质生产和消费能力的变化，并不足以综合反映一国人口的生活质量。特别是对于外围和半外围国家的人民来说，人均预期寿命往往能够更全面地反映一国人口物质和非物质生活水平综合作用的结果，还可以间接反映社会不平等程度以及妇女的社会地位。

表二比较了若干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历年人均预期寿命的变化。为了供读者参考，朝鲜的相关数据也列在其中。

在 1960-1980 年间，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提高了整整 23 岁。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从世界各国中最低的之一一跃而为当时世界上的中上水平，基本上赶上了六十年代初发达国家的水平。这是毛泽东时代中国所创造的人口健康水平跃进的奇迹！相比之下，1990-2008 年，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仅仅增加了 6 岁，增长幅度慢于东亚其它国家、拉丁美洲和南亚，而与撒哈拉以南非洲相当。

1990 年以后，古巴虽然经历了严重困难，但是在相当一个时期中，维持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方面。至今，古巴的人均预期寿命不仅大大高于邻近的资本主义国家（如与自己自然地理条件相当、隔海相望的海地），而且与美国相当。这不能不说是社会主义创造的又一个奇迹！

另一方面，还在苏联时期，俄罗斯联邦的人均预期寿命就已经陷入停滞。不过，在资本主义复辟以后，情况更加糟糕，俄罗斯一度出现了和平时期人均预期寿命大幅度下降的巨大悲剧。或许，对于俄罗斯人民来说，除了社会经济制度以外，地理、气候以及长期形成的文化（如酗酒问题）也是决定人口健康水平的重要因素。

综合来看，至少在低收入国家，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在满足人口基本需要以及提高劳动人民综合生活质量方面，有着无比可比拟的优越性。

基于上述历史事实，对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历史实际表现，我们至少可以做出以下一些结论：

第一，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出色地完成了它被赋予的历史使命，那就是在若干外围和半外围国家，以人民大革命的形式，彻底扫荡腐朽的、旧的统治阶级，建立独立自主的、崭新的民族国家，并为现代资本积累准备了一切必要条件。

第二，在完成上述历史任务的同时，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还迫使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和世界资产阶级做出重大让步，不得不对西方工人阶级实行阶级妥协，不得不接受广大亚非国家的民族解放，为广大外围和半外围国家的发展争取到了历史上最有利的条件。

第三，在各个历史时期，平均来说，各社会主义国家取得了不逊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

第四，历史上的社会主义国家虽然没有彻底消灭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现象，但是由于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又消灭了市场经济的无政府状态以及市场竞争所导致的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自发趋势，确实大大缩小了收入和财富方面的不平等。就大面积、大规模人口、长时间的实践来说，二十世纪社会主义可以称之为有阶级社会以来人类所创立的最为平等的社会经济制度。

第五，历史上的社会主义国家完全或者基本上实现了“充分就业”，实现并且保障了所有劳动者的劳动权。在现代历史条件下，这是一个重大的成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无法比拟的一个重大优越性。

第六，历史上的社会主义国家完全或者基本上为全体人口提供了免费或近乎免费的基本医疗和教育服务，为劳动者提供了一定经济发展水平下最有利的发展条件。只有少数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实行了类似的政策。

第七，在部分社会主义国家，初步尝试了在企业或者更高级别的工人民主管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分别出现过“苏维埃”、“文化革命委员会”等形式的群众民主组织或政权机关，初步实践了劳动者参与政治和经济管理的权利。

第八，社会主义国家在科学技术和文化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苏联在教育和文化方面的巨大成就，举世公认。苏联和中国在个别的科学技术领域赶超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水平。

第九，需要指出的是，历史上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在没有剥削和掠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外围国家，更没有屠杀整个大陆的人口并掠夺其资源的情况下取得上述成就的。各社会主义国家是在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包围并不得不与后者展开军备竞赛的情况下取得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方面成就。

根据以上各项历史事实，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同等经济发展水平条件下，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可以给一般劳动者提供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相比更加有利的发展条件。甚至可以讲，自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的整个历史上，还没有出现过比二十世纪社会主义更加平等、对普通劳动者更加有利的社会经济制度。

所有这些“旧社会主义”的伟大历史成就，不仅是二十世纪的，而且也完全值得二十一世纪的“新社会主义”继承。

表二 世界各国人均预期寿命（岁），1960-2012年

	1960年	1970年	1980年	1990年	2000年	2012年
中国	44	63	67	69	72	75
朝鲜	51	59	66	69	65	70
韩国	53	62	66	71	76	81
印度	41	49	55	59	62	66
俄罗斯联邦	66	68	67	69	65	70
欧洲联盟	69	71	73	75	77	81
古巴	64	70	74	75	77	79
美国	70	71	74	75	77	79
墨西哥	57	61	67	71	74	77
海地	42	47	51	54	57	63
东亚和太平洋地区	48	62	66	69	72	75
欧洲和中亚	67	69	70	72	73	77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56	60	65	68	72	75
中东和北非	47	53	59	66	70	72
北美洲	70	71	74	75	77	79
南亚	42	49	55	59	63	67
撒哈拉以南非洲	40	44	48	50	50	56
世界平均	52	60	63	66	68	71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红色中国
redchinacn.net

计划与市场

黎亚彬先生用了很长的篇幅，来论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然是“事实上的奴役制度”以及必然“崩塌、垮台”。姑且将黎先生比较经典的论述照抄如下，以备读者查询：

但是，传统社会主义的那种全民所有制计划经济的做法，却从根本上葬送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切目标、行为和计划。这种全民所有制计划经济的思想 and 做法要求人民在一种所有人都要无私奉献、一心为公、各尽所能、计划生产、按需分配的方式和环境下生产与生活。这看上去似乎并不排斥人民的自由与民主权利，但问题是这种生产方式无法有效满足劳动者个人的生产与生活需要，全国所有人民需要消费什么产品、人民能生产什么产品、具体怎样进行一种产品的生产、生产多少产品等等几乎所有经济上的问题都需要通过一个计划中心来安排和决定。显然，人民自身的生活与生活需要是千奇百怪、多种多样、变化多端的，任何的计划中心都根本不可能安排和决定好所有人民的生产与生活事务，不可能让所有人民都满意。因此，一些人民就会通过其他的方式和途径去实现自身更好的生产与生活需要。因此，一旦人民有了自由与民主的权利，可以自由从事生产与生活活动，那么这种全民所有制计划经济的生产方式就会崩塌、垮台，进而整个的社会主义大厦也会崩塌垮台。因此，实际上，对自由民主权利的排斥反映的只是全民所有制计划经济方式的弊端。在这种全民所有制计划经济的生产方式下，为了维持其“社会主义大厦”的稳定与存在，国家和政府都不得不去限制人民的自由与民主权利，都不得不通过某种宗教的方式，向人民灌输“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等无私奉献的共产主义精神，通过让人民放弃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放弃自由与民主权利，一心意为国家服务，绝对、无条件地服从于国家的统一计划、管理和安排的方式才能维持下去。显然，这根本就不是共产主义，而只是某种事实上的奴役制度。

黎先生的这一大段关于计划经济的评述在很大程度上不符合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在历史上的实际情况，说这段话充满了无知和对历史的歪曲，亦不为过。

黎先生说，“全民所有制计划经济”要求“所有人都要无私奉献、一心为公、各尽所能、计划生产、按需分配”。在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尤其是在苏联社会主义初期以及中国社会主义的毛泽东时期，确实从政治上、思想上鼓励广大的劳动者、特别是共产党员为共产主义的理想奋斗，但是从来没有要求“所有人”都按照共产主义的标准来从事社会和经济行为。黎先生或许还记得，社会主义社会的分配原则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而不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在实践中，不能说社会主义社会中所有的人都能做到“大公无私”，但是说在计划经济时期，劳动者中至少有一个相当数量的少数（大致三分之一）可以经常做到比较自觉地为了全社会或者集体的共同利益而劳动乃至发明创造以及在各种场合自觉维护社会或集体的利益（比如见义勇为、保护国家和集体的财产），这大约是符合历史事实的。此外，另外有三分之一或者更多的劳动者，在当时可以做到基本符合社会主义社会的道德和行为规范，其劳动质量和水平能够达到当时社会所认可的正常水平。剩下的三分之一不到的比较“落后”的劳动者，可能会有“偷懒”的行为，占一些国家和集体的“小便宜”，但是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大环境下，又受到社会上大多数劳动者的监督，行为、做事仍然不至于完全没有顾忌，仍然要有“底线”，不可能完全胡来。这样一种好人得到表彰、得到鼓励、得到发扬光大，多数人争做好人，而坏人被限制、被鄙视、被边缘化的社会，难道不是胜过人人自私自利、相互比滥、没有“底线”日甚一日的所谓“自由社会”一千倍、一万倍吗？

当然，黎先生要说，只要没有“自由”和“民主”，社会主义就只能是“事实上的奴役制度”。这位黎先生大概是哈耶克的垃圾读多了，以至于错把哈耶克的教条当成社会主义的经典了。所以，与黎先生一起探讨一下哈耶克奉为至高无上的“市场”或许是有益的。

黎先生说，“人民自身的生活与生活需要是千奇百怪、多种多样、变化多端的”。我不理解在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人民群众的生活需要为什么要“千奇百怪”。这里姑且不与黎先生探讨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常识，那就是人们的物质需要从来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由一定的物质生产条件、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所决定的。也不与黎先生探讨现代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常识，那就是在垄断资本主义的条件下，所谓的“千奇百怪、多种多样、变化多端的”消费者“需求”几乎无一不是垄断资本为了攫取垄断利润、将大量社会资源浪费在广告、市场营销、人为制造消费品的“更新换代”等非生产性活动以后“创造”或者“刺激”出来的。几乎没有一种重大消费品的需求是消费者在市场上主动“引导”出来的，更不必说由消费者通过民主讨论的方式决定了。

这里主要与黎先生探讨一下“市场”。黎先生说，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全国所有人民需要消费什么产品、人民能生产什么产品、具体怎样进行一种产品的生产、生产多少产品等等几乎所有经济上的问题都需要通过一个计划中心来安排和决定。”黎先生夸张了。即使是在高度集中的苏联式计划经济中，也从来不是只有一个“计划中心”，而是有“条条块块”，有各部委和各加盟共和国，各自有各自的计划，企业有企业的计划，国家计委只是起一个总体协调的作用。至于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实践中，计划的制定还要经过从中央到基层的“三上三下”，反复征求意见，反复修改。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甚至普通的工人也可以根据国家计划总的精神参与本单位计划制定与完成的讨论。

还是说“市场”。黎先生所说的问题，人民需要消费什么、生产什么、怎样生产、生产多少，市场经济不是一样需要解决吗？问一个黎先生以及各位市场拜物教教徒或许以为是弱智的问题。我们怎样知道，市场经济解决这些问题会比计划经济解决得更好呢？

啊哈！哈耶克！哦，不，哈耶克的祖宗是亚当·斯密，是“看不见的手”。斯密当年面临的问题其实是这样的。与黎先生所忧虑的相反，斯密并没有担忧如果要求人人都“大公无私”就会失去“自由”和“民主”，斯密所担忧的是，在一个复杂的社会经济系统中，社会福利水平取决于千千万万不同的个人相互之间的协调。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当然是自私的，并且，资本主义的“理性经济人”追求并且只追求私利。这样，我们怎样知道资本主义市场实际造成的社会和经济后果会是“最优”的呢？斯密的答案是，通过“看不见的手”或曰“自由放任”条件下的市场。

但是，为什么？斯密的论证是粗糙的，甚至可以说根本就没有论证。一直到二十世纪中期，现代的新古典派经济学家才用了一些故弄玄虚的数学手段，算是证明了在一系列严格的数学假设条件下，“完全竞争”市场可以导致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在理论上，这其实与在理想情况下，完全计划经济可以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一样有价值或者无价值。没有任何头脑稍微清醒的经济学家会认为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或者任何形式的市场经济）能够在实际上接近“完全竞争”市场所需要的条件。

主张自由市场经济的“大家”，如哈耶克、弗里德曼等实际上都是秉持这样的信念，在人人都追求私利这个千古不变的“人性”注定的条件下，人们市场中受着价格的引导。价格起着“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一方面传递着信息（一件商品所包含的社会收益以及生产成本），另一方面也起着物质激励的作用。价格上升，代表社会需求上升（更加符合社会利益），从而引导生产者更多地生产。生产者的成本上升了，而价格暂时没有变化，这时生产者就会退出，迫使价格上升，从而更准确地反映一种商品的真实社会成本。

这一切听起来都很不错。但是，如果价格传递的信息（与计划经济中企业向地方、地方向中央传递的信息一样）是不完整的、缺失的，又会怎样呢？如果价格传递的信息不仅是不完整的，而且根本是错误的、扭曲的（不是政府或者工会造成的扭曲，而是市场本身的扭曲），又会怎样呢？如果价格不是正确地反映社会收益和成本，而是拼命引导一大批自私自利的生产者和消费者最大化地生产和消费社会收益最小、社会成本最大的商品，又会怎样呢？

举一个黎先生或许能够理解的例子。在中国，为什么现在人民群众得不到基本的食品安全的保障，为什么毒大米、毒牛奶、毒饼干泛滥？不就是因为完全是“理性”的、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资本家为了减少私人成本使用了一些本来不属于食品的“中间投入”。而在“自由放任”的市场上，消费者凭自己的五官又无法识别有毒无毒，同样是为了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优先选择了较为“便宜”的商品，结果造成了大量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受损害的严重后果。

当然，这是在中国，中国的市场经济还不成熟、还不完善。已经搞了三十多年了，还要“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允许改革犯错误，不允许不改革”。为什么对计划经济就不能再宽容一些呢，计划经济出了一些问题，为什么就不能不断地、长期地“成熟”、“完善”下去呢？

好，说说外国。不知道黎先生是否学习过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也就是国内一般所说的“西方经济学”）。如果学习过，那么大概知道根据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理论，所有商

品的价值都是由土地、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共同创造的。在现代经济中，主要是资本和劳动，完全由土地带来的要素收入很少。

现在问题来了，按照现在通行的资产阶级微观经济学的理论，没有任何一个严肃的经济学家（不是像中国的主流媒体和政府官员那样的市场拜物教信徒）敢于否认，在现实的资本市场和劳动市场中，资本价格和劳动价格实际上必然是“次优的”（也就是说现实市场中资本和劳动的配置必然会造成社会福利的损失）。这是由于所谓“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从而市场所决定的实际工资水平必然“偏高”，因而大规模失业是不可避免的。市场所决定的实际利率必然“偏低”，因而银行事实上要对信贷进行“配给”，也就是用非价格指标来决定将贷款借给谁或不借给谁。这听起来是不是很像计划经济？

在资产阶级经济学中，忠实于凯恩斯传统的经济学家更进一步认为，就资本价格来说，不仅经常是错误的，而且由于未来从根本上是不确定的，实际上连有意义的均衡都没有。资本价格是由投资者的“信心”或者说“动物精神”决定的，根本不可能是“理性”的，因而必然会发生频繁的、大幅度的波动。金融市场实际上就是赌场，在金融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投资实际上就是金融泡沫的副产品。这些都是凯恩斯曾经说过的话。凯恩斯本人认为，只有依靠“某种全面的投资社会化”才能使经济实现某种接近充分就业的均衡。

好了，在现实的市场经济中，发达的也好，不发达的也好，两个基本的要素价格都是严重错误的。但是，还有更大的问题。如果说商品价值是由生产要素创造的，而要素价格都是严重错误的，合理的推论岂不就是，所有的商品价格必然都是严重错误的，因而必然引导自私自利的生产者和消费者造成社会福利受损甚至严重受损的结果？

在现实经济生活中，这些就表现为工人长期的、大量的失业，每隔几年一次的经济危机，反复的金融泡沫和崩溃，一方面房地产严重过剩、一方面大量人口住不起房，市场主导的医疗体系导致医疗成本成倍上涨而人口健康状况每况愈下，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外围和半外围国家还普遍表现为工人受到血汗工厂的残酷剥削、农民没有土地、劳动者没有基本保障、人民群众被N座大山压得喘不过气来等一系列问题。我们如何知道，如此累计相加的社会福利成本比计划经济累计相加的社会福利成本要小呢？

但是，还有“外部性”。什么是“外部性”呢？简单地说，就是当实际的社会成本不同于市场价格所表现的私人成本，或者实际的社会收益不同于市场价格所表现的私人收益的时候，就存在着外部性。现代社会最严重的“外部性”莫过于环境污染问题。在 market 价格的诱导和利润动机的刺激下，私人生产者为了短期的利益，必然要追求商品价值的最大化。但是从人类的长期利益来说，商品价值越是最大化，所消耗的资源 and 环境影响也就最大化，因而长期对环境的破坏也就最大化。

在经过了几个世纪的世界资本积累以后，现在世界上的各种环境系统，如土壤、水资源、森林等，都处于崩溃的边缘。气候变化危机更是威胁到整个人类文明的存续。虽然各国政府都假装对世界环境危机忧心忡忡，时不时做一些“可持续性发展”的惺惺作态，但是在现实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哪个政府胆敢违背资本积累的逻辑？而资本积累的逻辑就是，只要有利可图，资本积累就不受任何限制，“法无禁止即可为”。GDP越大，资本的利润就越大，哪管下一代的环境崩溃，哪管我死后洪水滔天？

没有雇佣劳动关系的市场经济？

黎先生理想的社会经济模式据说是一种“没有雇佣劳动关系的市场经济”。在这种市场经济中，实行“按劳分配，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由企业劳动者自己当家作主”，“社会经济建立在自由的市场经济基础之上”，计划管理仅用来满足“社会经济宏观管理上的需要”。

在黎先生的一篇博文中，黎先生还将他自己设想的这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说成就是“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实在是令人啼笑皆非。建议黎先生首先研究一下当年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理论和实践及其历史后果，再来阐述他自己的“市场共产主义”。

无论从马克思主义还是从市场经济的角度出发，黎先生的设想都面临着一系列无法解脱的矛盾。黎先生既然主张市场经济，那么想必在黎先生的市场经济中，企业与企业之间是相互竞争的，劳动者是追求私利的。如果劳动者都是追求私利的，都不可能是大公无私的，又如何向共产主义过渡呢？

在黎先生的市场经济中，允许不平等存在吗？如果允许，允许到多大范围？如果不允许或者要人为限制不平等的范围，岂不是政府干预市场、“国家权力主导”？会不会“鞭打快牛”，会不会打击劳动者“致富”的积极性？

在黎先生的市场经济中，允许企业破产吗？允许工人失业吗？如果不允许，那么对于效益低下的企业，国家要不要包下来？这种对“落后”的保护，会不会造成“另外一种不公平”？如果允许，倘若市场竞争造成大批企业破产、大量工人失业，贫者愈贫、富者愈富，黎先生的社会主义又如何自圆其说？

在黎先生的市场经济中，劳动者在企业之间可以相互流动吗？如果可以，如何流动？是不是在事实上要有劳动力价格和劳动力商品？资本在企业之间可以流动吗？企业相互之间可以参股吗？如果可以，如何避免企业中是劳动者说了算而不是资本说了算？如果不可以，如何保证资源最佳配置？

既然是市场经济，无论是“劳动者当家作主”的企业，还是资本家占有的企业，都只能根据价格来决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消费者也要由价格来引导，因而上一节所说的现实市场经济中的一切困境都将继续存在。这就是，一大批自私自利的消费者和生产者在严重错误的要素和商品价格引导下，必然导致社会福利严重受损的结果。

或许黎先生会补充说，政府可以“计划管理”啊，自由派会说，政府可以加强“监管”啊。“计划管理”也好，“监管”也好，政府怎样才能做好呢，是否也需要知道“正确的价格”在哪里，是否也需要掌握成千上万的商品如何生产、该生产多少的相关信息。比如，政府要治理雾霾，这就要涉及钢铁工业、电力工业、汽车工业、交通业等很多行业，就必须要对涉及所有这些行业的收益和成本进行调查。否则，我们怎么知道，清澈蓝天的价值要大过上述这些行业创造的GDP呢？为什么不让市场来评估价格和成本呢？

甚至于治理毒牛奶，也不简单，除了政府要了解牛奶产地和生产过程等复杂的信息以外，还涉及一个消费者选择的问题。凭什么政府就可以有代替消费者选择的权力，难道不会有某些特殊的消费者出于某些特殊的“偏好”自愿选择毒牛奶吗？这不是“国家权力主导”吗？

既然在现实中，市场失败是普遍的，也就是说市场价格实际上普遍地不能正确地反映社会收益和成本，那么政府要监管，原则上，有多少种商品，政府就需要了解多少种商品的“正确价格”。换句话说，在市场经济中，政府要实行有效监管，其所需要的信息量在原则上与计划经济是一样的。既然如此，如果计划经济是低效的，在现实的市场经济中，政府也必然无法实行有效监管，当把所有社会成本都充分考虑进来以后，市场经济也

必然是低效的。反之，如果政府真的可以对市场经济实行有效监管，那么也没有理由认为政府不可以同样有效地实行计划经济。

但是，市场经济还有一个“优势”是计划经济所不具备的。在市场经济中，因为所有企业和个人都是自私自利的，因而不会主动为了社会利益而避免制造对社会不利的商品，而是会主动发明创造各种各样政府监管不到的商品，比如各式各样的所谓“金融创新”，不断引诱消费者消费各种“新产品”，客观上对环境造成更大的破坏。

在现实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国家调节市场的力量，还受到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严重限制。如果国家调节的范围过大、过广，就会减少资本家的利润率，资本主义企业会在世界市场上就会丧失“竞争力”，资本就会外逃。凡此种种，都会限制资本主义国家的调节能力，但是因此也就造成了世界范围的“向底线竞赛”，对劳工和弱势群体的保护越来越少，环境法规越来越松，甚至于外围和半外围国家竞相进口核心国家的核废料、电子垃圾，从而导致整个体系的“外部性”越来越大，越来越严重，直至崩溃。

二十一世纪的“新社会主义”？

二十一世纪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当然不是对二十世纪的简单继承，而是螺旋式发展，在否定之否定基础上达到更高级的阶段。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主要是要解决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范围内，如何建立新型民族国家并开展快速资本积累的问题。二十一世纪的社会主义则必须面对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濒临崩溃时代的各种经济、政治、社会和环境危机。

目前世界上的基本形势是，美帝国主义已经无可挽回地衰落，但是又没有任何一个大国可以代替美帝领导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重组。新自由主义世界经济已经陷入长期的停滞，在未来还将爆发更大的经济危机。由于经济停滞和危机，各国阶级矛盾激化。在社会主义革命爆发以前，目前各国的阶级矛盾以种族、宗教矛盾等错综复杂的形式表现出来。总的特点是天下大乱。在大乱中，人民群众得到锻炼，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被削弱。世界环境危机到了总爆发的边缘，在不久的将来将爆发新的石油危机和资源危机。

在这样的总形势下，中国的前途怎样呢？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在事实上建立了私有制主导的市场经济。那些还认为中国经济现在是国有资本主导、官僚资本主导或政府主导的人都是罔顾基本的经济事实，在右派反动媒体的洗脑下，像唐吉珂德一样，大战想象中“强大的”国有资本。

依靠对广大劳动者的残酷剥削，依靠对资源和环境的疯狂掠夺，中国经济在过去一个时期一直“高速增长”。但是，正如马克思预言的那样，资本的发展必然带来无产阶级的壮大。中国工人阶级已经是中国各阶级中人数最为众多的，并且正在觉悟起来、组织起来。要不了很久，中国就将出现波澜壮阔的工人运动，中国工人阶级将要求获得广泛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权利。

但是，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一度达成妥协的历史情况不同，由于中国资本家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完全依靠对广大廉价劳动力的剥削，而没有来自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超额利润”，中国资本家将没有收买“工人贵族”的资本，更不可能收买整个的中国工人阶级。中国工人阶级的最低社会、经济和政治要求必然要突破中国私有制市场经济所能容纳的最大界限。

郭松民同志说：“新社会主义理论，不是横空出世的，它必然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是对时代本质的深入分析，是对当代中国社会的深入了解以及对

中国民间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的总结，是对从马克思到毛泽东理论遗产的继承和发展。”

未来的新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当然不应当是在书斋中拍脑门拍出来的。任何有生命力的理论和运动都必须能够回答它所生活于其中的那个历史时代的实际的、重大的政治问题。郭松民同志说：“十月革命时，由于已经有了成熟的革命理论和关于未来社会的蓝图，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就可以迅速带领工人群众建立苏维埃政权，将俄罗斯引向社会主义道路，开辟了人类历史新纪元。”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布尔什维克党关于革命的理论不能算很成熟，一直到二月革命以后、列宁返回俄国，才提出了著名的“四月提纲”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任务。“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口号也是几经波折。

关于未来社会的蓝图也远没有描画清楚。布尔什维克党人本来是一心指望德国革命和欧洲革命。德国革命失败以后，俄共（布）陷入了严重的内部争论和分裂，走资本主义道路（坚持“新经济政策”长期不动摇）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剥夺富农、加速国家工业化）的问题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解决。只是在经历了严重的党内斗争，斯大林派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以后，才最终走上了“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

在十月革命之前的历史紧要关头，布尔什维克党能够摆脱各种条条框框的束缚，正确地抓住了当时俄国广大劳动群众最迫切、最紧要的两个问题——“和平问题”和“土地问题”，从而取得了对代表工人和农民利益的工兵代表苏维埃的领导权，进而取得了武装起义的胜利，找到了一把打开俄国历史进程的钥匙。

今日中国追随马列毛主义的左派，同样要深深扎根于当今中国社会和经济的基本实际。另一方面，历史发展有其自己的客观规律，左派大可不必忙于给自己背上过重的理论包袱，而是应当一方面与工农相结合，另一方认真研究中国资本发展和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并在此基础上，牢牢把握当今中国的“和平问题”、“土地问题”，找到推进中国历史进程的二十一世纪“新钥匙”。

中国目前的私有制主导市场经济，其主要矛盾是，一方面，中国的资本积累有赖于对广大廉价劳动力的剥削和对资源和环境的疯狂掠夺，另一方面，资本积累必然造成新的社会阶级的形成和发展壮大。新兴的工人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白领”、“中产”）必然提出日益广泛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要求，开展反对环境污染的斗争。资源的枯竭、环境的崩溃也会在客观上限制资本积累的进程。

从这种形势出发，中国的左派应当坚决支持并在可能的情况下适当引导一切劳动群众反对资本、限制资本的斗争和要求，包括劳动者要求提高工资、争取社会保险的斗争，包括反对污染的斗争，包括要求降低房价的斗争，包括反对征地或者要求更高征地补偿的斗争，也包括未来可能出现的争取政治自由、罢工权利、八小时工作制等斗争。所有这些斗争，都会限制资本家资本积累的自由，增加他们资本积累的成本，同时使广大劳动者在斗争中得到组织和锻炼、提高觉悟。

但是，这样的斗争，到了一定的阶段，就会陷入其自身的矛盾。恰恰由于中国资本积累是靠剥削廉价劳动力和廉价资源才能进行的，当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斗争进行到一定阶段，工资、社会福利和环保成本上涨到一定程度，其它的对资本积累的限制增加到一定程度，就会引起资本家利润率的下降，进而引起资本积累的危机和资本外逃。这种情况，可能发生在中国未来政治上发生大的变化之前，也可能发生在大的变化之后。

当这样的危机爆发后，中国的工人运动就到了十字路口，或者软弱下来、退缩下去，放弃过去曾经赢得的一点有限的经济和社会权利，恢复到血汗工厂和肆意破坏环境的

状态。或者，中国的工人运动就必须向前迈出决定性的一步，挑战资本家的生产资料私有制，以人民的名义向资本家追讨历史欠账，没收一些罪大恶极的贪官以及确有民愤的资本家（比如勾结黑社会的、“第一桶金”来源特别肮脏的、过去压迫工人造成血案的、勾结外国资本出卖国家利益的）的财产，清算他们的“第一桶金”，并在此基础上初步奠定未来新公有制经济的基础。

通过建立新的公有制经济，可以直接满足广大劳动群众的各种经济和社会要求（就业、住房、教育、医疗等）。但是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包围中，这仍然不是长久之计。首先，即使是公有制经济（无论其内部多么民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也会很快产生两极分化，贫富差距会越来越拉越大。其次，未来的中国社会主义将会从私有制市场经济手上接过一个山河破碎、环境崩溃、资源枯竭的中国。

未来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要重整河山，恢复环境，消灭一切资源浪费并减少一切不必要的资源消费。为此，必须对全国的产业、基础设施、消费模式进行彻底改造。就像一五时期靠计划经济奠定工业化基础一样，要重整全国的环境也必须依靠计划经济的方法，还需要一部分群众做出一定的牺牲（如减少不必要的奢侈品进口，减少并最终取缔私人汽车等）。为此，要展开全国的民主大讨论，使得绝大多数群众都充分认识到克服资源和环境危机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并在人民群众广泛拥护的基础上，进行全国性的生态社会主义改造。

这可以算二十一世纪的“新社会主义”吗？这一方面取决于中国未来的现实社会和经济矛盾发展的结果，另一方面取决于中国社会的各阶级特别是工人阶级怎样发扬本阶级的历史首创精神，在既有的客观历史条件上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自己解放自己。

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异化问题的一些思考

李民骥（2014年6月27日）

松民，

来信收悉。红色中国网已经重点推荐发表。松民兄的这封信，内容重要，涉及方面很多，态度亦诚恳，不过恐怕巩老未必充分理解。

我个人对于“社会主义公民社会”一说，仍有保留。松民兄的意思我是理解的，就是要设法解决社会主义革命以后，国家政权异化进而导致“新阶级”产生的问题，要解决劳动者管理国家而不是被国家管理的问题。不过这些年来，我的想法是，这主要将是一个历史实践的问题，而不是理论的问题。理论方面，恐怕主要是要澄清解决上述问题所需要的历史条件，而不是提供一个现成的公式。

这里有两方面问题，需要区别开来。一方面问题是，如何防止社会主义国家异化，防止官僚特权阶层、阶级产生，进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从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说，就是由阶级社会向无阶级社会过渡。关于这个问题，马克思在各篇著作中都探讨过，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做过总结，就是要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而后者的前提是绝大多数劳动者要在很大程度上从日常生产劳动的重负中解放出来。关于这个问题，传统马克思主义是寄希望于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力的发展。现在，在生态环境和资源制约的条件下，要考虑怎样一方面限制全社会的物质消费，另一方面普遍缩短劳动者的劳动时间，殊非易事。不解决这个问题，劳动者要普遍参与生产、政治、文化的管理就不可能，某种程度的阶级分化、阶级差别就不可避免。

毛主席那个时代，被帝国主义包围，后来又与苏联闹僵，发展重工业、保障国家安全、支援世界革命，这是第一位的。缩短劳动时间自然无从谈起，况且起点是百分之八十人口文盲。咱们未来的重建工作，短期靠自己，长期还是要靠世界革命的胜利，否则恐怕依然难以长久。毛主席当时的基本战略，是在国内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办法尽量延长无产阶级专政政权的寿命，在国际上寄希望于世界革命胜利。在智利革命、葡萄牙革命失败以后，再加上九大以后、文革告一段落，世界革命高潮就过去了。主席当时很清醒，尽人事、听天命。

再一个方面的问题，是未来社会主义能不能解决形式民主的问题。传统社会主义，在这个问题上没有解决好，恐怕主要也不是理论认识不够的问题，而是现实历史条件的限制。从资本主义方面来看，男子普选权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才解决，妇女选举权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解决。种族隔离的问题，美国到上世纪六十年代才解决，南非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才解决，以色列到现在也没有解决。严格来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前，美国不能算真正的自由民主国家，现在的美国宪法仍然有大量的非民主残余。西欧直到七十年代还有西班牙、葡萄牙、希腊等法西斯国家。一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世界上实行独裁政体或一党制的国家是大多数，自由民主政体仅限于北美、西欧、日本、印度等少数地区，日本还是个半殖民地国家。所以，对于传统社会主义没有解决好民主问题，要放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理解。

从历史上看，形式民主的确立，主要不是资产阶级的政治要求，而是工人阶级发展壮大以后，工人阶级与城市小资产阶级共同斗争、资产阶级被迫接受的结果。这在西欧诸国比较明显，拉丁美洲、韩国、台湾的经验也类似。东欧则属于另外一种情况，是新兴资产阶级为了推行新自由主义与工人阶级做的政治交换。当然这样就有一个问题，中国资本主义是否有那样的空间可以容纳工人阶级的政治和经济要求（政治上民主、经济上福利国家）而不妨碍廉价劳动力体制下的资本积累。我看是不行的。所以，中国的争取民主的斗争，由小资产阶级右派（自由派）领导，必然失败；只能由工人阶级领导，而且必须不间断地发展为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

所以关于未来社会主义条件下，解决形式民主的问题，我认为可以乐观。但是仅仅解决了这个问题，并不能真正解决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差别的问题。资本主义社会中，在民主的形式下，资产阶级可以行使统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在民主的形式下，也可能有特权官僚集团或技术官僚集团行使统治。当然，在根本解决脑、体分工之前，无产阶级能否通过民主的形式一方面限制官僚集团的特权（要消灭恐怕不可能），另一方面以各种群众运动威胁官僚集团的统治，逐步向无阶级社会过渡，可以思考。

关于“公民社会”一说，我有保留意见，主要是这个概念源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理论中，国家一方面是为了防止“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当然主要是镇压无产阶级的反抗）所必须的，另一方面又要防止国家侵犯个人（主要是资产阶级）的基本“权利”（也就是普世价值）。所以自由主义的民主理论是有内在矛盾的，一方面承认政府的权力源泉来自于人民，另一方面又认为民主不得侵犯普世价值，在实践中就表现为资产阶级宪法对于民主的各种限制（比如最高法院可以宣布国会通过的法律违宪）。

按照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理论，市场是建立在平等的商品交换关系基础上，市场的参与者构成“公民社会”。国家的职能仅仅是维护财产权，确保正常的市场交换秩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国家可以超然于“公民社会”之上而不主导。当然，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实践中，不得不增加国家干预的程度，从而使资产阶级国家不得不在事实上通过福利国家、劳动环境法规等形式深深地嵌入“公民社会”之中。

另一方面，传统马克思主义和毛主席都认为，在社会主义时期或者在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国家的职能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的组织形式是类似于巴黎公社、苏维埃、文化革命委员会等工农民主的权力机关。工农民主机关一方面行使无产阶级专政的全部权力，另一方面代表全社会管理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在这个意义上，无产阶级的国家（如果确实是无产阶级的）必然是主导全社会的。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看，无产阶级的民主是不受任何法理限制的（当然这不等于说无产阶级民主不受现实的物质和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

当然，在传统社会主义实践中，无产阶级民主发展不充分，甚至于没有发展。这要用未来的革命实践来解决，而不是人为地用某种“公民社会”的概念去限制未来的无产阶级国家。试想，如果我们要引进“公民社会”的概念，并且不能被国家权力所主导，那么是否要用一套“普世价值”将“公民社会”保护起来？这些“普世价值”是否要限制未来无产阶级民主政权机关的权力？谁来决定这些“普世价值”的内容？

谁来监督无产阶级的民主政权机关，防止他们滥用权力？如果是由无产阶级以民主和群众运动的方式来监督，那么民主本身就足够了，“公民社会”并不需要额外的保护。如果要由另外的机关（比如宪法法院）来监督，谁来决定宪法法院的构成，为什么宪法法院要

有超越民主政权机关的权力？如果组成了由某些理论精英组成的、可以超越民主权力的宪法法院或者类似机关，以保护“公民社会”不被国家侵犯、主导，那么我们怎么知道这种机关不会凌驾于民主之上？我们岂不是用法律形式将我们原来想要防止的社会主义国家异化给固定起来了？

我个人看法，关于未来社会主义国家的组织形式，可以借鉴历史经验，如巴黎公社、如苏维埃、如工人委员会或文化革命委员会，都很好。能否持久，能否巩固，只能在未来实践中解决。目前理论工作的任务，恐怕主要是澄清未来无产阶级民主以及向无阶级社会过渡所需要的历史条件，而不是忙于制度设计。在制度设计方面，我们恐怕并不比我们的前辈更高明。

以上文字只是个人思考的产物，不成熟。请松民兄不吝批评。

李民骐

如果红中网变成了“最革命者”的舞台，该说告别的是我

新愚公（2014年9月12日）

对我而言，只有一件事情我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很多事情我都不确定。不确定谁是谁非，不确定谁对谁错，不确定谁革命谁不革命，也不确定谁的方向更正确、谁的道路更广阔。因为不确定，所以才要探索，所以才希望倾听各家之言，所以才主张包容，所以才特别重视团结。因为不确定，所以就不坚定，所以我随时准备放弃我自己的观点和成见，谁讲得更有道理我就接受谁的观点，所以必须让别人将道理讲出来，因此对于动不动就喊口号、扣帽子的行为特别反感。我渴望在红中网上看到更多有思想性的原创文章，期望能从网友身上学到更多，希望大家都能在彼此的讨论中弥补自己的视觉盲点，从而取得进步，所以期待在红中网上塑造一种良好的探讨气氛。不过现在看来，这些期待基本上落空了。

每次阅读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史，最让我痛心的不是蒋介石的凶残围剿，而是王明他们那些“唯我独革”、“唯我马列”的极左分子的瞎胡闹，蒋介石四次大围剿没有干成的事情，“最马列、最革命”的王明们一次就搞定了。不害怕敌人正面的枪火，就害怕来自自己阵营的横炮。

其他的就不多说了，阿早网友说红中网的编辑欠他一个道歉，我想作为编辑我确实没有做错什么，只是履行一个编辑的职责，并且后面一直秉承自己的审核标准，对阿早先生的“原创”帖（将几条跟帖拷贝粘贴糅合在一起的帖子，说是原创其实有些勉强）推荐最多的也是我。所以，作为编辑我就不道歉了。但是，作为一个不太坚定的革命同情者（不敢自称为革命者，只是革命的同情者），作为一个小资思想比较严重的网友，在面对最正确、最坚定、最革命的其他网友时候，是需要对自己的动摇、软弱、绥靖而道歉的。

另外，真诚的向编辑部的其他编辑致歉，特别是水边代主编，整个事件的处理和我现在的决定，都没有预先和你探讨商量。不过没办法，我需要通过这个事件来观察整个红中网的态度，然后才能得出我自己的结论，只有保持双盲的状态，观测结论才是可靠的。这两年作为红中网的编辑，我感觉很温暖，觉得自己不再孤单，现在要再次孤身上路，有几分留恋，也有几分不舍，但这就是红中网的大势，我确定自己已经不再适合作为红中网的编辑而存在，因此向红中网编辑部请辞。就此辞别诸位网友，谢谢。

答 05txlr 同志 —— 兼谈马列毛积极分子怎样对待小资产阶级进步派别

远航一号（2014年9月25日）

05txlr 同志撰写的“redchina 网友提的问题值得探讨”一文，经玉表同志编辑，已经在红色中国网理论版发表了。我将标题修改后，已经改在头条推荐了。在这篇短文中，05txlr 同志对贺合林同志文章下面以 redchina 名义发表的一篇跟贴提出质疑。这些质疑，05txlr 同志在文章中已经说明，此处不再赘述。

首先，要向 05txlr 同志和各位网友承认一个错误。最近工作上的任务比较重，参与红色中国网编辑工作较少。近日，因为新愚公同志休息，我就帮忙多做一些，但是其它方面的任务并没有减少。忙过头了，有时就难免忙中出错。...

那么再说那个跟贴，既然是忙乱中临时随手写下的，自然不是成熟的想法，错误在所难免。不过，忙乱也好，临时也罢，既然写下了，总是暴露一些“活思想”。现在就把我的“活思想”向 05txlr 同志和各位网友汇报一下，敬请各位网友分析解剖、严肃批评。

那个跟贴，是跟在贺合林同志文章下面。贺合林同志的文章中，有这样的说法：“所谓的新社会主义了无新意，根本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货真价实的修正主义 ... 新社会主义在我国早已有了几十年的实践，一旦形成理论在中国得逞，中国便将彻底干净失去真正的毛泽东思想，便将永远告别马克思主义、告别社会主义。”

先从后面那句话说起。贺合林同志说，“新社会主义”一旦得逞，“中国便将彻底失去真正的毛泽东思想，告别马克思主义、告别社会主义”。这里有一个问题，贺合林同志所说的“中国”，所指为何？如果说的是中国人民的“中国”，那么请贺合林同志放心，无论惊涛骇浪、天地翻覆，无论反动派怎样企图扭转历史前进的车轮，充其量只不过是乌云一时遮住了太阳，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阳光终将普照大地。从长远的、历史的观点来看，中国人民必将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取得反剥削反压迫斗争的胜利。怎么会“告别”呢？

如果贺合林同志所说的“中国”，指的是资产阶级的中国，也就是走资派的中国，那么他们早就抛弃和背叛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哪里还需要等到新社会主义得逞？所谓新社会主义得逞了，“中国便将彻底失去 ... 告别 ...”云云，难道是说，中国的资产阶级和走资派还没有彻底抛弃、还没有彻底背叛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中国的资本主义复辟还没有彻底完成？如此说来，贺合林同志与某些新社会主义论的主张者，倒是略有意见一致的地方。

回过头来，再来谈一谈“新社会主义”与修正主义的关系。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曾经以“修正主义”来泛指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及各种有利于资本主义复辟的思潮和实践。在中国已经发生资本主义复辟以后，由于今日中国资产阶级中占统治地位的势力主要（但并不是全部）是由当年的走资派演变过来的，在一部分左派同志中，仍然保留着这样一个习惯，即将今日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反对资产阶级统治的斗争，仍然习惯性地称之为“反修”斗争。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样的说法，已经越来越不符合实际，越来越不适当当前阶级斗争的需要，乃至不能为广大工农群众所理解，对于现实的工农斗争起副作用。

过去，在红色中国网编辑部内外，我都曾经严肃地就这个问题提出过看法。一定的理论概念、一定的政治词汇，都不是凭空产生的，都是来自于一定的社会历史环境和阶级斗争实践。产生于一定的社会历史环境和阶级斗争实践的理论概念，如果超出了它的合理适用范围，不但不能指导阶级斗争的实践，反而可能妨碍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解放斗争。

就“修正主义”这个概念来说，它本来是指国际工人运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所存在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潮。这种思潮的实质，是要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放弃无产阶级革命，专注于资本主义社会内的改良，实际上就是要使无产阶级运动放弃自己的政治独立性，臣服于资产阶级。但是在形式上，修正主义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它是国际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一种思潮。追随修正主义的有大量工人群众，也有大批工人政党。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是这样。苏联现代修正主义是这样。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刘少奇、邓小平修正主义也是这样。正因为如此，列宁所领导的反修斗争，采取的是第二国际内部斗争的形式；毛主席领导的反对苏修的斗争，采取的是国际共运大论战的形式；毛主席领导的反对刘、邓修正主义的斗争采取的是党内斗争和发动群众搞文化大革命相结合的形式。总而言之，是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斗争，而不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

等到走资派已经夺得政权，资本主义已经复辟，特别是大部分国营企业已经私有化以后，中国阶级斗争的性质就发生了根本变化。现在的阶级斗争，已经是资本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抗资产阶级压迫和剥削的斗争，而不是在社会主义国家或工人运动中马列主义派别反对修正主义派别的斗争。

那么，关于“新社会主义”的设想（还谈不上理论），是否属于修正主义呢？郭松民、秋石客、卢麒元这几位，在当今中国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舞台上，属于左翼进步知识分子。就他们本人的现实物质生活条件、主要社会基础以及他们的主要思想内容来说，可以说，属于小资产阶级中的进步知识分子（也可以说是城市中产阶级中的进步知识分子）。那么，他们所主张的“新社会主义”（他们所主张的“新社会主义”也不尽一致，有十位小资产阶级思想家，就有十种甚至更多种“新社会主义”），是中国当代无产阶级运动中产生出来的一种思潮或一种政治派别吗？郭、秋、卢等几位属于工人领袖或者工人政党的领袖吗？他们背后有工人群众或工人政党吗？如果都不是，怎么能说他们的思想主张是“修正主义”呢？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罗列了大量当时存在的、各式各样的所谓“社会主义”思潮，并明确说明了它们各自的阶级基础。列宁在批判第二国际修正主义以后，也没有画蛇添足地将马克思时代就已经存在的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潮命名为“历史上的修正主义”。（05txlr 同志熟读经典，如果我在这里说的不对，盼指正）一种思想，是什么阶级的，就要说它是什么阶级的。马虎不得，混淆不得。

当前中国正在发生的“新社会主义”讨论，其实际社会背景是这样的。在经历了几十年的资本主义复辟以后，各种经济、政治、环境矛盾日趋激化。在这样的背景下，不仅是工人阶级，而且有越来越多的小资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统治不满。小资产阶级中较先进的部分，愿意向往某种形式的“社会主义”作为他们心目中超越资本主义的理想社会模式。但是，他们对于历史上的斯大林领导的社会主义、毛主席领导的社会主义充满了怀疑（其中也有总结历史上社会主义经验教训的合理内核、另论），也不很相信今日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更不愿意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于是才冥思苦想、挖空心思，想要搞出一些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伟大创新。

那么，这样的“新社会主义”思潮与中国今日现实、紧迫的阶级斗争又有什么样的联系呢？自 2012 年以来，中国小资产阶级进步派别的政治斗争是衰落了。但是，大江南北的工人斗争正在日益高涨，并且已经给资产阶级造成了

越来越大的经济和政治困难。这种斗争，目前，就其主要方面来说，还不是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但是，假以时日，随着工人阶级斗争与中国资本主义的狭隘经济和政治界限发生越来越严重的冲突，一般工人阶级的觉悟必然不断提高，中国工人运动也必将向争取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

在广大的农村，半无产阶级的农业劳动者反对资本家征地抢地、保护地方环境和农业生产条件的斗争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有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反污染、保家园的斗争已经成为中国阶级斗争的一个新的重要趋势。所有这些斗争，都正在和中国资本主义的狭隘界限发生着日益不可调和的冲突，并且必将发展为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

中国工人阶级中的国营企业老工人长期以来一直进行着反私有化斗争，并且在反私有化斗争中发展了相当的马列毛主义觉悟。另一方面，老同志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中的少数最先进分子也已经发展为新时代的马列毛积极分子。严格来说，中国现在尚不存在马列毛积极分子领导的工农运动。中国的马列毛积极分子，应当投身到广阔深厚的工人运动浪潮中，在斗争中向工人阶级学习，在斗争中传播马列主义，逐步确立马列毛主义不仅是在反私有化斗争而且是在一般工人斗争中的领导地位。

工人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中国工人阶级的斗争要胜利，仅靠自己的力量还是不行的。历史上这样的教训很多。中国工人阶级的斗争要胜利，还必须发动农村的半无产阶级作为自己的最广大和最可靠的同盟军，还必须最大限度地团结进步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完全孤立资产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的一小撮极右翼。

从这个立场出发，中国的马列毛积极分子应该怎样对待在小资产阶级进步分子中发生的这场“新社会主义”讨论呢？该怎样定性，就怎样定性。既不要拔高，也不要贬低。把“新社会主义”说成是修正主义，实际上是一种拔高，因为今日中国小资产阶级中的进步派别并非工人运动中的一个派别。这就好比，我们不能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说成是修正主义一样（孙中山还说，他的三民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当然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代表的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更不能将蒋介石的三民主义说成是修正主义。如果我们把邓小平以来的资本主义复辟实践都说成是修正主义，那就无异于给蒋介石的三民主义戴一顶“修正主义”的高帽。

同样的，如果我们将中国资本主义复辟的实践说成就是当前中国小资产阶级进步派别正在探讨的“新社会主义”，那么不仅是对小资产阶级进步派别的一种贬低，实际上还忽视了中国当前阶级关系的一个重要事实。这个重要事实就是中国小资产阶级在阶级利益和政治态度方面所起的变化。在本世纪初以前，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其主要成分就是“知识分子”）是中国资本主义复辟的一个重要社会基础。上世纪九十年代，资产阶级向工人阶级进攻，小资产阶级是重要的帮凶。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工人阶级队伍中的一些激进派别也确实犯过没有团结小资产阶级的错误。但是，自本世纪初以来，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实际上已经分裂，从而才产生了今日中国的左派。今日中国的左派，就其社会基础来说，主要还是小资产阶级进步群众，当然还有老革命、老造反派、老工人。这里面，除了老工人以外，一般在现实生活和现实斗争中都是比较脱离工人阶级的。

小资产阶级的这种分裂，是中国阶级矛盾发展的结果，是阶级力量对比由对资产阶级有利转变为对无产阶级有利的历史过程中的一种中间过渡现象。小资产阶级进步派别加入中国工人阶级领导的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这对于中国工人阶级的最后胜利将是有利的。前提是，工人阶级不放弃自己在这场伟大斗争中的领导权，坚决不重蹈 1989 年的覆辙。

从现实斗争来说，小资产阶级进步派别目前关于“新社会主义”的讨论对于现实工农斗争乃至小资产阶级群众维权斗争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目前，还不存在小资产阶级进步派别夺得工人运动领导权的直接危险。就是马列毛积极分子的各个派别，目前关于工人运动发展的方向和方式以及与工人运动结合的方式，意见也是不统一的。小资产阶级右派（即自由派）由于投靠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有人有钱，在表面上对于一部分地区的工人运动有一些影响。但是由于他们不可能解决中国资本主义的狭隘界限与改良主义工运之间的根本冲突，也不可能在中国工人运动中获得长久的、广泛的影响。另一方面，以社会主义革命为方向的工人工作实际上在蓬勃发展。

基于以上考虑，中国马列毛积极分子对于小资产阶级进步派别目前正在进行的“新社会主义”的讨论，要站得高、看得远，不要听风就是雨。下围棋的时候，对方攻击己方局部的几个子，并不关乎己方根本利益，而己方通过抓住对方另外的漏洞可以完全掌握主动权的时候，要敢于“脱先”。象棋中，也有弃子入局一说。对于小资产阶级左派中正在向工人阶级、向马列主义靠拢的进步分子，我们要敞开双臂、满腔热情、诚心诚意地去欢迎他们，对于他们的错误观点，要善意批评；一时不能达成一致意见的，可以由时间来检验。

对于小资产阶级左派中的落后分子，也要认识到，他们的思想在现阶段是有实际社会基础的，反映了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群众既对资本主义不满又不甘心完全向工人阶级靠拢这样一种进退维谷的心态。对于这种心态，硬逼着小资产阶级左转是转不过来的，搞不好，还会适得其反。我们也不能盲目迎合一部分政治上不成熟的左派群众（包括一些宗派主义小团体）的心理，认为只要是非马列主义的（甚至于有些形式上非马列主义、但是事实上符合马列主义的）观点，就一定要将其批倒批臭。文革的历史经验教训证明，这样做，是不利于工人阶级的长远解放事业的。

类似的，对于前一个时期的韩德强的所谓“农场答客问”，成熟的马列毛积极分子，对于其实际政治作用，也要有个准确的估计。韩德强是背叛了，但是他背叛的是谁？是工人阶级的事业吗？韩德强没有那样的资格。韩德强所背叛的是他曾经作为其中一部分的小资产阶级进步派别以及追随这些派别的左派群众。对于这部分左派群众，成熟的、有觉悟的马列毛积极分子应该怎样去争取？韩德强走了，我们可以和他告别。但是造成一部分小资产阶级、一部分左派群众那种既想要社会主义又害怕社会主义的现实社会条件仍然存在着，一时半会儿是告别不了的。硬逼着他们“改造思想”也是改造不好的，况且我们既没有武力可以威逼，又没有金钱可以利诱，怎么强迫人家改造？对于这部分小资产阶级、这部分左派群众，我们要给他们时间。有什么钥匙开什么锁，要开小资产阶级这把锁，单单靠说理是说不通的，还是要靠现实的工人阶级的斗争。

毛主席确实讲过，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在这里，毛主席是用“灰尘”来比喻帝国主义和各国的反动派，而“扫帚”则是指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不是说，用几篇文章，把“灰尘”批倒批臭，“灰尘”就没有了。“灰尘”的产生，有它的现实、客观的物质基础。只有把这些物质基础消灭了，“灰尘”才能消灭；而要消灭“灰尘”的物质基础，有一个阶级斗争的过程，有一个无产阶级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客观发展规律。小资产阶级是很讲实际的。无产阶级要从根本上确立对小资产阶级的领导，只有在现实斗争中不断地打败资产阶级、证明自己越战越强，才能最终使得小资产阶级的绝大部分心服口服地接受无产阶级的领导。

考虑到，小资产阶级左派中的各种错误观点，目前对于工人斗争的实际影响并不大，乃至没有，在现实的意识形态斗争中，有觉悟的马列毛积极分子对于小资产阶级左派的内部争吵，（借用围棋的术语来说）要敢于“脱先”，

善于“脱先”。该引导的，引导；该不理睬的，就不理睬。近年的经验证明，这样做是有利于马列毛积极分子队伍的成熟和扩大，有利于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进步派别的长远团结，也是有利于无产阶级的最后胜利的。

已经写了很多。还有一些次要问题，如“与资本主义相比，修正主义也是历史的进步”一说，主要想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各国社会民主党在争取改善西方工人阶级社会和经济权利方面一度起到的进步作用，未经熟虑，就不赘言了。

05txlr 同志提出，希望大家一起来讨论。我就根据 05txlr 同志的意见，讲了一些我的想法，其中浅薄和不成熟的地方，在所难免。红色中国网编辑部的其他同志、各位网友，也应该响应 05txlr 同志的意见，畅所欲言。这样的讨论，将有利于马列毛积极分子队伍的提高和扩大。

社会主义、修正主义及其同路人

路石（2014年9月27日）

关于“新社会主义”的讨论在左派队伍中热度不减，说明在资本主义衰落的事实面前，一部分左派力量更加坚定了马列毛主义的革命社会主义主张，一部分左翼进步力量越来越愿意把“社会主义”作为一个超越资本主义的可行的选项。只不过就其内容来说，前者主张由未来的工人运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现实阶级斗争来创造历史；后者希望设计出的“新社会主义”能够被广大的左右翼小资产阶级容易接受，甚或被统治集团中的所谓“健康力量”所欣赏。

但是，无论主张什么样的社会主义，今天谁也无法割断同以往社会主义的历史联系，亦即不能回避将要继承些什么，扬弃甚至否定一些什么的问题。这样，就必然涉及到如何对待毛时代的社会主义，如何断定今天中国政权的性质以及它跟“修正主义”究竟还存在多少渊源的问题。

今天浏览了贺合林、05txlr、远航一号和沙海之舟发表的相关帖子以及文后网友的跟帖评论，很有感触，这里随感写点想法，以做交流。

一般来说，只要是严肃地讨论“社会主义”，无论谁要为其设计多么完美的制度形式，其宗旨都是要解决少数人对多数人在经济上的剥削、在政治上的压迫问题。一句话，就是要消灭最后一个剥削压迫制度——资产阶级现代私有制。“传统社会主义”所采取的措施就是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按劳分配以及无产阶级专政（对广大无产阶级的民主和对少数反革命的专政）。谁也不能否认，以往的这种实践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剥削压迫问题。但是这种实践却是在一种特殊的或隐或现的阶级斗争中进行的，最终无产阶级在这场阶级斗争中暂时失败了，走资派掌握了国家政权，其结果不是无产阶级将社会主义推进到共产主义，而是走资派借用社会主义已经取得的物质和精神成就建立了资本主义制度。通常被我们称之为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时至今日，一个既成事实是，狼已经吞噬了羊，但这只狼是一只伪装了的狼，一只吃掉了羊肉披上了羊皮的豺狼。下面我们设“社会主义”为“羊”，设“资本主义”为“狼”，设“特色”为“披着羊皮的狼”，根据不同的已知条件，求证一个不同的结果。

当前生物科学领域流行转基因技术，我们姑且拿到这里应用一下。

观点一，中国的“羊”之所以容易被“狼”吞噬，主要是因为该“羊”是西洋引进品种，天生基因就存在缺陷，被“狼”吃掉是必然的。现在好了，通过三十多年的改开，有了本土的“羊”，还有了本土特色的“狼”（一只喜欢披上羊皮的狼，大概

是愿意同羊做朋友的狼），都可以通过变更其基因，使得“羊”具有一些“狼”的特征，也使得“狼”具有一些“羊”的特征，羊可以吃肉，狼可以食草——“毛邓合”。对立消失了，羊狼同舟共济，可以共进晚餐了。这样的整体论思想的确令人耳目一新，但整体是由局部有机构成的，这不能不让人想起一则关于猫和老鼠的寓言故事：“一天，老鼠们研究怎样消除被猫吃掉的威胁。为此召开大会集思广益。经过反复讨论以后，有一只老鼠提出：‘如果在猫脖子上挂个铃铛，我们一听到铃声，不就能及时躲起来，不叫猫逮住了吗？’众老鼠盛赞这是一个天才的想法。有一只始终没有发言的老鼠这时候开口问道：‘可谁去把铃铛挂在猫的脖子上呢？’”是的，有谁见过一只脖子上挂着铃铛的猫呢？

观点二，“狼”轻易把“羊”吃掉，并且变成了一只“披着羊皮的狼”，这必然导致敌我难辨，在羊群中引起极大的混乱。首先，持这种观点者通过长期反思，认定自己是“羊”而不是“狼”，羊食草狼食肉，其自然属性无法改变，且二者是对立的，不奢望狼不吃羊而变种为食草动物。其次，比较强调“羊”本身存在着某种缺陷，主张需要通过“公民社会”这种模式培育新品种，扩大羊群规模，增加羊群吸引力。最后，借鉴历史上的群众运动经验，尤其是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增强“羊群”辨别和对抗“披着羊皮的狼”的能力。但持这种观点者还没有找到“消灭狼群”的政治路线图，只是正在试图对未来“羊群”的愿景作出描述。

观点三，“羊”轻易被“狼”吃掉，不是“羊”有问题，而是“狼”太狡猾。但“羊”的巨大吸引力，“狼”的臭名昭著，可能迫使“披着羊皮的狼”变成一只“羊”。目前来看，此种一厢情愿已经少有人相信了。

观点四，“羊”被“狼”吃掉，是生态环境制约，是客观规律，是阶级力量对比的结果。当前的问题是如何增加“羊群”的力量和智慧，推动力量对比向着有利于自己的一面变化。“披着羊皮的狼”本质上就是“狼”。“羊群”曾经是因为“狼”披上了羊皮而受到迷惑，21世纪初以后却是被“美化了的狼”所迷惑。但是，这种观点却不能令人信服地回答，为什么这只“狼”始终要披着羊皮不脱的问题。

贺合林显然跟巩献田、晨明等观点比较一致，反对提“新社会主义”这个概念，认为郭松民、秋石客和卢麒元等人的这种提法是扛着毛主席旗号的“修正主义”。这一观点值得商榷。首先，郭松民与秋、卢的观点是不同的，通过遗传育种技术改造羊的品种与通过转基因技术企图使羊具有狼的某些特征是大不相同的。其次，说他们是“修正主义”不甚恰当，就像我们不能说普鲁东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巴古宁的无政府主义、杜林的社会主义是“修正主义”一样。最后，郭还不清楚究竟要继承马列毛的什么，秋卢却是在根本上反马列毛的，二元论实质上就是一元论。

本人认为，修正主义必须是打着马列毛旗号为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或者已经夺得领导权而仍然打着马列毛旗号的。前者与后者主要区别在于修正主义是否掌握了“国家政权”（“国家再好也不过是在争取阶级统治的斗争中获胜的无产阶级所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恩格斯语）。掌握国家政权之前的修正主义是国际共运内部的一种小资产阶级思潮，是路线斗争，与无产阶级的斗争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掌握国家政权之后的修正主义却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两个对立的阶级的阶级斗争，是對抗性矛盾。

当前的问题是，羊同狼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但在形式上却表现为“羊”和“披着羊皮的狼”的斗争。这不能不说是一场复杂的斗争，是敌中有我，我中有敌，犬牙交错的斗争。不同于单纯的武装斗争，是在斗法，而不是斗“术”。

这里想起来了小时候看过的《三打白骨精》片段。我们要做孙悟空，但是却要做一个懂政治的孙悟空。孙悟空是认准了要打妖怪的，无论你变成村姑、村姑她妈还是村姑她爹。我们小时候谁不佩服火眼金睛七十二变武艺高强的孙大圣呢？但是，妖怪真正要捕获的唐僧沙和尚猪八戒，他们还没有这种鉴别能力，所以就一起反对起孙悟空了，把悟空赶走了，妖怪的目的就达到了。现在才明白，“火眼金睛”的孙悟空缺少的是政治，叫不懂“群众路线”吧！

现在正是“披着羊皮的狼”在执掌法杖，往往把敢于反抗的“羊”以莫须有甚至假以“披着羊皮的狼”的罪名给打掉了。就是人们通常说的“打着红旗反红旗”吧。毛主席之所以说修正主义上台必然是法西斯专政，是更坏的资本主义，是因为有过当家做主人体验的无产阶级必然要剧烈反抗这种倒行逆施，统治阶级必然要恩威并施，使用各种形式施以强力镇压。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可以，搞资产阶级的民主绝度不行。就像奴隶主之所以要给奴隶烙上印记戴上脚镣手铐，是因为他们的前身是自由民，他们对加于自身的统治有着剧烈的反抗。

但同时还有一种倾向，群众明白也罢糊涂也罢，是按照“羊”的标准要求这只“披着羊皮的狼”的，迫使这只“豺狼”不得不有所收敛也是事实。我们组织在一起学习马列毛理论，反对“修正主义”，开展红色活动是具有正当性的，是从特色政权里争取来的一点儿类似于传统资本主义国度里的“假民主”。在此条件下，一，通过现实材料教育大家认清“狼”的本来面目。这不能不付出一些代价，比如猪八戒好一口，必然先被妖怪掳掠了去，妖怪的面目就会有所暴露。毛主席给邓留党察看，也许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二，群众有了认识，而妖怪终极目标是唐僧，矛盾必然激化，群起而斗妖，“妖怪，看你还往哪里跑！”

“修正主义”，新一代工人听不懂，新生代知识分子还可能排斥它，也许是历史被割断被歪曲所致。但今天活跃在各界的左派基本群众听得懂，老工人不但听

得懂，还能跟他们遭受的磨难相联系。因此，现实斗争中运用这一概念的实际意义还是存在的。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讲到的一段话有助于我们讨论或对待这一问题。他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对自己的朋友，本人认为还是慎用“修正主义”，以免造成思想的混乱，敌友不分。有些朋友也许只是同路人，可以一同走一程。借用 05txlr 网友为大家推荐的一段鲁迅的话来理解同路人吧。

“每一革命部队的突起，战士大抵不过是反抗现状这一种意思，大略相同，终极目的是极为歧异的。或者为社会，或者为小集团，或者为一个爱人，或者为自己，或者简直为了自杀。……因为终极目的的不同，在行进时，也时时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然而只要无碍于进行，则愈到后来，这队伍也就愈成为纯粹，精锐的队伍了。” ——鲁迅

《金融时报》、《华尔街日报》与中国经济

远航一号（2014年9月30日）

近日读报，看到几则关于中国经济的报道。本周一，英国《金融时报》发表了一篇关于中国经济的评述，认为中国经济已经出现所谓“平衡表衰退”的风险。所谓“平衡表衰退”，是“balance-sheet recession”的直译。如果译为“资产负债衰退”，所表达的意思略微清楚一些。简单地说，这种“资产负债衰退”就是由于私人企业和居民长期过度负债，最终导致无法还本付息，进而被迫大幅度缩减开支以降低资产负债率而引起的衰退。这个词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日本陷入长期经济停滞以后开始流行起来的，后来又被用来描述美国、欧盟、英国在2008-2009年世界经济危机以来的困境。

现在，据说中国经济的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已经从2008年底的147%上升到了今年6月份的251%。随着负债投资难以持续，中国经济也出现了“资产负债衰退”的风险。虽然自4月份以来，中国的中央银行频频出台所谓“微刺激”措施，不断向市场投放新的货币，无奈在企业负债居高不下的情势下，企业缺乏借贷意愿，导致各种货币刺激措施完全无效，并且经济已经出现了加速下滑的态势。

随着经济衰退的风险上升，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和争吵也比以往更加激烈。一派力量认为，经济暂时下滑，是为了所谓“改革”必须要付出的代价，不能为了刺激经济而放弃改革，尤其不能像2009年那样，实行“国进民退”，而必须按部就班地完成私有化和金融自由化。另一派力量认为，如果再不采取大规模的货币和财政刺激政策，经济就可能崩溃。随着经济下滑的趋势日渐明显，后一派势力有所抬头。

本周二，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北京盛传，习近平正在考虑，要在即将于10月份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免除周小川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职务。如果周小川免职，据信原证监会主席、现任山东省省长的郭树清极有可能接任。郭树清据信也是所谓的“改革派”。但是，如果周小川被免职，据《华尔街日报》认为，可能标志着“改革派”与“反动势力”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某种“微妙的变化”，“改革”的势头可能会被削弱。

2013年3月，周小川破例留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这一举动，据信是为了防止金融市场发生负面的反应。据《华尔街日报》分析，关于周小川即将被解职的传闻涉及中国经济决策圈内部的严重分歧。无论是“中央”还是国务院，原则上都赞成利率自由化。但是周小川试图向“中央”施加压力，迫使后者明确承诺利率自由化的时间表。周小川希望，在两年内完成存款利率自由

化。周小川试图说服“中央”，即使经济增长下滑，也要不惜代价按照原定步骤进行“改革”。

中国现在的政权，是国内外资产阶级利益在中国的总代表。除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以外，资产阶级的各个集团之间为了争权夺利也充满了矛盾。这些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有时还会白热化。资产阶级的各个集团与“中央”之间的亲疏远近也各有不同。就货币政策来说，产业资本的各个集团，包括房地产资本家集团、出口制造业资本家集团以及国有资本集团，一般希望将利率保持在较低的水平，以获取剩余价值中较大的份额。长期以来，国际金融资本虽然在中国经济中逐步渗透，但是迄今不能完全自由出入中国的金融市场，并且因为中国政府对金融市场的干预导致所谓“金融压制”，限制了国际金融资本分享中国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的范围和灵活程度。

周小川，作为国际金融资本在中国经济决策圈里的前台代表人物，长期以来，一直积极鼓吹开放资本市场和利率自由化。对于这种主张，“中央”原则上是赞同的，但是又不能完全不顾及其他各个资本家集团的利益，因此才提出资本市场开放、利率自由化只能“逐步地”、“有秩序地”进行。由于“中央”的改革步骤还不够快，不够坚决，这就引起了国际金融资本的不满，预示着“中央”内部还将围绕经济政策爆发更加激烈的争吵。

作为一个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专门从事出口制造业的半外围国家，中国的资本主义积累所依靠的，一是对广大廉价劳动力的剥削，二是对大量廉价能源的消耗和对环境的无节制破坏，三是对西方市场出口的不断增长。由于西方经济大国普遍陷于停滞、中国工人阶级的斗争不断高涨、各劳动阶级以及其他社会阶层的反污染斗争日渐兴起，中国资本主义积累的矛盾已经日益加深，而且找不到解决的办法。

面对当前的经济困境，中国的资产阶级当局还可能硬撑一个时期。首先，是可能实行减息并进一步加大货币供给。但是在企业部门普遍债台高筑并且利润率不断下降的情况下，减息未必能够制止企业投资下降的局面。如果减息不解决问题，李克强政府接下来可能采取的措施就是给资本家减税。李克强政府愿意给资本家送钱，但是资本家拿到钱以后是用来从事生产性投资，还是用于金融投机，还是索性连人带钱逃往国外，就由不得李克强了。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如果减息、减税两招都不灵，那么李克强政府最后只有步温家宝的后尘，暂时把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抛在一边，增加公共投资，搞一点“国进民退”，先稳住经济再说。

如果是这样，中国资本主义经济还可能再稳定几年。在这几年期间，工人阶级斗争将更加高涨，工资上涨的幅度会更大，环境会更加恶化，能源和其它资源的成本在暂时稳定以后会恢复上涨，利润率会进一步下降。

笔者目前估计，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真正的、严重不可克服的危机，恐怕还是在五年以后。当然，事实也有可能证明，笔者的估计是过于乐观了。让我们不妨拭目以待！

香港问题正在起变化

远航一号（2014年10月1日）

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政治形势正在发生急剧变化。目前，笔者掌握的资料仍然不很多，但是从初步了解的情况来看，此次香港的政治动荡已经卷入了香港地区的绝大部分劳动群众。覆盖整个香港地区的抗议示威参加者在数万人至数十万人之间，香港学联已经号召香港各大、中学开展长时期罢课，部分香港工人阶级已经开始罢工斗争。目前形势的发展，已经演变为一场由香港小资产阶级领导、工人阶级参与的广泛群众运动。这场群众运动，在形式上是要求完整的资产阶级民主，反对北京政府的高压政策，夹杂着地域歧视，以及绝大多数香港人口由于香港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特殊地缘政治地位所形成的优越感。但是就其实质来说，正在演变为香港广大人民群众反抗香港大资产阶级统治的斗争。

由于中国资产阶级、香港资产阶级与以及已经衰落的英帝国主义所达成的政治妥协，香港地区的资产阶级统治采取的是缺乏完整的资产阶级民主条件下的自由主义体制。这种体制，最大限度地保障了香港大资产阶级的利益，间接保障了中国资产阶级将香港作为资本主义复辟的样板橱窗以及连接跨国资本的枢纽这两项基本利益。但是，也正是由于这种畸形的政治体制，香港广大劳动群众以及小资产阶级处于政治上无权、少权的状态。

在香港资本主义完成了其“冷战”时期的特殊作用以后，香港资本主义逐步金融化、非物质化，原来作为国际资本剥削中国内地廉价劳动力的中转地所获得的超额剩余价值越来越少。香港资本家在暴富之余，已经不再愿意承担维持香港地区上层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相当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核心国家生活水平这样一个大包袱，从而导致香港资本主义原有的社会契约破裂。

香港地区地狭人稠，人民群众在思想上长期受到西方殖民主义、亚洲式资本主义以及封建残余的毒害，历史上的革命传统已经基本断绝，现实的政治和经济环境又不允许香港进行独立社会主义建设，连进行比较显著的再分配改良都很难做到。在这样的政治和经济困境下，香港地区严重的阶级矛盾只能以其它的形式表现出来，也就是以反对北京政府以及要求完整的资产阶级民主的形式表现出来。

后两者，毫无疑问，决不可能给香港劳动群众在目前带来任何现实的、物质的利益。然而，另一方面，香港旧有的阶级妥协格局也即将被完全破坏。由于国内、国际阶级斗争的各种因素，中国资产阶级目前也不可能取缔香港现有的不完整民主条件下的政治自由。不是说，中国资产阶级仁慈；而是说，如果取缔香港的政治自由，中国资产阶级就要背上一个巨大的包袱。有一个基本法的体制，香港劳动人民的包袱要由香港资本家来背。没有了基本法体制，中国资产阶级就要直接背上香港几百万人的包袱，其政治代价、经济代价，均极其巨大。不到万不得已，中国资产阶级当局不至出此昏招。

综合以上各种力量起作用的结果，香港的政治动荡将长期化，香港资本主义将无可挽回地衰落下去。香港的阶级斗争以及中国内地的阶级斗争向来不是相互孤立的，而是相互起作用的。香港人民反抗大资产阶级的斗争将经常激励、鼓舞着中国内地各地方人民反抗资本家压迫和剥削、争取基本政治和经济权利的斗争。在香港人民斗争中产生出来的先进分子，当他们认识到仅仅在香港斗争，是改变不了香港人民命运的时候，会成批地加入到汹涌澎湃的内地人民斗争中来。在抛弃了旧香港殖民主义、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反动

残余以后，香港人民斗争的成功经验将在更广阔的全中国人民斗争的舞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纲举才能目张——关于香港问题要抓主要矛盾

远航一号（2014年10月1日）

项老的文章是红色中国网友先贴在红色社区论坛，我误以为是项老本人已经完稿，于是就作为正式文章发表出来了。不过，现在既然已经发表，由各位同志共同来讨论，也是好的。

我本人也写了篇即兴文章，是在华岳论坛上看了若干报道以后即兴写出的。今晨分别读了《金融时报》和《华尔街日报》，对于香港群众运动的规模和性质有了进一步认识。

关于香港问题，我个人看法，马列毛左派的各路积极分子在急于做政治表态之前，还是首先要了解一下香港阶级斗争的实际情况及其对中国内地阶级斗争的影响。香港“占中”势力的领导者，在政治上无疑是幼稚的乃至反动的（反共、反社、反华），也有少数香港本地的进步力量（其中多数也是反华的），但是其阶级基础毫无疑问是香港工人阶级和小资。而香港所谓的“亲中”力量，其阶级基础毫无疑问是香港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在香港本地，能够认识到香港工人阶级与内地工人阶级的长远根本利益一致，能够认识到香港的进步事业只有通过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完成的，这样的进步力量，不是说完全没有，也可以忽略不计，更谈不上夺取群众运动领导权。

面对这样错综复杂的阶级斗争形势，我们急于表态，有意义吗？对于香港形势有任何影响吗？

但是，这并不等于说，香港的阶级斗争是没有意义的。香港的阶级斗争无论其表面的号召是什么，民主也好，港独也罢，其最终效果只有一个，那就是把香港资本主义搞乱，把香港资本主义搞垮！这对谁有利，谁心疼？毫无疑问，香港资本家心疼；与香港资产阶级密切联系的内地资产阶级心疼！害怕香港乱的中国资产阶级心疼！与中、港资本主义利益相关的亚洲各国资本、欧美跨国资本心疼！

除了香港劳动人民要受些苦以外，于内地的工人阶级有任何损失吗？于中国无产阶级的斗争有任何不利吗？各位亲爱的同志们哪，凡事都要动个脑筋！什么事都讲得那样直白，在网站上也就罢了。未来的政治斗争将更加艰巨、更加复杂，敌、我、友往往是纠缠在一起的，黑白分明的事极少。

大家看，前两天，我还在为修正主义问题与沙海之舟同志辩论。我写了关于香港问题的即兴文章，他就献了花。前几天，05txlr 同志刚刚批评了我，现在是不是为香港问题又要批评我呢？当然，这些都是在“我”或“友”的范围内。

还是毛主席说的，无论阶级斗争形势怎样错综复杂，要抓主要矛盾，纲举才能目张。对于中国的马列毛左派来说，当前阶级斗争最主要、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对于中国无产阶级的长远胜利有利还是不利？凡是不利的，我们就反对；凡是有利的，我们就支持。由于相当一部分群众暂时不理解，我们暂时不便公开表态的，就不表态。古语说，作壁上观，未尝不可。

致红色中国网友：欠很多朋友一声同志

新愚公（2014年10月17日）

想要说的话很多，一时又不知道从何说起。既然专门抽出时间来回应前一段时间的质疑，那干脆将以前想说但没有时间说的话都顺便说出来。内容可能不成系统，想到哪里说哪里，就算是给自己一个自言自语的机会，一边回应网友们的疑问，一边厘清自己的思想脉络。

说实话，这是我写过最难写的文章，写完上面的那段开场白之后，就不知道该如何继续写下去。最近一直在追问自己几个问题：为什么要到红色中国网来当编辑？我想要找回自己来这里的初心；是不是真的是我错了，而红中网上的某些网友是对的？我想用客观的第三视角来审视我自己的心态；有没有可能是我自己变了，工作、生活让自己变得更世故、更圆滑或者更懦弱，不敢面对真正的革命热潮？我需要排除自己在现实中是在“叶公好龙”。这些问题我现在仍然没有答案，估计一时也找不到答案。没有面临末日，就无法得到末日审判，一切都在变化之中，无论是此时“最小资”的“我们”，或者是“最革命”的“他们”，一切都是不确定的，在未面临真正的生死关头之前，谁也不知道自己会如何表现。若真正的刀斧加身，枪弹临头，会如无数先烈一样的那样坦然面对吗？我期望自己能够，但无论怎样的追问自己，我都无法在现在给出一个肯定的答案。从小就对“死”这个概念感兴趣，而对我影响最大的历史镜头有几个：一个是谭嗣同拒绝避难日本，慨然赴死，“我自横刀向天笑”，何等的豪迈；一个是瞿秋白就义前说“此地甚好”，盘腿就坐，含笑饮弹；严格说来他们两个都是文人，都是书生，他们绝不曾象李逵那样手拿两把宣花大斧在人群中砍瓜切菜，但他们是心目中真正的英雄。当历史需要的时候，我能象他们一样吗？我不知道。那么，现在那些恨不得现在就拿上宣花大斧冲进特色朝砍瓜切菜的“最革命者”，他们能做到吗？我现在也不知道。但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扪心自问，为了心中的道义，我们能够承受多大的代价？

“愿嚶鸣以求友，敢步将伯之呼”，这是99年前主席以二十八画生为名征友时引用的一句古诗。主席当时之所以要征友，他在给萧子升的信中写到：“近以友不博则见不广，少年学问寡成，壮岁事功难立，乃发内宣，所以效嚶鸣而求友声”。俗话说单丝不成线，独木不成林，天下事乃天下人之事，只有集众人之智，合众人之力，才可以做众人之事，而众人之事，即是政治。那么为什么我要到红色中国网来当编辑？曾经拒绝过很多网站的邀请，一是时间有限，二是更愿意自己写而不喜欢看别人写，所以都回绝了。之所以来这里，最初是因为对朋友的绝对信任，可以说是在朋友后面“跟到走”；但后来坚持留下来则是因为“红色中国”这几个字，让“特色中国”变回“红色中国”应该是我们所有编辑和大多数红中网网友共同的愿望，因此在红色中国网上汇聚让中国回归红色的“众人之识”和“众人之力”，这就是我留在这里的初心。那么现在这个初心还在不在？应该说还在，之所以对这里有些失望，正是因为红中网上的整体氛围与“聚众”这个目标有偏差。有容乃大，只有包容才能聚众。聚众就得求同存异，聚众就得取长补短，将目光聚焦在“同”上，发现人之“长”，接受人之“长”；反省己之“短”，超越己之“短”，只有这样红中网诸君才会相互提携、彼此促进，才会共同成长。但现实却与之相反，部分网友的行为模式是专寻人之短，

一言不合，一语之差，即是敌人；凡是不支持的，则都是在反对；凡是反对的，那都是你死我活的敌人，不看一个人的主要立场和主要观点，专门吹毛求疵，主要精力都用在抓伪共“特务”上，这样怎么可能聚众呢？郭松民在文中依照国内舆论环境的语境，不小心使用了一个“邓小平同志”，于是马上惹来一群人围攻，无限上纲，我真想问问那些批评者——现实中，你们真有这么纯粹吗？在我看来这其实算“最革命者们”的红色“文字狱”，红色中国的网友，不应该这么狭隘。最近在和网友争论的过程中，经常使用“最革命”这个概念，如果没有严格定义那就是一顶帽子，那与我刚才批评的部分网友的行为其实如出一辙。这里就描述一下我所反对的所谓的“最革命者”们，“最”在数学上表现为二阶导数为零；在文学上则是“东家之子，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着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总之“最”是某一个范围内的极限值，是曲线中的顶点，因此“最革命者”就是革命群体中的极限值，其他人不是这里太长就是那里太短，“唯我独革”。在他们看来，如果甲是坏蛋，而乙不明确反对甲，那么乙必然也是坏蛋；丙如果不明确反对乙，则丙也是坏蛋；丁如果不反对丙，则丁同样是坏蛋……，以此类推；同样的逻辑，如果甲是“坏蛋”，而“我”反对甲，乙居然不支持“我”，则乙也是坏蛋；丙居然不反对乙，则丙也是坏蛋……，继续类推，问题二就化归为问题一。在数学上这类函数会急剧收敛，最终的收敛点总是会归结为“我最革命”，这就是我所谓的“最革命”模式。凡是有这种思维模式或者行为模式的人，无论观点是左还是右，都属于“最革命者”，极左和极右是相通的，通就通在他们的思维模式行为模式是一致的。最终都表现为极端的个人主义——“我最XX”，“我”就是“东家之子”。不希望这种风气在红色中国网上盛行，心灰意冷，是因为莫可奈何。

那么有没有可能就是我错了呢？中国的现状已经到了临界点？而此时此刻社会正剧烈塌缩，社会巨变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我的信息有限，我不知道其他地方如何，反正在我生活的范围内完全感受不到那种气氛。去年和一个左翼朋友见面畅谈之后，我送他去地铁，然后一个人站在天桥往下看，密密麻麻的人群从下面穿流而过，那时薄事件正是热点，我当时琢磨在这么多的人中间，会有人为了薄受到的不公正而驻足停步改变他们当天的日程安排吗？看稀奇瞧热闹的也许会有，但该回家的会回家，该上班的上班，该上学的上学，赶路的会继续赶路，有的三朋四友约着要吃火锅喝啤酒，有的精心打扮之后要去约会见网友……，人潮是汹涌，但每一个大脑中都装着他们各自的目标，都有各自的计划，要将这汹涌的人潮汇聚成社会历史中的滚滚洪流，需要什么条件呢？要将这“万头攒动”的混沌变成方向一致的有序状态，一定有内在的规律。当时在天桥上我没有找到答案，后来经常琢磨这个问题，逐渐就有了一些自己的看法。看过一本叫《协同学》的书，其中对于秩序的突然涌现有专门的研究，当“相变”发生时，系统中会出现所谓的“序参量”，在序参量的作用下其他的参量会消失，最后只保留很少的几个参量。社会状态的改变，实际上也是一个“相变”的过程，要让混沌的人群出现秩序，至关重要的是必须有“共同的目标”（也就是物理现象中的序参量），而“共同目标”要取代个人目标，有两点很关键，一是个人目标模糊不清，二是共同目标简单明确。如果一个社会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清晰明确的个人目标，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有路可走，那么人群是很难形成秩序的，用更通俗的话说，但凡人民群众还有路可走，那么社会“相变”是很难发生的，除非共同目标的诱惑力足够大，大到可以让群体成员舍弃自己的个人目标。所以，按照老百姓的说法，只要还过得去，很少有人会去折腾那些“公平、正义”的社会概念的，只有当人们走不下去了，生活无法继续了，才会将目光集中到这些事情上来。以这次香港占中事件为例，本来“普

选”确实是香港几乎所有人的共同诉求，甚至包括特区政府里面的高官，甚至连梁振英都可能是赞成普选的，“普选”的本质是特区政治从中央独立出来，这对地方领导人来说是很有诱惑力的，所以香港民主派占中向中央要普选权是有坚实的民意基础的，但可惜的是大多数人要“普选权”的诉求远远比不过他们诸如上班、赚钱、娱乐、跑马、泡妞等个人诉求来得强烈，所以一旦香港人发现争取普选权的代价太高，影响到他们的个人目标，民意马上转向，不然一开始时怎么没有听见有“反占中”人士的声音呢？他们不出声的原因是学生们占中要普选这本来就符合他们的心意，学生若能要到普选权他们是会乐享其成的。说句题外话，对于香港社会整体而言，现在反占中人士的声势越大，他们收获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就会越多，特色中央的一贯行为模式都是大棒之后给糖吃，这样占中、反占中两派人士分别在不同的时候扮黑脸红脸，联手从特色中央手里要糖吃，这才是香港人的最大利益所在。回到正题上来，现在中国社会到了相变点了吗？我个人的判断是保守的，现在老百姓是有各种各样的诉求，但大多数人的生活都还能继续，有班上、有钱挣，虽然不公平，但日子都还能过，那么每个人头脑中的个人目标就是最优先的目标，所以在大家都忙于生活的状态下，要提出一个能置换老百姓生活目标的共同诉求，这很难。所以，现在中国社会总体还是稳定的。那么什么时候会失衡呢？我个人还是倾向于外来因素将导致国内人民失去个人目标，最大的外来因素将是美国。现在中美关系其实很诡异，美国重返亚洲压迫中国的生存空间，最可能发生的事情是引爆国内的地方债务危机，地方债务危机会演化为中国的金融危机，而中国的金融危机则会通过天量美国国债作用到美国金融系统，于是美国的货币信用危机被引爆，于是引发全球金融危机，美国为了挽救他们的美元地位，开始在亚太挑动热战，于是中日危机演变成西太平洋的局部战争。于是，中国就必将再次走到生存还是死亡的临界点，国人的个人目标被群体生存目标所取代，社会将再次来到了相变点。所以，我个人的判断是现在大多数中国老百姓的日子还能过得下去，目前也没有谁提出一个能让大多数老百姓接受的共同诉求。因此，现在就想要过“革命瘾”的网友们恐怕得失望了，目前社会变革的条件还不具备，要么去好好的过自己的小日子，要么就踏踏实实地在道义上做准备，当历史时刻来临时才有人能够担当。要立马就卷起千堆雪、翻起万重浪的想法是不现实的。

基于以上对社会现实的判断，所以我不觉得自己因为生活而变得圆滑、世故、软弱。是不是叶公好龙也得等到了那个时候才能确定。

由于对红色中国网上狭隘的讨论气氛不满意而心生去意，后来在主编、代主编以及部分网友的劝慰下决定留下来。这次离开的诱因是“ahjoe”网友的一篇《别矣！红中网编民柳实/新愚公和“吴为同志”们！》

（<http://www.redchinacn.net/portal.php?mod=view&aid=21476>），这样一篇在我看来明显是胡搅蛮缠、而且威胁网站编辑的帖子，居然得到了很多红色中国网网友的支持，这让我非常失望，网友之中，如果只有派性标准，没有是非标准，那么我为什么要留在这里为他们耗费我宝贵的时间呢？另外，上网十多年，经历过大大小小的网站也算不少，但从来没有遇到像是在红色中国网上这样的情况，更可悲的是我自己是这个网站的编辑。后来主编远航一号告诉我要习惯做少数派，那么我就用一种全新的心态回到红色中国网来，原来我是将红中网当成自己的精神家园，这里的每一个网友都是我的论友，但我估计对现实估计得过于乐观，所以今后难免会将部分网友当论敌，尽管我一再对自己说要团结，可如

果有些人的目标就是要在网上制造分裂，那么团结这样的网友就是自寻烦恼。所以，今后在我当值的时间段中，对于破坏网站团结的那极少数网友，我会带上我自己的倾向管理帖文及其发言，这是作为编辑的权力也是编辑的职责，希望这点能得到大家的尊重。

这一次让我深受感动的是 laobing 网友的一段话：

【laobing 2014-9-11 00:31

首先由衷地感谢红中网编辑们用自己的业余时间给大家一个可以发表意见、探讨学习的地方。

我是搞技术的，现在主要写程序，虽然也算写作，还有几十个程序员的写作班子，但是对政治、经济、历史、文学确实外行。我在倒薄时开始上红中网，除了个人经历，也因为对诸多问题的“不确定”，来学习交流思考，“弥补自己的视觉盲点，从而取得进步。”期间从网友身上受益不少，比如跟这帖的几个下过乡、当过兵的网友分享亲历的文革进程，帮我澄清了不少云里来雾里去忽悠人的说法。其它的我就不说了，作为多吃过几年高粱米的个人，以为在虚拟空间见识一下现实中难能一见的行为，对今后的工作、生活，再往大了说，革命，应该有好处。

所以从个人角度说，您的“这些期待基本”没有“落空”，所以作为一个网友，说声“谢谢”，所以作为一个有点农村、连队、技术经历的、自认为屁股坐在人民群众、信仰共产主义的人，非常欣赏您一篇时评中的句话，大意是像愚公那样一点一滴地为人民服务，总有一天会感动人民群众这个上帝。

除了在步兵连当战士时互相称同志外，只有原来所在研究所的技术领导一直称我 XXX 同志，革命同志，深刻也温暖。今天我把自己从网友身份上拔高一下：感谢新愚公同志。。。】

laobing 同志，您的问候和那一声同志我收到了，我也接受了。谢谢您。我这里要特别说明一下，我对“同志”这个称呼看得很重，志向相同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在某时某刻的同路人，虽然大家在一个方向上努力，但彼此的志向也不一定是相同的。所以，同路，还能同志，这是难能可贵的一种状态。这里也要特别向一位左翼前辈道歉，他可以算是整个中文互联网非常早的左翼网友，并且一直坚持，当时对他称呼的那一声同志，我没有接受，现在想来我是过于矫情了，世界上没有永恒的东西，此时此刻大家志向相同，心灵相通，那么我们就是同志。另外，对于很多将我当同志的朋友，我也很少回应他们同志的称呼，这里我也想向他们道歉。同志，对不起啦。谢谢 laobing 同志，是你让我心里的这扇窗打开了。我会秉承我自己到红中网的初心，嚶鸣以求友，步将伯之呼，提高自己，成就别人，不辜负同志们的期望。

复新愚公 —— 关于几个经济问题

远航一号（2014年10月17日）

原编注：新愚公同志致各位红色中国网友的信发出后，就其中的几个经济问题，新愚公编辑与远航一号编辑交换了意见，转贴在这里，供各位网友参考。

远航一号：

想知道你对中国地方债务危机引爆美元信用危机这个观点的看法，因为你是专家。另外，对于革命形势的判断，我的估计和很多同志不一样。这点得请大家包涵。

新愚公

新愚公：

你好！太客气了。

事实上，我们周围的许多同志都不认为，革命形势是今年、明年或未来两三年就会爆发的事情。

我自己就这个问题写过一些东西。我认为比较稳妥的说法，还是未来五至十年，这样说是有政治、经济各方面根据的。

关于美国压迫中国引爆中国地方债危机等，你既然问起。我与你的估计确实不同。首先，我不认为有美帝压迫中国的问题，至少就中国资产阶级来说是。他们的根本利益乃至大部分近期利益都一致。当然也有差别，否则不能解释中国与俄罗斯的关系。但是美、俄对抗是主要的，而美、中一致是主要的。再没有比朝鲜问题能更明确地说明这一点了。

从经济上说，单是地方债的问题，倒还属于肘腋之疾，不至于致命。中国资本主义未来的问题，根本的是工人阶级的兴起，其次是环境能源的制约，其次是利润率的下降，三管齐下，必致其命。这一点，还是有规律可循，并且多少可以用数据来证明的。你说我是专家，我也不是混饭吃的，多少还是可以负一定责任的。

你在信中，多次提到对周围人群的看法。对于社会革命的研究，有点像对地震的研究。不能仅仅观察地表，而是要努力探究地下能量积累的过程。要了解地下能量积累的过程，要懂地震学的原理，还要进行测量，要积累数据，逐

步从各种偶然现象中发现其中的必然规律。而要研究社会革命，就要有阶级分析的方法，要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并且也不能仅有理论模型（甚至仅仅是导师的只言片语），还要积累大量的观察、数据。当然，中国资本主义还是个新事物，过去还没有遇到过危机。但是，凡是资本主义就有一般规律。世界资本主义有几百年历史了，其它资本主义国家危机与革命的经验，还是可以观察到的。中国历史上革命和改朝换代的经验也可以借鉴。1989年的历史教训，也可以参考。有了这些历史经验，再加上科学的研究方法，就可以做到既不是坐在那里天天盼革命、盼天上掉馅饼，又不会因为经常被日常人群所包围（我们所有人都遭遇到这种情况），于是就觉得变化遥遥无期，乃至灰心失望，直至最后“成熟”、老去、死亡。

我现在人到中年，从事政治活动有25年了，从右派到左派，又到马列毛。岁月蹉跎，已经少了几分锐气，但于未来的信心更加坚定，原因之一，就是从来不在主观上幻想革命马上爆发一类，而是在现实斗争中努力地活学活用马列主义。当然，我也不是神仙。科学研究，也有误差。马列毛等导师对于未来的设想与现实历史的发展也会大相径庭（但是也领导世界人民取得了伟大胜利）。但是，那又怎样，搞革命也好，搞科学研究也好，都是在前进中不断修正自己足迹的过程。历史总是要向前进的，总是要起变化的，这是绝对的规律。

受你的启发，多写了几句，供参考。

远航一号

只要资产阶级无办法，最后无产阶级总归有办法

远航一号（2014年11月27日）

近日，收到某马列托主义倾向同志（不是本网的“马列托主义者”网友）来信，其中有如下一段建议：

我有一个郑重的建议：希望红中网做一些工作，把争取罢工入宪的意义与某厂工人维权联系起来，给工人一个政治上的建议，并提供左翼运动促进工人斗争（变为真正的工人运动）的支点。争取罢工入宪，可以成为进一步串联全国工人斗争、促成真正意义的工人运动的契机。但是不要提什么罢工权专门立法。

某地工人今天到市政府、省政府上访，几名民主派的“公民”领导了工人行动，民主派人士受打压，算是暂时捞了政治资本；不过这事情本身，说明工人开始有公开联合政治人士的意识。希望更多左派，更有担当，形成网络呼应，介入到工运中发挥更显著的积极影响，而不是任由民主派、自由派、改良派去影响工人。

我给该同志回信，涉及到对当前斗争策略、时局、未来变化的一些想法，略加修改后，抄在这里，权代本周的红色中国时评。

某同志：

来信收悉。简单谈几点想法，供你参考：

1. 关于自由派影响工人问题。现阶段，绝大多数工人的斗争必然为经济斗争。目前中国工人阶级经济斗争处于上升、发展势头，阶级力量对比变化的趋势于工有利、于资不利，此乃大势。胜利的经济斗争，即有利于增加资产阶级的困难，有利于增强无产阶级的团结和组织。并有利于未来的危机和变化。故现阶段，不害怕若干自由派积极分子“领导”局部的工人行动。反过来说，在没有革命形势的条件下，在多数情况下，不经过长期、持久的工作，即使马列主义者领导、影响了若干工人经济斗争，其对工人积极分子的影响也难以持久（也有反例，后述）。故对于若干自由派积极分子的参与，目前一般可泰然处之，只在于我特别有利时，在自由派积极分子的干预明显对工人现实斗争构成障碍时，再与之展开斗争，予以揭露，争取工人积极分子向我靠拢。

2. 关于争取罢工入宪等问题，我个人意见，此等问题，除非革命形势，并不能解决。目前并非革命形势，亦非前夜，与工人直接经济斗争亦有相当距离。过早地发动和动员工人积极分子投入类似工作，当局必镇压，于工人直接斗争无益，反而可能将初步产生觉悟的工人积极分子扼杀于萌芽之中。类似工作，自由派积极分子有优势，而马列主义各派并无优势。虽如此，如有同志愿意做这方面工作，红色中国网自然积极配合。

3. 目前，名义上在马列毛旗帜下的各派别差别甚大。海外，目前以做针对进步小资产阶级的宣传鼓动为主；国内，目前以做老工人和地方左派（造反派）为主；均有局限。但马列主义各派目前在新工人工作方面实际上颇有发展。属

于泛马列毛系的各派青年融工团体发展甚速，其中较大一派内部已经布尔什维克化，但属于严重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另有一支，形式上以改良主义面貌出现，但实质上属于马列主义积极分子领导（非毛非托），在做新工人工作及培养长远新工人骨干方面，目前属于最成功者。

4. 有同志为保存力量计，采取韬晦的办法，我个人认为完全正确。

5. 长远方面，应对危机有信心，对革命有信心。要相信历史唯物主义，相信中国工人阶级的未来最低要求必然超过中国资本主义所能容忍的最大限度（故诸如罢工入宪等问题只有在有革命形势时才有杀伤力）。但同时要反对速胜论，要做五年乃至十年的准备。然而十年以上的可能性，亦不大。对于自由派积极分子参与工运，不害怕，不阻止，但必要与有利时，也与之展开斗争，以斗争求团结。并且要有这样的准备，即随着阶级斗争形势的发展，不仅工人积极分子会向马列靠拢，即使自由派积极分子中一小部分也可能追求进步乃至革命。在资本主义正常发展时期，以经济斗争为主，不急于发动政治斗争。但在革命形势来临时，又要准备群众觉悟的发展一天胜过以往的一年，在政治斗争中迅速发展。

6. 未来变化的基本形式，是天下大乱，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无产阶级政权要敢于善于在资产阶级薄弱环节生存发展。估计，将不会有稳定有效的资产阶级民主政府。到了那个时候，目前各地的工农群体性事件就会成十倍、百倍的发展。可能出现这样的局面，在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时，某个地方的几万、几十万群众在夺取了地方政府标志性建筑以后，就不走了（目前这样的事件已经发生，但事后群众总会退去），而是开始组织地方自治性民主政权。资产阶级中央政府可能去攻打。到一定程度，可能就会发展到短时间攻打不下来，从而鼓励更多地方自治性民主政权。或者虽然攻打下来了，但是过程十分惨烈，从而引起全国公愤，中央政府合法性彻底丧失。或者地方自治性民主政权太多，攻不胜攻，打不胜打，不得不放弃攻打，然后雨后春笋。这样的地方自治性民主政权，可能为自由派暂时领导，可能为马列主义者领导，也可能完全群众自发。均不要紧。革命有它自身的逻辑，群众一旦起来，就要满足他们自身的要求，工资、住房、教育、医疗、惩办地方贪官恶霸等。不能满足这些要求者，将很快垮台。资本家一开始逃亡，就会逼迫地方政权接管其厂矿。

7. 主要的结论是，未来时局，资产阶级必然无办法，不能满足无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最低要求，不能恢复资本积累所必需的有利条件。只要资产阶级无办法，最后无产阶级总归有办法。

以上各项不成熟意见，供你参考。其它各项分歧，如毛托之争，你我之争，若干具体政治问题之处理等，均可在马列主义大原则下，在未来阶级斗争实践中，逐步解决，或保留分歧、求同存异。

远航一号

中国的马列毛左派要敢于走前人和外国人没有走过的道路

远航一号（2014年12月10日）

读到龙翔五洲网友转来的进步青年网文章“组织起来，准备战斗——《韩国工人》读后感”，读后有些意见，写一篇短文，与各位网友以及战斗在国内工人运动前线的各位青年同志探讨一下。

进步青年网同志在编者按中提出的问题是**对的**：那就是要有日常的思想 and 理论的积累，要了解、比较各国工人运动的斗争经验。但是这篇文章也有着**一个不小的、严重的缺点**，那就是就事论事的比较中国、南朝鲜工人运动的斗争经验，并进而得出中国工人运动不如南朝鲜工人运动的结论。作者也意识到，南朝鲜工人运动现在事实上已经陷入僵局、裹足不前，如此说来，中国工人运动岂不是前途一片黑暗，连工联主义的前途都没有，又谈何社会主义革命？

目前，中国的无产阶级日益壮大，工人斗争方兴未艾。为了更好地了解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方向，我们既要认真了解、比较各国工人运动的历史经验，更要防止盲目照搬其它国家工人运动的模式，特别是要避免走其它国家工人运动已经证明走不通的弯路和死路。南朝鲜工人运动今日实际上已经走入死胡同，一个重要教训，那就是他们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激进、火爆，但是实际上陷入了工联主义的泥潭，由于不能够将工人运动的巨大潜力转化为社会主义革命的要求，无论南朝鲜工运还是左派力量都已经处于进退维谷的被动地位。照抄、照搬南朝鲜工人运动的失败经验，并以之为中国工人运动的楷模，决非中国工人运动之福。

就客观历史条件来说，南朝鲜资产阶级在美帝国主义的庇护下，可以将其廉价劳动力产业转移到中国，并且发展局部的高技术产业，从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转嫁并且克服资本主义危机。南朝鲜，由于被美、日帝国主义所包围，高度依赖世界资本主义分工，又面临着北朝鲜原社会主义严重异化的问题，客观上亦不具备独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脱离上述这些主客观条件，而盲目比较中国和南朝鲜的工人运动，是毫无意义的，甚至可能严重挫伤中国工人运动的自尊心和自信心。

中国劳动人民有着世界上最深厚、最光荣的革命历史传统。中国的马列毛左派继承了近现代以来最优秀的理论传统。自资本主义复辟以来，中国工人阶级进行了可歌可泣的反私有化斗争以及日益广泛的反剥削斗争。目前，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的阶级力量对比正在发生有利于无产阶级而不利于资产阶级的变化。在世界各大地理区域中，中国目前是**唯一一个**这样的区域，只有在中国，工人

工资的增长速度正在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这一变化，正在导致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利润率的下降以及资产阶级各方面矛盾的加深。对于这些有利于中国工人运动的主客观条件，很多同志仍然缺乏充分的、清醒的认识，因而导致了局部的失败主义、悲观失望主义以及由这种失败主义引起的局部的小资产阶级盲动。

中国的无产阶级队伍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这支队伍中包括着一些在世界工人队伍中拥有最先进觉悟的先进工人。在未来的阶级斗争中，这样的先进觉悟必将为数量越来越广大的工人同志们所掌握。中国的马列毛左派不仅继承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切优秀传统，而且继承了中国革命的一切优秀传统，并且正在与日益壮大的中国无产阶级有机地结合起来。中国的马列毛左派，应该有这样的信心和决心，那就是，中国的无产阶级将发展并且壮大起来，中国的无产阶级将不仅走好前人和外国人已经走过的道路，而且必将走出一条前人和外国人没有走过的崭新道路，以自己在未来斗争中的伟大胜利来证明不愧于自己的光荣历史。

在伟大的中国无产阶级面前，一切妄自菲薄的观点都是毫无根据的！一切悲观失望、无所作为的观点都是毫无根据的！一切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的观点都是毫无根据的！争取完成前人和外国人没有完成的事业，争取取得前人和外国人没有取得过的伟大胜利，这就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历史命运。